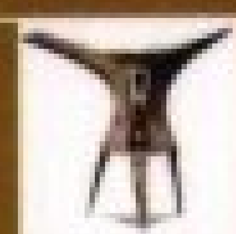
HISTORY Students

中国读本 

宋朝史话

吴泰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历史特级教师鼎力推荐

《中国读本（史话分卷）》丛书是目前所见学生历史读物中最好的。一是丛书的各单本作者都是史学界的专家学者，这保证了内容的专业性；二是丛书的内容深浅适中，既体现了大纲要求，又有所拓展，可以作为课内知识的有效补充，很适合学生阅读。同时，本书也适合老师们作为资源来储备。

——白幼蒂（北师大附属中学历史特级教师，北京市高级中学实验课本编委）

本套丛书是按照新课标要求进行编辑的，扣住了教学大纲，既体现了教学重点，又有适当的延伸，对拓展学生知识面很有必要，是一套质量很高的学生课外读物。

——李明赞（北京四中历史特级教师，国家新课标高中历史教材编撰者之一）

此书最大特点就是将知识、学术融为一体，既有严谨治学态度、科学辩证唯物史观，又能够栩栩如生描述再现一个过去，语言表达通俗易懂，人生哲理深入浅出，满足了不同学生的学习层面要求，更有助于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和知识的拓展。对于青少年学习、探究历史，《中国读本（史话分卷）》无疑是一部难得的好书。

——范桂英（北京十五中学历史特级教师，市级骨干教师）





ISBN 978-7-5078-3083-5

9 787507 830835 >

定价：25.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朝史话 / 吴泰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10
（中国读本）
ISBN 978-7-5078-3083-5

Ⅰ.宋… Ⅱ.吴… Ⅲ.中国—古代史—宋代—通俗读物 Ⅳ.K24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4318号

宋朝史话

著　　者	吴　泰
责任编辑	凭　林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232千字
印　　张	17
印　　数	5000册
版　　次	2009年10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10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083-5 / G・1281
定　　价	25.00元

出 版 说 明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
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光被遐荒。
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这是半个世纪前我们祭祀轩辕始祖——黄帝时留下的华美篇章。

我国是有着6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而不懈的考古挖掘，还在不断延伸着她的历史源头。放眼全球，我泱泱中华，江山多娇；检点历史，我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从《周易》到《诗经》，自《天问》而《警世钟》，六七千年，流淌不息。这里既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浩然博大，也有“何必马革裹尸还”的坦荡豪壮；既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贞刚烈，也有“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的忠奸判定。曾经长时期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华文明，为人类的进步无私贡献出了自己无数的珍藏。

曾几何时，延绵几千年的中华文明遭遇了暂时的挫折，“打倒孔家店”的激愤一度让很多人盯上了西方的月亮。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发展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让媚外的思潮重新暗流涌动。但与之同时，过度物质化了的西方国家，却把他们的目光重新投向东方文明的古邦，试图从中找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良方。为此，我们曾一度犹豫彷徨，当一片飞叶被远风捎来时，我们因分不清它来自仙草还是毒藤而迟疑；当一堆泥沙被湍流冲去时，我们为

说不清它含金蕴宝还是藏垢纳污而烦躁。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曾经徘徊在一些人心头的迷茫逐渐扫去，重视传统，回归本源，从中华文明中寻找持续进步的动力重新成为热门话题。清理我们的文化遗产，描绘她的真实面貌，发扬她的优秀传统，规划她的锦绣前程，是当代中国人既严肃又富有魅力的历史使命。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脉络者，我们的历史是最应珍视的一笔遗产。但中国历史博大精深，古籍文献、文书档案浩如烟海，一部中国史，真不知从何处说起！

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我社约请、组织在史学界享有崇高声望的老一辈历史学家，精心编撰了这套《中国读本》丛书（中国历史史话分卷）。本分卷共16分册，分别是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上、下）、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上、下）、五代、宋朝、元朝、明朝、清前期和晚清。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作者在专业研究的基础上，以大手笔撰写小文章，在各分册中，对该断代的重大事件、经济发展、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社会生活、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科技发展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既有专业的厚度，又不乏诙谐和幽默，文笔平实流畅，通俗易懂。

历史是一个辉煌的存在，历史学是一门智慧之学、启迪之学，我们衷心希望广大的读者朋友能从这套丛书中寻到灵感，从6000年历史积淀中汲得智慧，熔铸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崭新的智慧王国。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9年6月1日

开 头 语

——略说两宋

宋代的历史，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时期。北宋建都于开封，历时167年。南宋建都于杭州，历时150年。另外，在南宋灭亡后，一部分南宋官员又拥立帝昰、帝昺两个小皇帝，继续用宋朝旗号坚持了三年的抗元斗争。因此，宋朝的历史共达320年。

宋朝建立后，逐步消灭了各个割据政权，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重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宋朝的统一只是局部统一。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不是当时中国的统一王朝。北宋时，有辽、西夏同宋对峙。南宋时，则有金朝雄据淮河、秦岭以北的中国北方，南宋只能偏安一隅。

辽、西夏和金朝都是当时中国境内某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不断对宋朝进行侵扰。后来，南宋又受到北方兴起的蒙古的侵扰。而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在对付外患方面都软弱无力，最后都被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所灭亡。这种形势使得两宋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呈现尖锐而又错综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是民族矛盾始终比较尖锐，有时甚至成为主要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在当时土地兼并恶性发展，阶级矛盾本已异常尖锐的情况下，为了应付外患，统治者又加强各种赋敛的榨取，使得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北宋初年皇权过分膨胀所带来的弊病也暴露出来，宋朝的统治经常危机四伏。统

治阶级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痛感不能再按照原样统治下去，他们提出了改革的要求，而统治集团中的许多人却因为种种原因反对改革，这就使得统治阶级，尤其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十分尖锐。种种情况，都给人以宋代历史一片黑暗的印象。

腐败和黑暗，是宋代历史客观存在的一面，但并不是当时历史的全貌。宋代的历史，还有光辉灿烂的一面。

在社会经济方面，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的一个时期。宋代的“积贫”只是指政府因冗官、冗兵、冗费所产生的财政匮乏，并不是当时的社会经济不富庶。当时的农业发展虽然各地区不平衡，但因为圩田的垦辟，水田面积增加，荒地更多地开垦，耕作技术的进步，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总的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唐代。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浙地区，单位面积产量达到每亩六七石，出现了“苏常熟，天下足”的谚语，成了中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宋代的手工业更是呈现五彩缤纷的繁荣景象。中国传统的丝织业，不仅产品数量更多，织作技术也更加精湛，出现了一些新的织作工艺。瓷器的制作，在宋代更像繁花争艳，无论瓷窑的数量，制作工艺和形制，陶瓷美学等方面，都有重大的发展。造船、造纸、矿冶也都有长足的进步。印书业作为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兴手工业部门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在商业方面，不仅涌现了像北宋时期的开封和南宋时期的杭州等繁荣的商业中心，而且涌现了大量的镇市和乡村集市，形成了联系城乡、遍布各地的商业活动网。在城市的商业活动中，则突破了唐代坊、市的界限，商业活动也不像唐代那样限制在白天进行。纸币的出现和流通，更是宋代社会经济发展史上一件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事。这都反映了宋代国内商业比前代更加繁荣，更加发展。海外贸易在宋代也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

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古代引为骄傲的四大发明中，活字印刷术是这时期发明的，火药和指南针则在宋代取得重大的技术突破，火药被广泛应用于军事方面，指南针被应用于航海活动中。这三大发明，都对后来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数学、

天文学、医药学等许多领域，宋代也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宋代著名的科学家沈括，被世界公认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在文学艺术和史学方面，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灿烂的时期。散文方面著名的唐宋八大家，有六家在宋代。在宋代发动的诗文革新运动，对中国古代的文风和文学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宋词的成就，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瑰宝。宋代出现的话本，则是后代章回白话小说的先河。宋代的史学，更以各种新体裁史书的编纂及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对后代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有宋一代，也是中国历史上英豪辈出的一个时代。政治家王安石的“三不足”精神，文学家欧阳修、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人的精深造诣和创造性的成果，布衣毕昇和科学家沈括的发明创造，岳飞、文天祥等人的高风亮节，都表现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富于斗争精神的光辉传统，在后代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

如果把宋代置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加以考察，就不仅可以看到，宋朝的局部统一，是由五代分裂到元朝空前大统一的重要环节。而且还可以看到，宋代的历史出现若干承前启后的因素，它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半个世纪以来，宋代历史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注意。人们对宋代历史的新特点，宋代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问题，进行了许多研究和探讨，在国际学术界出现了宋史热，形成了宋史研究的国际性合作的局面。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虽然对于宋代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问题意见分歧颇大，国外有的学者提出的宋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发展，宋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的论断显然不符合历史情况，但是，宋代的历史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却是史学界所公认的事实。

从北宋初年起，宋朝就把“不抑兼并”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加以推行，纵容和鼓励大官僚大地主广置庄田，还通过“输钱印契”的手续，从法律上承认土地买卖的合法性，保护地主兼并所得土地

的所有权。这就使得唐代均田制崩溃以后发展起来的庶族地主土地私有制，得以更加迅速地发展。土地所有权迅速转移，“千年田换八百主”，“田宅无定主”，连国家所掌握的官田，在宋代也大量转化为地主的私田。在宋代还第一次出现了“田主”的称谓，这也是地主土地私有制发展的一个反映。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和土地所有权的迅速转移，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到宋代所出现的一个特点。

封建生产关系发展到宋代，也有一些新变化。租佃制进一步发展，实物地租成了占支配地位的地租形态，在实物地租中，定额租又有所发展。货币地租在宋代的某些地区也有所发展。当时地主对农民的压榨尽管还是非常残酷，在某些地区，佃农还遭受严重的人身奴役，但是，在多数地区，佃农同地主建立了书面的租佃契约关系，租约期满就可以离去。唐代“客户”的含义到宋代也发生重大的变化，“客户”已成了佃客的代称。佃客编入官府的户籍之中，成了“编户齐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再像唐代那样作为地主的“部曲”。这都反映了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了。

在宋代，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商品货币经济也有较明显的发展。这除了表现在手工业的繁荣和商品流通的加强外，还突出表现在农业生产同市场联系的加强方面。当时不仅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商品，如粮食、茶叶及果品等等，宋朝政府实行的“折变”以及熙宁变法的一些理财措施，都促使农民把更多的农产品投放到市场上以变易现钱。此外，雇佣关系在宋代也有较大的发展，农村中雇工的现象经常可见，城市中则有许多临时寻找生计的短工。官府手工业中普遍实行唐代出现的雇直制度。四川井盐业中经营筒井的豪民，雇工达四五十人之多。熙宁变法中推行的“募役法”，也是顺应了雇佣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这种雇佣劳动虽然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自由雇佣劳动，但却清楚反映了宋代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长期以来，因为杨家将故事、包公的故事、说岳、水浒故事的流传，许多读者对宋代的历史并不完全陌生。但是，由于这些小说故事及以这些故事为题材的戏剧有许多虚构，许多读者通过这些文艺形式所获得的历史知识，并不完全符合宋代的历史真实。本书的写作，就是想用尽可能通俗易懂的文字，把宋代历史的一些主要方面介绍给读者，使读者能对宋代历史有个比较清楚、比较准确的了解。

目　　录

第三章　北宋的赋役制度

第四章　北宋的社会经济

第五章　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和变法运动

第九章 南宋的腐朽统治和农民起义

第十章 蒙古南侵及南宋灭亡

第一章　北宋建立和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重建

一、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北宋的建立

公元959年六月，正当壮年的周世宗柴荣突然病死，后周宰相范质受顾命扶助柴荣年仅五周岁的幼子柴宗训继立为帝。

从公元907年朱温灭唐，到周世宗病死，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已经延续了半个世纪。在短短的53年中，中原的王朝已经换了五个朝代，有八姓、十三个皇帝登台。其中许多皇帝都像匆匆来往的历史过客，依靠手中掌握的兵权在一次兵变中登上皇帝宝座，很快又像走马灯似的被骄兵悍将赶下宝座。周世宗是五代比较有作为的一个皇帝，他推行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措施，严惩贪官污吏，破格选拔人才，重视法制，特别是针对过去骄兵悍将难以驾驭的积习，着手整顿军队，严肃军纪，建立了一支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精锐禁军，加强了中央集权。这一切，使得后周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大大加强。周世宗也在这一基础上着手进行统一战争，先后夺取了后蜀控制的秦（今甘肃天水）、凤（今陕西凤县东）、成（甘肃成县）、阶（甘肃武都）及南唐控制的江北、淮南十四州。又北击契丹，夺取了契丹占据的宁（河北原青县）、莫（河北任丘）、瀛（河北河间）三州及瓦桥、益津、淤口三关。五代分裂的局面已出现结束的征兆。但是，就在北击契丹的途中，周

世宗因患病不得不回师，回到开封不久就病死了。这时，后周出现了“主少国疑”的不稳定气氛，一个由掌握兵权的武将策划的政变计划也在酝酿着。

周世宗曾经协助其养父郭威举兵灭亡后汉，建立后周。对于武将拥兵夺取政权，他是有所防范的。他曾命令禁军将领赵匡胤把从各地招募到都城的“壮士”精选出尤其强壮的人，编为殿前诸班，作为皇帝的宿卫亲军，使殿前司统辖的殿前诸班成了禁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又另设侍卫马步军司同殿前司分掌禁军，就有着防范藩镇和武将拥兵夺取政权的意图。他在伐契丹途中见到一块上面写着“点检做天子”的木块，产生猜忌，临死前即把任殿前都点检这一禁军最重要职务的张永德罢免，晋升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夺取后周政权的，正是这个他认为可以信任的赵匡胤。

赵匡胤祖籍涿郡（今河北涿县），其父赵弘殷，是后周的一员高级将领。赵匡胤在后周因为屡立战功，深受周世宗的赏识。他受周世宗委托，选择最精强的壮士编成“殿前诸班”，又以殿前都虞侯、殿前都指挥使的衔头直接指挥这支禁军中最精锐的部队。这样，赵匡胤就牢牢确立了自己在这支最精锐禁军中的权威，在这支军队中培植自己的势力。在周世宗病死前，他又成了殿前司的主帅，掌握后周最重要的军权，许多禁军将领也都是赵匡胤的亲信。周世宗一死，后周就没有任何人的势力可以同赵匡胤抗衡了。五代时期，谁有兵权，谁就有做皇帝的资本。后周在周世宗壮年突然病死所出现的那种“主少国疑”的动荡气氛中，赵匡胤夺取政权也就势在必然了。

公元959年十一月，河北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定县）的急报传到开封。说是割据山西的北汉会合契丹兵向后周发动进攻。后周执政大臣范质等人不辨真假，即于公元960年正月初一决定派赵匡胤率军前去抵御。这就给了赵匡胤一次难得的发动兵变的时机。军队刚调动，开封城中就出现了将“册点检为天子”

的舆论。具体组织兵变的人，是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后改名光义）和亲信赵普。正月初三日，赵匡胤统率大军离开都城，当晚到达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兵变计划即付诸实行了。

这一天晚上，赵匡胤的一些亲信在将士中先散布议论，说当今皇帝年幼，将士即使出死力破敌也没有地方去领功受赏，不如先拥立赵匡胤为皇帝再出发北征。将士的兵变情绪很快就被煽动起来了。这时，赵匡胤假装喝醉酒睡觉去了，由赵普出面，要求参加兵变的将士严格管理军士，不得趁兵变剽掠，以安定都城人心，保证“兴王易姓”顺利进行。第二天凌晨，赵匡义和赵普率领兵变将士来见赵匡胤。赵匡胤假装酒醉未醒，慢腾腾地起床，将士立即把一件事先准备好的皇帝登基的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并下拜称呼万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黄袍加身”。

陈桥兵变后，赵匡胤迅速回师开封。

守备都城的主要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都与赵匡胤有私交，是赵匡胤的“义社兄弟”。陈桥兵变一发动，赵普就派人同他们联系。赵匡胤一回师开封，石守信和王审琦即开城接应。在开封的后周禁军将领中，只有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在仓猝间想率兵抵抗，但还没有召集军队就被军校王彦升杀死。陈桥兵变的将士兵不血刃就控制了后周的都城开封。这时，后周宰相范质等人才知道不辨军情真假就“仓猝遣将”是上了大当，但已经无可奈何，只得向赵匡胤跪拜，帮助赵匡胤举行禅代的仪式。赵匡胤遂正式登皇帝位，改封后周恭帝



宋太祖

柴宗训为郑王。因赵匡胤在后周任归德军节度使的藩镇所在地是宋州（河南商丘），遂以宋为国号，定都开封。这个以开封为都城的宋朝，历史上被称为北宋。赵匡胤死后被尊为宋太祖。

二、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巩固政权的重大措施

宋太祖依靠自己所掌握的禁军大权，轻而易举地夺取后周政权。他深知掌握禁军兵权对自己统治的重要性，因此，宋朝一建立，他就吸取后周灭亡的教训，加强自己对禁军的控制。

在宋朝刚建立的第一年内，参与及支持陈桥兵变的禁军将领都以拥立之功加官晋级。慕容延钊升任殿前都点检，高怀德为殿前副都点检，韩令坤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为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王审琦任殿前都指挥使，赵光义为殿前都虞侯，张令铎为马步军都虞侯，张光翰为马军都指挥使，赵彦徽为步军都指挥使。慕容延钊和韩令坤继续在外守边、巡边，允许他们随宜处置军政事务。宋太祖通过这样的人事安排，既安抚了带重兵在外的慕容延钊和韩令坤，取得他们对兵变的支持，又使统率京城禁军的权力掌握在发动兵变、拥立自己的亲信将领手中。

建隆二年（961），宋太祖鉴于当时已经控制了局势，开始着手解除这些禁军重要将领的兵权。

这一年闰三月，慕容延钊与韩令坤回到京城朝见，宋太祖趁机解除他们禁军主帅的职务，让他们到外地当节度使。因为殿前都点检是宋太祖黄袍加身前担任过的职务，从此不再设置，由石守信接替韩令坤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

在这以后，赵普又向宋太祖提出不应该让石守信等长期掌握禁军的人继续留任，提醒宋太祖，要他记住陈桥兵变的事件，避免类似的事件重演，使宋太祖下决心彻底解决禁军兵权的问题。

七月初九日晚朝，宋太祖把石守信等禁军宿将留下来喝酒。当酒兴正浓的时候，宋太祖突然让侍从都退出去，叹了一口气，对石守信等人说："我如果不是靠你们出力，到不了这个地位。但是，做皇帝也太艰难了，实在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个晚上都不敢安枕而卧啊！"石守信等人惊骇地问为什么。宋太祖就说："这不难知道，我这个皇帝位谁不想要呢？"石守信等人听了，知道这是话中有话，都慌忙下跪说："陛下何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还有异心呢？"宋太祖说："话不能这么说。你们虽然没有异心，然而，你们部下想要富贵，一旦以黄袍加你之身，你虽然不想当皇帝，能够办到吗"？一席话，软中带硬，使这些将领知道已经受到猜疑，弄不好就有杀身之祸，一时都惊慌哭泣起来，要求宋太祖指明一条"可生之途"。宋太祖缓和了口气，开导他们说："人生在世，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所以那种企求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多积金钱，多多娱乐，使子孙免致贫乏而已。你们不如释去兵权，到地方去，多多置买良田美宅，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的产业，同时多买些歌伎舞女，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同你们结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不是很好吗"？石守信等人见宋太祖话已经说得这样明白，再没有回旋余地，当时宋太祖在禁军中的权威又还不可动摇，都只好俯首听命，表示感谢太祖的恩德。第二天，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人都上表说自己有病，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欣然同意，让他们罢去禁军职务，到地方当节度使。只有石守信还挂上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的职务，但只是挂名而已，并不掌握兵权。宋太祖也真的同他们结成姻亲，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后来又把女儿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张令铎之女则嫁给太祖三弟赵光美。这就是所谓"杯酒释兵权"。

在解除石守信等宿将的兵权后，宋太祖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禁军将领，又使禁军将领互相牵制。这样，黄袍加身事件重演的隐患就消除了。

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耶?”

——“先南后北”统一战争方略的实施

北宋刚取代后周的时候，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并没有结束。在北宋北边，有强大的契丹及契丹卵翼下的北汉。南边和西边，有南唐、吴越、南汉、后蜀等较大的割据政权。此外，在今天的福建和湖南、湖北，还有留从效割据漳、泉一带，周行逢割据湖南，高保融割据荆南。这些大小割据势力中，北汉依靠契丹的支持，同北宋为敌。南唐虽然慑于北宋的兵威，想方设法讨好北宋，但暗中却对北宋严兵以待。后蜀和南汉统治者也极力想继续保持割据地位，对北宋持敌对态度。只有吴越顺从北宋，但也继续割据一方。

宋太祖在后周时曾积极参加周世宗对周围割据政权的统一战争。在确保对整个原后周统治区的牢牢控制及“杯酒释兵权”后，他也想把周世宗开始的统一事业继续进行下去。最初，他曾经想把北汉作为首要目标。为此，他向私交甚深的张永德询问“下并汾(指北汉)”之策。张永德对他说:“北汉兵虽少，但很强悍，加上有契丹的援助，不可急取，只有慢慢派间谍去做离间工作，使北汉得不到契丹援助，同时经常派少量兵马进行骚扰，使其不能正常进行农业生产，待其困弊，才可以下手。”有一天晚上，大雪纷飞，宋太祖又冒雪走访赵普。赵普惊奇地问他为什么雪夜来访，他说:“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赵普听出太祖是来同他研究统一战争的方略，就问太祖有什么“成算所向”。太祖说:“吾欲收太原。”赵普听了，沉默了半天才说:“非臣所知也。”太祖要他发表己见，赵普分析说，先打太原，有害无利，“何不姑略以俟削平诸国，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这一分析，同张永德的意见异曲同工，使宋太祖大为高兴。一个先消灭

西、南方各个割据势力，后消灭北汉的统一战争基本方略就这样确定了。这就是后人所归纳的“先南后北”方略。

北宋的统一战争，基本也按这个方略进行。对辽和北汉，北宋在削平南方割据势力前，基本上采取守势，只在边境适当显示武力，并对来犯之敌适当反击。同时与契丹互派使臣经营和好，力图保持北方战线的暂时安定。对南方各割据政权和藩镇，宋朝则利用矛盾，抓住有利时机，各个予以削平。

建隆三年（962）九月，割据湖南的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死，其幼子周保权继任。盘踞衡阳的军阀张文表不服，发兵攻占潭州（今湖南长沙），企图取而代之。周保权派兵讨伐张文表失利，向宋朝乞求救兵。这就给了北宋一个出兵消灭这个割据势力的极好机会。当时北宋军队挺进湖南，要经过荆南节度使割据的地方。这时荆南节度使已由高保融之子高继冲嗣位。宋朝早已清楚探明，高继冲这个割据势力军队不过三万人，周围有北宋、南唐、湖南、后蜀的压力，内部则由于横征暴敛而不得人心，处于内外交困状态，很容易削平，于是就制定了以援助周保权讨伐张文表为名，“假道”荆南，一举削平荆南和湖南两个割据势力的计划。

乾德元年（963）正月，宋太祖命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李处耘为部监，会师襄阳，一面向高继冲提出“假道”过境的要求，一面率军向荆南挺进。当荆南割据集团内部还在争论是伏击宋军，不让过境，还是顺应时势，向宋投降以保富贵的问题时，宋军已抵达距江陵仅百余里的荆门（今湖北当阳县）了。高继冲这时还举止不定，派其叔父高保寅带牛酒到荆门犒劳宋军，以探听宋军的强弱。李处耘盛情款待高保寅，使高继冲以为宋军没有消灭荆南的意图，不再进行防备。当晚，慕容延钊又在帐中设宴招待高保寅，而李处耘则率轻骑数千加快速度向江陵挺进。这时，高继冲却还一心一意在等待着高保寅给他带回好消息。当他得知宋军已逼近江陵时，一时慌了手脚，只得仓惶亲自出迎。李处耘在江陵城北15里的地方遇上前来迎接的高继冲，即把高继冲扣留在宋军营中，

让他就地等待慕容延钊到来，自己则率亲兵先入江陵。等到高继冲回江陵，江陵全城的要冲都已经被宋军所控制。这时，高继冲只好献上荆南割据的3州17县，向宋投降。

宋军在削平荆南割据势力后，继续挺进湖南。这时，张文表已兵败被杀，但宋军却于三月迅速攻下岳州（湖南岳阳），又向周保权盘踞的朗州（今湖南常德）进发。周保权集团这时才明白宋军的真正意图，派兵抵抗，但很快就被宋军击败。李处耘用残酷手段处置被俘的湖南败兵，使湖南兵感到恐怖而很快溃散，朗州遂被宋军攻破。周保权逃入山谷僧寺中被宋军搜获，个别湖南将官聚众反抗也很快被宋军消灭。湖南14州66县结束割据状态，由宋朝直接管辖。

荆、湖两个割据势力的削平，使南汉暴露在北宋的兵锋之下，后蜀和南唐的侧面也暴露无遗。这就使宋朝获得了进军岭南、钳击后蜀和南唐的有利战略形势，也使这几个割据政权更加紧迫地感受到灭亡的威胁。

乾德二年（964），后蜀统治者孟昶派遣赵彦韬带蜡书暗中出蜀，企图勾结北汉夹击宋朝。赵彦韬把蜡书秘密献给宋太祖。在这以前，宋朝听说后蜀在加紧备战，也已决定着手消灭这个割据政权，并已经对后蜀军事力量和地形作了探察。所以，宋太祖一得到赵彦韬的密报，就高兴地说："吾西讨有名矣。"于是，宋朝就在这一年十一月命王全斌为西川行营都部署，率兵六万，分两路向后蜀进军。一路由王全斌、崔彦进率领，准备取道剑门（今四川剑阁北）入蜀。一路由刘光义、曹彬率领，由归州（今湖北秭归）出发，溯江而上。孟昶听说宋军来攻，命王昭远率兵抵抗。王昭远根本不会用兵，却把自己比成诸葛亮，吹嘘他一出马，不仅要击退宋军，取中原灭北宋亦易如反掌。可是，他一同宋军接触，就大败而逃，很快连剑门也丢失了。王昭远本人吓得股栗失次，无法站立，最后在一个仓舍中被宋军俘虏。溯江而上的宋兵也很快夺取夔州（今四川奉节）等川东数州。孟昶听说王昭远兵败，忙派太子

孟玄喆率兵向剑门方向增援。这个太子在途中听说剑门失守，立即回头，沿途放火而逃。王全斌率军很快攻到成都城下。乾德三年（965）正月，孟昶投降。宋朝从出师到占领成都，仅用65天，就消灭了后蜀。

继后蜀被消灭的割据政权是南汉。

刘氏割据南汉60多年，到最后一个统治者刘鋹时，统治更加残暴，统治集团内部自相残杀，荒淫昏懦的刘鋹也众叛亲离。宋朝在消灭湖南割据势力后，同南汉就偶有兵戎相见。在进军后蜀前夕，宋太祖从一个南汉俘虏那里了解到南汉政治腐朽黑暗的情况，知道可以用"救此一方民"的名义出师，决定着手消灭南汉。

开宝三年（970）秋，宋太祖让南唐主李煜写信给南汉刘鋹，要他向宋称臣，把南汉占据的湖南州县交给宋朝，遭到刘鋹的拒绝。宋太祖就于十一月派潘美为桂州道行营都部署，大举攻南汉。这时南汉的许多将官都已被刘鋹杀死，由几个宦官掌兵，军事设施皆毁坏失修，一听说宋军大举来攻，仓惶应战。宋军迅速攻占南汉在湖南的州郡，又越过南岭，破南汉的大象阵，攻占南汉的门户韶州（今广东韶关），于翌年二月迅速进逼广州。刘鋹想用船舶载金宝及妃嫔下海逃亡，船被宦官和卫兵偷走，想在广州负隅反抗又告失败，只好向宋军投降。南汉割据的60州、240县并入宋朝。

削平南汉后，宋朝加紧作消灭南唐的准备。这时的南唐主李煜是个善诗词、工书画、喜音乐的风流才子，政治上却一塌糊涂。

开宝七年（974），宋太祖为制造进攻南唐的借口，要李煜亲自到开封朝拜。南唐一些大臣认为李煜一到开封就会被扣留，南唐就会灭亡，加以阻止。宋太祖就于这一年九月派曹彬率10万大军进攻南唐。宋军用事先准备好的龙船和竹排，三天之内就在采石造好浮桥，迅速渡过长江。南唐这时已十分虚弱，连战皆败，南唐主李煜却还以为不用过虑，只顾在宫殿中和僧人、道士念经。宋军抵达金陵城下数月后他才知道已经危急，急忙派能言善辩的徐铉到开封乞求宋朝退兵。徐铉同宋太祖论争，说南唐对宋一向百依百顺，

没有得罪之处，宋兵师出无名。宋太祖按剑喝道："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耶！"严辞拒绝南唐的乞求。宋军围困金陵将近一年。曹彬执行宋太祖逼李煜投降，争取人心，不得滥肆杀掠的指令，一直对李煜进行劝降。直到开宝八年（975）十一月底，曹彬才在诸将发誓不对金陵进行洗劫之后，下令攻进金陵。南唐主李煜至此才被迫投降，并按曹彬的要求，命令其他州县停止抵抗。南唐境内除江州（今江西九江）据城固守五个月才被攻破外，其他州县都很快被宋军占领。南唐 22 州、军，180 县，并入了宋朝的版图。

南唐的削平，是宋太祖领导的统一战争胜利的高峰。在灭南唐的第二年八月，宋太祖又一次派兵大举进攻北汉。因宋太祖突然在十月死去，新登位的宋太宗需要时间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契丹又在此时出兵支援北汉，宋太宗下令全军撤退。这次攻北汉又半途而废。

宋太祖在有生之年所进行的统一战争虽然没有完全实现统一的愿望，"先南后北"方略只是基本实现了"先南"的部分，但是，从宋太祖对西、南各割据政权都一举削平，而亲征北汉却未能成功这一事实看，他所制定的"先南后北"方略，无疑是适合当时形势的，是正确的。

四、"强干弱枝"，分化事权

——宋太祖加强皇权的措施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不仅致力于进行统一战争，以求实现统一大业，还把重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以避免五代分裂割据局面重演的问题，作为当务之急，予以特别的注意。

有一天，宋太祖召见赵普，提出两个问题让他回答：为什么从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十二君，争战无休无止？有什

么办法可以从此息天下之兵，建国家久长之计？这些问题也是赵普早就有所思虑的事，他一听到宋太祖提问，就说：

“陛下能问到此事，真是天地神人之福。这个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根治的办法，也没有别的奇巧可施，只要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就安定了。”

赵普的话还没有说完，宋太祖就连声说：“卿不用再说了，我全明白了”。君臣二人想法一致。一个“强干弱枝”、重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计划就这样酝酿出来，并逐步付诸实施了。

解决方镇太重的问题，采用“强干弱枝之术”，是同统一战争同时进行的。其措施：

一是把节度使兼领的“支郡”收归中央直接管辖。宋太祖在消灭荆、湖割据势力后，就下令这些地区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都直属朝廷，取消唐末及五代时节度使兼领“支郡”的制度，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县”等地方官，三年一更换，直接对中央负责，向朝廷奏事，不再听令于节度使。其他节镇兼领的“支郡”也陆续收归中央直接管辖。

二是把原由藩镇把持的地方财权收归中央。在北宋建立的第二年，宋太祖就从中央派常参官去地方参加管理地方财政。乾德二年（964），又接受赵普的建议，下令各地方每年的财政收入除留少量应付日常经费外，其余的钱帛都要运送到京城上交中央政府，不得占留。翌年，又在各路设置转运使，掌管一路财赋。这样，地方的财权就完全收归中央了。

三是剥夺方镇节度使的司法权。建隆三年（962），宋太祖下令此后各州的死刑案件，都要报告朝廷，由刑部复查。各州管理司法的官员原由州府的牙校担任，开宝六年（973）也由朝廷委派通过科举录取的文官去担任。宋太祖还恢复各县县尉的建置，把原来通常由节度使亲随担任的镇将所掌的一县司法治安权力，夺到朝廷派去的县尉的手中。这样，地方的司法权也夺归中央手中了。

四是通过各种方式，剥夺节度使和地方的兵权。乾德三年

(965）八月，宋太祖下令各州长官把所部兵员中骁勇的人都选送到京城补入禁军，又选强壮的士卒定为“兵样”，送到各路，召募符合“兵样”标准的人加以训练，然后送到京城当禁军。这种“兵样”后来改用“木梃”代替。这样，各地方军队中的骁勇强壮者，就都被集中到京城当中央控制的禁军，地方军队就再没有“精兵”，而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编成厢军，只供杂役。地方再也没有军事力量可以同中央抗衡了。

通过这些措施，宋太祖确实把地方的“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朱熹语）。在北宋初年，虽然还有藩镇，但已不再有唐、五代那种专制一方甲兵、钱谷、生杀予夺的权力了。宋朝中央指挥藩镇，真正做到了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那样灵便。即使是带兵在边境并兼相位的藩镇节度使，只要皇帝一召见，就马上奔命而至。唐、五代那种藩镇对抗朝廷的情况不再出现了。

宋太祖一面削弱方镇的各种权力，一面又利用原有节度使死亡、迁徙、退休等各种机会，委派文官取代原由武将担任的地方长官职事。宋太祖曾说：“朕选儒臣干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使他们都贪浊，也不及武臣一人为害之大”。宋太祖不仅委任文官“知州事”，还在各州设置通判，让通判对知州进行监督，同知州互相牵制。可见，用文官代替武将任地方长官，是宋太祖彻底解决方镇难制问题的又一个措施。对于一些五代以来一直盘踞一方的节度使，宋太祖则干脆剥夺他们的节度使职位。开宝二年（969），王彦超等藩镇入朝，宋太祖又一次拿出“杯酒释兵权”的办法，设宴招待他们，等到他们酒兴正浓的时候，就从容对他们说：“卿等都是国家宿旧，长久在藩镇，事务繁多，真不是朕所以优贤之意啊”。王彦超因为宋太祖在落魄时曾投奔他，他没有收留，宋太祖当皇帝后，他一直担心宋太祖同他算旧账。这时听了宋太祖的话，明白是要他们自动辞去藩镇事权了，就忙着说：“臣本无勋劳，久冒荣宠，今已衰朽。辞职，乞骸骨，归丘园，正是自己的心愿。”

其他节度使却不识相，争着谈自己奋斗的历史，想保留职事。宋太祖却不客气地说："这些都是别的朝代的事，何足论！"第二天，就把他们的方镇职权罢免了，让他们作为悠闲的环卫官在京城奉朝请，实际上是让他们退休闲居。由于老的节度使或被夺了权力，或被干脆罢去藩镇职事，由文臣担任的地方长官已失去原来藩镇的性质。唐、五代的那种专制一方的藩镇，在宋初就逐渐消失了。节度使后来也逐渐变成一种优待有勋劳的大臣的虚衔。

在解决藩镇问题、把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的同时，宋太祖着手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军事制度和官僚制度进行改革，使中央军、政部门的事权分散，官员上下左右互相牵制，一切权力最后都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以彻底解决唐末、五代时期那种君弱臣强的问题。

军事制度的改革，主要有四项：

一是禁军由"三衙"分掌。太祖在"杯酒释兵权"之后，就把殿前副都点检这一职事也取消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则形同虚设，不掌实际兵权。掌管禁军的机构虽然还是殿前司和侍卫司两司，实际上却是由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及侍卫步军司三个机构分别掌管，称为"三衙"。"三衙"的长官称为"三帅"，分统禁兵，互不统属。"三衙"的主帅和主要禁军将领都由皇帝随意任命和撤换，只对皇帝负责。

二是握兵权与调发兵权分离。"三衙"虽然分别掌握着禁军，但却无调兵和发兵的权力。发兵、调兵的权力在枢密院。枢密院则只有发兵之权，而不能直接掌握军队。南宋的朱熹曾说："枢密院号为典兵，仓猝之际要得一马使也没讨处。今枢密要发兵，须用去御前画旨下殿前司，然后可发"。实际上发一兵一卒都要通过皇帝画旨，没有皇帝的命令，任何人都无权调动军队。

三是使京城驻军同外地驻军保持均衡，称为"内外相维"。宋初有禁军 22 万（一作 23 万），宋太祖把 10 万余部署在京城，10 万余分散到各路驻扎，使京城驻军足以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变乱，

也使外地驻军合起来足以制止京城驻军可能发生的内变，内外军队互相制约，都不能发生变乱。而京城驻军又多于外地任何一个地方，反映了宋太祖用兵保卫京城的“强本”意图。这样，皇帝也就可以保证牢牢控制全国的军队了。

四是使兵与将分离。无论驻屯京城的禁军，还是驻在外地的禁军，都必须经常调动。京城驻军要轮流到外地或边境戍守，有的则要到产粮食的地方就粮。这种轮流驻防的办法称为“更戍法”。军队的将领也经常更换。有紧急的事出师，将领由皇帝临时委派，兵事完毕，即兵归宿卫，将还本镇。这样，就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将官再也不能同士兵结合，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声望，也就再也不能率兵同朝廷和皇帝对抗了。

官僚制度的改革，主要有下列方面：

一是中央实行军政、民政和财政三权分立，宰相权力和地位削弱。

北宋前期的宰相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宋代以前，宰相是皇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军、政、财各种部门的事无不统。陈桥兵变前夕，后周宰相范质等让宋太祖出兵，就说明当时宰相是有军事权力的。北宋建立后，范质、王溥等人继续留任。因为他们是兵变后逼于形势才勉强拥护宋太祖登基的，所以不得不小心从事。宋太祖利用这一机会，罢去范质、王溥参知枢密院事的职事，剥夺了他们的军政和财政权力，实行三权分立。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财政大权不再归宰相所管的户部，而归三司使掌握。宰相只有管理民政的权力。其中枢密使与宰相地位相当，称为“二府”（宰相为东府，枢密为西府）。在宋代以前，宰相晋见皇帝，皇帝让他们坐下面议大事，还常赐茶招待，有着“坐而论道”的意思。宋初，宰相见皇帝时“坐论”和赐茶都取消了。有一种记载说，当时范质等人因为心存顾虑，每事都要向太祖报告，朝见时事情太多，无暇坐论，所以坐论和赐茶的制度无形中取消了。另一

种记载则说是有一天，范质等人奏事时还坐着，宋太祖说自己眼睛发昏看不清，让他们把文书送到他面前，等范质等人回到原处，座位已被撤掉，以后这成了制度。这两种说法虽然不同，但宰相见皇帝不再有座位，即从宋初以后成为一种制度，从形式上也反映了宰相地位的下降。

后来，范质等人罢相，赵普由枢密使调任宰相，三权分立的制度依然如故。宋太祖为了防止赵普擅权，又设参知政事，作为宰相的副手，以分宰相之权，后来又让参知政事同宰相分日知印押班。宰相的民政权力也被分散了。

二是实行职官的官、职、差遣三者分离的制度。

宋太祖以禅让的方式夺取了后周的政权，后周的整套官僚机构都被接受下来。各个割据政权被消灭后，许多官僚机构也依旧保留。旧政权的职官也都继续留用。这种政策使得宋朝团结了一大批旧政权的官僚，对稳定局势，巩固宋朝在原割据势力盘踞地区的统治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些旧机构和旧人员又显然不能适应重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需要，宋太祖对他们也难以信任。所以，尽管旧的机构和官职都保留了下来，宋太祖却没有再让他们行使相应的职权，而是另外差派官员，让他们在官衔上带着“判”、“知”等等字眼，去行使实际职权，使原来的旧机构丧失实际作用。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官与职殊，名与实分，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官”只表明一个官员的位品，作为领取俸禄的依据，并无实际执掌和权力。“职”只是一种荣誉头衔。只有“差遣”，才是实际职事，才拥有行政权力。在北宋初年，这种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既安抚了原来支持旧政权的官僚地主，又使宋朝皇帝在旧政权机器之外掌握了一部得心应手的行政机器，对政府各部门进行有效的控制。这对宋初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重建也是有好处的。

三是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宋太祖鉴于唐代科举考试中主考官同被录取的人由“座主”和“门生”的关系结成政治集团，进行派

系斗争，危害唐朝统治的教训，于建隆三年（962）下诏令禁止新中进士到主考官那里谢恩。又命令进士及第的人不得称春官（主考官）为“恩师”、“师门”，也不能自称“门生”。以后，又举行殿试，由皇帝亲自录取进士。这些经过殿试录取的进士，就成了“天子门生”。科举考试是产生文官的途径。在重用文官的宋代，宋太祖对科举考试的这些改革，也是加强皇权的一个措施。

宋太祖所采取的削弱藩镇权力的“强干弱枝之术”和分化事权、加强皇权的措施，使得北宋出现了一个“以大系小，丝牵绳连，总合于上”的统治体制。一个以皇权空前膨胀为特点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确立了。

五、“创业垂统”，稍逊风骚

——宋太祖历史功过概观

宋太祖在位共 17 年。在这 17 年间，他通过战争消灭了大多数割据政权，基本上结束了五代分裂割据的局面，奠定了北宋局部统一的基础，又重建了中央集权专制统治。这是他作为一个开国皇帝的主要业绩。

结束分裂割据局面和重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使北宋出现了一百多年局部统一的局面，这是具有进步历史意义的事情，也是宋太祖的重要历史功绩。

宋太祖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既有当时时势促成及宋朝力量比各个割据政权雄厚这些要素，宋太祖本人的谋略和素质，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北宋代周以前，后周已逐渐具备了统一的物质力量。周世宗整肃军纪制服骄兵悍将以及南征北战皆获得成功的事实，反映出一个中央权力加强、国家开始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已经出现了。北宋

建立之后，割据湖南的周行逢在病死前嘱咐其幼子和亲信在不得已的时候归附宋朝，以求家族得以安生。后蜀宰相李昊说：“我看宋朝建立，气势已不同于后汉、后周，一统海内，大概在这时了”。建议后蜀向宋朝纳贡，以“保安三蜀”。南汉一个官员也说，以前南汉是趁唐朝内乱才得以建立，天下乱得太久了，乱久必治，应该有所防备，并同宋朝通好。这些割据政权统治人物的话，既反映了当时各个割据政权统治已经难以继续维持下去，也反映当时统一已经是人心所向。宋太祖所以能获得成功，主要就在于他既有从后周那里继承来的雄厚物质力量，又顺应了当时的人心和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

宋太祖虽然是个行伍出身的专制帝王，在加强皇权方面不遗余力，但是，他决策问题却并不那么专横武断，而是善于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在统一战争中证明是正确的“先南后北”方略，就是集思广益的结果。剥夺方镇权力的许多措施，则是来自赵普的建议。据说在“杯酒释兵权”后，宋太祖想用天雄节度使符彦卿典禁兵，赵普提出反对意见。太祖说：“朕厚待彦卿，他哪能相负呢?”赵普却反问说：“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这句话一下子揭了宋太祖的疮疤，实在是够刺耳的啦。但是宋太祖却听了进去，从而打消了重用符彦卿典禁军的念头。正因为宋太祖能听取臣下的建议和不同意见，从而减少了决策方面的失误，也使像赵普这样有才能的政治家能充分发挥作用，群策群力，使宋太祖的统一事业获得成功。

在用人方面，宋太祖也能做到赏罚分明，不念旧恶。在消灭后蜀时，主帅王全斌等人贪残杀降，尽管有平蜀之功，还是被降职责罚。清廉的曹彬和转运使沈义伦都被特加优赏。有个叫董遵诲的武将，在宋太祖未成名时曾倚势欺侮宋太祖。在宋初，董遵诲有些过失被告发，以为宋太祖会趁机治他的罪了，想不到宋太祖却对他说：“朕方赦过赏功，哪会念旧恶呢?”继续予以信任，让他带兵守边，使得董遵诲感激万分，也更加用心守边，立下战功。对于那

些带兵出征或守边的武将，宋太祖也给予信任，授以方面之权。在出兵平南唐时，还以剑授曹彬，授以“副将以下，不用命者斩”的大权。在边境的守将，则凡是军中的事情，都让他们有自己处理的权力，还把地方的“筦榷之利”交给他们，让他们派人经商贸易，用所得钱财养募死士深入敌境刺探情报。这些边将也都能尽力守边。所以，宋初虽然解除了许多禁兵宿将的兵权，军事力量却没有削弱，新任用的将官都能胜任职事，北方边境得以安宁，南方各割据政权也都一鼓而下，迅速被消灭。宋太祖制定的“先南后北”方略所以能贯彻执行，同宋太祖在用人方面的知人善任、赏罚分明，使将官能尽责尽力，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赵普像

宋太祖采取措施分化事权、加强皇权，主要目的在于防止文官武将危害宋室的统治。但是，对大臣他却不随意猜疑。有一天，他到赵普的府第，正好吴越王钱俶送十瓶东西给赵普，说送的是海物。宋太祖让赵普打开瓶子，见瓶里装的都是用来贿赂赵普的瓜子金。赵普一时大为吃惊，忙跪下声明自己实在不知道里面装的是金子。宋太祖却坦然地说：“收下不要紧，他以为国家的事都由你书生决定呢！”一件本来可以兴起刑狱的事就这样平息了。对大臣不随意猜疑，使得宋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能够保持稳定的局面，这对宋太祖顺利进行削平割据政权及剥夺方镇权力两条战线的斗争，有不能忽视的作用。

可见，善于集思广益，听取大臣的建议和不同意见，用人能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对所信用的大臣不随意猜忌等等，虽然都是宋

太祖个人的素质，但都对他完成历史功绩起了一定的作用。

除了结束五代分裂割据局面和重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外，宋太祖作为一个“创业垂统之君”，还为宋朝制定了其他一些政策，如减刑罚、兴学校、重文官、轻武将、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的人。不抑兼并及把所有游惰失业的人召募为军队加以严格管制的养兵政策等等。这些政策有些也成了对宋朝影响深远的基本国策。

宋太祖所创建的业绩和制定的政策，有的有明显的进步意义，有的则对宋代历史产生消极的影响，如不抑兼并的政策助长了有宋一代土地兼并成祸，养兵政策对北宋则产生“冗兵”的问题，地方权力过分削弱、皇权过分膨胀等等，在后来也都成为北宋政治方面的弊端。从对历史的作用来说、宋太祖有功也有过。不过，比较起来，宋太祖在世时所创建的业绩，进步的方面还是占主要地位，宋太祖还是功大于过，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第二章　从锐意进取到“守内虚外”

一、斧声烛影，太宗继业

——平北汉和局部统一的完成

开宝九年（976）十月二十日，宋太祖突然在夜间死了，终年50岁。当时他的儿子赵德昭和赵德芳都已成人，皇帝的位置没有由儿子继承，他的弟弟晋王赵光义却在次日登上了皇帝宝座。这在秦代以后汉族皇朝的皇位继承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件。赵光义就是宋太宗。

这一事件在六年后，由赵普出面说是有个“金匮之盟”的秘密。原来，赵普虽然因为帮助宋太祖出面策划陈桥兵变，又在制定统一战争方略和削弱藩镇权力等重大决策中为宋太祖出谋划策，深得宋太祖的信任，但因利用权力做了一些贪赃枉法的事被发觉，太祖去世前就被罢去宰相职事。太宗初年，赵普多年郁郁不得志，就上书给太宗，说是他知道有个“金匮之盟”的事。据赵普说，早在建隆二年（961），皇太后杜氏在临死前，曾召赵普入宫立下遗嘱。当时杜氏对太祖说：“你知道这个天下是怎样得来的吗?”太祖说：“都是祖宗和太后的功德。”杜氏说：“不对。这是因为柴氏让幼儿主天下的缘故。如果后周有年长的君主，你哪能得到皇帝位！你百年后，应当传位给光义，光义传光美，光美再传给德昭。四海至广，能立年长的君主，是社稷的福气。”太祖表示一定遵从母教。杜氏让赵普当场在榻前记下这些话作为誓书，藏之金匮，由

谨慎可靠的宫人掌管。宋太宗按赵普提供的情况找来这个金匮打开，果然有这个誓书。赵普提供的这个“金匮之盟”，到底真实性如何已经无从稽考。宋太宗后来也没有传位给他的弟弟赵光美，反而借故治光美的罪。赵德昭后来也被逼自杀了。宋代的人对这件事的说法也不一样。例如，有的记载就说是因为太祖生病，听了一个道士说：“天上宫阙已成，王鐩开。晋王有仁心”，才夜召晋王赵光义让他继位。这种无稽之谈的出现，说明宋代有的人就不相信“金匮之盟”的说法。



宋太宗

兄终弟及这个异常的事件有“金匮之盟”作了解释，但宋太祖到底怎么死的，却有种种离奇的传闻。

宋朝官方编纂的国史和实录对此略而不载。野史的记载则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太祖听了一个术士的话，知道自己气数已尽，急召太宗到宫内酌酒对饮，安排后事。当时宦官和宫人都不让在场，只从远处见到烛影之下，太宗有时离开座位，作推辞的样子，后来又看到太祖拿柱斧砍地上的雪，大声对太宗说：“好做，好做”。最后，太祖解衣带就寝，太宗当晚也在宫内留宿。到凌晨，太祖就去世了。有的说是太祖宠爱原后蜀主的花蕊夫人费氏，那天晚上，太祖有病，太宗入宫问候，夜间见太祖睡熟了，乘机调戏费氏，太祖醒来，以玉斧砍他，皇后和太子闻声赶到，太祖已气息奄奄，太宗急忙出宫归自己的府邸，第二天清晨，太祖就死了。至于太宗即位的情况，说法也不一样。有的说太宗当晚一直留在皇宫里，太祖一死，就在灵前即位。有的则说，太祖死后，皇后让宦官王继隆召秦王赵德芳入宫，王继隆却直接跑去找当时任开封

府尹的晋王赵光义，让赵光义赶快入宫，否则，帝位将为他人所有。太宗入宫时，太祖的皇后大为吃惊，急忙说："吾母子之命，都托给你了"。太宗回答说："共保富贵，不用担忧"。于是，太宗登上皇帝宝座。这种种说法，都很离奇，真实情况也无从考查。所以，斧声烛影，就成了千古之谜。

宋太宗在后周时就开始戎马生涯。他参加组织陈桥兵变，北宋建立时任殿前都虞侯，成为禁军重要将领，后又任职位重要的开封府尹，位在宰相之上。在太祖外出时还作为东京留守，坐镇京城，看守朝政。在太祖逝世以前，他已经掌握了宋朝很大部分的权力。所以，他登上皇帝宝座后，没有出现什么波折就顺利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在北宋的皇帝中，宋太宗也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继承皇位以后，把宋太祖的统一战争等未竟事业继续进行了下去。

太平兴国三年（978）三月，吴越国王钱俶到开封朝见太宗。在这以前，吴越对宋朝一直顺从听命，当宋朝出兵灭南唐时，钱俶也按宋太祖的要求，出五万兵夹攻南唐。南唐灭亡后，钱俶到开封一次，受到宋太祖盛情接待。当时宋朝许多大臣都劝宋太祖扣留钱俶。宋太祖大概是考虑到南唐刚灭，有的地方还在据城反抗，还需要一段时间巩固在江南广大地区的统治，担心操之过急会在吴越地区引起反抗，不利于巩固在原南唐境内的统治，不仅没有采纳群臣的意见，反而把群臣主张扣留钱俶的奏疏都交给钱俶，使钱俶既惧怕，又感激不尽。事隔三年，形势不同了，宋朝已牢固确立了在江南的统治，宋朝消灭吴越的时机也成熟了。所以，这次钱俶带了大批宝物到开封朝贡，宋太宗在收下贡物后，既不说让他回吴越，又不明说要扣留他。钱俶要求除去吴越国王的封号和其他优待，只要求回吴越，宋太宗也不准许。钱俶当时自己身处宋朝都城，知道如果不向宋朝纳土，取消自己对两浙的割据，连性命都难保全了，就上表把原割据的 13 州、1 军、86 县交给宋朝。宋太宗这才点头准许，另对钱俶等人进行封赏，把钱俶的近亲和吴越的官吏都迁到汴

京。吴越国被削平了。

同一年四月，在留从效死后继续割据福建漳、泉一带的陈洪进，也逼于形势，自动取消对漳、泉2州14县的割据，向宋朝纳土。

南方的割据势力至此完全削平了。

接着，宋太宗就把消灭北汉的事提上了日程。

宋太宗在斧声烛影的迷幕中登上皇帝位后，虽然出于先稳定自己统治的考虑，把宋太祖派出攻北汉的宋军撤了回来，但并没有放弃消灭北汉的计划。鉴于北汉倚靠契丹援助及太原城池坚固不易攻破，宋太宗即位后，就着手从外交和军事两个方面，积极作攻灭北汉的准备。从即位的第二个月到太平兴国三年十二月的两年又两个月内，他先后派遣六批使臣到辽朝，对辽作出和平友好的姿态。对辽朝来宋的使臣，宋朝也盛情款待。通过这种亲善的姿态，把准备对辽支持的北汉大举进攻的战略意图掩盖起来，使辽放松同宋朝军事对抗的准备。与此同时，宋太宗则加紧精选将士进行军事训练。他亲自到造弓箭院视察，又筑讲武台于开封城西，亲自检阅禁军的演习，厚奖训练有方的将官。他还在靠近北汉的晋、潞、邢、洛、镇、冀等州加紧修造兵器及攻城器械。

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宋太宗任命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制置使，兵分四路，围攻北汉的统治中心太原。又命郭进占据太原以北的石岭关，阻击辽朝援兵。二月初，太宗下诏亲征，并由开封率大军向镇州（今河北正定）出发。除了中央禁军围城打援外，宋太宗还命令折御卿等人从各路向北汉进攻，使太原处于孤立境地，很快被宋军包围。

北汉皇帝刘继元见宋大军压境，急忙向辽朝求援。辽一面派使者来见宋太宗问伐北汉的原因，企图阻止宋朝进军，一面派兵驰援太原。宋太宗严辞对辽的使者说："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表示了强硬的态度。辽既未能阻止宋朝向太原进军，派来的援兵也于三月中旬在石岭关附近被早就埋

伏在那里的宋兵击溃，几乎全军覆没。太原被宋军团团围住，刘继元派出去向辽求援的使者也被宋军捕获杀死于城下。北汉兵出城偷袭宋营，也遭失败。守城的北汉将士见外援断绝，军心发生了动摇。而宋军又在太原周围修筑起长连城加紧围攻，宋太宗还亲临城下督战，并对北汉统治者发布了劝降的诏令。从三月到五月，在宋军的围攻和劝降的心理攻势下，守城的北汉官兵更加动摇，一些将官出城投降，刘继元的亲信纷纷逃散，一些北汉元老大臣见大势已去，也劝刘继元投降。刘继元被迫于五月初向宋太宗投降。北汉10州、41县并入北宋。北汉有名的将领刘继业见刘继元已投降，也释甲来见宋太宗。宋太宗见他投诚，非常高兴，即让他取消北汉的赐姓，恢复杨姓，单名业，给予厚赏，并让他继续领兵屯守边境。杨业入宋后成了抗辽的名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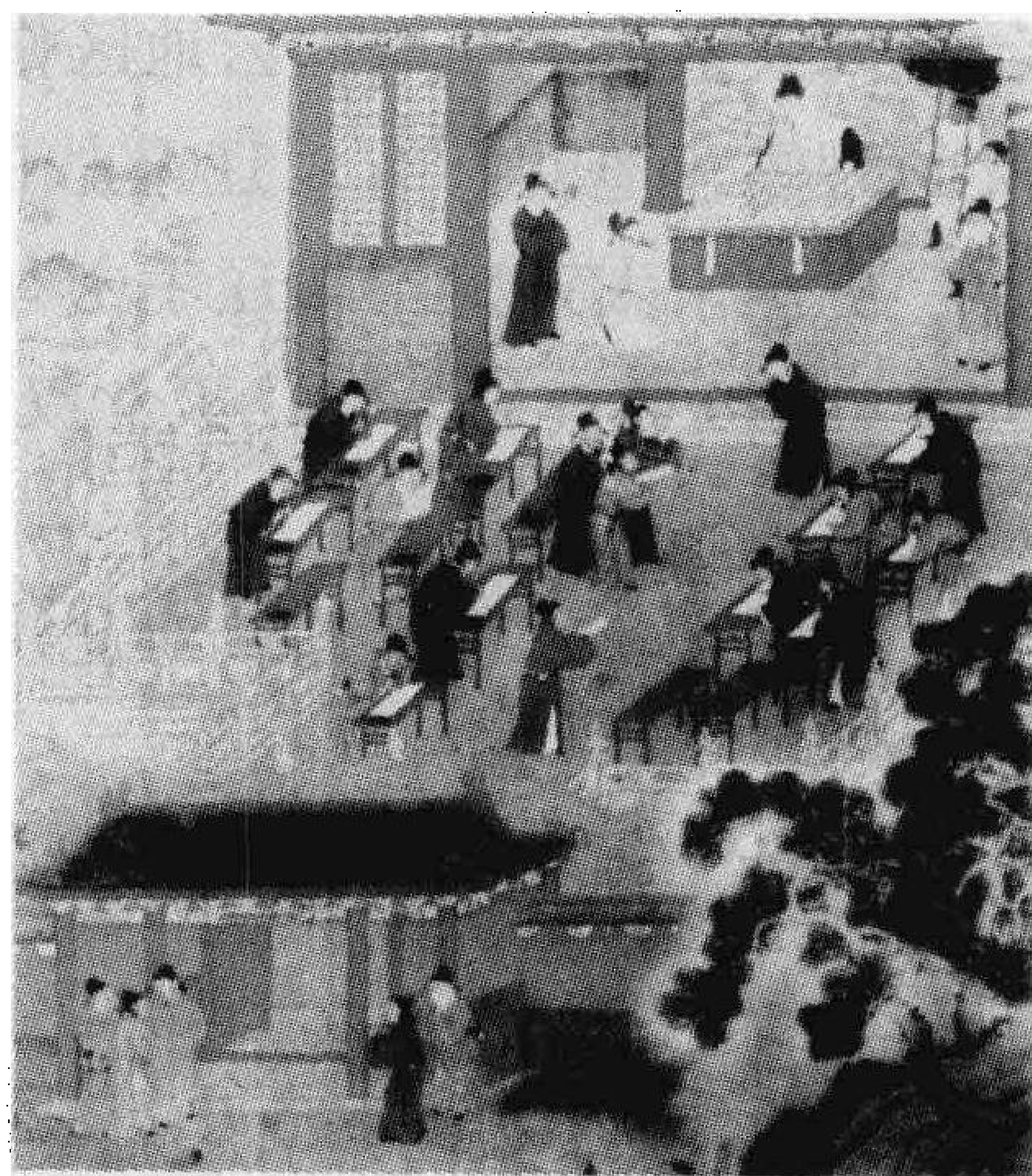
宋太宗不仅继承宋太祖的统一战争事业，削平五代最后三个割据政权，奠定了北宋的疆域和北宋局部统一的规模，还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加强宋太祖重建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

在宋太祖时，藩镇兼领"支郡"的问题虽然基本上解决了，但在中原和陕西等地区仍然有些残余"支郡"存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八月，因一些"支郡"的知州同藩镇发生矛盾，宋太宗派右拾遗李翰去进行调查，李翰回朝后报告了节度使兼领"支郡"的一些弊病，建议进一步实行强干弱枝之术，不使节度使再有所统摄。于是，宋太宗下令陕西、京西、京东、河北各地39个州皆直隶中央。节度使兼领"支郡"的制度至此彻底废除了。

宋太宗还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宋太祖时仅有掌管一路财赋之权的转运使，这时成了方面按察大员，不仅掌一路财赋，还被授予督察刑狱、考察一路官吏的大权，被称为"监司"。但转运使不得荐举官员在自己管理的一路内任职，部内官有阙员，要随时向朝廷申奏，由朝廷委派。转运使所在的府、军、监，每年要把转运使在厘革庶务、平反狱讼、漕运金谷等方面的成绩向中央详细报告，使中央能了解转运使行使方面大权的情

况。朝廷既通过转运使监察各州、军地方官，又通过各州、军地方官对转运使起监视作用。至道三年（997），宋太宗正式把统治区划分为15路，把转运使管理一路事务的制度确定下来。此外，太宗还亲自选派各州管理司法的司理参军，随时派官员到地方处理狱讼。宋太宗还从京城派出密探去秘密探察外地是否有发生危害中央专制统治的行为。这一切，使得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了。

对于中央的官僚机构，宋太宗也在宋太祖分化事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他设磨勘院（后分为审官院和考课院），把原属中书省的考课官吏的权力分割出来，又置审刑院于禁中，掌最后审议案例并向皇帝及宰相呈报，使中书刑房失去作用。这样，宰相的权力进一步削弱了。负责内外奏章收受和颁发的通进、银台二司，原属枢密院，太宗时也从枢密院独立出来，合并成一个通进银台司，直接对皇帝负责。管理财政的三司，有许多事务也由宋太宗亲自裁处。因为朝廷许多行政机构的权力更加分散，许多新设的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皇帝的权力更加集中了。宰相吕蒙正曾感激地对宋太宗说：“中书、枢密院，自来难处之地。唐末帝王专委臣下，致多阙失，兼家族罕有保全。今陛下躬决万机，臣下止于奉圣旨。臣等实知荣幸”。皇帝一人独揽大权，大臣只是奉圣旨，不再拥有参加决策的权力。宋太祖时期已经膨胀的皇权，在宋太宗时又膨胀到一个新的高度。


宋代殿试图

宋太宗还通过扩大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满足用文官取代武将当地方官的需要。在他统治的二十多年内，科举考试登第的有近万人。他曾得意地说：“朕亲选多士，几乎忘了饥渴，召见士子亲自提问考查，以观察他们的才干，给予选拔任命，希望使

山岩四野没有被埋没的人才，而朝廷得更多的君子。朕每见布衣缙绅中有人才出众被众人所推誉的人，都替他们父母高兴。如果召拜近臣，必为选择吉日，想保他们终吉。朕对于士大夫无所负了”。由于大批文人被吸收参加各级政权，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更加扩大了。

二、进军幽州及杨业之死

——宋、辽战争的爆发

宋太宗在继续进行统一战争时，虽然平北汉之役获得成功，但在同辽争夺幽燕十六州控制权的战争中，却接连遭到失败。

进军幽州（即辽朝的南京幽都府，后改称燕京，在今北京），把后晋石敬瑭割给辽朝的幽云地区置于宋朝的统治之下，这也是宋太祖的宿愿。宋太祖专门设置一个封桩库，把每年财政节余封存在这个库里，准备蓄满三五十万，向契丹赎回幽云地区。如果契丹不答应，即用这些钱召募勇士，用战争手段夺取幽云。但宋太祖没有来得及实施这个计划就死了。

宋太宗也把夺取幽云地区作为自己奋斗的一个目标，在出兵北汉的时候，他就已有对辽开战的打算。辽援北汉的军队被宋军击败，更使宋太宗感到从辽手中夺取幽云的时机已经成热。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下旬，灭北汉的善后事宜一处理完毕，宋太宗就决定直接向幽州进军。

这时的宋军已经连续对北汉作战好几个月，将官和士兵都已疲惫不堪。

在宋军于六月十九日进入幽州地区后，因辽朝没有防备，只在涿州（今河北涿县）遇到小股契丹兵的抵抗，辽岐沟关（今河北新城北）和涿州的守将开城迎降，宋太宗没有费什么力气就在六月二十三日凌晨率军抵达幽州城南，在幽州城北击溃了一支为数不

多的契丹兵马，从六月二十五日起，对幽州发起围攻。

幽州是辽的南京，也是一个军事重镇，防守很坚固。宋太宗亲自督宋将攻城，又制造八百个炮具等在当时堪称新式的攻城设施，自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初五日，连攻 11 天未能把幽州城攻陷。七月初六日，辽朝派耶律休哥率领的援兵抵达幽州，同宋军在城西的高梁河展开激战，宋军大败。第二天，宋太宗连夜挥军后撤，辽军随后猛追，宋军陷入混乱，丢盔弃甲仓惶溃逃。宋太宗脚上中了一箭，急忙乘一辆驴车才得以逃脱。这次由宋太宗亲自决策并亲自指挥的幽州之役，以宋军惨败告终。



宋辽关系图

从幽州之役以后，辽兵经常进犯北宋的镇州、瓦桥关、雁门关等边境地区，北宋则在边境严兵以待，双方在边境的战争中互有

胜负。

在边境同辽对峙的同时，宋朝君臣也在讨论要不要继续夺取幽州的问题。有个叫张齐贤的官员上疏说，圣人举事，动在万全，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燕、蓟不足取，建议峻垒深沟，蓄力养锐，不要同契丹争尺寸之地，争强弱之势。宋太宗从幽州城下兵败后，虽然表面上曾作出要再次亲征幽燕的姿态，其实已经没有刚灭北汉时那股锐气了，听了张齐贤的意见，非常欣赏。攻取幽燕的事暂且搁置起来。此后，宋、辽双方继续在边境对峙。

太平兴国七年（辽乾亨四年，982），辽的政局发生变化，辽景宗耶律贤病死，立12岁的幼子耶律隆绪为皇帝，次年国号改为契丹，权力落在其母萧太后及其宠臣韩德让手中。宋朝一个守边的将官就向宋太宗报告说："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请趁此机会攻取燕、蓟。"宋太宗接到这个报告，也觉得是个攻取幽燕的难得时机，决定再次大举进军幽云地区。

雍熙三年（986）正月，宋太宗派曹彬、田重进、潘美为三个方面军的主帅，分三路出击。曹彬、米信等人所率东路军号称十万，由雄州出发，主攻目标是幽州，是这次对契丹开战的主力。田重进率军由定州向飞狐关（今河北涞源北）挺进。潘美、杨业出雁门关。宋太宗的部署是：曹彬一路先虚张声势，缓慢向幽州进发，吸引契丹的注意力。潘美和杨业则趁契丹把注意力集中到幽州而无暇西顾的时机，攻取云（今山西大同）、朔（山西朔县）、应（山西应县）等州，然后同田重进合兵东下，与曹彬一路对幽州展开钳形攻势，攻取幽州。

三月间，三路宋军都向辽境开拔。曹彬一路先攻取固安、新城二县，继又攻占涿州，并败契丹兵于新城东北。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是个很会用兵的将领，他因兵少，不与曹彬所率宋军正面交锋，却在夜间派轻骑出击，并在林莽间设伏兵断绝宋军粮道。曹彬一路宋军因军粮断绝，被迫退师雄州，以补充给养。田重进和潘美、杨业两路宋军的进展比较顺利。田重进先后在飞狐南及飞狐北

击败契丹兵，占领了飞狐和灵丘。潘美、杨业也很快就攻占寰（山西朔县东）、朔、应、云等州。

曹彬的部将听说其他两路宋军都所至克捷，感到本路军拥有重兵却未能破敌是个耻辱，吵吵嚷嚷要求出兵。曹彬不得已，于五月间又率军裹带粮食向涿州进发。宋军沿途遭到耶律休哥派遣的轻骑兵袭击，一路且战且走。当时天气炎热，大军所至没有水喝，连泥浆水都喝干了，在途中走了四天，到达涿州时已困乏不堪，军粮也快吃完了。这时契丹主耶律隆绪与萧太后所率应援大军已经逼近涿州。曹彬、米信见形势险恶，又引军撤退，在涿州南的岐沟关被耶律休哥的追兵击败，宋军开始溃散南逃，许多宋兵在夜渡拒马河时淹死在河中。曹彬、米信一直退到易州（今河北易县），正在沙河边准备做饭充饥，听说耶律休哥的追兵又到，宋军又立即溃逃，许多人互相践踏而死，沙河中塞满了宋军的尸首，河水为之断流。宋军丢弃的兵器和盔甲堆得像山丘一样。

因为曹彬所率的宋军主力惨败，其他两路宋军也被迫后撤。宋太宗这次三路出兵伐辽，又以惨败告终。

就在西路宋军后撤的途中，发生了抗辽名将杨业被陷害，兵败被俘身死的事件。

杨业自归附宋朝以后，一直带兵驰骋在河东的抗辽战场上。自太平兴国五年三月出奇兵以数百骑击溃辽十万大军后，契丹人都畏惧杨业的威名，每当同宋军作战时，只要一看到杨业的旗号，就悄然引兵退走。杨业因为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获得“杨无敌”的称号。

杨业的战功却遭到其他宋将的妒忌。这次他同潘美奉命撤退，并把云、应、朔、寰四州吏民迁到宋境。辽将耶律斜轸追赶袭击，连败宋军于五台、飞狐等地。八月间，潘美、杨业撤到朔州南面的狼牙村，这时辽兵已攻陷寰州。杨业见辽兵势甚盛，不宜同辽兵争锋，主张绕道而行，避开正面强大之敌，于途中的石碣谷布列三千强弩，再用骑士在中路接应，以保证后退的宋军和被迁百姓能安全

撤退到宋朝境内。这个正确意见却遭到监军王侁、军器库使刘文裕等人的反对。他们主张不顾一切直趋雁门。杨业认为这种冒险举动必遭失败。王侁竟指责他空有“无敌”之号，见敌不战，毁谤他另有打算，对宋朝不尽心。王侁的无理指责和毁谤，把平日对杨业的妒忌和敌视的情绪都肆无忌惮地发泄出来了。



雁门关

作为全军主帅的潘美，本来也是有军事常识的，理应支持杨业的方案。可是，当两种作战方案发生争执时，他却不表示意见，实际上支持王侁的主张，也支持了王侁对杨业的无理毁谤。杨业这时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若违心按潘美、王侁等人的主张去同兵锋正盛的契丹兵争战，不是兵败身亡，也会因兵败被追究责任治罪。若按自己的方案去行动，违抗主帅军令的罪责也难逃。他明知这些宋将是想借刀杀人，把自己逼入死路，但他不可能有别的选择。他作为一个从北汉归降宋朝的将官，尤其不能忍受说他对宋朝怀有二心这样的毁谤。于是，他激动地说：“我杨业不是怕死，只是认为时势不利，不能让士卒白白死亡而又不能立功，今天你们指责我不去死，我在你们之前先死就是了”。说完，他就带兵开向朔州。

在率军开拔时，杨业老泪横流，对潘美说：“我此去必定失

利。我杨业本是太原的降将，本来早就该被处死了，但皇上不杀我，反而让我带兵。我不是故意放着敌军不去出击，而是想找战机，争取立尺寸之功以报国恩。今天诸位却指责我有意避敌，我杨业一定先死于敌人手中。”接着，他又指着陈家谷口说：“请你们在这里布置步兵强弩，分左右两翼准备救援。等待我转战到这里，你们就用步兵两面夹击相救。否则的话，只会全军覆没。”潘美当面答应了杨业的要求，在陈家谷口布下了阵，以备救援。

可是，在杨业出发仅仅四个时辰，王侁见杨业没有回来，以为是杨业把契丹兵击败了，怕自己在陈家谷口争不到功劳，不顾原约，领兵离开谷口，想去争一份战功。潘美作为主帅，不仅听任王侁擅自行动，自己也跟着离开了。当潘美、王侁率军离开陈家谷口20里的时候，听到杨业战败的消息，但他们不仅不回师去救援杨业，反而率军迅速退走。

杨业率部同优势的契丹兵作战，且战且退，自中午一直战斗到天黑，终于转战到陈家谷口。这时，他看到陈家谷口已经空无一人，潘美等人早已违约把宋军全部开走了，知道摆在面前的已经是全军覆没的命运，不由得抱头痛哭。当契丹追兵又蜂拥而至时，他看着身边仅存的一百多个宋军将兵，对他们说：“你们都各有父母妻子，如果同我一起战死，没有益处。”他让这些将兵各自逃生，待敌军散去，回去把这次战斗的情况向宋太宗报告。但是，由于杨业平时很爱护部下将士，能同士卒共甘苦，将士对他很有感情，他们都不愿丢下杨业逃生。于是，杨业又率领这些残兵继续奋力死战。他身受数十处伤，在身边士卒几乎全部战死时，还亲手杀死许多契丹追兵。到最后，终于因为所骑的战马受了重伤不能行动，被契丹兵所俘。部下将官和士兵全部壮烈殉难，杨业的儿子杨延玉也在这个战役中战死。杨业自己被俘后，不肯向契丹低头投降。他想到自己对宋朝一片忠心，却遭到奸臣陷害，以致兵败被俘，无限悲愤，决心用绝食而死表白自己的一片丹心。这个威震敌胆的沙场老将，在绝食三天后，死于被押往

燕京的途中。辽代在长城古北口有个祭祀杨业的庙宇，可能古北口就是杨业殉难的地方。

杨业死后，其子杨延昭（原名延朗，后改名延昭）继续驰骋在宋朝抗辽的战场上。杨延昭是杨业的第六子，从小就喜欢做军队布阵的游戏，杨业每次出征，都让他跟随出去接受战斗锻炼。宋真宗时，杨延昭领兵守卫保州（今河北保定）等河北边境城塞，多次击败进犯的契丹兵，宋真宗称赞他“治兵护塞，有父风”。他也像其父杨业那样智勇善战，忠于国事，能与士卒共甘苦，在战斗中能身先士卒而又不居功，深受士卒爱戴。他前后守卫边境 20 多年，威名也为契丹人所畏，被契丹人称为“杨六郎”。他死后，河北许多人都为之哭泣。

杨延昭之子杨文广，也是一员武将。在北宋中期，曾在陕西对西夏作战，还曾随狄青讨伐广源州蛮侬智高，屡立战功。后来杨文广还出任过定州守将，为抗辽斗争献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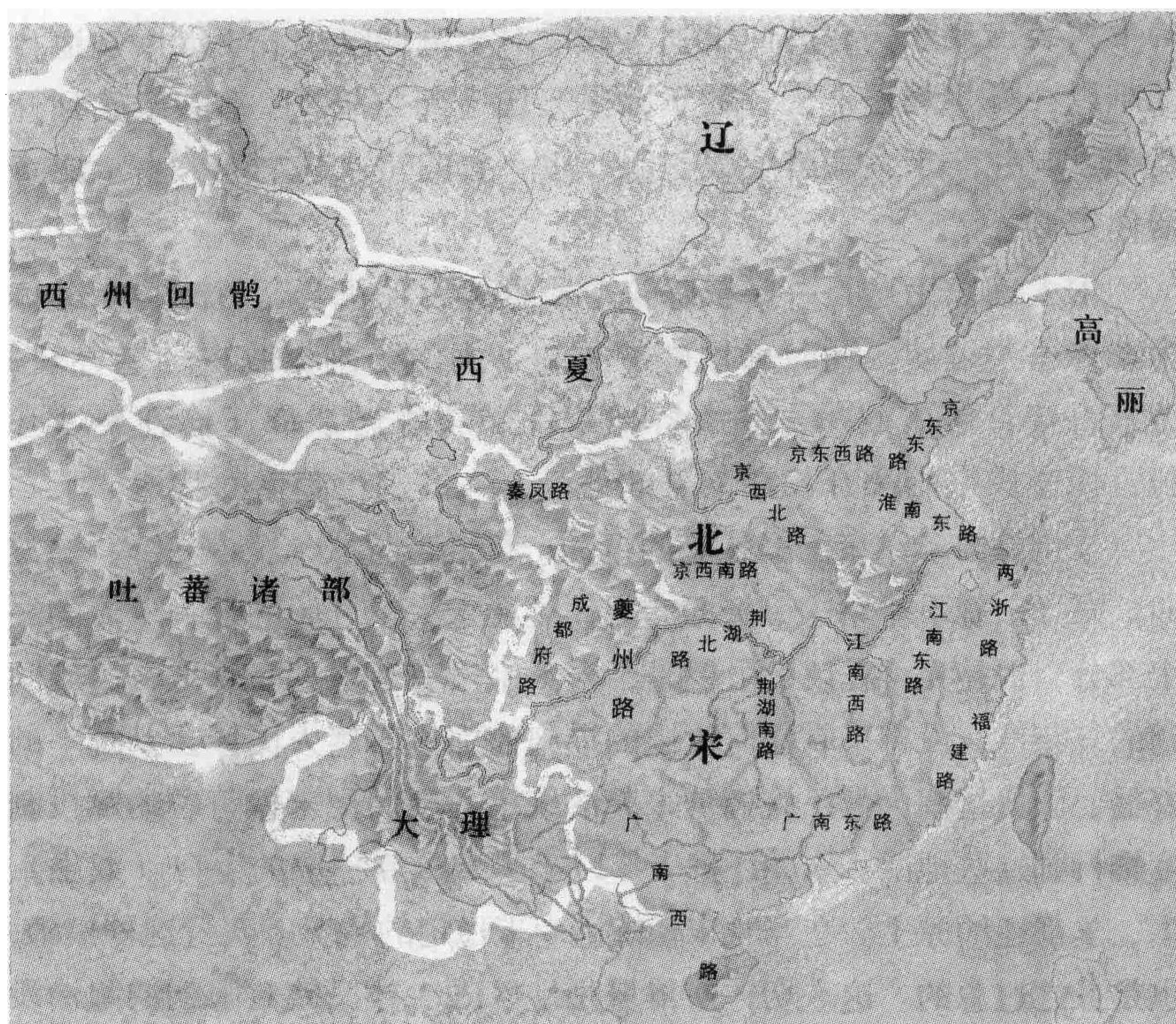
因为杨业祖孙三代赤心为宋朝驰骋沙场，在民族斗争中战功卓著，气节感人，从南宋以后，民间艺人就根据他们的事迹进行加工，并虚构了许多人物和情节，编成“杨家将”故事加以颂扬。

三、李继迁发难

——宋、西夏的分裂

在唐末五代的割据势力中，还有党项人拓跋氏割据的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辖有夏、绥（陕西绥德）、银（陕西米脂）、宥（陕西靖边县西）四州之地。

党项人是羌族的一支，最初居住在青海高原东南部，李唐时期逐渐向东迁移到今甘肃、陕西西北一带，接受唐朝政府的管辖，其首领被授予官职。唐代后期，拓跋氏首领拓跋思恭利用唐朝中央政权力量削弱、地方军阀割据的形势，占据宥州，自称刺史，成为陕



北宋、辽、西夏对峙形势简图

北的一个割据势力。后来，拓跋思恭率领一支由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人合编的军队，帮助唐王朝镇压黄巢起义，被唐僖宗任命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李，封夏国公。唐朝让他镇守夏州，统辖夏、绥、银、宥四州之地。从此，党项羌李氏成了割据夏州地区的藩镇。在五代时期，夏州李氏同梁、唐、晋、汉、周都保持臣属关系，同时始终保持割据地位。

北宋建立后，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李光睿、李继筠祖孙三代，同北宋中央朝廷都保持密切的关系，夏州地区虽然仍处割据状态，但形式上却是宋朝的一个组成部分。

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定难军节度留后李继筠死，其弟李继捧继位。这时李氏家族发生内讧，李继捧的一些父辈宗族，有

的带兵袭击夏州，有的向宋朝上表反对李继捧继位。李继捧知道自己难以在夏州割据下去，就于太平兴国七年（982）率领亲族到开封朝见，并向宋太宗献上夏、银、绥、宥四州八县之地，表示愿意留住京城。

宋太宗以为这是一举铲除这个割据势力的机会，就改封李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同时采用削平吴越、闽两个割据政权的老办法，派官直接管辖这四州，并准备把李氏宗族的近亲都迁移到京城开封，使李氏宗族离开长期割据的地盘，失去进行割据的基地。

李继捧自动结束割据状态的行动，符合当时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方向。宋太宗着手铲除这个割据势力，是从宋太祖开始的统一事业的一个部分，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宋太宗没有考虑到夏州地区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没有采取任何优恤的措施使那里各族人民体会到统一的好处，以使这些少数民族拥护宋朝的统治，反而把宋朝苛虐的赋役制度推行到这些地区。宋朝还把十年以来少数民族掠取的生口（奴隶）、牛、羊都还给原主。在当时宋朝统治尚未稳定的情况下实行这种措施，也是操之过急的。这一切，使得夏州地区的少数民族对宋朝的统治没有好感，中央王朝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也就难以巩固。

而在这时，本来矛盾重重的李氏家族在对宋朝的态度问题上也发生分裂。除了李继捧主动向宋朝纳土外，多数宗族也没有反抗就被宋朝迁到京城，接受宋朝新的官职。而李继捧居银州的族弟李继迁兄弟却假装送乳母出葬，把兵器藏在棺材里，同他们的亲信数十人离开银州，逃到夏州东北300里的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巴彦淖尔），聚众进行反抗，揭开了以后连绵一个多世纪的宋、西夏战争的序幕。

李继迁是夏州党项贵族中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当他知道宋朝将把李氏举族迁往内地时，就对亲信说：“我们祖宗经营这块地方，已300多年，父子兄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今宋朝下诏让宗族尽入京师，死生都受束缚，李氏割据就要断绝了”。其弟李继冲也说：“虎不可离于山，鱼不可离于渊”，反对随宋朝使者入京。

他们带着几十个赞成继续割据一方的人，利用李氏家族长期在蕃部中的影响，也利用宋朝统治未能在这里的少数民族中获得拥护，拿着其祖父李彝殷的画像，煽动党项族人民跟随他们一起反宋，恢复李氏的祖业。一些党项族的部落逐渐被煽动起来。李继迁依靠这些部落的支持，开始进行反宋的武装分裂活动。

从太平兴国八年（983）起，李继迁不断袭击已由宋军驻守的宥州等地。翌年，宋朝知夏州尹宪和巡检使曹光实探听到李继迁在地斤泽活动，选派精骑兵连夜奔袭，杀了他的追随者500人，烧了400余顶帐篷，俘虏了李继迁的母亲、妻子及羊、马、各种器械万数以上。李继迁只身逃脱。

李继迁从地斤泽逃脱后，继续在党项部族中进行煽动，同野利氏各部建立了反宋联盟，势力又逐渐强大起来。雍熙二年（985），他用诈降的办法麻痹曹光实，诱杀曹光实于葭芦川，进而攻陷银州、会州。李继迁自称定难军节度留后，开始重建割据政权。

宋太宗听到李继迁攻陷银州的报告，立即派兵前去讨伐。王侁所率宋军连败李继迁，一些蕃部又转向宋朝，表示要同宋站在一起，帮助宋朝消灭李继迁。

李继迁看到单靠自己的力量难以战胜宋军，难以重新建立割据政权，就利用辽和宋的矛盾，采用联辽反宋的策略，于雍熙三年（986）向辽朝称臣。这一年，宋太宗分兵三路大举攻辽，宋、辽战争正激烈进行。辽朝当然很愿意在宋的侧面扶植一个反宋势力，以加强自己在同宋朝争战中的地位，就授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并把宗室之女作为公主嫁给李继迁，雍熙七年（990），契丹又册封李继迁为夏国王。

辽朝的支持加强了李继迁反宋斗争的力量。宋太宗派兵讨伐，一再失利。

至道三年（997），宋太宗死，其子赵恒（宋真宗）即位。恰在此时李继迁又派使者来同宋讲和，要求宋朝承认他的割据地位。当时宋真宗刚即位，就接受李继迁的要求，授予他定难军节度使，

把早已并人宋朝版图的夏、银、绥、宥等州划归李继迁管辖。后来甚至把灵州（今宁夏灵武）也放弃给李继迁。李继迁死后，宋真宗又于景德三年（1006）授予李继迁之子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封西平王，给予内地节度使的薪俸，每年赠予金、帛、缗钱各4万，茶2万斤。宋朝正式承认西夏的割据地位。

四、“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王小波、李顺起义的风暴

正当北方辽朝自曹彬等三路宋兵败回后不断骚扰宋的边境，西北李继迁又加紧反宋武装分裂活动，弄得宋太宗穷于应付之际，淳化四年（993），在四川地区暴发了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

淳化四年距宋朝建立仅仅33年，距宋朝消灭北汉，实现局部统一才14年。在一个王朝建立和实现局部统一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这种中国历史上的罕见情况，是由宋初特定的阶级斗争形势决定的。

北宋初，太祖、太宗进行了将近20年的统一战争，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做了一件有益于历史的好事。但是，人民却为统一战争付出了代价。中原地区人民要应付军需调发。原割据势力盘踞地区的人民有的则遭受宋军的掳掠乃至屠杀。灭南唐时，宋将曹翰攻陷江州后纵兵抢劫赀财并大肆屠杀，就是一例。其他割据政权被消灭时也有类似情况，有的情况甚至更为严重。宋太祖为安抚那些被迫交出兵权的功臣，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鼓励他们去兼并良田美宅。这就更加助长了土地兼并，到宋太宗时，已经是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了。贫、富的对立异常尖锐。贫苦农民无法生存下去，只得向富人借高利贷，而一旦陷人高利贷的罗网，等待他们的就是土地被兼并，妻女落入高利贷者的魔

掌。宋朝的赋税也非常苛重。南宋的朱熹曾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五代十国的搜括名目在宋代基本上都保存下来，还有一些新的搜括名目出现。而种种赋税负担最终又都落到广大农民的头上，因而农民的处境特别悲惨。在宋初，就不断有农民因贫困及欠高利贷者的私债、不堪忍受赋税榨取而逃亡。由于上述情况，宋初的局部统一并没有带来阶级矛盾的缓和，在北宋初年，小规模农民起义就在许多地方爆发。

四川这个号称"天府之国"的地区，在后蜀时，因为统治者残酷榨取，地主又把佃户置于农奴的地位，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入宋以后，在"不抑兼并"政策之下，豪强地主继续维持原状，像对待奴隶那样奴役佃客——"旁户"。同时，宋朝派去的地方官也肆无忌惮地对蜀民进行榨取。据宋朝官方统计，在王小波、李顺起义以前的 20 多年内，宋朝派去四川的高级官员，就有 100 人以上贪赃不法。时人张咏的一首诗也说宋朝在四川的地方官"罔思救民瘼"，"情性非方直，多为声色著。从欲窃虚誉，随性纵贪攫。蚕食生灵肌，作威恣暴虐。佞罔天子听，所利惟剥削"。这就使得占蜀民多数的四川农民的境况更加恶化。

宋朝统治者还把贪婪的眼光盯住四川的丝织品和茶叶这两种有利可图的物产，在四川设置"博买务"，先是垄断布帛的买卖，后又对茶叶实行专卖。四川号称"罗纨、锦绮等物甲天下"，不仅许多手工业者从事丝织业，许多农户也兼营家庭纺织业。"博买务"对布帛实行专卖，既逼使许多贩卖布帛的小商人破产失业，也损害了许多从事布帛生产的手工业者和农户的利益。对茶叶专卖的结果，是官府以低价强行收购茶农——"园户"的茶叶，使许多茶农陷入困境，也使许多原先以贩茶为生的茶贩失去生计。在四川，因为人多地少，许多农户粮食耕作无法自给，要靠从事家庭手工业和种茶的收入籴买粮食来维持生活，而那些大地主、大商人也乘农民陷入困境之际，操纵粮价，籴贱贩贵，更加深了农民的困苦。

王小波是四川青城县（今四川灌县）人，曾以贩茶为生。长

期的茶贩生涯使他有机会更多地了解社会上贫者极贫、富者奢靡无度的情况。宋朝政府对川茶实行专卖，逼使他丧失生计，使他亲自感受到贫者丧失生计的苦楚，对当时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愤恨不平，也理解广大贫苦农民要求改变贫困处境的强烈愿望。于是，他就在淳化四年（993）二月二十八日，在四川青城县发动起义，并且响亮地对参加起义的群众提出了“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战斗号令。

青城县地处山区，盛产茶叶，有许多贫苦茶农因官府对茶叶实行禁榷而陷入困境。在四川的山区，地主对佃农的人身奴役又特别严重。“旁户”世世代代受“豪民”的奴役，不仅要向“豪民”地主交租和提供力役，还要替地主负担官府的一切赋敛。青城县也有许多这样的“旁户”。在这里发动农民起义，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均贫富”的口号，又集中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农民朴素的革命要求，因此，王小波“均贫富”的义旗一揭，立即得到贫苦农民的热烈响应。许多贫苦农民加入起义队伍。起义军在几天内就发展到数万人，并很快占领青城县城。

在攻下青城后，起义军采取了积蓄力量、稳步发展的方针，没有立即进攻其他城邑。到这一年夏天，王小波突然率起义军越过一些城邑南下奔袭彭山县。彭山县令齐元振是个贪婪暴虐的家伙，他把搜括来的金帛寄在同他勾结的豪强地主家中，却装出一副清廉的样子，博得宋太宗的“玺书奖谕”和“清白强干”的美称。彭山县的百姓恨之入骨。王小波可能事先了解到这种情况，知道彭山县是宋朝统治的一个薄弱环节，可以得到广大农民的响应，所以采取了奇兵奔袭这一很有胆略的行动。果然，这次奔袭获得成功，起义军很快攻陷县城，全歼守城的官兵，贪赃诡诈的齐元振也被起义军捕获。

攻陷彭山后，起义军接连击败知成都府吴元载派来的官军，势力继续发展。川西一些地区的村民受“均贫富”口号的鼓舞，纷纷起来响应起义军，有的贫民还带着起义军去挖豪富地主家藏在地

窖里的财宝。农民起义军的声势也越发壮大。十二月，王小波率军攻打位于川西交通要道上的江原（今重庆境内），同宋军展开激烈战斗，击败了官军的数次反扑。在战斗中，王小波被宋朝西川都巡检使张玘暗中射中一箭。他不顾箭伤，继续指挥起义军勇猛杀敌，终于击溃官军，一举攻克江原城。王小波还亲手杀死了顽固与起义军为敌的张玘。不幸的是，王小波因伤势过重，战斗结束后也牺牲了。

王小波的牺牲，更加激发了起义军对宋朝统治者的仇愤。他们推拥王小波的妻弟李顺为领袖，以更加奋勇的精神，继续同官兵作战。

李顺也是一个杰出的农民起义军领袖，他和王小波一样，也是茶贩出身。他没有辜负参加起义的群众对他的信赖，继续高举王小波"均贫富"的战斗旗帜，并且把这个口号变成行动。这时四川因为旱灾，饥荒日甚。李顺的起义军所到之处，都召集各乡里的富人，命令他们家中所有财物和粮食，除留下全家人口食用部分外，都交出来分给饥饿的贫民。

从淳化四年十二月到淳化五年（994）正月，起义军以风卷残云之势，迅速攻克蜀州（今重庆境内）、邛州（四川邛崃）、新津、永康军（在今灌县境）、双流、郫县等城邑，所到之处都惩办贪官污吏，为民除害。而起义军则纪律严明，除打击地主和贪官外，对一般百姓秋毫无犯。广大人民的支持，使起义军所到克捷，很快就直逼两川的重镇成都。

淳化五年正月初，起义军首次围攻成都。因在西郭门失利，李顺为麻痹成都守城宋军官兵，就作出从成都撤退的姿态，率军进攻汉州（今四川广汉）和彭州（今四川彭县），只用两天就攻占这两座城邑。然后又乘成都的官军没有防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回师围攻成都。正月十六日，成都被起义军攻破。

李顺入成都后，即宣布建立"大蜀"国，自称"大蜀王"，改年号为"应运"，并铸造铜钱、铁钱发行。李顺注意录用有才

能的人，并“存抚良善”，保护人民。大蜀起义军一到，许多州县都开城门迎接，只要大蜀的檄文传递到哪里，那里的百姓就奋起夺取城池以响应起义军。四川的大部分地区很快就成了大蜀政权的天下。

成都被起义军攻占的消息传到开封，宋太宗大为震惊，急忙派亲信宦官王继恩为剑南两川招安使，让他统率大军入川镇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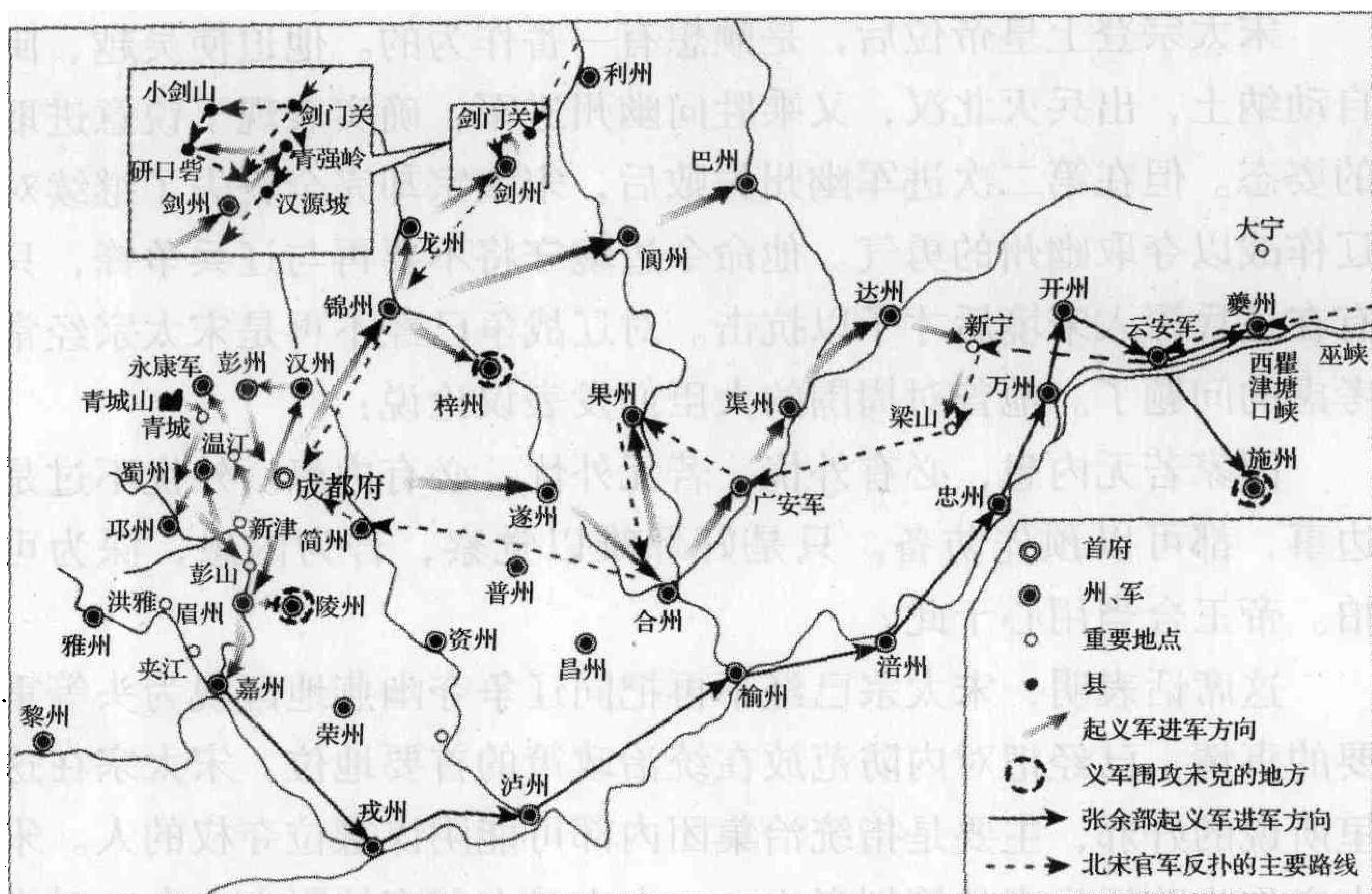
王继恩也采用当年宋太祖入后蜀的故伎，分兵两路扑向四川，一路奔向巫峡，沿长江水陆并进，一路抢占秦岭山脉的剑门栈道。

当宋朝镇压大军即将压境的时候，起义军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在成立大蜀政权后，李顺只派数万起义军去攻打剑门，而把主力派去攻打梓州。结果，攻打剑门的义军遭到失败，损失也极惨重。进攻梓州的起义军主力却因宋军防守坚固，遭到重大伤亡还难以得手，被官军长时间牵制在那里。李顺也没有再作夺取剑门、控制官军入川增援道路的努力。因此，当王继恩率大军到达蜀口时，剑门天险依然在宋军手中，王继恩得以长驱而入。这样，起义军就面临着两路庞大的官军的钳形攻势，开始在战场上处于不利的地位。

王继恩入川后，首先集中力量夺取剑门附近的剑州（今剑阁）、绵州（今绵阳）、阆州（今阆中）、巴州（今巴中）等战略要地，消除起义军继续进攻剑门的可能性，确保后继官军和军用物资入川的路线，同时派兵支援梓州守军，迫使围攻梓州的起义军全线撤退，然后就向成都进逼。

在优势的入川官军面前，起义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是，终因力量悬殊，没能挡住入川宋朝大军的攻势。

淳化五年（994）五月，起义军建立的大蜀政权的中心成都被王继恩包围了。李顺率领在成都的十多万起义军，同围攻的官军进行浴血战斗，成都城内许多百姓也同起义军站在一起保卫成都。但因外无援军，内缺武器和其他物资，成都终于被王继恩所率官军攻破。十余万起义军大部分壮烈牺牲。李顺的下落不明。



王小波、李顺起义进军路线示意图

宋朝统治者在残酷镇压了王小波、李顺起义以后，宋太宗发布诏令，在四川地区，只要占有土地能向官府提供增加一倍的租赋，官府就承认其土地所有权。川西一带地主就在官府支持下广占良田，使许多逃避官军屠杀的农民丧失土地，无家可归，最终又不得不充当地主的“旁户”。被农民起义冲击得七零八落的剥削秩序又重新在四川建立起来。

尽管如此，这次起义对宋朝统治者和四川地主的打击还是相当严重的。它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首次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标志着中国农民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五、“守内虚外”与“澶渊之盟”

——宋、辽对峙局面的确立

宋军两次出击幽州的失败，李继迁联辽反宋，以及王小波、李顺起义等重大事件，对宋朝统治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

宋太宗登上皇帝位后，是颇想有一番作为的。他迫使吴越、闽自动纳土，出兵灭北汉，又乘胜向幽州进军，确实表现了锐意进取的姿态。但在第二次进军幽州失败后，宋太宗却完全丧失了继续对辽作战以夺取幽州的勇气。他命令边境守将不要再与辽兵争锋，只有在辽兵深入宋境后才予以抗击。对辽战争已经不再是宋太宗经常考虑的问题了。他曾对周围的大臣们发表议论说：

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是边事，都可以预先防备。只是奸邪难以觉察，若为内患，深为可怕。帝王合当用心于此。

这席话表明，宋太宗已经不再把同辽争夺幽燕地区视为头等重要的事情，已经把对内防范放在统治政策的首要地位。宋太宗在这里所说的奸邪，主要是指统治集团内部可能阴谋篡位夺权的人。宋太宗作为陈桥兵变的策划者之一，本人又在斧声烛影中上台，对内部政变问题是异常敏感的。因为有人在幽州兵败找不到太宗时议立赵德昭，赵德昭就被他逼得去自刎。有人诬告其弟秦王赵廷美（即赵光美）想篡位。廷美也被他治罪流放，死于流放的地方。连他立第三子赵元侃为太子后，京城有人夸奖皇太子是“少年天子”，太宗听了都很不高兴，向寇准提出了“人心急属太子，欲置我何地”的问题。亏得寇准赶快拜贺，说“此社稷之福也”，皇太子的地位才得以保全。对自己的儿子尚且如此，对其他大臣和将领当然就更加不能放心，更加需要严加防范了。宋太宗进一步强化皇权，加强对官吏的监察，主要都是出于对内部“奸邪”的警觉。王小波、李顺起义则使他深切体会到农民起义的巨大威胁。他听了成都被起义军攻破的消息，曾吃惊地说：“岂料贼势猖獗如此”！在震惊之余，对内防范的重点自然也转到防范农民反抗的方面。从此以后，只要哪个地方出现饥荒，朝廷就赶快从京城派军队开到那个地方驻扎，随时准备镇压那里可能发生的农民起义事件。地方官府则用强制办法把饥民中可以当兵的人都召募编入军队，强壮者编入禁军，疲弱的人编入只供杂役的厢军，用这种釜底抽薪的办法，以防止历代发生的饥民暴动酿成农民大起义的事件出现。宋朝按

“内外相制”的原则在京城周围屯驻的数十万甲兵，主要都用在预防可能发生的农民起义的“内患”方面了。

这种在边境进行消极防御，而把防范重点放在对付内部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尤其是防范农民起义发生的政策，南宋的吕祖谦曾用“守内虚外”四个字给予形象的概括。

宋朝因为推行“守内虚外”的政策，对辽完全采取守势。辽朝却利用宋朝在边境上力量削弱的情况，一再对宋朝边境发动袭击和侵扰。

从雍熙三年（986）冬到至道三年（997）宋太宗逝世，辽朝对宋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攻势，都被宋军击退，使得边境相对安定。

宋真宗即位后，辽朝统治者大概从宋朝承认李继迁的割据地位这件事看清了宋朝的软弱，更加强了对北宋的军事攻势。

咸平二年（999）十月，辽兵大举入侵河北。这时朝廷笼罩着的对辽妥协的情绪已经反映在对边防主帅的任命方面。河北负责镇州、定州、高阳关一线防务的主帅傅潜就是个既无将略，又毫无斗志的人。他虽然统率8万步骑，却闭营自守，不敢迎击辽兵，凡是请战的部将，都遭到他脏话污骂。宋将范廷召当面骂他怯懦得连一个老太婆都不如。傅潜不得已，才分出骑兵8 000、步兵2 000给范廷召，让他率这一万军队去高阳关迎击辽兵。范廷召却是一个在后方气壮如牛，见了强敌胆小如鼠的人。他约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会兵迎敌，自己却在会战前一夜溜之大吉，使得康保裔的军马陷入辽兵重围，最后兵尽矢穷，被辽兵所俘。

辽兵的这次进攻一直进行到咸平三年（1000年）正月。宋朝将领只有杨延昭在遂城（今河北徐水）作了认真的抵抗。辽兵铁蹄践踏了祁（河北安国）、赵（河北赵县）、邢（河北邢台）、洛（今邯郸东北）、德（山东陵县）、棣（山东惠民），并在德、棣两州渡过黄河，在齐（山东济南）、淄（山东淄博市南）两州大肆杀掠，然后凯旋而归。宋真宗虽然作出了亲自率军抵抗的姿态，带大军来到大名府驻扎，但并没有给来犯之敌以什么打击。直到辽兵退出之后，在高阳关溜之乎也的范廷召等将领才声称是去追击契丹兵，取得了夺回被掠物资、迫使契丹兵出境的胜利。宋真宗也在群臣的称贺声

中飘飘然起来，作了一首《喜捷诗》题在大名府行宫的壁上。当时一些大臣认为傅潜拥兵自守，罪不容诛，但宋真宗却予宽大处理。而临阵逃走的范廷召却因在辽兵退走后“遣使告捷”（实际是虚报战功），得到加官晋爵的奖赏。在作了一番是非不清的处置后，宋真宗自以为出师大功告成，也就从大名府班师回开封了。

咸平四年（1001）十月，辽兵再次入侵，在遂城同宋军遭遇受挫，很快就退回去了。

咸平四年辽兵的进攻，是更大规模进攻的试探性行动。到景德元年（1004）八月，辽朝又一次对宋发动大规模入侵，并越过许多宋军坚守的州县，向黄河边挺进，大有直逼北宋都城开封之势。

这时宋朝举朝震恐。朝中的大臣在如何对付辽朝进攻的问题上，发生了主张迁都逃跑与坚决抵抗两种对立的意见。主张迁都的人在迁往何处的问题上又有不同的意见。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今江苏南京）。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主张真宗跑到成都。宋真宗无所适从，征求宰相寇准的意见。寇准说：“应该先斩献这种计策的人，然后北伐。”他分析说，真宗大驾亲征是上策，否则，出奇兵骚扰辽兵，宋军坚守，使辽兵因长期不得进展而疲劳涣散，也可以获胜。如果抛弃在开封的宗庙，跑到楚、蜀去，必然会使人心崩溃，那时，敌人乘胜长驱深入，宋朝的天下就难保了。

宋真宗虽然害怕同辽兵作战，但在宋朝天下能否保全的问题上却不能不多加思虑，终于接受寇准的建议，没有逃离京城。

景德元年（1004）十一月，宋真宗终于鼓起了勇气，率军离京向河北进发。到达韦城县时，又有人悄悄向真宗建议逃到金陵。宋真宗看到强敌就在附近，又想退却了。寇准了解到这种情况，激动地对宋真宗说：“群臣如此怯懦无知，同乡下老妇人简直没有差别。今天敌兵已经迫近，四方人心惶惶。陛下只能进一尺，不能退一寸。河北的军队日夜盼望车驾到达，士气百倍增长。如果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敌军将乘势进攻，那时连想要到金陵都不得而至了”。

寇准这样透彻的分析，还是没有能使宋真宗去掉畏敌心理。但是禁军主帅高琼主张坚决抵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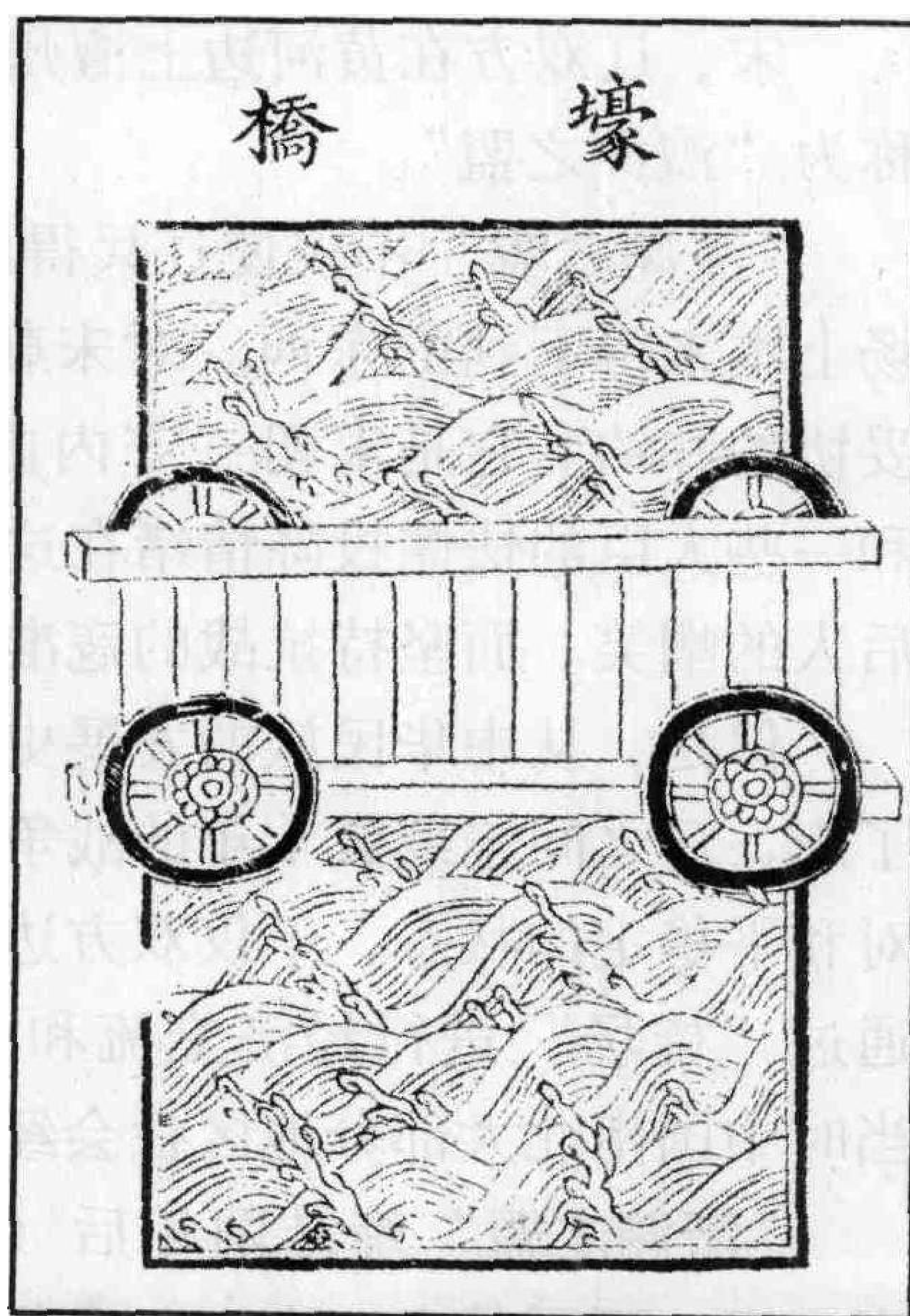
在寇准、高琼等人的敦促下，宋真宗才又下令离开韦城县，继续向澶州进发。

十一月二十四日，辽兵抵达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北城，对澶州北城展开三面围攻。辽军充当先锋的大将挞览在督战时被宋威虎军头张瓌的床子弩射中额角，当晚死去。辽军因损失大将，士气大为低落，稍为退却。

十一月二十六日，宋真宗到达澶州南城。这时，宋朝君臣还不知道辽将挞览死亡、辽兵士气低落的消息，在要不要过黄河的问题上又发生争执。许多人认为辽兵势盛，宋真宗不能过黄河。寇准和高琼坚持要求宋真宗过黄河，以鼓舞士气，安定人心，克敌制胜。高琼甚至说："陛下若不过河，河北百姓如丧考妣。"

这时，站在一边观望的签书枢密院事冯拯说话了。他苛责高琼说话不顾分寸，想以此打击高琼的抗辽激情，同时讨宋真宗的欢心。高琼更加被激怒了。他愤慨地对冯拯说："君以文章，升到两府高位。今天敌骑充斥如此，还指责我高琼无礼。你为何不赋一首诗以退敌骑呢?"这一席话说得冯拯哑口无言。

高琼说完，不等宋真宗表示态度，就指挥卫士推出宋真宗的辇驾，驱车继续出发。当车驾到达黄河边上联系澶州南、北城的浮桥时，宋真宗又犹豫起来，让把车子停下。高琼见此情况，当机立断，急忙用木村敲打车夫的背，让车夫赶快把宋真宗的车驾推上浮桥。宋真宗这时才又无可奈何地下令起驾过河。



宋代濠桥

宋真宗的过河，虽然是被寇准催促，被高琼强推过去的，但他到达澶州北城，却给宋军一个皇帝坚持抗战的感觉。守城的宋军因此

大受鼓舞，“万岁”的欢呼声响彻数十里，宋军士气大增。早已因丧大将而士气低落的辽兵，这时见宋军气势百倍，军心更加动摇了。

在这种情况下，辽朝统治者知道要在澶州战胜宋军已不可能。而辽兵这次南下又是孤军冒险深入，沿途州郡大多还由宋军坚守着，辽兵的退路随时有被宋军切断的危险。在澶州同宋军相持时间越长，对辽兵带来的危险性就越大。于是，辽统治者决定尽快同宋朝议和，以迅速脱离危险境地。

在宋朝方面，宋真宗虽然标榜自己是御驾亲征，其实并没有打胜仗的信心。就在离开都城前，宋真宗已派曹利用去同辽方议和。这时见议和已有希望，简直是喜出望外，决定用汉代赠玉帛与匈奴单于的故事，不惜用财货求得同辽和议成功。

就这样，宋辽双方出于各自的考虑，都迫不及待地想同对方达成和议。双方通过使臣往返商谈，经过讨价还价。十二月，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宋、辽成兄弟之国，辽朝皇帝耶律隆绪称宋真宗为兄；宋朝每年以银 10 万两、绢 20 万匹，作为岁币向辽朝交纳；双方使者定期互访。

宋、辽双方在黄河边上澶州城下达成的这个休战协议，历史上称为“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不仅使辽兵得以安然从险境中脱身，还获得了战场上本来得不到的东西。对宋朝来说“澶渊之盟”则是一个屈辱妥协的和约。它是宋朝“守内虚外”政策推行的副产品。宋真宗和一些大臣的怯懦投降情绪在这个和议订立过程中暴露无遗，受到后人的嘲笑。而坚持抗战的寇准，却成了历代人们歌颂的英雄。

但是，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看，“澶渊之盟”的订立，却结束了宋、辽之间连续数十年的战争，使此后的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不仅双方边境大片地区得以发展生产，双方还通过“榷场”进行经济交流和商业活动。这对宋、辽双方，即对当时中国南北大部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澶渊之盟”缔结两年后（景德三年，1006）宋、西夏休战，宋、辽、西夏鼎立，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

第三章　北宋的赋役制度

一、主户与客户

——北宋乡村的阶级结构

北宋建立后，在结束五代分裂割据局面的同时，还针对五代时政局混乱所带来的官府没有本地区的“版籍”、百姓没有户帖等户籍制度上的混乱情况，于建隆四年（963）下令各州重新编造“版籍”，把各县的户口、土地情况登记造册。以后又把这一工作制度化，规定每逢闰年作一次统计，由县呈报给州，由州上报中央，制成“闰年图”，作为各州、县税额的依据。

宋朝把全国人户分为乡村户和坊郭户两大类。坊郭户是城镇居民。乡村户则是居住在乡村的人户。无论是坊郭户还是乡村户，在户口版籍上都有主户与客户之分，这是宋代户籍制度的一个特点。坊郭户划分主、客户，主要是依据有没有房产等生活资料，有房产的称为主户，自己没有房产、依靠租赁房屋居住的，一般称为客户。乡村的主户，是指那些占有土地、向国家交纳夏、秋两税的农户。有的农户虽然没有耕地，但尚有一点墓地、房基地等非耕地，也被列为主户。乡村客户就是那些没有土地，甚至没有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依靠租种土地为生的佃客，因为主户一般都要向官府交纳两税，又称为税户。

在宋代以前，客户的含义是外来的客籍户。到了宋代，客户成了佃客的同义语。一些既没有土地，又没有耕牛、房屋等生产、生

活资料，只能在租种地主土地的同时，使用地主提供的耕牛、农具，住地主所提供的住房的客户，又被称为“浮客”。宋代客户含义的变化，反映了外来客籍户在佃客中所占比例的变化，说明当时丧失土地和一切生产、生活资料，到处漂泊，充当佃客以谋生的农民更多了。据宋代文献的记载统计，在北宋时期，客户约占总户数的33%至36%。这么大比例的农户丧失土地沦为客户，正是“不抑兼并”政策导致土地兼并恶性发展的结果。但是，同唐代以前佃客只作为地主的部曲，不另立户籍这种情况比较起来，宋朝的客户另立户籍，成了封建国家的编户齐民，却反映了随着门阀士族地主的衰落，佃客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削弱了，而封建国家对丧失土地的农民的控制却加强了。

宋代户籍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有户等的划分。坊郭主户分为十等，乡村主户分为五等。乡村的户籍版簿既记录主户的人丁，又登记五等人户的财产，称为“五等版簿”，或称“五等丁产簿”。

乡村五等户的划分依据，是各户财产的多少。但各地区划分户等的财产标准很不一致。有的按税钱的多少，有的按占有土地的数量，有的按各户的“家业钱”（包括土地的价值和浮财），有的按土地需用种子的数目。同一户等的人户，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及官吏上下其手等原因，财产的差别也很大。北宋中期的吕陶曾说：“有税钱一贯，或占田一顷，或积财一千贯，或受种一十石为第一等；而税钱至于十贯，占田至于十顷，积财至于万贯，受种至于百石，亦为第一等。其为等虽同，而贫富甚相远”。

虽然如此，五等户的划分大体上还能反映出当时乡村的阶级和阶层结构。

第一等户是占田三顷以上至几十顷、几百顷的人户，是当时的大地主阶层。第二等户是占田一顷左右至数顷的人户，是当时的中小地主阶层。第一、第二等户通常又被称为“上户”。他们兼并土地，依靠剥削佃户为生，宋人的记载中既称他们是“兼并之家”，又称之为“有力之家”。

第三等户又称中户，主要是些占田虽然不很多，但能自食其力而又比较富裕的农户。这些农户属于农村中较富裕的自耕农阶层。第三等户中，也有少数占田虽然并不多，却出租土地剥削佃农的小地主。因为第三等户中也有部分兼并之家，所以，宋代有人又把第三等户同第一、第二等户连在一起，称为“上三等户”，说他们“乃从来兼并之家”。

第四、第五等户是占田三五十亩或仅有几亩的农户，属于农村中的自耕农、半自耕农阶层，当时又被称为“下户”。司马光曾说：“第五等以下，土地不及二十亩者。”可见，占田二十亩以上至三五十亩土地的农户属于第四等户，而有二十亩以下乃至一二亩土地的农户，都属于第五等户。有的已经完全丧失土地的农户，因为在官府那里应交纳的两税尚未勾销，也依然被列为第五等户。

属于第四、第五等下户的农民，生活艰难，一遇歉收，就要挨冻受饿，朝不保夕。欧阳修在《原弊》这篇著名时论中所说的那种“场功甫毕，簸糠麸而食秕稗，或采橡食、畜菜根以延冬春”的情况，应该就是第四、第五等户的遭遇。他们是地主兼并的主要对象，许多人因陷入高利贷罗网而最终丧失土地，沦为客户，或者“产去税存”，成为“无产税户”。许多半自耕农因为还要租种地主一部分土地，也受地主的剥削。

第四、第五等户在主户中所占的比例，据北宋中期的张方平估计，“常及十分之九”。其中第五等户又占“下户”的多数。北宋中期河北路安喜县（今定县）的情况是，第五等户占主户总数的2/3左右。按此计算，第五等户在“下户”中就占70%左右了。

主户中的“下户”同客户合在一起，约占全部户数的85%。主户的第四、第五等户和客户，虽然经济地位有所差别，但彼此比较接近。他们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那些生活艰难的自耕农很容易丧失土地，变为半自耕农，甚至变成客户。个别客户也可以购买点土地上升为主户中的“下户”，但这种机会是很少的。“下户”和客户基本上都是不论寒暑、披星戴月地劳动，全家男耕女

织，然而又经常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农户，他们构成农民的主体和社会生产的主力军。

宋代的五等户制，是同职役制度联系在一起的。

北宋的职役，既有在州县官府服役的衙前、弓手、承符、手力、散从官，又有在乡里替官府办事的里正、户长、乡书手、耆长和壮丁。衙前主管官府的府库和辇运官物。里正、户长、乡书手负责督催赋税，还负责协助县吏划分户等，编造版籍。承符、手力、散从官供州县衙门随时驱使。耆长负责乡里的盗贼和词讼。壮丁、弓手负责逐捕盗贼，维持乡村治安，其中壮丁由耆长管辖，弓手属县尉管辖。

在宋神宗以前，北宋的职役实行按户等轮差的制度，又称为差役。按规定：衙前、里正、由第一等户轮充；户长由第二等户轮充；弓手由第三等户轮充，在第三等户不足时，也差派第四、第五等户担任；壮丁之类的“轻役”则由下户差派。

地主阶级中的一些人通过读书参加科举考试和向政府捐献钱财等途径，还可以获得官职，成为“官户”。

“官户”这一概念在唐代是指那些因犯罪而被没入官为奴婢、隶属于某些官府从事奴役的人户。在北宋刚建立时颁行的《宋刑统》中，“官户”依然是指发配诸司供役的没官人户，法律规定这种“官户”不在州县籍贯之中。但到北宋中期，“官户”的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指低贱的没官奴婢变成专指品官之家。“官户”成了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不仅享有优厚的俸禄，还可以荫补子弟和亲属不经科举考试而直接获得官职。官户虽然没有免除两税的特权，但有的官户可以通过皇帝的特许，减免某些赋税。

在北宋时期，随着科举录取名额的大量增加及纳粟买官的增多，“官户”迅速增加。许多“官户”依仗权势，武断乡曲，鱼肉农民，建起美宅台榭，终日与宾客饮酒游宴，赋诗相献答，过着奢靡的寄生生活，成了北宋社会的一个寄生赘瘤。

“官户”是宋代“形势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朝法律规

定，品官之家、各路按察官司的吏人、州县役人和担任乡书手、耆长、户长等乡役的人，只要不是贫弱者，都属于“形势户”的范围。因为担任州县役和乡役的人户，又被称为“职役户”，所以，宋朝的“形势户”主要是由“官户”和“职役户”两部分人户中有钱有势的人户所组成。“形势户”既包括官，又包括吏，他们把持了从中央到地方乡里基层的政治权力，是宋朝统治的支柱。

二、“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繁苛的赋税、征敛和力役

宋朝的户籍版簿除了作为差派职役的依据外，主要还是作为征收赋税、摊派力役及其他负担的依据。

文献记载说，宋朝的“岁赋”（即每年都有固定名目征收的赋税）有公田之赋、民田之赋、城郭之赋、杂变之赋、丁口之赋五大类，另外还有商税、酒麴税等等。

公田之赋，是指官田的租税，宋朝把官府直接控制的土地，称为官田。官田有屯田、营田官庄两种经营方式。屯田不仅有军队耕种，也召募百姓佃种。营田官庄主要是召募佃客耕种。耕种官田的佃客，要像租种地主土地那样向官府交纳地租，也有个别官庄的佃户像私有土地那样向官府交纳田税。在宋代的赋税中，因为官田数量并不太多，而且许多官田又陆续通过各种方式转化为私田，屯田的效果也不太好，公田之赋在税收中的比重并不大。

民田之赋，就是指民户私有土地交纳的二税。宋朝继续实行唐朝中期以后实行的两税法，规定占有土地的农户，每年要按土地的数目，分夏秋两季向官府交纳田赋，称为夏税、秋苗。夏税一般是纳钱、帛，秋苗一般要纳米谷。每亩土地应交的田赋，由于各地的土质有异，原先各割据政权征收数量也不同，各地的二税征收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夏税从每亩收几文钱到几十文钱不等，秋苗则大

约在几升到二、三斗之间。南方和北方因农业发展水平差别较大，每亩应交的二税数额差别也较大，以秋苗为例，江南、福建一般是亩收三斗，其他地区一般就只有亩收一斗。

民田所交的二税，是宋朝官府的主要赋税收入。从表面看，每亩土地所交的二税数额并不多，但农民实际交纳的数额，却要大大超出规定的数额。因为在交纳时，要多交米谷入仓后被老鼠、麻雀吃掉的损耗部分，称为“加耗”。广南地区规定农民交纳一石田赋，要另外交纳二升鼠雀耗。江西农民交纳一石更要有二斗的“加耗”。除了强迫民户“加耗”外，民户交二税时还要另交一种所谓“头子钱”，宋初规定每纳一石谷要另交“头子钱”7文，纳一匹帛要交10文。不仅如此，民户在交纳二税时，官府还有“支移”和“折变”这两种变相掠夺的名目。所谓“支移”，就是政府用“以有余补不足”等口实，不让民户在本州本县就近交纳，却让他们自备费用，运到远处州县交纳。例如，在河北、河东、陕西等地区，宋朝政府出于边防的需要，让民户把谷物运到沿边的城镇交纳。没有“支移”任务的地区，民户则要按交纳税物的数量交纳所谓“脚钱”。所谓“折变”，就是官府借口一时的需要，让纳税人或者是把钱折成某种物品交纳，或者把本来应交的物产折成钱交纳，在折价时官府又强行规定不合理的比价，使农民每“折变”一次，就要增加一次负担，凡此种种，使得农民的二税数额往往要成倍地增加。

城郭之赋，是指城镇的房宅税和可供盖房的宅地的地税。

杂变之赋，是指唐末五代以来各个割据政权在田亩二税之外所增加的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有牛革钱、蚕盐钱、鞋钱、陪钱、地钱、食盐钱、蒿钱、农具钱等等。单是南唐统治区就有户口盐钱等14种。这些不同的苛税名目，都是把各地的物产变易为赋税，统称为杂变。宋朝在削平各割据政权后，把原割据政权的苛税名目都继承下来，让民户照旧交纳，称为“沿征”。到宋仁宗时，才把各种杂变名目以类合并，统称为“沿纳”，让民户随二税

输纳。

丁口之赋，是按人丁征收的人头税。宋代规定每个男子20岁成丁，60岁为老，20岁到59岁的男子都算作丁口。宋代的户籍中，有《丁帐》记载各户丁口数。在南方地区的丁口都要负担丁口之赋。这种身丁税本来也是五代时南方各割据政权增加的一种苛税，因为唐代两税法实行时，身丁税早已并入二税，割据政权既要民户交纳二税，又重新设立身丁税，实际上就是对丁口重复征税。入宋后这种重复征收的身丁税依然存在。身丁税的名称，随所征收的物品而异。纳钱者称身丁钱，纳绢者称身丁绢，纳米、麦者称身丁米麦。南方地区每个成丁男子都要交纳。交纳的数额也随地区而异。如睦州（今浙江建德县东）每丁纳钱695文，福州（今福建福州）每丁纳325文，苏州（今江苏苏州）每丁就只纳200文。同一福建地区，漳州每丁纳米八斗八升八合，泉州、兴化军（今莆田）每丁纳米七斗五升，数额也不一致。

宋朝不仅继承了五代时南方各割据政权的身丁税名目，还有所创新。如两浙路最初是官府按丁口数，每丁给盐一斗，民户输钱166文，称为丁盐钱。北宋中期允许民户以绸绢按时价折纳，称为丁绢。后来北宋政府改革食盐的专卖制度，官府不再供给食盐，却把每丁所纳钱数增加到360文，称为丁身钱。原来的丁盐钱、丁绢演变为一种新的人头税。

丁口之赋各地交纳的标准虽然并不一致，但即使是数额较少的地方，对农民来说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宋朝南方许多地方都有“生子不举”的现象，许多农民为了避免增加丁口税的负担，生子而不敢养育，遗弃或残杀自己初生的婴儿以减少丁口。这说明，身丁税是贫苦农民一种不堪忍受的重负。

除了以上五类赋税外，宋朝还有“和买”、“和籴”两种变相征敛的名目。

“和买”规定按田亩多寡强制征购民户一定数量的帛绢，最初付给一定的价钱，后来就用一部分食盐抵价。到北宋后期，官府在

"和买"绢帛时，钱与盐等抵价物不再支付，绢帛却要民户照原数交纳，"和买"逐渐变成一种新的赋税名目。

"和籴"又称"和市"、"籴买"、"市籴"等等，主要是征购粮草以供军需。籴买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置场向商人籴买，官府先是用现钱支付，后又用现钱、茶盐、香药等钱物按比例搭配充当籴本。二是在民间按户等、家业钱、税粮、税钱的多寡，摊派数额，强行征购。在形式上，官府强行征购也有籴本，要支付一定的价钱给民户，但在实际上，由于贪官污吏从中克扣，民户所得无几。而在交纳时，又要像交纳二税那样多交各种附加税。"和籴"也成了农民一种新的横赋。

在宋代，不仅农民要负担种种横赋，作为城镇居民的坊郭户，也有沉重的税敛负担。

除了房屋税和宅地税以外，坊郭户要按户等负担各种"科配"。"科配"既有科买，又有配卖。科买是官府随时所需的物品，要坊郭中的商业和手工业者组织的各种"行"负责供应，形式上也给予一定的报酬，实际上是低价强买。各地官吏在科买时又乘机变换花样进行敲诈勒索，如某种物品不是在某一季节生产，官府偏在某一季节要坊郭行户供应。某一地区不出产某种物品，官府偏要这个非产地供应某种物品。这就迫使承担科买任务的行户出高价去到处购买，来低价卖给官府，弄得许多坊郭户因此破产。配卖是官府把征收各种实物税获得的物品，在长期积压以至变质后强行摊卖给坊郭户销售，实际上是把官府管理不善的损失转嫁到坊郭户身上。

上述赋税和科配，虽然名义上大都是按户等或资产的多少负担，似乎上等户负担比下等户多，但实际上，无论是乡村豪强地主，还是坊郭的富户，都往往采用各种方式，把负担转嫁到贫民下户身上。例如，乡村地主往往假立户名，把一户分成几个子户，以减低户等，称为"诡名子户"。四川地区的大地主，甚至有的一户析为四五十户，把征徭都转嫁到"中产下农"头上。有的地主兼

并了农民土地，却不把应交的土地税过移到自己户头上，使许多贫苦农民“产去税存”，没有土地却要承担二税。在城镇中，富户也同官府勾结，用各种方式免去科配。

在宋代的赋税名目中，商税也是重要的一项。宋朝在京城及各个州县，都设立征收商税的税务。许多镇市乃至农村定期集市，官府也要征收商税。

商税分过税和住税两大类。商人携带货物经过某一税务关卡，要交过税，税率为2%，即货价1 000文，抽税20文。开设店铺的商人，或商人把货物停在市场上出售，要交住税。住税的税率为3%，即按货物的价值，每千钱抽税30文。

除了过税和住税外，还有各种附加税。例如，舟船载货要征收“力胜钱”。能装载百斛的民船，要征收100钱。如果载货，还要另外征税，称为“溪渡钱”。

宋朝商税的收入相当可观。宋太宗时，每年的商税收入约400万贯。到宋仁宗时，每年将近2 000万贯。商税在宋朝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宋朝政府除了用各种名目收取赋税外，还要乡村农户提供各类力役。

在宋代，由于大量杂役由厢兵承担，农民的力役负担比前代相对要轻一些。但是，因为唐代实行两税法时也已经把各种杂徭都折入夏、秋二税之中，宋朝既继承唐代以来的二税，又另要农民提供力役，就是役上加役了。这种役上之役，不论主户、客户，都要按丁摊派。

宋朝的力役没有像唐代前期那样有时日的规定，官府随时所需，就随时征派。春耕以前调发的夫役，称为“春夫”，主要用于春初修筑河堤。北方黄河沿岸许多州县，每年都要按丁帐征调“春夫”去修河堤。宋仁宗时，官府为修治黄河水患，一次就调发了30万民夫。官府随时有紧急的事，也征调夫役，称为“急夫”。如宋太宗讨伐西夏李继迁，就征调十多万民夫紧急运送军用物资。

另外，官府修筑城墙、营建宫殿及佛、道寺观，乃至官员之间每逢年节互送礼物，也都要征调民夫提供力役。这种种力役，除了“春夫”外，都没有规定的时间，官府往往在农忙时调发民夫，使许多农民无法按农时季节耕种，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计带来严重影响。运送军需品到边境的民夫，更有许多人冻饿而死。这种种情况说明，宋朝的力役虽然比前代略有减轻，但仍然是农民的一项沉重负担。

南宋的朱熹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清代学者赵翼也说，宋朝“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这些对于宋代赋敛情况的评论，都是很恰当的。

第四章　北宋的社会经济

一、“稻粱桑枲，务尽地力”

——农业的发展

北宋时期，局部统一的局面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有利的条件。

首先，唐末五代那种战乱局面的结束，不仅使得农业生产的发展有个安定的环境，农民可以致力于农田水利设施的修建，而且使得政府有可能推行发展农业生产的长远政策。《宋史·食货志》说宋太祖时，“稻、粱、桑，枲（麻），务尽地力”。农业生产在宋初有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宋太宗时则下令各县设置“农师”，由熟悉土地情况和种植技术的人担任。“农师”必须了解各户土地、丁口、耕牛等情况，同乡三老、里胥一起，督责农户开荒种莳。农户有只顾饮酒赌博不努力于农务者，“农师”要向州、县报告，加以处罚。后来，宋太宗又下令州县荒地旷土，允许民户请佃，当作自己的产业，免除三年赋税，三年后也只交1/3的田税。这些规定，有的虽然没有认真推行，但却反映了北宋政府在结束战乱局面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意向，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是起一定推动作用的。

第二，分裂割据局面的结束，有利于南方和北方农作物品种和耕作技术的交流。宋太宗为改变江北农民只种五谷杂粮、江南专种

水稻的情况，曾下令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各州长吏鼓励百姓种植杂粮，粟、麦、豆、黍等种子则由淮北州郡调配供应，而江北诸州，则鼓励农民广种粳稻。宋真宗时，江、淮、两浙旱灾，水稻种植有困难。而福建路有一种从占城（今越南南方）引进的旱稻，可以在旱田上种植，称为“占城稻”。宋朝政府就下令从福建路调三万斛“占城稻”种子分给江、淮、两浙三路缺水的旱田种植，并把“占城稻”的种植方法用张贴告示的办法向三路农民介绍。这种农作物品种的交流，只有在局部统一局面下才有可能大规模进行，它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显然也是有利的。

第三，由于阶级关系的变化，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削弱，有较多的人身自由，在租佃制中，定额租制又有较大发展，这就使得在农民中占很大比重的佃农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广大自耕农、半自耕农则因为厢军承担了许多杂役，相对减轻了徭役负担，可以有更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佃农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及自耕农、半自耕农能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对农业生产发展的积极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由于上述各种积极因素的影响，在整个北宋统治区，农业生产在许多方面都有明显的发展。

北宋农业生产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土地垦辟数量的增加方面。根据宋代的文献记载统计，宋太祖开宝末的垦田数为：2 953 320 顷。宋太宗至道二年（996）的垦田数为：3 125 251 顷，比开宝末年递增 5%。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的垦田数为 5 245 584 顷，比开宝末年增加 75%。从北宋中期以后，由于官僚地主大量隐瞒土地以逃避赋役，官方统计的垦田数有所减少。但从《宋史·食货志》所说的“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户口蕃庶，田野日辟”这席话看，宋真宗天禧五年以后的实际垦田数还是继续增加的。

除了耕地垦辟数量的增加以外，北宋垦田方面的成就，还突出表现在水田的增加和圩田的大量出现方面。在同辽交界的河北路，宋太宗接受何承矩等人的建议，把靠近交界处的许多塘泊连接起来，把东起泥沽海口，西至太行山的许多旱地开垦成水田，引淀水灌溉，种植水稻。到北宋中期，陕西一些地区也推行“水耕”的方法种植水稻。而在江、淮、两浙，则不仅修复了宋初荒废的许多圩田和其他水利设施，还大力兴建了许多新的圩田。这种圩田又称围田，有坚固的圩岸把河、湖的水隔开，圩岸之内有河渠，多余的水可以通过水渠排泄出去。圩岸上有门闸，天旱时开闸门，可以放进河、湖的水灌溉圩里之田，涝时可以关闭闸门，挡住河、湖之水以防水患，可以做到旱涝保收。在北宋中期以后，太湖流域及长江沿岸的许多地方，都有规模相当大的圩田。据沈括《万春圩记》说，从宣州到池州有圩田千区以上，其中的万春圩有田 12.7 万亩，圩中有大道长 22 里，整个圩像一座大城。在江南河、湖之滨，不仅有像万春圩那样的大圩田，还有 300 亩、500 亩的中小圩田。苏轼曾说：“浙人喜于丰岁典卖举债出息以事田作，车水筑圩，高下殆遍”。他还用“与水争尺寸”这句话，描绘了当时江南水乡农民兴修圩田的情景。

在多山的地区，垦田的特点是梯田的大量出现。江西抚州、袁州等地的农民在岭坂上开辟禾田，层层而上，直至山顶。福建路农民也把许多山坡开垦成像阶梯那样层层而上的梯田，并且“缘山导泉”，利用山泉灌溉这些梯田。

圩田的修造和梯田的垦辟，反映了宋代农民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强了，土地的利用也更充分了。这是北宋农业生产力提高的一个重要表现。

北宋的农业生产工具，也有明显的进步。

北宋的耕作，主要还是牛耕，犁的质量同耕作水平有密切关系。1956 年在扬州出土的北宋铁犁铧，刃边为钢质，光泽锐利，可在坚



踏　犁

硬的土地上耕作。从这件犁铧可以看出当时犁具制作的质量已相当高。北宋犁壁的制作也很精巧，形状像桃，便于深耕。除了铁犁以外，宋太宗时，有个叫武成元的官员创造了一种不需要耕牛牵引，只用人力操作的“踏犁”。由于这种踏犁经过实践证明比人力用镢刨地效率高，宋真宗时又推广到河北地区。可见，踏犁虽然不是一种先进的农具，但对缺牛地区农业生产的进行，是起一定作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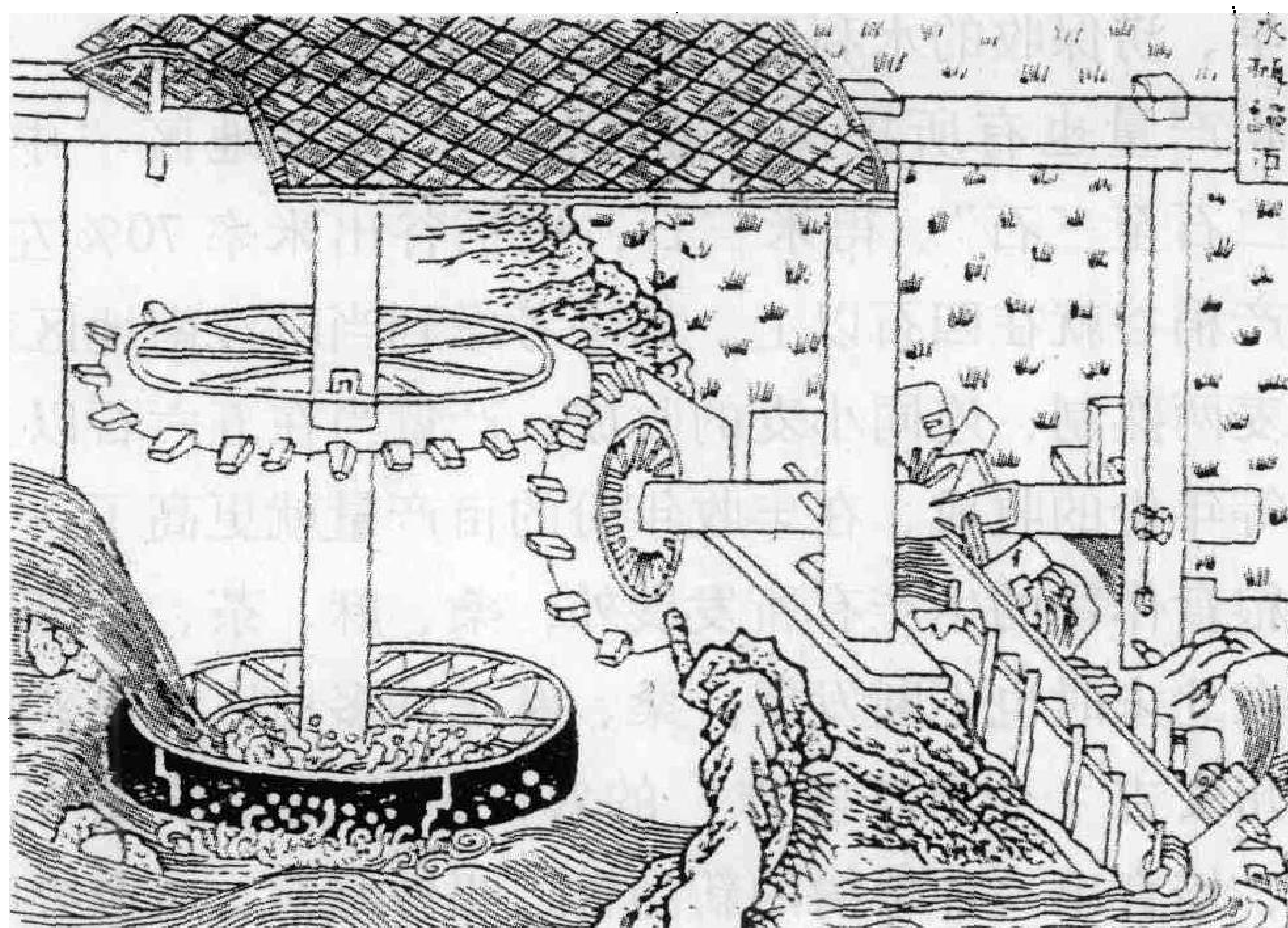
鄂州（今湖北武昌）地区农民所创造的秧马，是北宋时出现的一种比较先进的农具。据苏轼《秧马歌行》说，武昌地区农民在插秧时都骑秧马。这种秧马用榆、枣等硬木为腹，底部光滑，上部用楸梧木制作，比较轻。整个形状像一只小舟，首尾昂起，农夫用两髀雀跃于泥中，“日行千畦”，比弯腰弓背插秧，劳动强度大大减轻。这种秧马出现后虽然没有在其他地区推广，但也反映了北宋生产工具的进步。

前代已经出现并广泛使用的灌溉工具龙骨车，在北宋时随着水稻种植面积的扩大和圩田的大量出现，使用更加普遍了。北宋中期的范仲淹专门写了一篇《水车赋》，称颂龙骨车为大旱之岁的“霖雨”，说这种水车“假一毂汲引之利，为万顷生成之惠，扬清激浊，诚运转而有时。救患分灾，幸周旋于当世。……河水浼浼，得我而不滞不凝。原田莓莓，用我而无灾无害”。梅尧臣《水轮咏》说：“孤轮运寒水，无乃农者营。随流转自速，居高还复倾。利才畎浍间，功欲霖雨并。不学假混



牛转龙骨车

沌，亡机抱瓮罂”。这首诗不仅描绘了一种依靠水力运轮的筒车吸水灌田的情况，还反映了当时农民普遍欢迎使用这种吸水机械，不愿再抱瓮提水的心情。



水转龙骨车

北宋的农民不仅创造和运用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以提高生产效率，在耕作技术方面也有新的提高。

北宋末、南宋初的陈旉，在其所著《农书》中，特别强调要精耕细作，“广种不如狭收”，要适时播种，注意因地制宜、合理施肥。《农书》不仅介绍了小麦生长过程中“屡耘而屡粪”，即可获得丰收的经验，还介绍了在旱田、晚田等各种不同土质的土地上种稻的方法，以及江南农民充分利用地力、合理安排多种作物的播种顺序，做到“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的情况。《农书》成书于南宋初的绍兴十九年（1149），其时距北宋灭亡只有20多年，《农书》所介绍的情况，应当主要是北宋时期农业生产的经验。从《农书》所介绍的情况，可以看出北宋时期耕作技术已相当讲究，生产经验更加丰富了。各地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培育了许多水稻优良品种。如福建路除引进的占城稻外，还有金黍、赤鲜、金牛、白稌、青龙、虎皮、先黄等11个水稻品种。苏州则有师婆粳、箭子稻等。北宋后期吴县人朱长文在其编纂的

《吴郡图经续记》中说："稻有早晚，其品名甚繁。农民随其力之所及，择其土之所宜，以次种焉"。这一记述，就是当时农民因地制宜，选择品种，进行种植的写照。

由于旱、涝保收的水利田的兴修和耕作技术的进步，北宋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也有所提高。范仲淹说，苏湖地区"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得米三石，按稻谷出米率70%左右计算，每亩水田产稻谷就在四石以上。如果考虑到当时江南地区普遍实行一年稻、麦两熟制，连同小麦的收成，产量当在五六石以上。达才仅仅是中等年份的收成，在丰收年份的亩产量就更高了。

除了粮食作物的生产有所发展外，桑、麻、茶、甘蔗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北宋时也不断发展。桑、麻是许多地区农民普遍种植的作物。湖州安吉（今浙江安吉）的农民采用先压条成苗，然后接枝的办法，培育出一种桑树的新品种，叫做海桑，所产桑叶的质量比其他桑树好。江淮地区农民利用桑树根深、苎麻根浅，互不相妨碍的特点，实行桑、麻间作，在桑园的间隙种植苎麻，增加了土地的经济效益。广西山地多，不宜种植桑树，但适于种植苎麻，宋朝政府对苎麻生产进行鼓励，使广西的苎麻生产大大发展。茶也是北宋一项重要的经济作物，福建、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北及四川、汉中等大片地区的山地，都有茶树的种植。许多地区还有专以种茶树为业的农户，称为"园户"。甘蔗的种植则集中在四川、广东、两浙、福建四路，其中四川有的地区，蔗田竟占耕地的十分之四。随着经济作物种植业的发展，北宋时期还出现一些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专业的地区。苏州太湖的洞庭山，专以植桑、种麻及种植柑橘为常产，就是一个这样的经济作物区。

应当指出的是，北宋农业的发展，各地区之间是不平衡的。从总的发展趋势看，长江以北地区的农业虽然也有恢复和发展，但发展水平显然不如长江以南地区。而长江以南地区则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最为突出。太湖流域无论是土地利用情况、精耕细作的程度和单位面积产量，都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地区。南方

的两广地区在北宋时期也是个旷土甚多，茅草茂盛，有待进一步开发的地区。在荆湖以西的川峡四路的山区，则还普遍处在刀耕火种的水平。这种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并不影响北宋农业在多方面明显发展这个基本情况。

二、繁花争艳，大放异彩

——手工业的发展

北宋农业的发展，直接促进了一些重要手工业部门的发展。

纺织业是同农业关系最为密切的手工业部门。桑、麻生产的发展，为纺织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许多地区的农民都把织作丝、麻作为家庭副业苦心经营。广大农民既需要织作丝、麻以交纳租税，又需要纺织这项家庭副业的收入补助生活。所以，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纺织业，仍然在当时纺织业中占据主要的位置。许多官僚地主和寺院也经营纺织业。官府还设有专门的作坊，从事各种绢帛和丝织品的生产。北宋政府在都城设绫锦院，征调四川等各地手艺精湛的工匠到绫锦院织作锦、罗、绉、縠、绫、绝等高级丝织品，以供皇室及中央政府的需要。绫锦院曾发展到拥有400张织机的规模。在许多州、府则设立场院或场务，从事官府所需织物的织作。在许多地区，还出现拥有数张织机，雇工织作的“机户”。在江南还出现了一些主要从事纺织业生产的城镇。欧阳修曾用“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鸣机”这样的诗句，来形容婺州东阳县城（今浙江东阳）丝织业繁盛的景象。

纺织业有丝织和麻织两大种类。河北、东京（主要今山东省）、四川、东南地区的两浙和江东西路，是北宋丝织品生产最发达的地区。麻织业以广西和川陕一带最为突出。

丝织业是北宋最重要的纺织手工业。每年织作的数额十分庞大。仅从政府赋税收入的绢帛看，北宋元祐初年（1086）为2 445

万匹，超过唐代收入最高年份（唐玄宗年间）岁入740余万匹的3倍。这除了北宋王朝压榨比唐朝政府更为残酷这一因素外，也多少可以反映出北宋丝织品生产数量超过了盛唐时期。

北宋丝织品不仅数量超过前代，质量也有提高。明代著名画家董其昌评论说："唐绢粗而厚，宋绢细而薄"。从"粗而厚"到"细而薄"，反映了宋代丝织品技术上的一个突破。在北宋的丝织技术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刺绣工艺的精巧和刻丝技术的创造。董其昌说，宋人的刺绣，针线细密，"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嚵唼之态"。不仅色泽艳丽，且有立体感，人物、花鸟皆栩栩如生。刻丝是北宋出现的一种新工艺。这种工艺织作的丝织品，花纹图案凝空而视，犹如经过雕镂而就，故名刻丝。刻丝以定州最为著名，据说一件妇女的衣裳，要用一年工夫才能制成，可见工艺之精细。宋绣和刻丝，在中国丝织手工艺史上都占有突出的地位。



北宋王居正所画纺车图

除了丝织与麻织两大部类外，棉纺织业在北宋时的发展也引人注目。

海南岛的黎族人民，很早就掌握了植棉和织作棉布（吉贝布）的技术。黎族妇女从小就都学会织作棉布。北宋时，黎族人民织作的一种木棉巾，上面有细字杂花卉，十分工巧，深受赞誉。在北宋时，棉织技术已经渡海传入闽广许多地区，许多农户也都植棉织作吉贝布。

制瓷业是北宋光彩夺目的另一个重要的手工业部门。

北宋的瓷窑，最著名的有汝窑（在河南临汝）、官窑（在河南陈留）、钧窑（在河南禹县）、定窑（在河北曲阳）。这几个瓷窑，

在后代都被称为宋代的名窑。耀州窑（在今陕西铜川）、景德镇窑（在今江西景德镇）、磁州窑（在今河北磁县），也都是北宋重要的瓷窑。除了这些著名瓷窑外，还有许多规模较小的瓷窑遍布南北各地。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情况看，北宋制瓷业的重心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北方的名窑，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为后世所称道。有些名窑还因为对其他瓷窑产生巨大影响，形成别具一格的瓷窑体系。

定窑创于唐代，盛于北宋。制品以白瓷主为，兼烧黑釉、酱釉、绿釉及白釉剔花器。装饰技术精巧，能用印花、刻花、划花三种不同技法，使瓷器呈现各种花纹和图案。所烧的白瓷质白如粉，胎薄且轻，又称粉定或白定。其印花白瓷的图案工整严谨，为宋代印花白瓷的珍品，对南北瓷窑都有较大影响。定窑的工匠在北宋中期所创造的覆烧工艺，可以充分利用窑炉空间，降低生产成本，后来也为其他瓷窑所采用。受定窑影响而仿烧定窑瓷器的瓷窑，有山西的平定窑、阳城窑、介休窑及四川的彭县窑等，形成一个颇有影响的定窑体系。

耀州窑也创于唐代，宋初受余姚越窑的影响烧制刻花青瓷，所制青瓷有“越器”之称。但耀州窑的青瓷在学习越窑青瓷的基础上又有独创，风格已不同于越窑。耀州窑的制品以刻花青瓷为主，也兼烧印花青瓷。刻花青瓷以刻花犀利洒脱而闻名，制品有“巧如范金，精比琢玉”之称。所烧制的器物以生活实用的碗、盘为主，也有瓶、罐、壶、盆、炉、香薰、盏托、钵、注子、注碗等器物。器形之多，为北宋其他瓷窑所少见。仿耀州窑风格的瓷窑，有河南的临汝窑、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还有广州的西村窑，广西的永福窑等等，形成一个别具一格的瓷窑体系。

钧窑兴起于北宋时期。它同耀州窑一样，属于北方青瓷系统，但又有自己的特点。其独特之处在于它使用的乳浊釉中含有少量的铜，烧出的釉色青中带红，像是蓝天中的晚霞。青色也有别于其他

青瓷，近于蓝色。钧窑的青瓷在青瓷工艺中有创新和突破，北宋末年进入鼎盛时期，曾烧制贵重瓷器供北宋宫廷享用。在北宋时期，钧窑的影响还只限于河南境内少数瓷窑，还没有形成为大的瓷窑体系。

磁州窑创建于北宋时期。它同耀州窑一样，产品以民用瓷器为主，但又不像耀州窑那样以青瓷见长。它继承了唐代民用瓷窑的特点，产品种类繁多，既烧白瓷，也兼烧黑瓷、花瓷、青瓷等等，以富有乡土气息和民间色彩，在宋瓷中别具一格。其中的瓷枕画面多取材于民间生活小景，富有生活意趣与幽默感。其高档瓷有白釉釉下黑彩划花瓷器，技艺也很高超。这种釉下彩画，是元代著名的青花瓷器的先河。磁州窑的风格，对北方的河北、河南、山西的一些瓷窑都有影响，也形成一大瓷窑体系。

北宋时北方的名窑，还有汝窑和官窑。宋代的记载有名窑以“汝窑为魁”的说法。这是因为汝窑在北宋后期主要是为宋朝宫廷制作高档青瓷，在釉料方面不计工本，据说还以玛瑙作为釉料，制作数量不多，因而显得特别珍贵。汝窑的青瓷，以淡天青为基本色调，在宋代青瓷中别具一格。官窑是北宋末年为宋徽宗享受的需要而创建，烧制瓷器呈粉青色，“釉色莹澈”，也很精美。这两个瓷窑因为产品多为宫廷所垄断，对其他瓷窑没有产生像定窑等名窑那样的影响，也没有形成独特的瓷窑体系。

南方的瓷窑，以景德镇窑最为著名。景德镇原名昌南镇，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才改名景德镇。这里烧制的瓷器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称为青白瓷，又称为“影青”。这种青白瓷不仅风格独特，而且质量远远超过唐代负有盛名的越窑，釉质如玉，制品几乎具备与玉器无别的质地。景德镇的青白瓷在北宋时大量生产，并对江西、福建、广东的许多瓷窑产生影响，在江南也很快成为一大瓷窑体系。

北宋时期的制瓷业，不仅瓷窑众多，分布范围广，有独特风格的名窑迭兴，在制瓷工艺上有很多创新，而且从造型、装饰和釉色

各个方面都符合审美的要求，有的匀称秀美，有的轻盈俏丽，有的色泽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图案有的工整严谨，有的犀利潇洒。这些唐、五代所不曾有的新的仪态和风范，为陶瓷美学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成了后世陶瓷业长期追仿的榜样，至今仍为人们所倾倒。

矿冶业也是北宋手工业中呈现异彩的一个部门。

煤（石炭）的开采，在北宋矿冶业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当时煤已经被普遍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宋人记载说，都城开封数百万家，都依靠煤作燃料。河东（今山西）家家都烧石炭。煤还被应用于冶铁、炼铜等方面。这一切，使得煤的需要量大大增加，采煤业也迅速发展。河东已出现一些专门以挖石炭为生的民户。采煤的技术在北宋也有显著进步。1954 年在河南鹤壁市所发现的北宋晚期煤矿遗址，四条较长的开掘巷道总长达 500 余米，说明这个矿的开采规模已经相当大。从这个遗址可以看出，当时已运用了先内后外逐步撤退的“跳格式”的采掘方法，还有排水的水井和木制辘轳，可见采煤技术已相当先进。

北宋的冶炼技术也达到相当水平。由于用煤作燃料，冶炼的质量提高了。据苏轼说，徐州利国监在北宋中期用煤炼钢，所铸造的兵器“犀利胜常”。沈括则记载磁州锻坊能炼一种“纯钢”，“百炼不耗”。信州（今江西上饶）铅山的冶铜工匠用“胆礬”（即硫酸铜）炼铜，又采用近代化学中“置换反应”的原理，用“胆礬”浸铁成铜，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先进的冶炼技术。

四川井盐开采中所出现的“筒井”（又称“卓筒”），也是北宋采矿技术的一大新成就。这种“筒井”是用一种圆形的刃凿出数十丈深的井，井口却只有碗口大小，在井里安上首尾衔接的去节巨竹，再装上用较小的竹筒做成的唧筒，把咸泉吸到地面。在这种“筒井”技术出现后 20 余年，仅四川陵井一地，盐井就从数井发展到数百井，可见新技术的出现对井盐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北宋的造船业比前代也有较大发展。船有内河航船及海船之分。虔州（今江西赣州）、吉州（江西吉安）、楚州（江苏淮安）、潭州（湖南长沙）、鼎州（湖南常德）、斜谷（陕西眉县）及明州（浙江宁波）、温州、台州（浙江临海）等沿河、沿海之地，都有官府的造船务。浙江、福建民间也打造海船。内河的航船，可以从现存宋人名画《清明上河图》看到具体的形象。民间打造的海船长十余丈，可以载2 000石粟在大海上航行，每船的篙师、水手有60人。北宋末年，朝廷为派使臣到高丽所造的“神舟”，据说比2 000石海船还要大3倍。没有高超的造船技术，要造出这样大型的海船是不可能的。

刻印书业是北宋新兴的一个手工业部门。当时不仅官府大量刻印书籍，也有民间私人书坊。京城的国子监是官府刻印书籍的中心，所刻印的书称为“监本”。据国子监官员说，从宋初到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的四十多年中，国子监的书板从不到4 000块增加到10多万块。可见北宋刻印书业的发展异常迅速。

同刻印书业息息相关的造纸业，在北宋时也有新的发展。据北宋人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记载：四川多以麻造纸，有玉屑、屑骨之号。江浙多以嫩竹造纸，北方以桑皮造纸，剡溪以藤造纸，海边的人以苔造纸，浙江人还用稻草和麦茎造纸。各种不同的原料，造出了各种不同质量和用途的纸张，可谓品种繁多。安徽的宣纸，杭州的“油拳”，池州的“茧纸”，越州的藤纸、竹纸，四川的广都纸等等品种，在北宋时都享有盛名。其中的竹纸，是北宋的新产品。苏轼《东坡志林》说：“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这种竹纸刚出现时，虽然纸质较差，着手便裂，但却因为它一碰即裂，不能再粘贴，用来书写秘密信件，他人不敢私自拆开，士大夫纷纷使用。用稻草和麦茎作原料造纸，也是北宋的首创。这种纸虽然质量较差，但成本低，原料来源多，适于一般老百姓使用，也是当时造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反映。纸的生产规模也很大。仅潭州一地，宋初每年调发纸178万余幅，产量之大可以想见。

上述各个手工业部门发展的情况表明，北宋手工业确实是一派繁花争艳的景象。这种景象的出现，是广大手工业者辛勤劳动的结晶，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和卓越的创造能力。

三、都市、镇市和货币

——商业的繁荣和纸币的出现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使得北宋商业的发展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北宋商业的发展，表现在商税的增加、商业都市的繁荣、农村镇市的发展及城乡商业网的形成、国内各民族商业联系的加强及海外贸易的发展等许多方面。

据《宋会要·商税杂录》所记载的各地商税数统计，除使用铁钱的成都府、梓州、利州、夔州四路外，北宋所辖四京、十九路在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的商税额为500多万贯。熙宁十年重新确定的商税额为640余万贯。多数地区的商税额都有增加，有的增加的幅度还相当大。例如，京东东路由246 000余贯增加到472 000余贯，永兴军路由29万多贯增加到37万余贯，淮南东路由25万余贯增加到42万余贯，两浙路由475 000余贯增加到862 000余贯，江南东路由24万余贯增加到36万余贯，江南西路由16万余贯增加到25万余贯，福建路由13万余贯增加到近24万贯，广南东路由8万余贯激增至近25万贯，广南西路由4万余贯激增至近14万贯。这些数字，多少反映了当时商业普遍发展，汴河沿岸及东南沿海地区各路的发展尤其突出的情况。

北宋每年商税收入最多的都市，有都城开封、成都府、兴元府（今陕西汉中）。这三个城市每年商税额在北宋中期都达到40万贯以上。

开封既是北宋的政治中心，也是最大的商业都市。这个都市因为处在汴河和黄河的交汇处，自唐代以来就逐渐发展成一个舟车辐

辏的“水陆都会”，入宋后更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宋真宗时的参知政事张洎曾说，汴京比汉唐的都城长安，“民庶十倍”。开封成为拥有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南宋初年的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一书，对开封的繁华景象作了详尽而又精彩的描绘。据孟元老说，开封城“八荒争凑，万国咸通”，“车马阗拥，不可驻足”，人烟稠密，街道因往来的人很多而显得非常拥挤。城内商店林立，已经突破了唐代城市中坊、市的界限，也不再有夜间不许交易买卖的规定，夜市的买卖一直延续到三更。到五更时，一天的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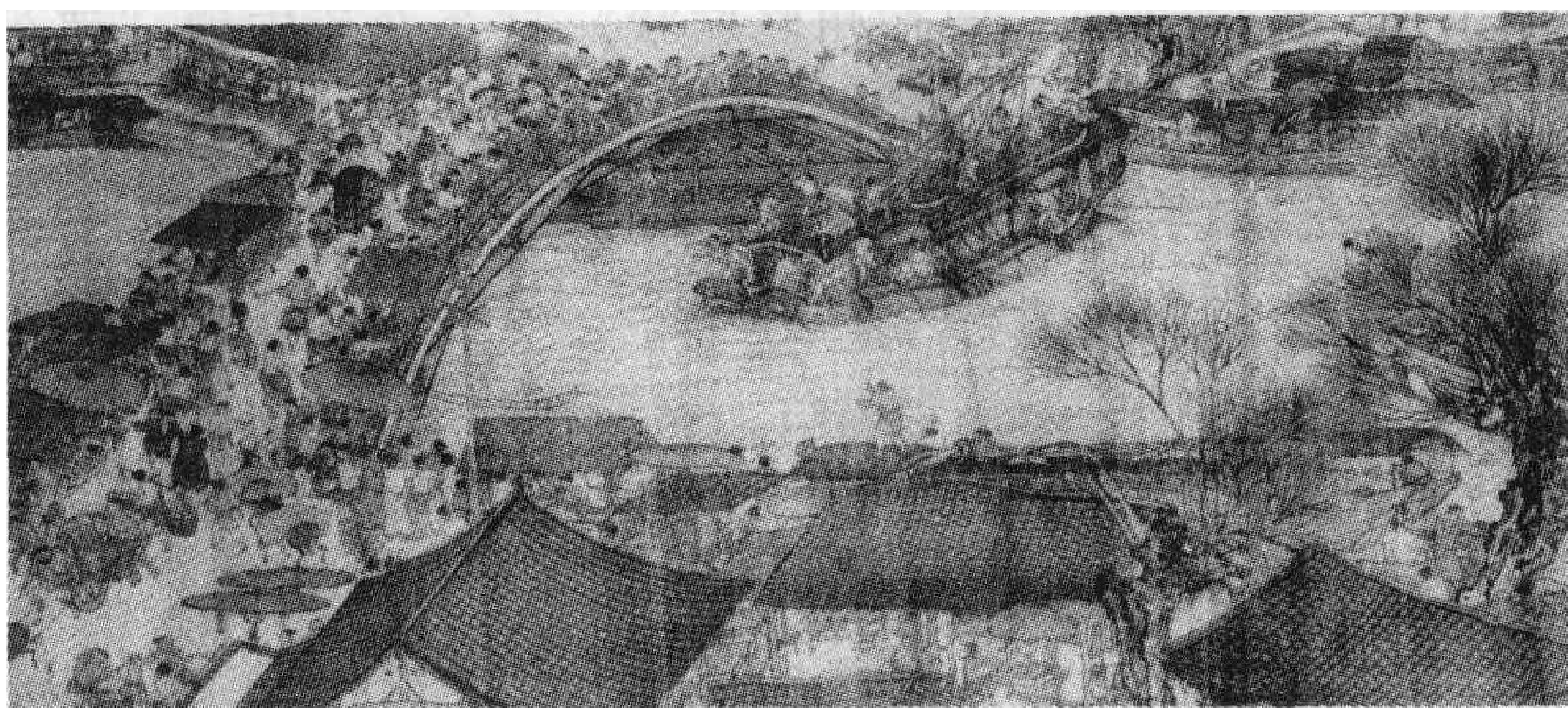


清明上河图（局部）

卖又开始了。在闹市区更是“通晓不绝”。商店的交易数额也相当大，金银采帛的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开封商业最繁荣的地方在相国寺，这里每月举行五次万姓交易，各种货物“无所不有”。从北宋末年现实主义画家张择端的著名画卷《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开封舟船货运繁忙，街市店铺买卖兴隆、街头行人拥挤、摊贩众多的景象。

成都（益州）很早就是西南地区的商业都会，在唐代与扬州齐名，有“扬一益二”之称。入宋以后，这里被北宋统治者认为是个“宝薮珍藏”之所在，依然是四川和西南地区的商业中心。纸币这时期首先在成都出现，就是成都商业发达的有力证据。

兴元府地处汉水上流的汉中平原，是中原、陕西和四川商业流通的必经之地。北宋中期文同说，这里有各地来的商人互相“贸迁有无”，“天下物货种列于市”，“公籴私贩，辇负不绝”，附近的洋州（陕西洋县）也是个“四方商贾”贸易毕至之地。兴元府是西北地区的重要商业中心。



汴河船运图

地处运河南端及钱塘江入海处的杭州，每年商税有十多万贯。著名词人柳永《望海潮》词上阙，有“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等句，形容北宋中期杭州的繁华。杭州是东南地区的一大商业中心。

除了上述四个商业中心外，运河沿岸的寿州（今安徽凤台）、楚州（江苏淮安）、扬州，长江沿岸的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鄂州（湖北武昌）、江陵府（湖北江陵），沿海的密州（今山东胶县）、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福建泉州）、广州等城市，都有相当繁荣的商业。其他约300个州、府、军、监所在的城市及其所属的县城，也都有数目不等的商税定额，说明这些城市的商业，都有不同程度的繁荣。

在县城以下，则有众多的镇市和乡村的草市。

镇在五代以前，主要是作为军事据点设置的。入宋以后，镇的军事性质基本消失，许多旧有的镇都变成商品经济活动的集散地，宋朝政府也在这些镇市设立税场征收商税。由于乡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乡村集市也发展成镇市。据《宋会要·方域》记载，北宋时新置的镇市有106个。就整个北宋辖区而言，据《元丰九域志》记载，有镇1 884个。

草市是农村的定期集市，它出现于唐代，入宋以后更在广大乡

村普遍出现。苏轼在《乞罢宿州修城状》这个奏疏中说“诸处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谓之草市者甚众”。他后来到了海南岛，也有一首诗说：“籴米买束薪，百物资之市”，这里的“市”也是草市。宋仁宗时，因为广南这类墟市众多，有的官员曾上书建议取缔这种集市，让买卖都到城邑中进行，以增加商税收入。宋仁宗因为这事牵涉面太大，没有同意。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草市已经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交换市场了。

在北宋时，不仅镇市、草市大量涌现，还有许多草市发展成镇市，许多镇市发展成城市。开封府延津县草市镇，就是草市发展成镇的。密州高密县板桥镇，因北宋中期商业活动繁盛，升为胶西县，就是镇升为县邑的例证。这一切都反映了北宋商业的发展。

开封、兴元府、成都、杭州及沿江、沿运河、沿海的商业城市，通过大运河、长江、沿海航路及内陆的蜀道、湖南通广州的驿道等水陆交通干线联结起来，又通过各州、县的商业市场，联系乡村的镇市和草市，使北宋境内形成一个遍布城乡的商业活动网点。这个商业活动网的出现，既是北宋商业发展的结果，又对北宋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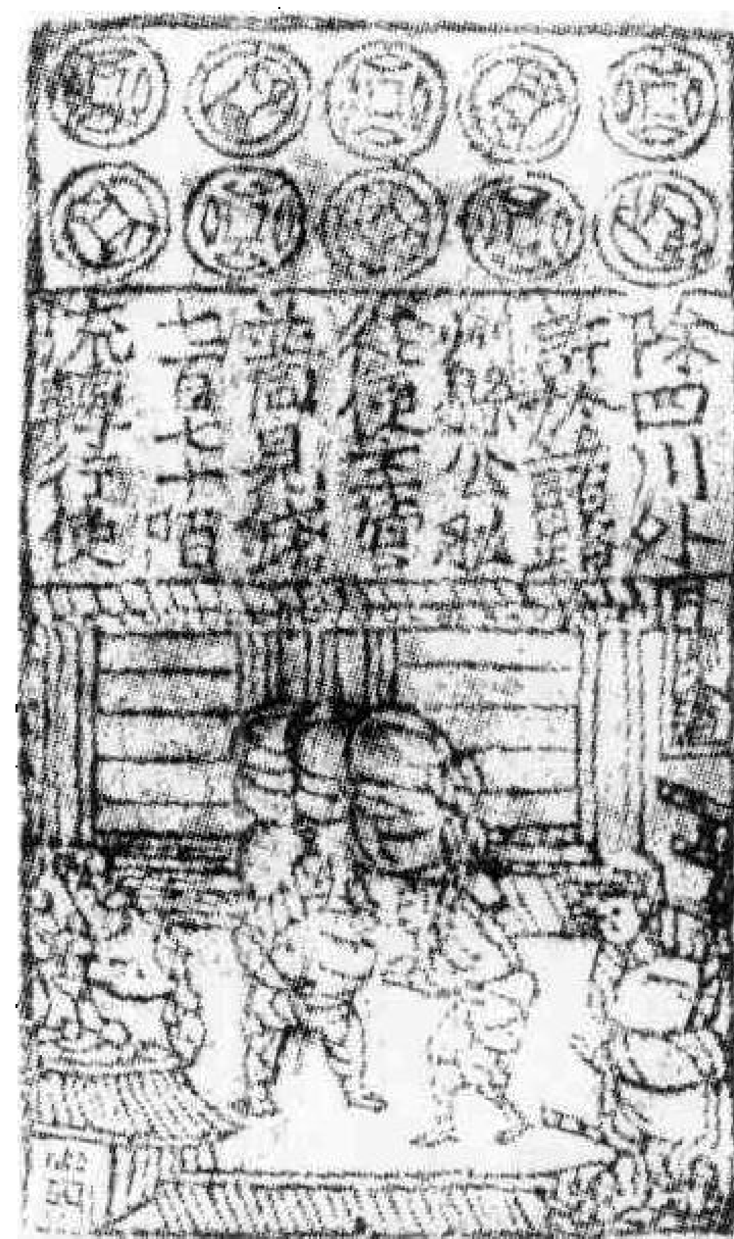
对辽、西夏以及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是北宋商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宋初年，曾先后在同辽接界的镇州（河北正定）等地，设置过“榷务”或“榷署”，沟通同辽朝的商业联系。在澶渊之盟订立后，又正式设置雄州、霸州（天津霸县）、安肃军（河北徐水）、广信军（河北徐水西遂城镇）四个榷场，组织对辽的贸易。对西夏的贸易，则有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镇戎军（今宁夏固原）两个榷场。宋辽、宋西夏之间民间贸易的渠道，更不限于这些榷场。在西北和西南，北宋还先后在古渭寨（今甘肃陇西）、熙河、兰州、雅州（今四川雅安）等地，设置市易务、折博务或博易场，作为同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贸易往来的场所。开封既是北宋最大的商业中心，也是当时中国各族经济交流的中心。除了辽、西夏使臣到开封兼营商业贸易外，还有许多回鹘商人

长期居住开封经商。可见，北宋尽管同辽、西夏处于对峙状态，但同国内各民族的商业往来还是相当活跃的。

海外贸易在北宋时期也有显著发展。北宋政府实行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的政策。当南汉割据政权一削平，宋太祖就下令在广州设置市舶司，作为主管广州港海外贸易的机构。两浙地区并入北宋后，宋朝又在明州、杭州及秀州华亭设立市舶机构。宋太宗还于雍熙四年（987），派遣内侍四人，带着金、帛，分头到海外蕃国宣传宋朝发展海外贸易的政策，邀请海外国家来华贸易，这些使臣还直接从事购买香药、犀角、象牙、珍珠、龙脑的贸易活动。由于宋朝的鼓励政策，北宋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又为海外贸易提供了比前代更加丰富的出口物资，北宋的海外贸易迅速繁荣起来。东亚、东南亚、南亚、西南亚乃至非洲东海岸，都有中国海商活动的足迹，许多海外国家的商人和政府贸易使团也航海来华贸易。宋朝的沿海港口，除广州、明州、杭州空前繁荣外，泉州港也发展成重要海外贸易港。山东半岛的密州板桥镇也发展成一个贸易港口。北宋中期，为适应海外贸易发展的需要，宋朝政府还分别在泉州、密州板桥增置市舶司。宋朝政府的市舶收入也迅速增加。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4）的岁入为53万余。到北宋末年，九年间的市舶收入达到1 000万，每年竟达100万以上。中国历史上的海外贸易，入宋后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

随着商业的发展，北宋的货币制度也发生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演变。

北宋所流通的主要货币是铜钱，局部地区使用铁钱。四川是使用铁钱的地区，铁钱与铜钱的比值是十比一，分量又重，小钱每十贯就有65斤，街市买卖，三五贯铁钱就难以提携。这种货币显然不适应商业繁荣、大规模交易的需要。于是，北宋初年，成都的十几户富商就联合发行一种铁钱代用券，代



交　子

替铁钱在贸易中使用，称为交子。交子可以兑换现钱，但兑换时每贯要多交 30 文，作为手续费。到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宋朝政府在成都设立益州交子务，交子由私商发行变为官府正式发行。交子最初只在四川地区流通，后来又在陕西地区使用。这种交子，就是中国货币史上最早的纸币。

纸币的出现，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有利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北宋时期，它虽然还只是局限在川、陕地区流通，但它的出现，却为中国货币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五章 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和变法运动

一、“天书”骗局，蠹政耗财

——宋真宗的东封、西祀

宋辽“澶渊之盟”订立后，被寇准等人推着北上、一路畏惧万状的宋真宗总算松了一口气。他既庆幸自己“亲征”获得如此的成功，也感激促他此行成功的寇准。所以，当他从澶渊返回都城后，对寇准更加看重。而寇准也因此颇为自得。

但是，寇准在“澶渊之盟”后声望和地位的提高，却遭到曾经力主真宗迁都金陵的王钦若的妒恨。王钦若为人奸猾狡诈，他不甘心于寇准主张的成功和自己逃跑主张的失败，就想方设法对寇准在“澶渊之盟”时的行动横加诽谤，以离间宋真宗同寇准的关系。

有一天退朝，王钦若看到宋真宗目送寇准时流露出敬重的感情。王钦若就说：“陛下敬重寇准，是不是因为寇准对社稷有功呢?”真宗回答“是”。王钦若挑动说：“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而说寇准有社稷之功，为什么呢?”真宗惊骇地问他为什么这么说。王钦若回答道：“城下之盟，《春秋》书中认为是可耻的事。澶渊的举动，以皇帝万乘之贵而订城下之盟，有什么能比这事更可耻呢!”王钦若看到宋真宗已流露出不高兴的神情，又进一步挑动说：“陛下听说赌博吗?赌棍在钱快输光时，把所有的剩钱都一下子押上，称为孤注。陛下就是寇准的孤注，当时实在太危险

了。”王钦若的这些话，正好戳到了在北上澶渊时畏敌如虎的宋真宗的痛处，使宋真宗对寇准的感情一下子发生了由敬重到怨恨的变化。景德三年（1006），寇准被罢去平章事（宰相）职务，到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当知州。

宋真宗自从听了王钦若的挑动以后，感到澶渊之盟是个难以洗刷的耻辱，经常闷闷不乐。王钦若明明知道宋真宗害怕同辽打仗，却故意对他说："陛下只要出兵攻取幽、蓟，就可以洗刷这个耻辱了。"宋真宗当然不会接受这个主意，就问他另外还有什么办法。王钦若就对宋真宗说："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天不如大搞符瑞，借天命以自重，戎狄就不敢轻看宋朝了。"他向宋真宗提出了"封禅"的建议，说这是个可以"镇服四海、夸示戎狄"的"大功业"。他还告诉宋真宗，"封禅"需要有"天瑞"出现才能进行，而"天瑞"可以人为地制造，只要人主（皇帝）深信不疑布告天下就可以，还说什么这是圣人以神道设教的办法。这些话明显是要宋真宗制造迷信骗局以自欺欺人，但却正中宋真宗之下怀。当时朝中的陈尧叟、陈彭年、丁谓、杜镐等人都同王钦若沆瀣一气，只有宰相王旦反对这个骗局。于是，王钦若就去向王旦说明宋真宗的意旨。在王旦勉强顺从后，宋真宗又亲自召见王旦，请他饮酒，并赠一尊酒让他带回去与妻子同享。王旦回去一看，里面装的都是美珠，知道这是宋真宗要堵住自己的嘴，也不再提出异议。



宋真宗

当满朝主要大臣都支持搞迷信骗局后，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煞有介事地说他去年梦见天神下降，让他设道场敬天迎接"天书"，今天果然天降下二丈多长的黄帛，就是"天书"

下降了。王旦等人再拜称贺，宋真宗下诏改元大中祥符，群臣都因此加官晋爵。一场闹腾多年的天书、祥瑞迷信骗局就这样开场了。

“天书”制造出来后，紧接着就是制造请求宋真宗到泰山“封禅”的“民意”。从大中祥符元年三月起，经过半年多的准备，沿途修建行宫，调用大量物资。宋真宗遂于这一年十月初四日，带着王旦、王钦若等朝中大批官员及众多的护驾军队，从京城出发到泰山举行所谓“封禅”仪典。在泰山祭神饮宴后，又到曲阜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赐给孔庙钱30万，帛300匹。到十一月二十日才回到京城。满朝官员都因“封禅”典礼而得到封赏。

泰山“封禅”典礼刚完毕，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汾阴祀后土的准备又开始了。大中祥符四年（1011）初，尽管当时水旱灾害相继，京城近郊谷价踊贵，宋真宗还是不顾部分官员的劝阻，又带着大队人马到河中府等地闹腾了两个多月才回都城。过了两年，又到亳州（今安徽亳县）亲谒太清宫，册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这次谒太清宫，也是东封、西祀那样大的规模。

宋真宗人为制造“天书”骗局，本想借用“天命”来加强宋朝的统治，结果却适得其反。

首先，它腐蚀了北宋的政治，使北宋王朝迅速走向腐败的道路。

在制造“天书”骗局后，宋真宗把主要精力都用在鬼神祭祀的迷信活动方面，朝政方面的大事多由皇后刘氏专决。王钦若、丁谓、陈彭年、刘承珪和林特五人，因为积极参与制造迷信骗局，受到宋真宗的特别信任。这五个人互相勾结，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被时人称为“五鬼”。

因为宋真宗热衷于制造所谓“符瑞”，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官员也群起效尤。

“天书”骗局对北宋的财政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在到泰山搞“封禅”活动以前，宋真宗曾先向掌管财政的丁

谓询问经费情况，得到国库有余的回答后才决定东封。这次“封禅”活动，耗费国库 830 余万贯。在东封结束后，大臣王曾说：“迩者方毕封崇，颇烦经费”。为准备汾阴和亳州之行，大臣李迪说：“土木之役，过往时百倍”，费用比“封禅”更加浩大。

为迷信活动的需要，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兴土木，耗费更是惊人。大中祥符二年（1009），宋真宗下令在京城建“玉清昭应宫”，作为敬奉“天书”的地方，又下令各路州、府、军、监、关、县，都建筑道观。“玉清昭应宫”由丁谓主持修建，规模宏大，每天服役的民工达三四万人，所用的建筑材料，分别从全国各地征调，有陕西秦、陇的松，河东岚、石、汾阴的柏，潭州、越州的杉，衡州的碧石等等。原准备 15 年修成，因丁谓下令夜以继日开工，结果用七年修成宫殿凡 2 610 区。亳州修建的“明道宫”，也有 480 区。其中“玉清昭应宫”中“长生崇寿殿”的三座塑像，就用去金一万两、银五千两。宋真宗死后，有个叫范雍的大臣说：“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玉清昭应宫”的修建使宋朝的国库大大亏空。

因为各种迷信活动和大兴土木，都大量使用金银，国库中的银消耗殆尽，民间的金、银价格急剧上升，整个社会的物价也因此受到影响。

“天书”骗局从大中祥符元年（1008）起，一直闹腾了 15 年，直到宋真宗死去，“天书”作为随葬品埋入坟墓方才收场。但是，“天书”骗局所造成的北宋政治腐败和财政空竭的问题，却继续影响到宋仁宗统治的时期。

二、因循成习，三冗成灾

——宋仁宗时的弊政和“积贫”局面

宋真宗死后，其子赵祯（宋仁宗）继位。当时宋仁宗年仅 13 岁，由刘太后垂帘听政。到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死后，宋仁

宗才亲自执掌朝政。

刘太后为人机敏，有权术。在宋真宗时，她从一个宫女一步步爬上皇后的位置，成了宋真宗决策朝政的得力助手，已有很大的权势。大中祥符三年（1110），宫女李氏生下宋仁宗，她即夺为己有，使李氏在宋仁宗登皇帝位多年以后仍然被置于宫女的位置，直到死去。宋仁宗也一直到刘太后死后，才知道自己的生母不是刘后，而是李氏。这件事后来就被艺人渲染成《狸猫换太子》的故事。

刘太后当权的12年中，一直把宋仁宗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政治上没有任何建树。她所信用的大臣吕夷简、晏殊等人，都是墨守成规，只知道唯刘太后之命是从。刘太后死后，宋仁宗虽然罢了吕夷简、晏殊等刘太后亲信大臣的官，但这只是反映了帝、后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宋仁宗想另有什么作为。宋仁宗是个庸懦而又荒淫的皇帝，朝政也只务苟且，吕夷简等大臣不久又都被起用了。因此，从刘太后垂帘听政到宋仁宗亲政以后的几十年内，宋朝的因循守旧风气更加发展，任何改善朝政的建议都会被“先朝旧规，不可轻议改革”的论调所扼杀。

北宋王朝的整个官僚机构，在宋仁宗统治时期也更加臃肿。

从宋太宗统治时期起，宋朝分化事权所带来的官僚机构重复设置，许多机构有官无职事，名与实分的弊端就已经暴露出来。有个官员上疏对宋太宗说，中央许多机构“多为冗泛之司，虽有其官，不举其职”。宋真宗时，文学家柳开更说，为分化事权而增置的一些机构“如骈指赘疣，亦如十羊九牧”，“人即加倍添人，事即依旧公事”。官僚机构不仅层床叠架，而且人员越来越臃肿，通过科举考试录取的官员数额也迅速增加。那些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的人，很快就可以升任高官。从真宗时起又确定了对官员三年一“磨勘”的考核制度，一般官员只要无大差错，每三年都可以迁转一官，也可以逐步爬到高官的行列。而在当时，只要到达一定的级别，都有“恩荫”子孙及亲属为官的特权。级别较高的官员可以

每年“恩荫”一子为官，级别较低的官员也可以每三年授一子官职。这就使得北宋的官僚队伍迅速膨胀。许多没有真才实学的纨袴子弟，甚至许多刚出生不久的稚儿都列入了官僚队伍的名册之中。为了安排这些获得做官资格的人，宋朝对各级政府机构采取“有定官，无限员”的办法，大量扩大各政府机构官员的编制。宋真宗时，王禹偁举一个州的例子说，最初这个州只有刺史一人，司户一人，公事照样办理，后来陆续增加了团练推官、通判、副使、判官、推官，盐、酒等税务官员又增加了四人，曹官之外又增加一个司理。仅仅一个州，官员人数在几十年内就增加了五倍以上。到宋真宗时，官僚机构已经臃肿不堪了。



宋仁宗

宋仁宗时，宋朝官僚制度的种种弊端更加恶性发展。北宋的科举考试录取名额在太宗、真宗两朝本已冗滥不堪，宋仁宗还嫌“取人之路尚狭”，认为许多人“白首而不得进”，遂于亲政的第二年（景祐元年，1034）下令：此后“试进士诸科，十取其二”，还规定那些经过多次考试，到达五六十岁的人，即使试文不合格，也不轻易宣布落选，必须向皇帝报告。实际上这些人也都以“赐及第”等名目被录用。每科考试录取的名额也更多更滥了。“恩荫”到这时期也更加泛滥。天圣三年（1025），那个在宋真宗搞“天书”骗局中起极坏作用的王钦若死去，他的亲属和亲信20多人都被录用为官。这在宋朝是没有先例的。地位稍低一些的官员，只要是担任学士以上的官20年，一家兄弟子孙就可以有20人通过“恩荫”担任有相当级别的京官。这一切，使得官僚的人数比宋真宗时更加膨胀。据包拯说，在宋真宗景德、大中祥符年间（1004—1016），文武官总数是9 758员，到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内外官总共达

17 300 余员，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未委派差遣职事的待安置官员在内。包拯估计在这四十年间宋朝的官员增加一倍以上。因为官员人数太多，差遣的位置有限，即使把编制扩大几倍也无法全部安置，后来更出现了苏轼所说的“一官三人共之”的现象，一人在职，一人刚去职，已经又有一个人在等待这个职位。官僚队伍的臃肿情况，在宋仁宗时期更加严重了。

官僚人数恶性膨胀，官僚机构严重臃肿，官员奢靡腐化，办事因循自守，无所作为，十个地方官中找不出一个得力的人。这就是宋仁宗时期的“冗官”之弊。

从宋太祖时开始实行的募兵养兵政策，其不良后果也日益严重。雇佣兵的数额因为荒年募饥民为兵而与年俱增。宋太祖开国初期厢禁军的总额只有 22 万，到开宝年间（968—975）增加到 378 000。宋太宗至道年间（995—997）总兵额为 666 000。宋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为 91 万多人。到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因为对西夏战争，北宋军队总数更激增到近 126 万人。由于宋朝统治者对武将严密防范，将不专兵，因而军纪松懈，号令不明，平时也缺乏训练。士兵们终日游戏打闹于街市之间，以卖弄技巧和刺绣作画为业，衣服举止都不像军队的样子，站不成行，走不成列，甚至骑兵不能披甲上马，射出的箭在马前一二十步就落地。打仗时官与兵互相不能照应，号令不能相通，往往遇敌即溃。军队数额猛增，而战斗力却极低，这就是从宋初发展到宋仁宗时期的“冗兵”之弊。

官员和军队人数的激增，给北宋王朝的财政带来严重的影响。北宋的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享受着优厚的薪俸待遇。以两府大臣宰相和枢密使为例，每月俸钱达三百千，足够购买上等良田 100 多亩，此外还有冬春服、随从人员的衣粮餐钱、茶酒厨料、薪蒿炭盐、饲马刍粟、米面羊口之给等等。每当有什么祭祀典礼，还有各种固定名目的赏赐。清代赵翼说北宋王朝“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是很确切的。官员的增加当然就带来了宋朝财政支出的增

加。据北宋中期的曾巩说，仅郊祀的费用，宋真宗景德年间为600万缗，宋仁宗皇祐年间为1 200万缗。而从景德年间到皇祐年间的官员数目也恰好增加了一倍。宋仁宗皇祐年间冗官的开支，比宋真宗景德年间大体上也增加了一倍。养兵开支也相当惊人。在正常情况下，一名禁军每年需要五十千，一名厢军每年开支是三十千。军队数额激增自然也带来养兵费用的激增。宋仁宗时蔡襄做了一个统计，全部厢、禁军每年开支达4 800余万，占宋朝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5/6。除了“冗官”、“冗兵”的费用外，还有大兴土木、继续修建寺观，无休无止的道场斋醮等等的费用。因为宋仁宗荒淫无度，后宫数千人，整天沉溺在燕乐与女色之中，宫廷赏赐动以万计，皇室的开支也更大了。北宋王朝的财政支出因为上述各项开支激增，比北宋初年据说增加了20倍。据包拯统计，宋真宗景德年间的财政支出为4 974万余，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支出达8 938万余，40年间财政支出增加了将近一倍。这就是宋仁宗统治时期的“冗费”之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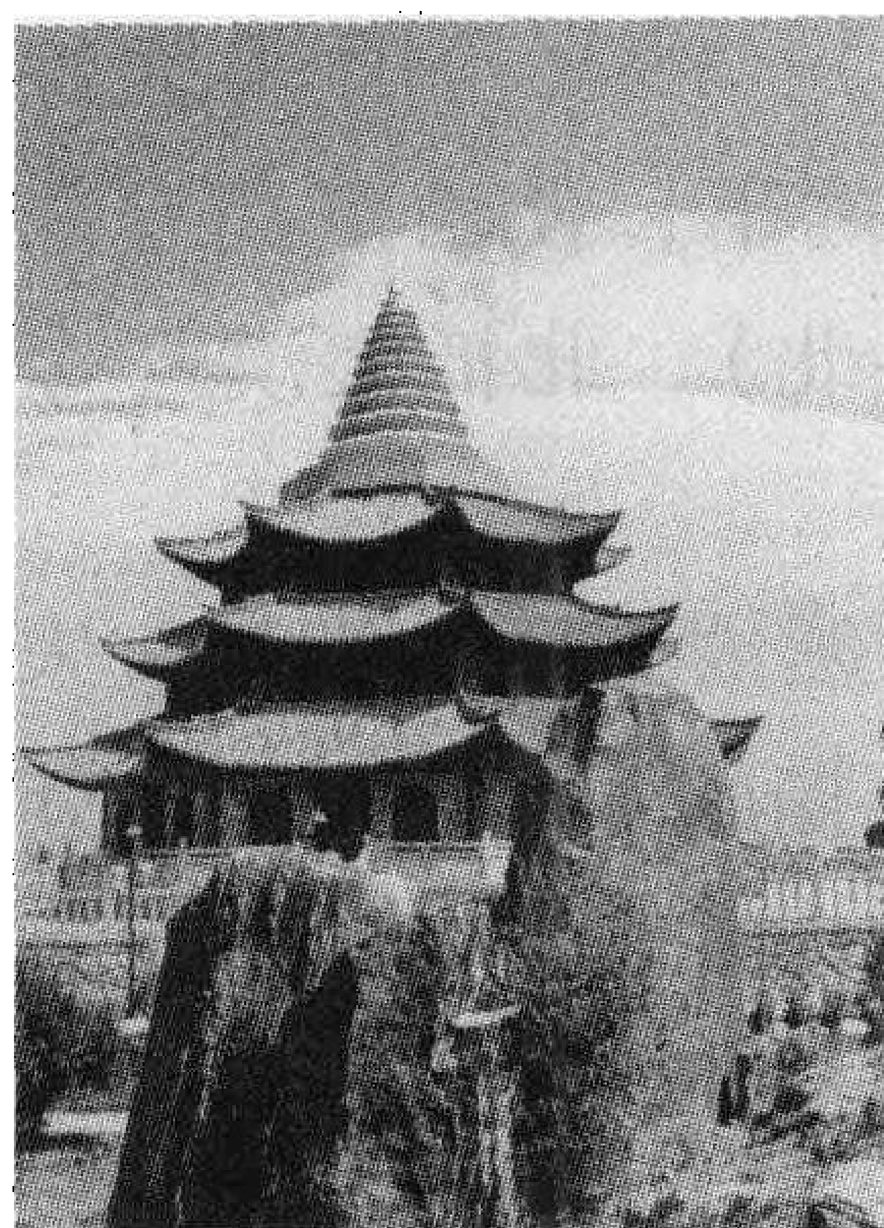
宋朝的国库经过宋真宗的东封、西祀等各种迷信活动，本来已经空竭。宋仁宗时尽管通过横征暴敛，赋税收入大大增加，但是，由于“冗官”、“冗兵”及各种靡费所造成的“冗费”，再加上每年交纳给辽、西夏的岁币及其他赠礼，北宋的国库总是年年入不敷出。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宋朝每年的财政亏空竟达300万缗以上，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积贫”局面。

三、边患迭起，穷于应付

——宋仁宗时的“积弱”局面

宋仁宗统治时期，宋朝不仅在内政方面弊端丛生，在边境也接连受外患的困扰。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宋、西夏的重开战端。

从景德三年（1006）李德明接受宋朝西平王的封号后，西夏



西夏王宫（局部）

一方面利用同宋朝媾和的时机，巩固已经占据的夏州等大片地区的统治，发展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一方面利用宋朝赠与的大量物资及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所提供的物质力量，继续扩张势力。其子元昊先后领兵攻占回鹘统治的甘州（今甘肃张掖），降服回鹘瓜州王贤顺，使西夏的势力伸展到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以东。同时，李德明还把灵州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市）改称兴州，在那里大建宫殿、宗庙和官署，作为西夏新的统治中心。

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李德明死，元昊继承统治权力。元昊是个野心勃勃而又很有才略的人。他对其父李德明臣事宋朝早就不以为然。当他听李德明说本家族30年所衣锦绮皆来自宋朝时，曾抗辩说："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图霸王之业，哪是为了锦绮？"他一继承西夏的统治权力，就下令以兵法管理各个部落，使各部落都成为可以随时征调的军事组织。下令党项人恢复旧俗，在三日内一律秃发，耳挂重环。他本人则不承认唐、宋两朝李、赵两个赐姓，改姓嵬名，改名曩霄，自称"兀卒"（青天子），重订西夏的礼乐制度和官制，制定西夏文字，升兴州为兴庆府，并于1034年（宋仁宗景祐元年）改年号为开运（旋改为"广运"），不再使用宋朝的年号。与此同时，他又向东进攻宋朝的府州（今陕西府谷县）、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庆阳县），向西攻取吐蕃大首领唃厮罗占领的青唐（今青海西宁市），攻占回



西夏开国之主元昊

鹘的肃（今甘肃酒泉）、瓜（今甘肃安西县）、沙（今甘肃敦煌县）三州，把河西走廊完全置于西夏的控制之下，使西夏拥有东抵黄河、西达玉门、南到萧关（今甘肃环县北）、北抵大漠（今蒙古瀚海），辐员二万余里的广大疆域。

宝元元年（1038），元昊一面同各部落首领约好要大举进攻宋朝，一面于十月正式称帝，建国号大夏，公开撕毁了李德明同宋朝订立的和约。紧接着，元昊又于次年正月上表宋朝，要宋朝予以正式承认，企图刺激宋朝统治者，逼使宋朝做出反应。宋朝果然忍受不了这一刺激，于宝元二年（1039）六月下诏削除元昊的赐姓和官爵，停止同西夏的边境互市，并在边境发表文告，宣布谁能捕杀元昊，就授予定难军节度使。元昊也借机把宋朝授予的旌节和封号敕诰退还宋朝，公开同宋朝决裂。



宋夏三川口之战

宝元二年（1039）十一月，元昊率兵进犯宋朝的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宋夏战争正式爆发。此后，西夏又接连进犯宋朝的渭州（甘肃平凉）、延州（陕西延安）、麟州（陕西神木县北）、府州、丰州（陕西府谷县北）等许多边境地区。宋朝因为推行“守内虚外”的腐朽政策，特别是从宋真宗搞“天书”骗局以后，武备失修，军政腐败，将官怯懦寡谋，不识干戈，兵骄不

知战阵，兵器也朽腐不堪。战争初期负责指挥对西夏防御战争的范雍等文官既不懂军事又缺乏谋略，朝廷派去担任监军职事的宦官又对军事行动横加干预。所以，在战争初期，宋朝连吃败仗。康定元年（1040）正月的三川口（在延安西）战役，因延州主帅范雍指挥失策，宋军大将刘平、石元孙被俘，万余宋军损失殆尽，延州城几乎被夏兵攻破。

三川口战役的惨败使宋朝大为震恐。宋朝一面征调军马粮储入陕增援，一面调整陕西的主兵将帅，调遣在士大夫中颇有声望的韩琦、范仲淹二人入陕为边帅，不久就任命韩、范二人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陕西经略安抚史夏竦一起主管全陕的军事，范仲淹兼任延州主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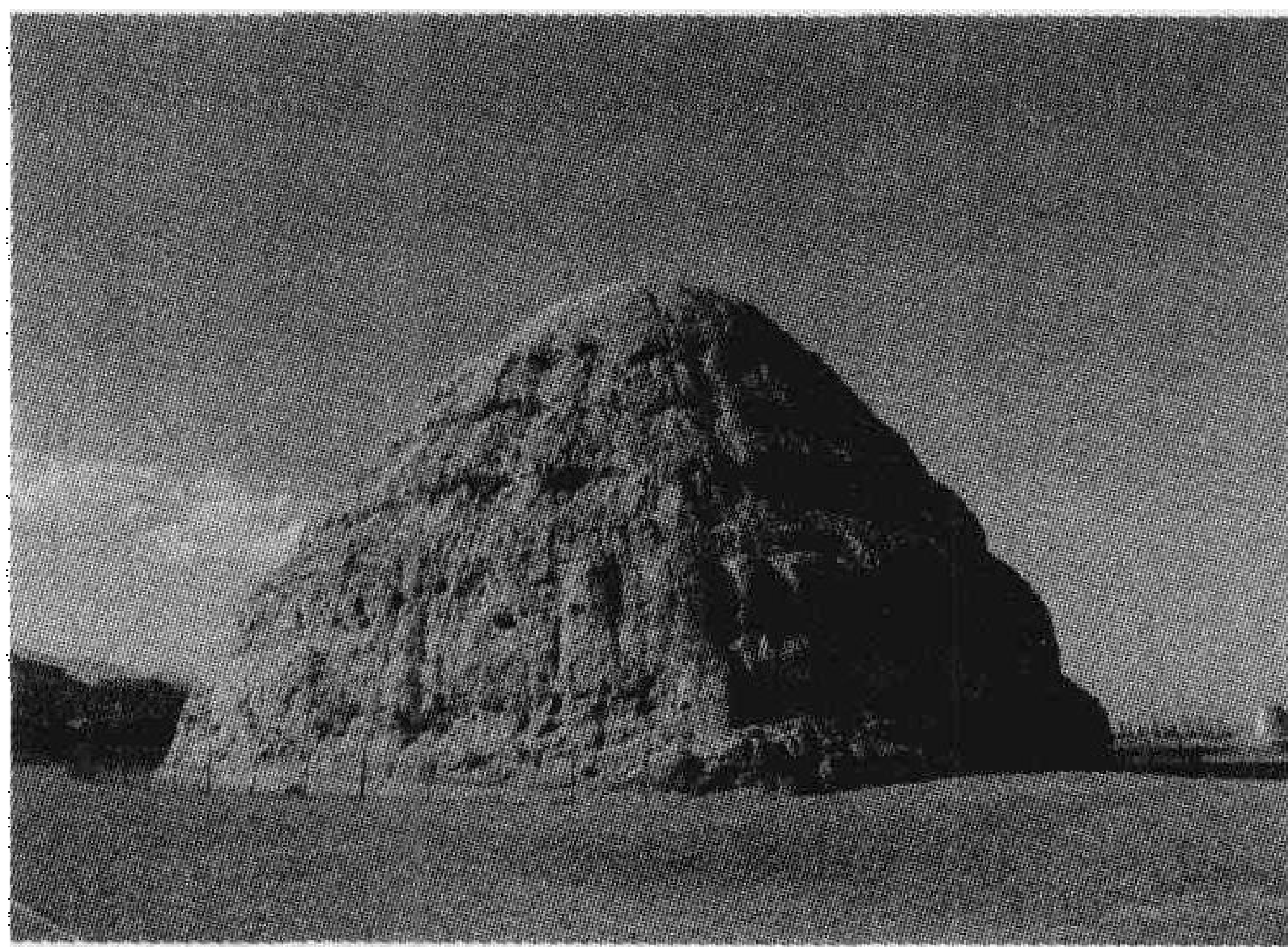
范仲淹在延州，针对当时选择将官论资排辈的弊病，将州兵18 000人，由六将率领，加强训练，敌来即根据敌情派兵出战，又相视地形，筑了一系列防御堡寨，使各堡寨互相应援，延州一线的防御才稳固下来。西夏人了解到范仲淹在延州的防御部署，互相警戒说："不能再轻视延州了。今小范老子（指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指范雍）可欺啦。"范仲淹还注意选拔将材。行伍出身的狄青作战勇敢，临敌时披头散发，戴着铜面具，在敌阵中杀进杀出，所向披靡。范仲淹对他甚是赏识，不仅给予优厚的待遇，还授予《左氏春秋》，对他说："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而已。"狄青从此努力读书，精通秦汉以后将帅兵法，成了一个有名的将领。

但是，由于范仲淹只掌握延州一线的军权，延州防御的稳固，并没有改变宋朝整个陕西边境对西夏战争被动挨打的形势。陕西的宋军主帅之间依然不能协调一致。范仲淹主张持重防御。韩琦主张会兵出击。夏竦身为统帅，却遇事不拿主意，只顾在军中与侍婢淫乐，而把攻、守二策都上报朝廷等待宋仁宗裁决。最后，宋仁宗批准了韩琦主动出击的计划，韩琦也于庆历元年（1041）二月派大将任福率军18 000人，深入敌后，企图截断进攻渭州（今甘肃平

凉市）的西夏兵的退路。任福率军抵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东）时，中了元昊的埋伏，大将任福、桑怿等人战死，宋军大败，死亡达 13 000 多人，陕西为之震动。

好水川战役以后，宋朝罢了夏竦的统帅职务，重新调整了陕西边境的防御部署，由韩琦、王沿、范仲淹、庞籍分别任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的主帅，各自负责一路的防务。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元昊大举进攻泾原路所属的镇戍军（今宁夏固原），王沿派大将葛怀敏率兵御敌，在定川砦（今甘肃平凉市北）遭元昊包围，葛怀敏及将校多人战死，9 000 多宋军及 600 匹战马皆被俘虏。元昊乘胜长驱直入渭州，大肆抢掠，并且发表文告，扬言要“亲临渭水，直据长安”。因范仲淹自庆州（今甘肃庆阳）率军来援，元昊才撤退回去。宋朝经此败仗，撤了王沿的职，由韩琦、范仲淹、庞籍分管陕西的防务。

从宝元二年开始的宋、西夏战争，既暴露了宋朝的虚弱，也暴露了宋初过分削弱武将权力的不良后果。后来，经过范仲淹等人的努力，宋朝的边境防线虽然逐渐稳固，但是，长期的战争，对于冗费繁多，国库空竭的宋朝，却是个不堪忍受的财政负担。所以，宋朝统治者迫切希望尽早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对以元昊为首的西夏统治者来说，几年的战争虽然多次利用宋朝兵力分散的弱点，获得战役的胜利，也掠夺了一些战利品，但因宋朝在陕西驻有重兵，西夏每一次战役胜利的成果都不能进一步扩大，也不能巩固。因为战争，不仅原先宋朝每年赠送的大量物资没有了，边境互市获得的巨额利益也丧失殆尽。战争掠夺所得远远不能弥补战争的损失。频繁的战争和战争所带来的巨


西夏王陵

大伤亡，不仅给西夏各部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也严重影响了西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在宋朝防务逐渐改善的情况下，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给西夏带来的困难也越多。所以，从庆历三年（1043）起，元昊也开始试探同宋朝重新媾和的可能。

因为宋、西夏双方都需要结束战争，经过一年多的讨价还价，到庆历四年（1044）又重订和议：西夏取消帝号，由宋朝册封为夏国王；宋朝每年赐给西夏银 7 万两，绢 15 万匹，茶 3 万斤；宋朝重开沿边榷场，允许宋、西夏民间贸易往来。历时七年的宋、西夏战争至此结束。宋朝又用重币获得了西北的暂时安宁。

在宋、西夏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辽朝也趁宋朝受西夏困扰的时机，于庆历二年（1042）派使臣来宋朝，要宋朝交还周世宗北伐时所夺取的瓦桥关以南十县地，同时聚兵幽燕，作出要南侵的架势，对宋朝进行要挟。宋朝急忙派富弼出使辽朝，同辽朝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答应每年送给辽的岁币中，银增加 10 万两，绢增加 10 万匹，辽才宣布从幽燕撤兵。宋朝继“澶渊之盟”，又一次屈辱地满足了辽朝的无理要求。

西北和北方的边患获得平息不久，在南方又发生了广源州蛮侬智高大规模侵扰广南的严重事件。

广源州位于广西和交趾（今越南北方）的交界处，从唐末以后依附交趾。侬智高是广源州的首领，因对交趾的控制不满，想依附宋朝，宋朝未予同意，他转而怨恨宋朝，就于皇祐元年（1049）九月间，趁宋朝广西守将没有防备，率领他所纠集的 5 000 亡命之徒攻破邕州横山寨（今广西田东）。由于宋朝统治者麻木不仁，没有认真对待这一边患，更加助长了侬智高的凶焰，侬智高遂于皇祐四年（1052）向广南地区大举进攻。因当时广南州郡武备失修，宋朝官员都闻风而逃，侬智高很快就攻陷了两广大片地区，在邕州（今广西南宁）称帝，并曾一度包围广州，对广州城外进行洗劫。宋朝先后派大臣余靖、孙沔等人前去负责讨伐，都未能成功。侬智高的凶焰也越发嚣张，公然要求宋朝封他为邕桂节度使，承认他在

广西的统治权力。

宋仁宗这时无计可施，曾准备接受侬智高的要求。刚好这时狄青主动要求出征，宋仁宗就把征讨侬智高的重任交给狄青。

狄青因在对西夏战争中屡立战功，受到宋仁宗的赏识，这时已升任枢密副使。由这样一个有卓越军事经历的人以二府大臣的身份率师出征，在当时已经是再适合不过的人选了。可是，由于宋朝历来猜忌武将，开始时宋仁宗对他也不完全放心，准备配备个宦官当狄青的副手。有的谏官也说狄青是武人，不能专任，须派侍从文官为之副。这时宰相庞籍向宋仁宗陈述了北宋大将权力太轻，指挥无力，作战屡败的教训，认为如果不给狄青全权，不如不派他出征。经过庞籍力争，宋仁宗终于解除疑忌，授予狄青指挥岭南军事的全权。



狄　青

在宋代有一种陋习，就是主帅受命出征，总有一些纨袴子弟利用各种关系在军队中挂个职务，混在军中，他们并不参加作战，却要捞取功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沔受命征讨侬智高，就因为有许多纨袴子弟在军中而不能成功。狄青受命后，也有人托权贵大臣向狄青说情，希望随军出征以捞取功名。狄青清楚地了解宋军屡败的原因所在，决心从杜绝请托入手，整肃军纪，严明赏罚。他接见请托的人，郑重其事地说："你想跟狄青出征，这正是青之所望，何必托人来说情呢？然而此次军情危急，跟我出征的人如作战有力，朝廷有赏，我不敢不代请赏。如果不能出战，则军法无情，

我不敢徇私。”一席话，吓得那些请托的人再也不敢说要跟随出征了。因为他不受请托，带在身边的人都得力可用，全军纪律严明，行止皆成行列，所到之处秩序井然，万余人的队伍在行进中不闻人言语之声。宿营时戒备森严，但求见狄青却随时可见。大军于皇祐四年十二月迅速挺进到宾州（今广西宾阳）。在这以前，广南宋军将官都视屡战屡败为常事。这时桂州（广西桂林）知州陈曙战败而回，也如以往那样若无其事。狄青立即把陈曙及其部下将校 32 人按军法处斩，使那些常败之将大为震恐，宋军全军的战斗精神却为之一振。

在处斩了陈曙等人以后，狄青下令休整 10 天。当时正值皇祐五年（1053）正月的上元节，狄青又下令大宴三夜赏灯。侬智高得到探子的报告，以为狄青不会迅速进军邕州。狄青却趁侬智高没有戒备，在上元节第二晚称病不出，其实却冒大风雨亲自率军越过险要的昆仑关，直扑邕州。侬智高仓猝应战，结果全军被歼，邕州为宋军夺回。侬智高本人逃到大理（今云南），为大理人所杀。广南重获安宁。这是狄青一生军事生涯中最光辉的业绩。

侬智高被消灭，这是北宋中期经历了一系列战败的教训以后，解除武将不能专用的禁忌，大胆任用确有军事才能的武将所获得的一次重大胜利。狄青因此声誉更隆，不久就升任枢密使。但是，声望的提高却使狄青受到文官加倍的妒忌。当了宰相的文彦博以狄青受都城士卒的爱戴，用宋太祖黄袍加身的例子，要求宋仁宗罢狄青的官。狄青家中夜间不慎失火，知制诰刘敞却造谣说这是和唐末朱全忠（梁太祖）代唐之前夜多光怪出屋一样有异象，并在士大夫中广为传播。这种危言耸听的流言蜚语，迫使狄青自动要求辞官居外，以避杀身之祸。当狄青出知陈州后，宋朝又故意每月派两次使者去表示抚问，实际上是去察看狄青的举动，使狄青精神经常极度紧张，没有半年就患病而死。一个能克敌制胜的良将就这样被无端猜忌扼杀了。

宋仁宗时期的南北边患虽然最后都被平息下去，但是，这几个

事件都暴露了宋朝在对付外患方面的软弱无力。外患迭起而又穷于应付，最后对西夏和辽都只是屈辱妥协，用重币买得边境的暂时安宁。这就是宋朝长期推行“守内虚外”政策在北宋中期所造成的“积弱”局面。

四、“庆历新政”夭折，变法思潮未艾

——范仲淹、包拯等人的革弊尝试

北宋中期，随着社会危机和宋朝财政危机的加深，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加剧。

针对势官豪强大量隐漏田赋的情况，从宋太宗以后，宋朝政府曾多次下诏均田税。宋仁宗景祐年间（1034—1037），推行了郭谘、孙琳在洺州肥乡县（今河北肥乡）实行的“千步方田法”，清查隐漏田赋的土地。但是不久，这场清查就因许多官僚地主的反对而停止了。这种均田税与反清查的斗争，反映了北宋中央政府和豪强地主之间，在地主阶级全局利益和豪强地主局部利益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在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有一些人出于对社会危机发展的忧虑，对当时死气沉沉的官僚政治提出了批评，提出了改革弊政的主张。长期担任宰相的吕夷简则指责这些不满统治现状的官员是“朋党”，对他们加以排斥。在对时政不满，要求有所改革的官员中，核心人物是范仲淹。在范仲淹受排斥时挺身而出对他表示支持的，有余靖、尹洙、欧阳修、蔡襄等一批位居馆阁清要职事、以文学知名的人士。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苏州市）人。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读书很刻苦，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登进士第，开始了宦游生涯。他在当地方官时，就注意兴修水利，兴办学校，关心时政得失，获得清正的名声；后来被推荐



范仲淹

到朝中为官，又以敢于直言、不畏权贵而著名。景祐三年(1036)，他上《百官图》，讽刺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又上书讥切时弊，希望宋仁宗不要一味信任吕夷简。为此，范仲淹被吕夷简指责为离间君臣、引用朋党，罢去权知开封府职事。

从此，"朋党"问题成了宋朝统治集团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到了庆历初年，因为对西夏的战争连年不息及阶级矛盾激化，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因为社会危机加深，宋朝的各种弊政暴露得更加清楚，长期执政推行因循守旧政策的吕夷简因不能辞其咎而地位发生动摇，欧阳修甚至指责他任宰相期间"坏了天下"。而长期受吕夷简排斥的范仲淹，因为在陕西对西夏组织防御战争的贡献而声望大增，支持范仲淹的欧阳修等人也先后被召回朝廷任职，要求革新朝政的势力在朝廷里面加强了。

士大夫中要求改革弊政的呼声这时也更加强烈。在庆历二年(1042)五月，欧阳修就上疏说"天下之势岁危于一岁"，并分析了当时的各种弊端，要求宋仁宗不迟疑地"革去旧弊"。一向昏庸的宋仁宗在这时也不能不对时局感到忧虑，遂于庆历三年(1043)三月罢去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事，任命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为谏官，表示了改革天下弊事的意向。要求革新的势力也进一步抬头。范仲淹、韩琦、富弼、余靖、欧阳修等有名望的大臣都纷纷向宋仁宗提出改革弊政的具体建议。宋仁宗遂于庆历三年七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任命富弼为枢密副使，让他们兴致太平，就当

世急务提出处置意见。

庆历三年九月，宋仁宗一再以手诏敦促范仲淹、富弼等人尽心国事，提出改革意见。后来又开天章阁，召见范仲淹等人，并破例赐坐，发给笔札，让他们当面陈述政见。范仲淹和富弼在惶恐避席退出后，分别向宋仁宗呈送了自己的革弊建议。

范仲淹认为，“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宋朝建国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已经到了“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的时候了，他具体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倖、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命等十条立制度、振纪纲的建议。这十条建议的核心内容，是改变以往官员按固定年限升迁的制度，对官员进行严格考核，按政绩的优劣分别升降；改变恩荫官员冗滥的状况，对官员恩荫子弟为官，要严格加以限制；对地方长官的委派，要由中书省和枢密院负责严格选择；改善科举制度，改变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的取士办法，以吸收有经世致用的人才补充官僚队伍。富弼的建议，主要内容也是要求进贤退不肖，止侥倖，去宿弊，逐步改善吏治。

范仲淹的建议，大部分都为宋仁宗所采纳。从庆历三年十月到庆历四年（1044）上半年，宋朝根据范仲淹革弊主张，陆续发布诏令，对内外官员的考绩升迁办法重新做了规定，对大臣陈请子弟亲戚任馆阁清要职事及转官升陟都加以限制，还对恩荫制度重新做了规定，各级官员恩荫子弟亲戚的人数和官职都做了比以前更加严格的限制，要求各路地方官注意兴修水利，尽可能合并人口较少的县份，以减少吏役的人数，使减少下来的役人回乡务农。这就是所谓“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的推行，虽然主要是为了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但对官僚机构的整顿，却不能不触犯那些在因循腐败的官僚制度中获得利益的势官权贵的利益，有的庸碌无能的官员确实被撤掉了。宋人的记载说，当时范仲淹查阅各路转运使的“班簿”（名册），每见有一人不称职，就用笔勾了记号，依次更换。富弼对他说：

"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范仲淹却说："一家哭，怎比得上一路哭呢！"坚决罢了那种不称职的官员的职事。正因为如此，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到各种无端的诽谤，攻击范仲淹、富弼是"朋党"的论调更是甚嚣尘上。以奢靡、阴险闻名的大官僚夏竦，甚至让女奴偷偷练习拥护新政的官员石介的笔迹，写了一件废立皇帝的诏书草稿，诬赖是石介代富弼起草的，并把这件事加以散布，企图置主持"新政"的人物于死地。这种种毁谤和中伤，使得范仲淹和富弼这两个推行"新政"的主要人物都感到在朝继续任职的危险，要求宋仁宗派他们到河北、陕西去主持军事事务。昏庸的宋仁宗在流言蜚语的影响下，那种迫切希望更革弊事的心情很快就消失了，对范仲淹、富弼也不再信任，就让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任河北宣抚使。到庆历五年（1045）初，范仲淹、富弼又被以更张纲纪、纷扰国经等罪名贬黜，朝中支持"新政"的官员也都被贬官到地方任职。已经颁布的磨勘（考绩）、荫子新法也被宣布作废。"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就夭折了。

范仲淹被贬官出朝廷后，于庆历六年（1046）九月，在邓州（今河南邓县）写了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表述了自己"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国忧民情思，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句，抒发自己继续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抱负。但是，因为他被排斥在朝廷之外一直到死，在有生之年中再也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抱负。在推行新政时曾经比较激进的富弼，因为有人诬告他准备以河北一路兵支持石介谋叛，在由河北入京时被阻止在国门之外不许进京城。这一夜，富弼因为不知道自己会受到怎样的处置而惶恐终夜不能入眠。他想起在同范仲淹主持新政时，有个官员用金帛迎接王伦的起义军，他坚决主张杀这个官员，范仲淹主张宽宥，并私下对他说："祖宗以来没有轻易杀一臣下，这个规矩不要轻易破坏。我们在朝中，同僚之中同心者无几，圣上的心思也摸不透，如果轻导人主诛杀臣下，他日

手滑，你我也不能自保呀。”在惶恐之余，他感慨地称赞范仲淹是有先见之明的“圣人”，也悔恨自己当初的激进。可能是因此之故，富弼从此丧失了继续改革弊政的勇气。

在“庆历新政”夭折后，士大夫改革弊政的思潮虽然一时受到压抑，但是，由于社会危机继续存在，从庆历四年（1044）宋朝同西夏订立和约后，陕西的驻军并没有减少，却又多了一大笔每年要赐给西夏的银绢，财政危机继续加深，因此，士大夫的变法思潮并没有因“庆历新政”的失败而消沉下去。在宋仁宗统治的最后十多年间，又有不少官员继续提出各种变法和革除弊政的主张。

在这股要求革弊图新的潮流中，涌现了一个不仅一再呼吁革去积弊，还在自己职权范围内不遗余力地除暴安良的清官包拯。

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在宋仁宗统治时期，他由进士及第登上仕途，做过多任地方官，还担任过权知开封府、三司使、枢密副使等多种重要职务。因为他曾被授予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等清要职衔，所以又被人们称为“包待制”、“包龙图”。



京剧中的包拯形象

在北宋中期主张革新的士大夫中，包拯虽然不如范仲淹和后来的王安石知名，但他也在许多场合表述过反对“因循”守旧的政治立场。他针对当时的“三冗”积弊，提出了裁减冗吏、冗兵和节用度的救弊主张，要求宋仁宗“锐意而改图”，并且尖锐指出，如果再上下因循，不务更张措置，将来必有不可救之患。他还提出了慎命令，严明赏罚，严惩赃吏、杜绝请托、抑侥倖等一系

列革弊主张。这些主张虽然由于他位卑言轻，没有产生多大政治影响，但却说明包拯的革新派立场是很鲜明的。

在包拯的宦游生涯中，最令人称道的，是他刚直不阿，执法如山，铁面无私。他任庐州知州时，一些亲旧倚势不服从官府约束，有个堂舅更公然犯法。包拯却毫不徇私，依法处置，使那些亲戚从此再也不敢仗势胡为。他对来自亲朋故旧的请托，一概加以拒绝，从不徇情枉法。他在朝中做官，以立朝刚严，不畏权贵而著名。他一再弹劾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说他使“法制刓敝”，是“清朝之秽污，白昼之魑魅”，并说宋仁宗重用张尧佐，“有私昵后宫之过”。有个中贵人侵占河道数步作亭榭，包拯也予以弹劾。因为他铁面无私，不畏权贵，所以在他权知开封府时，令行禁止，那些平日为非作歹的贵戚和宦官都有所收敛，而老百姓则因为他刚正无私，作歌谣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意思是说只有包拯不能用贿赂和请托打通关节。

包拯立身处事的种种作为，虽然未能改善北宋的腐朽统治，也不能改变当时劳动人民倍受压榨的悲惨命运。但是，他要求改革积弊，反对因循守旧，尤其是他不畏强暴，尽力除暴安良，敢于为民请命，却是符合当时人民愿望的。在腐化成风的北宋官场中，他那种廉洁无私的作风，更是受到人民的赞扬。所以，后来人们就把包拯的一些事迹编成戏曲小说加以流传，包拯也成了后代人民景仰的一个传奇式的清官。



包公祠

五、“熙宁变法”的风波

——王安石与司马光两派的不同政见之争

嘉祐八年（1063）初，在皇帝位达40年之久的宋仁宗病死。宋仁宗无子，其养子赵曙（宋英宗）继承皇位。

宋英宗面对宋仁宗遗留下来的内外交困的政局，曾经想对朝政积弊进行一番改革。他继位不久，就对执政大臣提出“积弊甚众，何以裁救”的问题。只是由于当时执政大臣富弼用“恐须以渐厘革”这句话予以搪塞，不予积极支持，宋英宗本人不久也重病缠身，经常精神失常，不能处理政事，他救治积弊的愿望终于无法实施，宋朝统治所面临的危机也继续加深。仅财政一项，宋仁宗统治时期每年亏空的数额即达300万缗以上，财政危机已经很严重了，英宗治平年间竟达到1 570余万缗。到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病死时，宋朝甚至不得不大大削减丧葬的费用。可见，当时宋朝的财政困难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宋英宗死后，其子赵顼（宋神宗）继承皇位。这时的宋朝，已经像一个五脏皆患痼疾的中年病人，随时有疾患发作、难以救治的可能。就在宋神宗刚即位两个月，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就上疏给宋神宗，对当时“天下困极”、“而上下恬然不图营救”的政局表示“不胜忧愤”，并且说，宋朝如果继续“遵常守故，龊龊细文，避猜嫌，顾形迹，恤浮议而废远图，忽人谋而徼天幸”，将来一旦出现饥馑及“寇戎”，就将难以挽救。张方平并不是革新派人物，但他也提出反对“遵常守故”，说明改革弊政是当时士大夫的普遍愿望。

宋神宗在当太子时，就很关心天下大事。他继承皇位时虽然只有20岁，但在当时士大夫方兴未艾的变法思潮影响下，很想能有一番作为，以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因此，他在登上皇帝位不久，就向元老大臣富弼询问富国强兵之术。他哪里知道，这时的富

弼不仅因为庆历新政的失败而早已丧失改革的锐气，而且由于自己政治地位的变化及久居高位，变得十分老于世故，已经变成个醉心于看经念佛，政治上自己不想有任何作为，也反对别人有所施为的守旧人物。富弼也像几年前对待宋英宗的除弊热情一样，给宋神宗浇了一盆冷水，让宋神宗"二十年不言兵"，实际上是让宋神宗放弃富国强兵的改革念头。



王安石

宋神宗看到从元老大臣那里得不到支持，就寄希望于当时在士大夫中享有很高声望的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其父王益做过几任州县长吏。王安石在青少年时期随其父到过许多地方，对宋朝的社会问题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

对社会问题的感受，使王安石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决心改变少年轻狂、吟风咏月的情趣，努力钻研学术，为改变社会现状做一番留芳史册的事业。所以，在他考中进士、开始宦游生活后，无论是做县官还是做州官，他都注意兴修水利和关心民间疾苦。例如，他在知明州鄞县时，就利用冬暇组织当地人力修筑堤堰，疏通沟渠，在临江靠海之处建立斗门。他还针对农民在青黄不接时为高利贷坑苦的情况，把官仓的粟米轻息贷给农民，使农民在秋后归还，渡过青黄不接的难关。长期的地方官生涯，使他得以更多地了解宋朝统治所面临的问题，主张改革弊政的思想也逐渐形成了。

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向宋仁宗呈送了一封长达万言的《言事书》。他在这个《言事书》中分析了宋朝内忧外患交炽，财政日益困穷，风俗日益败坏的形势，提出了"变更天下之弊法"及培养大批适应变法革新需要的人才的迫切性，要求宋仁宗以汉、唐两代王朝的覆亡为前车之鉴，果断实行变法。他还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思想。

这个《言事书》呈送上去后，如石沉大海，没有引起宋仁宗

的任何反响。在这以后，王安石也没有受到重用。但是，王安石却因为不以进退为意，而且学识过人，在士大夫中获得越来越高的声誉，以致许多人都为他没有被任命为执政大臣而抱不平。

宋神宗在登皇帝位以前，对王安石的学问就已经有所了解。在他登上帝位后，因为元老大臣对富国强兵问题的消极态度使他感到失望，遂于熙宁元年（1068）初把王安石从知江宁府（今南京）召进京城为翰林学士，让他随时陈述政见。

王安石一就任，宋神宗就恳切地对他说："朕久闻卿道术德义，有忠言嘉谋当不惜告朕。方今治当何先?"他还问王安石"唐太宗何如"，这些问题清楚表达了他变法图治，使宋朝变得像盛唐时期那样强盛的强烈愿望。王安石则激励宋神宗"当以尧舜为法"。退朝以后，王安石即上了个《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分析了宋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指出宋朝所以百年无事，主要是因为外敌并不强大，内部又无严重的水旱之变的缘故，是"天助"的结果，但"天助……不可常恃"，必须赶快修"人事"，即采取措施使政治清明，而"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宋神宗对这个奏疏十分重视，当晚就反复看了数遍。他十分赞赏王安石的意见，第二天见到王安石时，就迫不及待地让王安石"详言施设之方"，提出改革弊政的具体建议。王安石只粗略谈了一些设想，宋神宗就大为高兴地说："这都是朕所未尝闻，他人的学问所不及的啊!"

在王安石的激励下，宋神宗坚定了变法图强的决心，遂于熙宁二年（1069）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接着又设置一个名为"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新机构，由王安石主持，专门负责拟定变法措施。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熙宁变法"就在宋神宗发动下，在王安石主持下，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

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宰相，授予政府大权，让他更有力地推行新法。

王安石因为得到宋神宗的信任，感到自己施展政治抱负的时候到了，也以变法总设计师的姿态，根据自己对宋朝积弊的认识及其他官员实行过的一些革弊经验，招集吕惠卿、曾布等一批拥护变法

的官员，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为宋神宗设计了一个个改革方案。当改革方案经宋神宗认可，并以诏令形式发布后，王安石又不屈不挠地极力加以推行。

从熙宁二年到熙宁九年（1076）的八年内，宋神宗在王安石的大力协助下，围绕富国强兵这一目标所推行的变法措施，主要有：

（1）均输法——变法以前，东南六路每年需按规定的品种和数额，上供物货供京城的皇室和朝廷享用，各路丰年物多价贱时不能多办，歉年物贵时却又必须办足，物货运到京城后往往因不合需要而削价抛售，朝廷所需却又要另去搜括，结果是“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富商大贾却乘机操纵物价，“擅轻重敛散之权”。均输法规定：总管东南六路赋入的发运使可以周知六路财赋有无并加以移用；在采办上供物货时可以“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发运使应先了解京城府库支出之所需，“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这项变法意在“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既保证朝廷所需物货的供给，又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和人民的负担。

（2）青苗法——它规定：把以往为备荒而设置的常平仓、广惠仓的钱谷作为本钱，在夏、秋青黄不接的时候贷给农户，称为“青苗钱”，收成后加息20%，随夏、秋两税纳官。推行青苗法的用意，在于使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免受兼并势力的高利贷盘剥，并使官府获得一大笔“青苗息钱”的收入。

（3）农田水利法——又称农田利害条约，它规定：对提出兴修农田水利建议以及能出财力、组织农户兴修农田水利的人，都待施行毕按功利大小酬奖；各级官吏能兴修农田水利，也按功绩大小给予升官；如果工程浩大，受利农户财力不足，可向官府借贷“青苗钱”，按借“青苗钱”的办法分两次或三次纳官；对开垦荒田也进行奖励。

（4）募役法——又称免役法，是对北宋职役制度的改革。北宋初年以来实行的按户等轮差各种职役的制度，虽然像里正这类职役由地主担任，反映了地主政治上的特权，但是，职役也有使轮差

的乡户破产的可能。例如，“衙前”一役，因为乡村地主不熟悉官场事务，失陷所保管的官物又要赔偿，许多轮差“衙前”的乡户往往因此而破产。里正、户长碰到豪强势官逃避赋税，也有因为官府强迫代纳而破产的。所以，在北宋中期不断有人要求对职役制度进行改革。募役法就是针对职役制度的弊病而发布的。它规定：衙前等原由乡户轮差的职役，改由官府雇人充役；乡户按户等向官府交纳免役钱，随夏秋两税交纳；原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寺观，要按同等户的半数交纳役钱，称“助役钱”；乡户在交役钱时，另多交二分，称“免役宽剩钱”，以备荒年不征收役钱时雇役之用。募役法推行的用意，在于使原来轮充职役的乡户返乡务农，并使政府增加一笔役钱收入。

（5）市易法——主要内容是：在京城设市易务（后改为市昌司），以一百万贯做本，负责平价收购商人滞售的货物，赊贷给商贩贩卖，也向商贩发放贷款；商贩赊贷货物及借款，需以财产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市易法最初实行于京师，后来又推行到其他较重要的商业城市。

（6）方田均税法——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就是每年九月由县令负责丈量土地，按肥瘠定为五等，登记在庄帐籍中。“均税”就是以“方田”的结果为依据均定税数，凡有诡名挟佃隐漏田税者，都要改正。这个法令是针对豪强隐漏田税，为增加政府的田赋收入而发布的。

（7）保甲法——主要内容是：乡村住户以十户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以住户中最有财力和才能的人担任保长、大保长和都保长；同保人户互相监察，发现有违法行为或外来不明身份的人，要告发，否则要连坐处罚；一家有两丁以上者，选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中练习武艺。推行保甲法，主要是为了防范和镇压农民的反抗，也有通过训练保甲以代正兵，逐步改革募兵制度的意图。

（8）保马法——规定开封府界及陕西、河东、河北等路的保甲和带有民兵性质的义勇，可以养一匹至两匹马，由官府供给马匹

或出钱让养马户自行购买；养马户可以免除一些赋税负担；养马户要互相结保，马匹死亡要赔偿。保马法的推行，主要是减少官府牧监的养马费用，获得更多的战马供军队使用。

（9）将兵法——这是针对禁军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而发布的整军措施，办法是把各地禁军分为若干单位，每一单位置将、副将各一人，选派有武艺又有战斗经验的军官担任，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凡实行“将兵法”的地方，将官“各专军政，州县不得干预”。“将兵法”先试行于陕西地区，在熙宁七年推行于北方各路，共置42将。

除了上述九项措施外，在熙宁年间，对军器制造的机构、科举制度及培养人才的办法等等，也都有所改革。这场发生在熙宁年间，由宋神宗和王安石主持的变法，就是“熙宁变法”。

“熙宁变法”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实现富国强兵这一目标，改变北宋的积贫积弱局面，增强宋朝对外防御、对内镇压的能力，巩固和加强宋朝的统治。变法推行的结果，虽然“保甲法”和“将兵法”的推行并没有使宋朝的军事力量有什么加强，“强兵”的目标并没有实现，但是，因为，“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的实行所获得的巨额青苗、市易息钱及雇役出剩的役钱，宋朝的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出现了“中外府库，无不充衍”的局面，变法的“富国目标”部分达到了。

这场自上而下的变法，有的内容明显是为了镇压农民的反抗，一些理财措施也有“聚敛”的意图，推行的结果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但是，它鼓励兴修农田水利，并且确实收到了实效，单是水利田一项，在熙宁年间就兴修了上万处，使千万亩的土地获得灌溉之利。有的水利设施对后代还产生良好效益。例如，福建莆田的木兰陂在熙宁八年（1075）兴修后，使万顷土地“变泻卤为上腴，更旱暵为膏泽”，直到南宋后期还在发挥效益，官府还立碑纪念这项工程的主持者。可见，变法对发展农业生产起了有益的作用。募役法中的以雇役代替差役，也顺应了当时商品货币经济和雇佣关系

发展的历史趋势。

但是，这样一场对加强宋朝的统治有利，又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变法，在北宋统治集团内部却激起了轩然大波，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当时站在反对新法立场的，不仅有文彦博、韩琦、富弼、欧阳修等元老大臣，还有太皇太后曹氏（宋仁宗的皇后）、皇太后高氏（宋神宗之母）和宋神宗之弟赵颢等宫廷显贵。其代表人物则是司马光。

当时站在新法对立面的人，除了有富弼那种反对任何微小改革的顽固守旧人物外，有许多人是因为在如何革弊问题上同变法派有不同政见。例如，在宋神宗刚即位时就提出反对“遵常守故”的张方平，他反对守的“故”，只是北宋中期的积弊，他主张的变革是“修明真宗已（以）前旧典”，逐渐“裁而正之”，使北宋恢复太祖、太宗、真宗时期的局面。这种思想在保守派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这种留恋“祖宗”“旧典”的人反对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变法主张，是很自然的。司马光在宋英宗时曾提出过改衙前差役为募役的主张，但他又认为对待祖宗之法应当“存其善而革其弊，不当无大无小尽变旧法”，“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他认为祖宗之法使宋朝承平百年，不应尽变。所以，当他认为变法是要尽变祖宗旧法时，他就大叫“祖宗之法不可变”，成了保守派代表人物。苏辙则是另一种情况。变法开始时，苏辙曾上疏给宋神宗，批评变法是“所当先者失之于不为，而所当后者失之于太早”。他并不一概反对改革，而是不赞成当时的改革步骤，也站在变法的对立面。因此，在宋仁宗庆历、嘉祐年间那些“常患法之不变”的“名士”们，在熙宁变法时纷纷站在反变法的立场，这种变化主要不是他们政治立场有什么改变，而是因为他们的改革主张同熙宁变法不同，不能接受熙宁年间否定“祖宗之法”的变法。

司马光等保守派人物所以反对变法，主要理由是担心变法对北宋统治会产生不良影响。例如，在“抑兼并”问题上，尽管变法

派只是一种标榜，变法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多大效果，但他们已产生无穷的忧虑。因为他们认为，富者是宋朝统治赖以依靠的支柱，“抑兼并”会使富者变穷，而富者变穷后，一旦突然遇到内忧或外患的祸变，宋朝所急需的军用物资就无所从出，就会措手不及。实行“将兵法”本来是为了提高禁军的素质，他们却认为让武将“专军政”，改坐“以文驭武”的原则，就会出现武将难制的情况。“保甲法”本来是为了防范“盗贼”，他们却认为教民习武，适足以助长“盗贼”的气势。总之，他们认为“祖宗之法”是宋朝统治稳定的保证，反对尽变“祖宗之法”。保守派同变法派围绕变法问题所进行的激烈斗争，是统治集团内部围绕如何加强宋朝统治的问题所进行的不同政见之争。

由于宋神宗坚持变法立场，王安石又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同守旧派进行坚决斗争，吕惠卿等其他变法派人物在斗争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熙宁年间，守旧派阻止并取消变法的企图没有得逞。在王安石于熙宁九年（1076）十月辞职离开朝廷，退出政治舞台后，所有的变法措施都在宋神宗主持下继续推行。

“熙宁变法”虽然前后推行了 18 年之久，也获得一些成果，宋朝的国库收入大大增加，出现了府库空前充实的局面。但是，由于变法只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并没有触及导致社会危机加深的社会经济结构，对造成宋朝“积贫”、“积弱”局面主要根源的专制皇权过分膨胀的问题，更没有任何触动。许多变法措施本来就没有切中时弊，难以在社会生活中扎下不可动摇的根基，在推行过程中又因官员们希功邀赏，不断出现推行违背立法原意的问题，如把青苗钱的发放由民户自愿请领变为强行摊配，增加青苗息钱等等。这就使得新法不仅失信于民，有的还引起农民的不满，增加了推行的阻力。因此，新法虽然推行多年，却没有使当时的统治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同时，由于变法派内部并不是一个政见一致的政治集团。在变法过程中作为王安石得力助手的吕惠卿、曾布二

人，后来都同王安石发生尖锐的矛盾。曾布在“市易法”问题上倒戈。吕惠卿则利用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四月第一次暂时辞去宰相职位的时机，想取而代之，夺取宰相职位。在王安石识破他的阴谋，回朝再任宰相后，他又结成一个小集团同王安石对立，甚至告发王安石对宋神宗不忠，企图置王安石于死地。有些积极参加变法的人则纯粹为了投机。例如，有个叫邓绾的人，为了获得王安石的信任，大力为新法唱赞美歌，并且毫不掩饰他猎取高官的欲望，遭到同乡们的责骂，他却恬不知耻地说：“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就是这个邓绾，后来就在王安石同吕惠卿的矛盾斗争中推波助澜，加深了变法派内部的分裂。变法派内部的矛盾，使得变法派不可能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当时只有宋神宗一人才能把四分五裂的变法派黏合在一起。熙宁九年（1076）十月，王安石在变法派内部争斗不已，自己也灰心丧气的情况下再度辞去宰相职位，并且从此离开政治舞台后，变法由宋神宗亲自主持，其他大臣都只是奉行宋神宗的意旨，整个变法的命运，也都系在宋神宗一人身上。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病死，其子赵煦（宋哲宗）继承皇位时还不满十岁。宋神宗之母高氏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守旧派重新上台。这时，变法派就只能用“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个武器，来防止变法被取消了。而当司马光提出“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时，变法派就无能为力了，新法也很快被废罢。“熙宁变法”因为根基不牢，政局一变就以失败告终。

第六章　北宋后期的腐朽统治和“靖康之祸”

一、“更化”与“绍述”

——政局的剧变与党争

宋神宗死后，以太皇太后高氏和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废罢新法、恢复旧法制的活动，因为是在宋哲宗元祐年间，所以后来被称为“元祐更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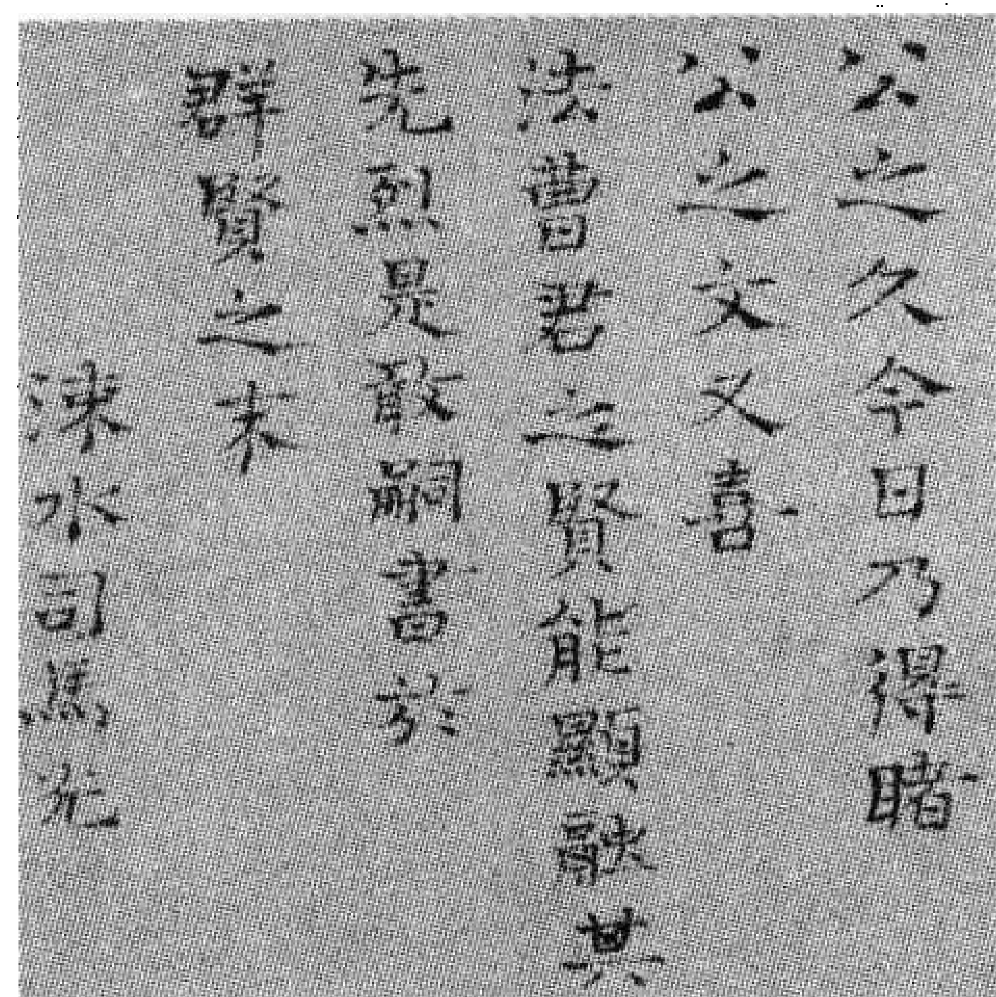
“元祐更化”不仅把北宋的统治拖回变法以前“积贫”、“积弱”的老路，还使得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更加复杂。

在守旧派上台大举制造废罢新法的舆论时，因为变法派的蔡确和章惇还分别任宰相和知枢密院事，分掌东、西二府的人权，使守旧派不能为所欲为地废罢新法。但蔡确、章惇很快先后被赶出朝廷。

蔡确被贬官居外后，在安州（今湖北安陆）作《夏中登车盖亭》诗十首。有一首绝句咏道：“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有个叫吴处厚的官员把蔡确的十首诗抄录向朝廷打了报告，说是有五首都有讽刺朝政之意，还特意把上面这首绝句作了添油加醋的笺释，说这是借唐高宗时郝处俊谏高宗不要逊位给武后这件事，影射攻击太皇太后高氏。吴处厚的报告一呈上，朝中的守旧派立即纷纷要求治蔡确的“讥

讪”之罪，蔡确也因此被流放到新州（广东新兴），一些反对以诗治蔡确之罪的官员也遭贬斥。蔡确终于被迫害死于贬所。这就是所谓车盖亭诗案。

后来，守旧派为了进一步打击变法派势力，又把吕惠卿、章惇等36人定为王安石的“亲党”，把安焘等60人定为蔡确的“亲党”，并把这两个“亲党”的名单列榜公布，全部赶出朝廷，不许他们再入朝为官。



司马光手迹

因为守旧派对变法派人物进行过火的打击和迫害，两派之间结下了仇怨，矛盾更加不可调和了。

除了守旧派与变法派之间的矛盾加深外，守旧派内部的派系斗争也发展成公开的冲突。

司马光在元祐元年（1086）九月死后，守旧派内部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并分裂成朔党、蜀党、洛党三个派别。朔党以刘挚为首，在废新法时是司马光最坚定的支持者，势力也最大。蜀党以苏轼为首。洛党以理学家程颐为首。三派之间互相攻击，程颐、苏轼、刘挚先后都因为守旧派自相倾轧而被罢去朝官职位。

在元祐年间，守旧派都仰承垂帘听政的高氏的鼻息，没有把小皇帝宋哲宗放在眼里。有时甚至连宋哲宗说话，许多守旧派大臣都不予理睬。宋哲宗随着年龄的增大，对守旧派大臣这种目中无君的情况越来越愤懑。守旧派同皇帝之间潜伏的矛盾，也越来越深。

正当守旧派内部各派互相倾轧，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太皇太后高氏于元祐八年（1093）死去，守旧派一时又失去了靠山。宋哲宗在亲政后，准备驱逐那帮曾经对他不敬的守旧派大臣。这时有个惯于投机的官员杨畏揣摸到宋哲宗的意向，上疏称颂宋神宗毅然变法的功德，要求宋哲宗“成继述之道”，起用章惇、安焘、叶清臣等变法派人物。宋哲宗接受杨畏的建议后，把年号改为“绍圣”，公开打出了“绍述”先圣（神宗）的旗帜。章惇被起用为宰

相，其他变法派人物也被召回朝中担任各种要职。凡反对“绍述”神宗事业的人，都被罢官赶出朝廷。北宋的政局又一次发生剧变。

章惇等人重新得势后，虽然以恢复新法为标榜，但实际上他们主要是考虑如何对守旧派进行报复。在章惇赴京城途中的船上，有人问他为政以何为先。章惇说：“司马光奸邪，所当先办，势无急于此。”他执政后，也确实把对守旧派进行政治报复作为当务之急。当时在元祐年间协助高氏废罢新法的主要人物司马光和吕公著虽然都已死去，还是被追夺官职。章惇等人甚至要求掘他们的坟墓，劈棺暴尸，以泄私恨。其他在元祐年间支持废罢新法的官员则被作为元祐党人贬官。守旧派中的刘挚、苏辙、范纯仁等地位较高的官员，更被流放到岭南，有的甚至死在流放的地方。残酷的政治报复，使守旧派同变法派在元祐年间结下的仇怨更加深刻了。

在“绍述”的旗号下集结起来的变法派人物，也矛盾重重，互相排斥。首先提出恢复新法的杨畏，因为元丰年间支持新法，元祐年间却附和守旧派攻击新法，哲宗亲政后又首倡恢复新法，被人笑骂为“杨三变”，被右正言孙谔弹劾罢职。孙谔又在恢复募役法问题上同章惇发生分歧，主张吸取元丰、元祐政策的长处，被蔡京弹劾罢去官职。监察御史常安民说蔡京“奸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巧足以移夺人主之视听，力足以颠倒天下之是非”，要求宋哲宗驱逐蔡京。常安民还指责章惇专国植党，要求宋哲宗收主柄而抑其权。结果常安民被罢官。安焘因为替常安民辩护，被指责为与常安民相表里，也被罢官。主“绍述”之说很得力的李清臣，因为不赞成把所有元祐党人都逐到岭南，逆了章惇之意，也被赶出朝廷。章惇成了权势最显赫的人物。

但是，章惇的好景不长。宋哲宗亲政仅仅六年就病死了，他没有儿子，其弟端王赵佶继承皇位，神宗皇后向氏同处分军国事。赵佶就是宋徽宗。章惇因为反对赵佶继承皇位，不久就被罢去宰相职位，赶出朝廷。向氏也是个守旧派人物，在她同处分军国事时守旧派大臣又纷纷被召入朝担任要职。韩琦之子韩忠彦被起用为门下侍

郎，不久就任右相。在韩忠彦的活动下，司马光、刘挚等33个元祐党人都恢复原来的官职，守旧派势力又有所抬头。蔡京等人则被罢官逐出朝廷。

向氏当权不久就归政于宋徽宗。宋徽宗这时曾经想调和一下变法派同守旧派两派的矛盾，任命韩忠彦为左相，任命拥戴自己继承皇位的曾布为右相，做出两派兼用的姿态。又把年号改为“建中靖国”，表示要大正至公，消释朋党，并对元祐年间和绍圣年间的政策都进行批评，企图以此平息两派的斗争。

曾布是比杨畏更加狡猾的投机家。在“熙宁变法”开始时，他态度最为坚决。王安石曾说，始终说法可变者，只有曾布一人。但是到后来，他就倒戈攻击市易法。以后在两派反复斗争中，他一直看风使舵。当章惇激烈反对宋徽宗继皇帝位时，他即呵责章惇，因而受到宋徽宗的信任。在向氏当权时，他极力参加对章惇等人的打击。在向氏归政给宋徽宗后，他也曾顺着宋徽宗的意向，想“和调元祐、绍圣之人”。因两派难以调和，他同韩忠彦又发生权力的争夺，就又向宋徽宗“进绍述之说”，鼓动宋徽宗打击守旧派，并且把蔡京重新召人朝中，企图加强自己的势力。

蔡京又是一个比曾布更加狡诈的人物。在宋神宗时，他投机于变法派。司马光废罢募役法时，他在开封府又按司马光的要求，五日内把开封府畿县的雇役全部改为差役，获得司马光的嘉奖。绍圣年间，他又支持章惇全面恢复募役法。宋徽宗刚继承皇帝位时，他被向太后赶出朝廷到杭州任知州。正好宋徽宗的亲信宦官童贯投徽宗之所好，到江南访书画奇巧。蔡京也是个能书善画的人，于是不惜代价同童贯交游，托童贯把自己所画的工艺品进献给宋徽宗。宋徽宗由此赏识蔡京。当时有个叫邓洵武的官员又对宋徽宗煽动说：“陛下乃神宗子，现宰相忠彦乃韩琦之子。神宗行新法，韩琦反对。今忠彦更神宗之法，是忠彦为人臣尚能绍述其父之志，陛下为天子反不能绍述先帝吗？要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邓洵武还画了一张《爱莫能助之图》献给宋徽宗。说举朝辅相、公卿都是

害政不欲绍述的人，非相蔡京不可。

在曾布和邓洵武等人的煽动下，宋徽宗也改变了调和两派的想法，把年号改为“崇宁”，表示要追崇熙宁新法，于崇宁元年（1102）五月罢免了韩忠彦。因为宋徽宗早已决定让蔡京当宰相。闰六月，曾布也被罢免。七月，蔡京拜相。

蔡京当政后，又打起了变法的旗号，声称不仅要恢复熙宁、元丰年间已行法度，连宋神宗想改革而未暇改革的问题，也要进行改革。对元祐党人，则进一步加以打击，把司马光等120人定为奸党，由宋徽宗亲自书写，刻石于皇宫的端礼门，称为党人碑。其中已死的人追贬官职，未死的人贬窜流放到边远地区。苏轼等人的文集也被下令毁掉。凡元符末年宋哲宗死后提议恢复旧法的人，共500余人，也被作为“邪类”加以降官责罚。崇宁三年（1104），蔡京又伙同宋徽宗，把元祐、元符党人合为一籍，重新确定309人为“党人”，刻石于朝堂。到后来，连李清臣及王安石的学生陆佃等许多变法派人物，因为得罪了蔡京，也都被打入元祐党人籍，甚至连章惇也被视为“党人”加以打击。

从“元祐”到“崇宁”十几年间，宋朝政局的屡变及党争的恶性发展，统治集团内部愈演愈烈的相互倾轧，使得北宋的政治更加黑暗，统治力量也进一步削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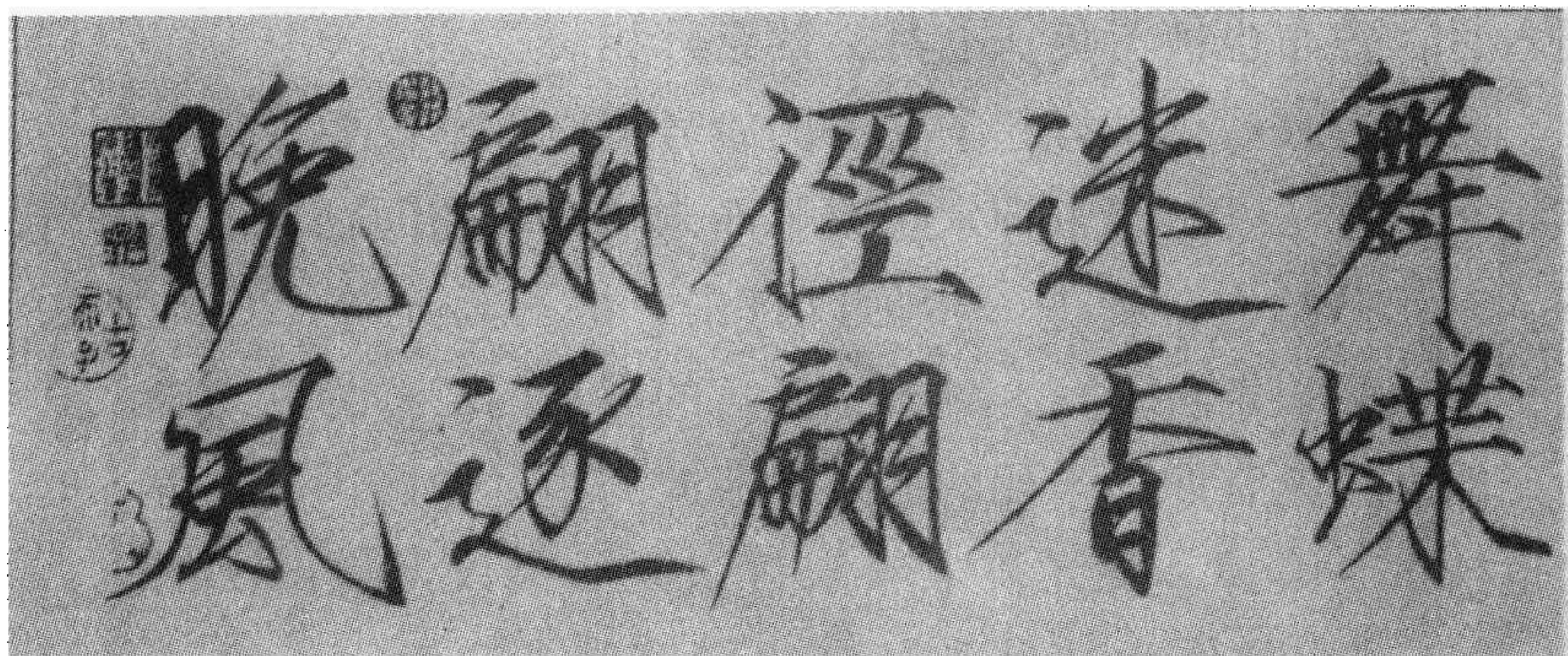
二、“丰亨豫大”与花石纲之扰

——宋徽宗、蔡京集团的腐朽统治

宋徽宗以蔡京为宰相，同蔡京结成统治集团，使北宋的统治进入最黑暗、最腐朽的时期。

宋徽宗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和昏君。他吟诗咏赋，能书善画，宋人说他文采风流胜过后唐李后主百倍。他对玩乐特别嗜好，声、色、书、画，奇花异石，飞禽走兽，乃至蹴踘（踢毬）、诙谑

等等，他无不喜好。凡能投其所好的人，不论朝中大臣、宫廷宦官，还是市井流浪汉，都能得到他的信任和重用。有个叫高俅的人，本来是个听差，因为善于踢毬，徽宗未做皇帝时就很赏识他。徽宗做皇帝后，不几年就升高俅为殿前都指挥使，让他统领禁军，



宋徽宗赵佶“瘦金体”书法

并且很快就授予高俅“使相”的头衔。同高俅一起在端王府邸当随从的人看到高俅一再升官，要求徽宗对他们一视同仁，宋徽宗竟说：“你们有他的好手脚吗?”

在宋徽宗统治的20多年中，最受信用的，是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人，这些人都势焰熏天，被时人称为“六贼”。他们互相勾结，排斥异己，广树党羽，贿赂公行，甚至公开标价卖官。当时曾有“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的歌谣，揭露蔡京等人公开卖官的行径。许多想靠行贿得美官的人都在蔡京门前等候。在宋徽宗统治时期，朝内外大权基本上都在“六贼”及其党羽、门人的控制之下。他们也凭借权势，大肆兼并土地。其中朱勔得势几年，所兼并的土地跨州连郡，甲第名园遍布苏州，每年租课达10余万石，后来被宋钦宗（宋徽宗之子）下令抄家时，被没收的土地达30万亩。可见这些势官兼并土地之猖狂。

为巩固自己的权势，蔡京等人竭力在各个方面投宋徽宗之所好，助纣为虐。

宋徽宗对方士幻术感兴趣，蔡京就为他引荐会方术的方士。宋

徽宗迷信神仙，有一次祀天，徽宗突然装神弄鬼，说是看到天上有楼台殿阁。蔡京之子蔡攸在旁，也煞有其事地说他也看到离地几十丈的云间有楼台殿阁，还有道流童子隐约出现。宋徽宗迷信道教，蔡攸就说有什么珠星、劈月、跨凤、乘龙、天书、云篆之符，竭力加以逢迎。

对于宋徽宗想粉饰太平的心思和在玩乐方面的嗜好，蔡京等人更是竭力加以应承。

蔡京挖空心思，把《易经》上“丰亨，王假之”和“有大而能谦必豫”两句话加以发挥，提出“丰亨豫大”的口号，说宋朝的礼乐制度和宫室规模，都同国家的富强和徽宗君德之隆盛不相配称，需要广建宫室、重修礼乐。他还鼓吹宋徽宗应“享天下之奉”。蔡攸则劝宋徽宗“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不要“徒自劳苦”，让有限的岁月白白流逝。宋徽宗对此当然乐于接受。于是就下令仿照夏、周的制度，用铜22万斤，铸造显示皇权浩大的九鼎，并兴建有九座大殿的九成宫，以安放九鼎。宋徽宗还以蔡京为明堂使，下令搜刮各地完整的大木料运到京城，每天役工上万人，兴建供祭祀用的“明堂”。凡能粉饰太平、显示皇帝君德的东西，宋徽宗及蔡京一伙都不惜代价地去兴办。

在粉饰太平的同时，宋徽宗、蔡京统治集团在玩乐挥霍方面的追求，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还在崇宁元年（1102）初，宋徽宗就让童贯在苏州、杭州设造作局，制造各种精美工艺品，以供宫廷享用。蔡京当政后，知道宋徽宗对花石特别嗜好，就让苏州人朱冲密取浙中珍异花木进献，宋徽宗果然大为赞赏。此后，花石的进奉越来越多。所进奉的花石都通过大运河和汴河，用船运到京城，称为“花石纲”。崇宁四年（1105），宋徽宗更在苏州设置苏杭应奉局，由朱冲之子朱勔总负责，以搜刮东南地区更多的花石。朱勔按照宋徽宗的旨意，把士庶之家可供玩赏的一石一木，都指为御前之物，用“花石纲”运到开封。在江湖之中的异石，也不惜代价捞取。这些花石运到都城

后，蔡京就鼓动宋徽宗在原来的皇宫以北兴建延福宫，让宦官童贯等五人分任其责。这五个宦官争以侈丽高广相夸尚，不仅殿阁亭台相望，凿池为海，疏泉为湖，还建筑了鹤庄、鹿砦、文禽、奇兽、孔翠诸栅，豢养各种珍禽奇兽。嘉花名木及怪石堆砌而成的假山，更是不计其数。在延福宫建成后，“花石纲”继续源源不断地把江南搜刮的花石运到京城，于是，从政和七年（1117）起，宋徽宗又下令建造规模更大的万岁山。万岁山的兴建，前后用了6年时间，整个范围有10余里，其中有人工堆成的土山，高峰达90尺，山林岩壑都像天然生成的那样，亭台楼观不仅数量极多，工程也极其宏丽。

宠臣们帮助宋徽宗兴建宏丽的宫殿和园林供其享乐，宋徽宗兴建豪华的宅第赐给宠臣，每座宅第，用费都达百万贯。

宋徽宗统治集团在“丰亨豫大”口号下的种种倒行逆施，把“熙宁变法”以后殷实起来的国库挥霍净尽尚且不够，于是就变本加厉对人民进行残酷的榨取，以满足穷奢极欲的需要。

“熙宁变法”中的“理财”措施，这时变成了宋徽宗一伙榨取民脂民膏的手段。“免役法”恢复后，他们就任意勒索免役钱。以巩州（今甘肃陇西）为例，元丰年间的役钱是四百贯，政和元年（1111），免役法仅仅恢复十年，就膨胀到近三万贯，增加了七十多倍。“方田均税法”恢复后，各地官员也都在原有税额之外，以“蹙剩”的名目增加税额，有的一县税额增加达数万。在丈量土地时，各地官僚地主又和官府勾结，大量隐漏土地，有的把二顷九十六亩定为七十亩（有的记载作“一十七亩”），使税额大大减少。而农民经过“方田”，税额却大大增加，有的从原纳二十七钱增至一贯四百五十钱，一举增加了五十五倍半。有的税额更从原纳一十三钱增加到二贯零二百钱，一举增加了一百七十七倍。蔡京一伙恢复“方田均税法”，不仅没有使农民的二税负担更加合理，反而给农民带来更大的苦难。

北宋征收赋税时的“支移”和“折变”这两种榨取名目，这

时也变得更加残酷。如果把“脚钱”、“折变”、在北宋末年，农民的正税负担要增加10倍以上。

上述种种变本加厉的赋敛，还是无法填满宋徽宗腐朽集团的欲壑。于是，宋徽宗又设置所谓“西城所”，先后由宦官杨戬、李彦主其事，把京东西、淮西北、河东、河北等地区的许多废堤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流之处的已开垦之地，都强括为“公田”，勒令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从税户变成官府的佃户，按租佃办法向官府交纳田租，以供宋徽宗的御前支用。这更是对农民赤裸裸的掠夺。

宋徽宗、蔡京一伙前后20多年的腐朽统治，把广大人民推入了水深火热的苦难深渊。北宋末年，民间广泛流传着歌谣说：“打破筒（童，指童贯），泼了菜（蔡，指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这首歌谣反映了人民对这个腐朽统治集团的憎恨，表达了广大人民要求推翻这个统治集团的统治、争取人间好世界出现的心声。人民的反抗斗争已经迫在眉睫了。

三、“仗义而起”，四方响应

——方腊及宋江起义

宋徽宗、蔡京腐朽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使得北宋的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到宣和初年，终于爆发了京东地区的宋江起义和东南地区的方腊起义。

京东地区（包括今河南东部、江苏北部及山东）在北宋时期因为黄河决口和改道，自然灾害比较严重，农民反抗事件也较多，一直被统治者认为是个“多盗”的地区。在这地区的梁山泊，因为黄河决口，成了一个方圆800里的泽国，附近的济（今山东钜野）、郓（山东东平）等数州的许多农民，都靠梁山泊的鱼、蒲等水产为生。宋徽宗让宦官杨戬设置“西城所”后，这地区不仅许多因黄河水患而出现的废堤弃堰和退滩地被强括为“公田”，连梁

山泊的水面，也要按船定租。私自到梁山泊捕鱼采蒲的人被以盗贼治罪。靠近梁山泊的州县都在常赋之外另增加捕捞水产的租钱 10 余万缗，即使在水旱灾害之年也不能减免。“西城所”的横征暴敛，把许多本已因遭水患而灾难深重的农民，迫得难以求生。宋江起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

东南地区是北宋王朝重点搜刮的地区。宋朝通过运河和汴河，每年要从东南地区漕运数百万石米粮到都城，以供冗官和冗兵的消费。政和六年（1116），东南地区发生大水灾，饥民遍野，官府却还是照样强征米粮漕运上供。童贯主持的苏杭“造作局”和朱勔主持的“应奉局”，更给东南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造作局”制作牙、角、犀、玉、金、银、竹、藤、装画、雕刻、织绣等工艺品，所需的各种材料都直接摊派给民户，强迫民户供应。朱勔主持的“花石纲”为害更大。只要哪一家有一石一木有欣赏价值，就领士卒直入其家，贴上黄纸的封条，算作御前之物，要原主人加以保护。稍微保护不慎，就按对皇帝大不恭治罪。到运走时，撤屋拆墙，无所不为。凡被指派供应花石的人，就是中产之家也必破产，迫使许多民户卖掉子女以应付“应奉局”的须索。至于在江湖不测之渊中捞取太湖石，为了运奇石而劈山开路、陆路水路的纲运，更要调发许多农民充当工役，而官府的督责又特别惨刻，东南人民，尤其是农民更是苦不堪言。方腊起义就是在“花石纲”的长期酷取下激发起来的。

宋江起义爆发的详细时间和具体地点，史书都没有明确记载。在宣和元年（1119），宋江起义军的活动已引起宋朝统治者的注意，这一年十二月，宋朝下诏令对宋江进行“招抚”，但没有成功。宋朝下令京东、京西两路提点刑狱负责督捕，也没有奏效。宋江的队伍继续在京东、河北、淮南三角地带展开流动作战，活动范围达十郡之广。他们并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因为他们活动的地区在梁山泊的周围，后人就加以附会，说梁山泊是宋江聚义的地点。

宋江起义军的人数并不多，因为没有根据地，也没有攻占城邑

作为立足点，队伍没有什么发展，史书都说宋江的队伍只有 36 人。因为当时官兵腐败，宋朝驻在河北、京东的官军共有数万，却都畏避宋江的兵锋，没有敢去追捕和镇压。这支只有几十个人的精悍队伍，在河朔、京东一带横行，如入无人之境。

正当宋江横行魏（河北）、齐（山东）的时候，声势浩大的方腊起义，在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爆发了。

方腊是睦州青溪县堨村的一个“中产”地主，“家有漆园之饶”[1]。当时以宋徽宗为首的宋朝统治者对东南地区的搜刮，不仅使广大农民坠入苦难深渊，连许多中小地主也因为“花石纲”之役而破产。青溪县位处山区，盛产竹、木、漆。当时造作局每年要向各州县搜刮漆千万斤，青溪县自然是造作局注意榨取的一个地区。而家有漆林的方腊，也是造作局榨取的对象。备受官府酷取的遭遇，使方腊深切同情广大农民遭受的苦难，并对宋朝的黑暗统治十分愤慨。他看到当时宋朝统治者的搜刮在东南地区各阶层人民中激起了巨大的仇恨，就决心发动农民举行起义，以推翻宋朝黑暗统治。

在当时的两浙地区，流传着一种“吃菜事魔”的秘密宗教。参加的群众不喝酒，不吃荤，而且对贫穷的人“率财以助”，许多贫苦农民都踊跃参加这种秘密宗教。这种秘密宗教把佛教经典《金刚经》中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这句话，故意念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对佛经中众生平等的说教加以讽刺，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对虚伪的平等说教的失望，及实现真正平等的愿望。方腊就利用这种秘密宗教组织农民，准备起义的力量。

宣和二年（1120）十月，因为青溪县一个叫方庚的土豪向官府告发了方腊准备起义的情况，方腊决定立即发动起义。

刚发动起义时，方腊的队伍只有 1 000 多人。起义军喊着诛朱

① 关于方腊的出身问题，史学界现有争论。有的认为是中小地主，有的认为是雇农。本人认为雇农说不能成立，故不取。

動的口号，到处杀掉那些为害人民的官吏和“公使人”，大得人心，正苦于官吏压榨的农民纷纷响应，起义军在几天内就发展到10万之众。方腊自称“圣公”，改元永乐。

参加起义的农民尽管没有防卫的甲胄，武器也很少，但作战英勇。起义军用简陋的武器，在青溪县境的息坑痛快淋漓地歼灭了闻讯赶来镇压的官军，并且一举攻下了青溪县城。在这以后，方腊率起义军分路出击，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就攻占了睦（浙江建德东）、歙（安徽歙县）、杭（杭州）、婺（浙江金华）、衢（浙江衢县）、处（浙江丽水）等6州52县。

在方腊起义军胜利进军的形势鼓舞下，归安的陆行儿、苏州的石生，浙东兰溪灵山的朱言、吴邦，剡县的裘道人，仙居的吕师囊等人，都聚众起义响应。湖州、秀州、常州、平江府管下的许多乡村农民也都暗中集结，准备方腊起义军一到，就奋起响应，夺取州县。起义军所到之处，那些平时鱼肉人民的土豪地主及官吏都纷纷逃窜，守城的官兵一听到“方腊来矣”的喊声，就吓得狼狈逃跑。两浙地区的农民起义呈现了气势磅礴的局面。

方腊起义胜利发展的形势，使整个东南地区受到震动，也使宋徽宗统治集团大为震恐。宋徽宗急忙派童贯率军15万，奔往两浙进行镇压。统治者对京东宋江起义军的活动也更加重视，有个叫侯蒙的大臣还向宋徽宗提出了一个招降宋江，使宋江帮助打方腊以立功自赎的毒辣计策。

宣和三年（1121）初，宋江起义军在由京东向淮南转移时，在沂州（今山东临沂）及海州沭阳先后遭受官兵的截击，受到挫折。转到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时，遭到知州张叔夜优势兵力的伏击，所乘舟船被官兵焚毁，宋江起义军也有人被官军俘获，宋江也在海州接受张叔夜的招安。时人李若水有一首《捕盗偶成》诗，描述了宋江起义及受招安的情景：

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

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
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
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
……

宋江受招安后，宋人的记载还说宋江曾被派去参加打方腊。在方腊起义失败后，宋徽宗又以“御笔”密令刚从两浙班师的将官折可存把宋江逮捕。宋江后来可能落得个被处死的下场。

童贯率军于宣和三年（1121）正月开到东南地区后，一面宣布废罢造作局及停止“花石纲”，企图收买人心，一面对起义军进行残酷镇压。起义军对官军的镇压进行英勇的反抗，双方对峙了一个月左右。后来宋朝又继续增派禁兵前去支援童贯，方腊起义军才被迫撤出杭州等已攻占的州郡，一步步后退到最初起义的青溪县帮源洞。四月底，帮源洞被官军攻破，方腊被俘，许多起义军将士英勇牺牲。方腊起义终于被淹没在血泊之中。这一年八月，方腊被押解到开封后壮烈就义。响应方腊起义的吕师囊等各地起义军，也先后被残酷镇压下去。

震撼东南的方腊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打击了北宋王朝的黑暗统治，对后代也产生巨大的影响。直到南宋时期，方腊的名字还使统治者胆战心惊。

四、从“海上之盟”到“靖康之祸”

——北宋的灭亡

宋徽宗虽然镇压了震撼东南的方腊起义，渡过了一场统治危机，但是，东北地区女真族的兴起，却使北宋王朝面临覆灭的命运。

女真族是中国境内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从南北朝起，这



金太祖陵

个民族同内地各民族就有了联系。在宋、辽对峙时期，女真族受辽朝统治者的奴役。有一部分女真人被编入辽的户籍，称为“熟女真”，未被编入户籍的女真人，称为“生女真”。

生女真居住在黑龙江中下游及长白山地区，有十多万人，分成不相统属的72个部落。到公元11世纪末，生女真中的完颜部强大起来，统一了生女真各部。而在这时，辽朝的统治却日趋腐败，对生女真各部的压榨也更加残酷。辽统治者不仅用各种名目掠夺生女真人的财物，无端殴打女真人，还要蹂躏女真妇女。辽朝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激起了女真族人民的愤恨。女真族遂于公元1114年，在完颜部首领阿骨打的率领下誓师起兵，展开反对辽朝民族压迫的斗争。阿骨打接连打败辽兵，势力迅速强大起来，就于公元1115年称帝建元，正式建立了金朝。

金朝建立后，阿骨打又攻下了辽专为对付女真人而设置的重要军事据点黄龙府（在今吉林农安）。辽朝天祚帝亲率数十万大军前去讨伐，也在阿骨打的袭击下溃逃。金朝乘胜进军，很快就占领了辽朝辽阳以东的全部州县，并于公元1116年一举攻下了辽的东京辽阳府。辽朝统治区内这时又爆发了董庞儿、安生儿等许多起人民的反抗斗争，已经气息奄奄，朝不保夕了。

辽朝在金兵进攻下岌岌可危的消息传到北宋后，宋徽宗、蔡京等人以为同金朝联合攻辽，不要花什么力气就可以夺取燕云十六州，完成宋太祖、宋太宗未竟之大业，可以使自己的腐朽统治放出光彩，得到加强。在这种火中取栗的侥幸心理驱使下，从重和元年（1118）起，宋朝就以买马为名，一再派人从登州（今山东蓬莱）渡海到辽东，同金朝商议共同伐辽的事宜。宣和二年（1120），宋、金终于订立“海上盟约”。双方约定：

（1）宋、金从两个方向同时向辽进攻，金兵攻取辽长城以北的州县，宋兵攻取辽朝的燕云地区，共同灭辽，任何一方不得单独接受辽的投降；

（2）灭辽以后，长城以南州县归宋管辖，宋廷要把原给辽的岁币每年如数交给金朝；

（3）如果宋兵出师失期，就不能按原约实行，即不把燕云交宋管辖。

"海上盟约"订立后，金朝即对辽展开新的攻势，接连攻陷了辽的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南大明城）及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迫使辽朝天祚帝率卫兵逃入夹山（今内蒙古包头附近）。

宋朝也调集号称精锐的陕西兵准备向燕京进军。但就在这时，方腊起义的消息传到都城，宋徽宗立即调遣这支已经集中起来的军队火速南下镇压方腊起义，没有如约出兵。直到东南地区的农民起义平息，这支陕西兵班师以后，宋徽宗才于宣和四年（1122）派童贯及蔡京之子蔡攸率10万大军向燕京地区出发。

这时的辽朝，在长城以北已无立足之地，燕京地区则由皇族耶律淳自立为帝，内部更加分裂。童贯、蔡攸等人以为燕京只是辽的残余力量了，不用费力就可唾手而建功业，根本不作战斗准备，一路稀稀拉拉，还对军队下达了不许杀辽兵一人一骑的荒唐命令。结果，在燕京辽兵的阻击下，宋兵遭到大败。宋徽宗急忙下令宋军撤回边境驻扎。

耶律淳在宋军败退不久就病死了，辽的燕京小朝廷内部自相残杀。宋朝认为有机可乘，又派20万大军进攻辽燕京地区。但因为主将刘延庆根本没有打胜仗的信心，在良乡碰到辽兵，未曾开战就烧营焚辎重逃跑。辽兵乘势追击，宋兵自相残踏，把熙宁变法以来积存起来的大量军需品，都丢弃给辽兵。

在接连两次向燕京出击均遭惨败后，童贯为了逃避兵败的罪责，秘密派人到金营见金太祖阿骨打，约请金兵进攻燕京。阿骨打

遂率军于宣和四年（1122）十二月，由古北口、南暗口、居庸关三路越过长城，攻占了燕京。辽的燕京小朝廷覆灭。不久，辽天祚帝也被金兵俘获，辽朝就灭亡了。

金朝在攻占燕京后，因为看透了宋朝的腐败和无能，不肯按原约把燕京交给宋朝。经过双方讨价还价，宋朝方面一再退让。最后，金朝只答应把燕京及其所属的 6 州 24 县交给宋朝，却要宋朝每年除把原给辽的 40 万岁币交给金朝外，还要把这 6 州 24 县的赋税如数缴给金朝。宋朝答应每年另交 100 万缗作为燕京六州的“代税钱”，金朝才答应从燕京撤军。而在撤军时，金兵却把燕京的金帛、子女等席卷而去，只把几座空城交给宋朝。

在金兵撤出燕京后，童贯把宋军的惨败吹嘘成胜仗，宋徽宗也飘飘然地沉醉在“复燕云”的祝贺声中，给童贯等人加官晋爵。

就在宋朝君臣自欺欺人地为收复燕京而庆功封赏的时候，金朝却在加紧作侵宋的准备。宣和五年（金天辅七年，1123）金太祖死后，继位的金太宗更一面加紧备战，一面派使者不断来宋朝，把侵宋的道路险易、宋朝治乱、府库虚实等情况逐一摸清，同时又竭力寻找入侵宋朝的口实。刚好这时有个叫张瑴的降金辽将，因出于对金兵掳掠燕京人民北去的愤慨，在平州（今河北卢龙）起兵反金，并暗中与宋朝联系，准备献平州归附宋朝。金兵迅速扑向平州，张瑴在平州被攻破后逃到燕京。宋朝统治者虽然按金朝的要求，砍下张瑴的脑袋献给金朝，但金朝还是以宋朝招纳金朝的叛亡为借口，于宣和七年（1125）十月，分兵两路大举向宋朝进攻。东路由右副元帅斡离不率领，由平州攻燕山。西路由左副元帅粘罕率领，由云中出发进攻太原。

粘罕所率西路军在太原遭到宋朝军民的顽强抵抗，被牵制在太原城下。斡离不所率东路军，因宋朝的燕京守将郭药师投降并充当向导，宋朝在河北的其他州郡又全无防备，金兵得以长驱直入，向浚州（在今河南浚县东北）的黄河渡口逼近。

当金兵南侵的急报传到开封时，宋徽宗一伙还以为依靠郭药师

守燕山司已安然无事，根本不作任何防御准备。直到金兵从河北长驱而南，宋徽宗才慌了手脚，急忙把京城的全部禁旅交给宦官梁方平，让他屯兵黎阳（今河南浚县），守卫黄河北岸；同时又急忙把皇帝位禅让给皇太子赵桓（宋钦宗），自己带着蔡攸、童贯等宠臣，沿汴河逃到南方避难。蔡京也跟着举室南逃。

梁方平在黎阳，一见金兵的先头部队涌来，即吓得狼狈奔溃。黄河南岸守桥的宋兵远远看到金兵的旗帜，也急忙烧桥逃生。守卫黄河南岸滑州的二万宋兵，更是连金兵的影子都未见，就望风而逃。当金兵用小船一批一批从容渡过黄河后，发现黄河南岸竟没有一个宋兵的踪影，斡离不喜出望外地说："南朝可谓无人矣，若有一二千人，吾辈岂能渡哉！"接着，斡离不挥师直逼北宋的都城开封。

当金兵逼近开封的时候，宋钦宗及宰相白时中、李邦彦等人也准备逃离京城。这时一个地位不高的官员李纲却挺身而出，成了开封军民抗金斗争的中流砥柱。

李纲，字伯纪（1083—1140），福建邵武人。自政和二年（1112）开始由进士第登上仕途后，因为上疏指摘朝政过失及要求朝廷注意内忧外患问题，一再被罢官，这时刚被重新召回朝廷任太常少卿不久。他看到宋钦宗准备逃离京城，就站出来坚决劝阻，并表示愿意承担组织守卫开封的重任。于是，宋钦宗委任李纲为尚书右丞、东京留守，让他负责京城的守备事宜，并表示自己决心留在京城固守御敌。

但是，当天晚上，宋钦宗又变了卦，下令第二天凌晨出逃。李纲在第二天清晨入朝时，见宋钦宗的车驾即将启程，急忙对禁卫军说："你们愿死守宗社，还是愿跟着跑？"禁卫军士都回答"愿死守"。于是李纲又去对宋钦宗说："陛下已答应留下，又忽然要出走，因何呢？今六军父母妻子皆在都城，愿以死守。万一中道散归，谁为陛下守卫。且虏骑已迫，知乘舆走出未远，以健马疾追，何以抵御？"宋钦宗听了，知道逃跑比留在京城更加危险，才不得

不留在京城，并命令李纲为亲征行营使，让他全权指挥京城守卫部署，同时遣使臣到各地督勤王兵入援。宋钦宗还迫于当时朝野的议论，下令治蔡京、王黼、童贯等“六贼”的罪，以平息民愤，争取民心。“六贼”中除蔡京在流放途中病死外，都先后被处死。

李纲刚把京城守备设施布置就绪，斡离不所率金兵就于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把开封包围了。斡离不兵抵开封的当天晚上，就向开封的宣泽门进攻。李纲亲率将士，投石击碎金兵的火船，又派壮士出城，杀死金兵百余人，把攻城的金兵击退。斡离不见开封守备严密，一时难以攻下开封，就施展“以和议佐攻战”的策略，一面继续围攻开封，一面放出和议的空气，要宋朝以金500万两，银5 000万两，牛马万头，绢綵各100万匹，马驼驴骡各以万计，犒劳金军，尊金朝皇帝为伯父，割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太原三镇给金朝，还要以宰相、亲王为人质，护送金军过河。表示只要这些条件得到满足，就可以从开封城下撤军。宋钦宗竟不顾一切，全盘答应斡离不的苛刻要求，并下令在开封全城刮借金银运送给金军。因为李纲坚决反对同金军议和，宋钦宗就以宋兵一次夜间出击失利一事，追究李纲的责任，下令罢免李纲，废掉李纲主持的亲征御营司，以向金兵表示议和的决心。

宋钦宗这一倒行逆施，激起了开封军民的愤慨。太学生陈东等人上书，要求宋钦宗收回成命，起用李纲，罢免主张和议的白时中、李邦彦、张邦昌等人。京城军民数万人不约而同，集中到皇宫门口，对陈东表示支持，要求宋钦宗接见。群众呼声震天动地，并杀死数十个宦官。宰相李邦彦在群众喊打声中狼狈逃跑。宋钦宗见众怒难犯，只好重新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让李纲主持京城四壁的防御。

斡离不看到开封的抗金斗争群情激昂，知道难以孤军攻下开封了。这时宋朝各路勤王兵也已陆续开到，李纲及负责指挥各路勤王兵的种师道又有增兵扼守黄河切断金军粮道之议。斡离不担心孤军深入，后路被切断，就在对宋朝的勒索得到部分满足后，于靖康元

年（1126）二月率军撤离开封北去。

开封解围后，斡离不把金军转移到河北，围攻中山、河间二镇，因久攻不下，又见宋军来援，遂撤兵北还。河北一线的战局虽暂时平静，而河东的战事却继续紧张进行着。粘罕在围攻太原的同时，又分兵南下，攻占威胜军（今山西沁县）及隆德府（山西长治）。宋朝派去河东的援军也被击败。只是由于暑夏已到，粘罕回云中（山西大同）避暑，围攻太原的金军不是主力，河东战线在靖康元年夏天也暂时处于相持的状态。

河北、河东的这种局势只是金兵更大规模入侵的间歇。然而，以宋钦宗为首的腐朽统治集团却以为太平无事了，罢了有声望的老将种师道的兵权，各路开来的勤王兵也全被遣还。宋廷又恢复以往“文恬武嬉”的故态，根本不作任何防御金兵再次入侵的准备，甚至把防备金兵再次入侵的呼吁斥为“危言耸听”。当时的人用“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这句话，揭露了宋钦宗在金兵撤退后不再听取任何抗战建议的情况。宋徽宗这时也回到开封继续享乐。而对坚持抗战的李纲，宋钦宗一伙则加以排斥与打击。六月间，宋钦宗因为厌恶李纲屡言备边之策，派他为河东、河北宣抚使，强行把他赶出朝廷。李纲准备解太原之围，宋钦宗不仅下诏解散李纲已召集起来的军队，还给李纲制造各种障碍，使李纲不能指挥所部的宋将，从而使他解太原之围的计划落空。到八月间，李纲连两河宣抚使的职务也被罢免了。

靖康元年八月，金兵在经过一个夏天的休整后，又以宋朝不如约割让太原、河间、中山三镇为口实，再由粘罕和斡离不分道率军大举南侵。九月间，太原被粘罕军攻破，坚守太原250多天的宋将王禀战死。接着，粘罕率军直逼黄河北岸的河阳（今河南孟县）。斡离不的东路金军也接连攻陷了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庆源府，经恩州（今河北清河），直逼大名府魏县（今河北魏县西南30里）的李固渡，准备从这里渡过黄河。

金兵的这次南侵，已摆开了一举灭亡北宋之势。宋钦宗一伙却

以为可以继续用金帛赂使撤退，急忙派出一批又一批的使者，分头到金营向粘罕和斡离不赠送金帛宝玉，乞请缓师，表示愿把三镇的全部赋税以岁币的形式贡纳金朝，甚至表示愿与金朝以黄河为界，把河北、河东都割给金朝。而在军事方面，却不作任何认真的防御准备。对坚决主张抗战的李纲，他们则以“专主用兵之议”的罪名，把李纲一贬再贬，流放到江南，使李纲不能继续在抗金斗争前线发挥作用。

由于宋钦宗等人一心只想投降，不作认真的抵抗，两路金兵先后顺利从李固渡和河阳渡过黄河，对开封展开钳形攻势。十一月二十五日，斡离不率领的东路金军再抵开封城下。闰十一月初二日，粘罕所率西路金军也抵达开封与斡离不会师。开封再次被包围了。

这时的开封城中，抗战派官员已被排斥净尽，统治者也不敢像金兵第一次围城时那样组织开封人民参加守卫战。但宋钦宗一伙却相信开封的郭京、刘无忌等一群无赖会用“神兵”，幻想依靠这群无赖所组织的“六甲正兵”、“六丁力士”、“北斗神兵”，来保卫开封。闰十一月二十五日，这支“神兵”正式开城门出战，宋钦宗等人都眼巴巴地等着胜利的消息。谁知“神兵”一出城，就被金兵击溃。郭京在城楼上见骗局就要败露，推说要下去“作法”，急忙带着残存的一群流氓无赖溜之大吉。金兵却乘机登城，攻破开封城头。

金兵攻破开封城头，因为看到开封军民已准备展开巷战，不敢立即进占全城，而是一面据守城头，紧紧把开封围困起来，一面重弹“和议”的老调，向宋廷勒索财物，并要宋钦宗下诏令让河北州郡的军民停止反抗，向金朝投降。粘罕和斡离不企图用这些手段，瓦解宋朝军民的斗志，同时把开封城的物资搜刮干净，使开封军民在围困中陷入绝境，并因饥饿而失去抵抗能力，然后一举消灭北宋王朝。

可是，宋钦宗却直到此时还没有从“和议”的迷梦中醒悟过来。他委派宰相何㮚等人频繁往来金营，同粘罕等女真贵族商议割

两河、纳岁币、献金银财物、良马、兵器等事宜，把开封城内的作战物资都尽可能搜刮献给金军。宋钦宗还按粘罕等人的意旨，下令各路勤王兵停止向开封进发。开封人民自动组织起来制造兵器，准备抵抗，宋朝统治者却立即镇压，处死为首的人，并下令居民不得再打造铁器。将官吴革暗中组织勇士准备抗击金兵，被发觉后也惨遭杀戮。以宋钦宗为首的宋朝统治者为了讨好金人，把开封城军民的反抗手段都剥夺了，使开封军民只能在外无援兵、内无物资的情况下坐以待毙。当时正是严冬季节，大雪纷飞，开封人民遭受饥寒无情的袭击，冻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蔡河、汴河中满是冻、饿而死的尸首。宋朝腐朽统治者的投降政策，使开封人民遭受难以言状的灾难。

从靖康二年（1127）正月起，粘罕和斡离不见开封军民在金兵围困和宋朝投降派的破坏下，已失去抵抗的能力，消灭北宋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先后把宋徽宗、宋钦宗拘留在金营，接着金主又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另立同金朝勾结的原宋朝宰相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北宋王朝就这样灭亡了。四月初一日，金兵把宋徽宗、宋钦宗及宋朝的后妃、宗室，连同朝官共3 000多人，一起俘虏北去。开封的金帛、宝货、文物、图册等等，也被洗劫一空。这就是所谓“靖康之祸”。

第七章　宋廷南渡及宋、金和战

一、赵构登极，宋室南移

——南宋的建立及李纲之进退

在金兵把徽、钦二帝及后妃、宗室俘虏北去的时候，宋朝嫡亲宗室中只有康王赵构和哲宗的废后孟氏幸免于难。

康王赵构，是宋徽宗第九子，宋钦宗之弟。在金兵第二次围攻开封前夕，他以亲王的身份，奉命同刑部尚书王云一起，出使金朝求和。走到磁州（今河北磁县）时，王云暗中勾结金人、准备挟持赵构去做人质的阴谋被揭露，赵构接受知磁州宗泽的劝阻，没有再北上。但他也不敢留在已是战争前线的磁州，而是掉头跑回相州（今河南安阳），同知相州汪伯彦勾结在一起，逃避抗金斗争。金兵再次围攻开封后，宋钦宗派人夜间缒城而出，委任他为河北兵马大元帅，让他组织河北的宋兵入援京城，但他在河北召集兵马后，却怀着一旦父兄被俘，即另建小朝廷的打算，只顾饮宴取乐，笼络部属，不听宗泽向京城进发的建议，不肯前去救援京城；后来更把大元帅府由河北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移到离金兵更远的京东路东平府（今山东东平），以避免同金兵接触。

金兵俘虏徽、钦二帝及在京城的赵宋宗室北去后，赵构另建小朝廷的时机也到来了。

当时因为金兵从开封撤到河北后，主要力量都用在对付河东、河北宋朝军民风起云涌的抗金斗争方面，无暇顾及张邦昌伪楚政权

的命运。京城的朝官和京城外的一些宋朝将官也拒绝接受张邦昌的号令，并对张邦昌施加压力，要他归政与赵氏，复立赵氏为帝。张邦昌成了孤家寡人，不得不表示自己当伪楚皇帝只是“权宜”之计，接着就请哲宗废后孟氏出来垂帘听政，又向拥兵在外的康王赵构上了一道表文，请赵构即皇帝位。

赵构在假意推辞一番之后，于五月初一日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改元建炎。这个新建立的小朝廷后来被称为南宋，赵构就是宋高宗。



宋高宗

宋高宗同乃父乃兄一样惧怕同金朝打仗。他所信用的汪伯彦、黄潜善二人，也都是些主张逃跑和屈膝投降的人。南宋小朝廷刚建立，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派人去金朝求和，还让臭名昭著的张邦昌写信给粘罕和斡离不，表示小朝廷愿与金朝以黄河为界，把河东、河北许多尚在宋军坚守下的州郡奉手送给金朝。

对于主张抗战、反对向金朝投降的官员，他们则加以排斥。在河北兵马大元帅府任副元帅、坚决主张救援京城的宗泽，在小朝廷建立后就被排斥出小朝廷。只是由于当时投降的时机尚未到来，刚建立的小朝廷也还没有巩固起来，汪、黄二人又都“不餍人望”，对各路军民没有什么号召力，宋高宗还需要一个能孚众望的人物来帮他支撑一下局面，使小朝廷在广大军民心目中有个较好的形象，所以，宋高宗又决定起用因组织开封守卫战而声望很高的李纲担任宰相。

当时麕集在宋高宗周围的一些投降派人物，因为不理解宋高宗的真意，对起用李纲一事极力进行阻挠。御史中丞颜岐甚至无耻地

说："李纲，金人所不喜。虽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罢之。"高宗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他竟把反对起用李纲的奏疏封好，派人在李纲赴任的途中递给李纲，企图阻止李纲到小朝廷所在的应天府任职。

李纲没有理睬颜岐之流的阻挠，毅然到小朝廷就任宰相职务，并且竭尽思虑，为宋高宗筹划重振朝纲、组织抗金斗争的种种事宜。他针对北宋以来军政腐败的情况，颁布新军制 21 条，申严赏罚制度；他为了防备金兵的入侵，重新调整了防务部署，在沿江、沿淮、沿河建置帅府，又把州郡分为要郡、次要郡，各固定驻扎一定数量的军队，以资防守；他还在沿江、沿河着手建造战舰，操练水军，以期在反抗金兵入侵的战争中发挥宋军的优势。鉴于当时南宋小朝廷刚刚建立，正规军还来不及整编，还没有成为一支足以抵挡金兵大规模进攻的力量，李纲又坚决主张支持两河军民的抗金斗争，并决定在河北设置河北招抚司，在河东设置河东经制司，委任张所、傅亮分别担任河北招抚使、河东经制副使，拨给钱钞，让他们去河北、河东招募当时各地奋起的义兵，抗击金兵。

李纲在以巨大的努力，着手进行抗金斗争部署的同时，还在下列几个重要问题上，同投降派展开激烈的斗争：

一是对金的和战问题。高宗及汪、黄一伙幻想用对金朝屈膝投降的办法，来换取金朝对刚建立的南宋政权的承认。李纲则认为，对金朝退让只能助长女真贵族的凶焰，"今日法勾践尝胆之志则可，法其卑辞厚赂则不可"，主张"一切罢和议"，"专务自守之策"，认真整修战备，以期三年之后能打败金兵，"雪振古所无之耻"，争取二帝不待迎而自回。

二是对待伪楚皇帝张邦昌的处理问题。高宗及汪、黄一伙因为害怕得罪金人，也想利用张邦昌作为他们同粘罕等女真军事贵族联系投降事宜的桥梁，不但不惩办张邦昌丧失民族气节、同金人合作的罪行，反而吹捧他"知几达变，勋在社稷"，加封他为太傅、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颜岐更无耻地说："邦昌，金人所善，虽已为三公，宜加重平章事，增重其礼"。李纲则坚决要求宋高宗严

惩张邦昌以快人心，表示自己与卖国贼不能并立，若不惩办张邦昌，自己就坚决辞职。

三是关于定都在何处的问题。汪、黄等人主张放弃故都开封，把都城迁到有长江之险可恃的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市）。李纲则认为开封是宋朝“宗庙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不应放弃，在京城残破的情况下，可先在长安、邓州、襄阳三城市中选择一个地方作为临时都城，待开封修葺完毕，即迁回开封。

在围绕上述三个问题所展开的斗争中，只有处置张邦昌的问题，因为张邦昌实在声名狼藉，宋高宗只好部分同意李纲的要求，把张邦昌降职流放。其他重大问题，宋高宗不仅不支持李纲，反而对李纲的坚持感到厌烦，后来更同汪、黄一伙相互表里，破坏李纲的抗金设施。

李纲感到自己在小朝廷中已不能有所作为，不得不提出辞职要求。宋高宗也顺水推舟，仅仅让李纲担任 75 天宰相，就以“狂诞罔悛，谋谟弗效”等无中生有的罪名，于八月十八日罢了李纲的官。李纲的一些抗金部署也被破坏。

建炎元年（1127）十月，宋高宗带着他的宠臣们，从应天府沿运河逃到扬州，宋廷终于由北方南移。

二、“出师未捷身先死”

——宗泽联络义兵守汴的事迹

在李纲被逐出南宋小朝廷后，继续举起鲜明的抗金旗帜、同投降派做坚决斗争的人物，是年近七旬的老将宗泽。

宗泽，字汝霖（1059—1128），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他从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以同进士出身登上仕途后，虽然长期郁郁不得志，但他却关心国事，以“名节”自恃，还作赋表达了自己“老当益壮，自任以天下之重”的雄心。在金兵第一次围

攻开封撤退后，他被召到朝廷当谏官，在朝廷内一再发表抗金主张，驳斥投降言论。在金兵第二次围攻开封时，他在河北表现了同宋高宗一伙截然不同的态度，曾率军孤军奋战，抗击过金兵。南宋建立后，他又以鲜明的抗金立场，为李纲所知，于建炎元年（1127）六月被李纲推荐到故都担任开封府尹，不久又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

开封这座曾经举世闻名的繁华都市，经过金兵的洗劫，这时已经疮痍满目，楼橹尽废，残破不堪。各路来到这里的勤王兵，既没有人统一指挥，也没有军纪约束。整个开封的社会秩序异常混乱，物资奇缺，物价飞涨，人民不得安生。

宗泽一到开封，就立即着手整顿开封的秩序，处死一批曾勾结金兵抢掠残害居民的恶棍，严禁盗窃及哄抬物价的活动，使开封居民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

鉴于当时开封的宋朝军队数量不多，又都是各路临时召募来“勤王”的乌合之众，既无训练，又无纪律，单靠这些军队，不可能保卫开封以抵挡金兵的再次入侵，宗泽就把注意力放在团结中原地区的抗金义兵方面。经过他的努力，王善、丁进、王再兴、李贵、杨进等许多义兵首领，都投到了宗泽的麾下。云集在开封一带的义兵，据说有 180 万之多，开封的军势一时大振。

在安定人心和团结义兵的基础上，宗泽积极营建开封的防务。在开封城的四壁，都设有统领守御使臣，负责守御一定的区域，召募来的义兵则分属四壁的统领守御使臣管辖。在开封的四周，根据不同的地形，建筑了 24 个坚固的壁垒，各驻兵数万，以保卫开封的外围。沿黄河南岸，则建筑了一层一层像鱼鳞那样的连珠寨，每个寨都派兵驻守；同时，还挖了许多深广各丈余的壕沟，沿壕沟设障碍物，以阻止金朝骑兵的进攻。在宗泽的悉心经营下，开封这么一个坚固的防御体系，只用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就于建炎元年十月修建完成了。开封完全改变了宗泽刚到时那种“欲战则无兵可凭，欲守则无粮可因”的情况，成了抗金斗争前线的一个军事要塞。

建炎元年十二月，金兵分三路再次南侵，东路自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渡河攻山东，西路自同州（今陕西大荔县）渡河攻陕西，中路由粘罕亲自率领，自河阳渡河攻河南。粘罕在占领汜水关（在今河南巩县东）后，率军向开封进逼。东路金兵渡河后，也由兀术分率一支金兵，从东面指向开封，企图同粘罕配合，一路夹攻开封，一举拔掉这个要塞。但是，由于宗泽沉着指挥，宋军和义兵奋勇作战，开封的防线固若金汤，金兵夹攻开封的计划被粉碎了。

因为开封保卫战的胜利，开封这个要塞继续屹立在中原大地上，使女真贵族不敢越过它纵兵南侵。粘罕虽然攻破了河南几个州郡，终于被迫撤回河东。东路金军在攻占山东几个州郡后也停止了攻势。宗泽经营的开封防线，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宗泽整修开封的防务，不仅是为了守卫开封，主要还是力图把开封建成收复两河失地的基地。他也深知，两河失地不恢复，开封“虽有备御，未易可居”。所以，他在营建开封防务的同时，还积极派人联络两河坚持抗金的义兵。

当时的两河地区人民，因为不堪忍受金兵的烧杀抢掠，到处燃烧起抗金斗争的烽火。许多地方的人民组织义兵，占领山谷险要，保卫乡里，据守山寨，同入侵的金兵展开斗争。其中最突出的，有河北五马山寨义兵，河东红巾军，太行山的“八字军”等三支。

“八字军”是李纲担任宰相期间设置河北招抚司的产物。在招抚司被解散前夕，都统制王彦奉命率岳飞等裨将，以所部7 000人渡河收复了新乡。因为遭到数万金兵的围攻，岳飞率部分队伍离开王彦，独自向南转移。王彦率残部突围，转战到共城（今河南辉县）的西山，据险继续抗金。王彦与士卒共甘苦，他的部下为了表示抗金到底的决心，都自动在脸上刺了“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被称为“八字军”。“八字军”在斗争中迅速壮大起来，队伍发展到1万多人。太行山一带的义兵首领傅选等人所率的10余万义兵，都受王彦的号令，互相呼应，多次打败金兵。

两河风起云涌的义兵抗金斗争，使宗泽更清楚地看到了人民抗

金武装的力量。他不仅派人去联络两河各山水寨坚持抗金的义兵，还积极声援两河义兵的斗争。建炎元年（1127）九月间，他得知金兵在河北加紧对义兵的进攻，就亲自率兵自游家渡渡河到河北“视师”，表示对河北军民抗金斗争的关怀和支持。两河义兵也纷纷与宗泽建立联系。在建炎元年十月，王彦的“八字军”开始接受宗泽的号令。五马山寨的首领马扩，也于建炎二年（1128）四月，带着“信王”的一个“咨目”① 来到开封见宗泽，并通过宗泽的介绍，到扬州进见宋高宗。其他许多义兵也都表示愿意接受宗泽的指挥。

宗泽也深切知道，两河分散斗争的义兵，如果得不到宋朝的有力支持，终会遭到失败。而一旦两河的抗金斗争被金兵镇压下去，宋朝将更加难以收复失地。所以，在开封秩序恢复安定后，宗泽就上疏给宋高宗，要求他还都开封，以号令抗金斗争，争取收复两河失地。在他任东京留守的一年时间内，他先后给宋高宗上了 24 个要求回銮开封的奏疏，这就是有名的 24 个《乞回銮疏》。在要求宋高宗返都的同时，他还着手作渡过黄河收复失地的准备。在开封保卫战获得胜利后，他更增强了打败金兵，收复失地的信心，渡河收复失地的准备也更加紧了。他在开封对将士作了出征前的动员，妥善安顿了军士家属的生活。他一一派人去同两河山水寨的抗金军民打招呼，约他们做好响应宋朝大军过河收复失地的准备。对于那些被掳在金朝的汉人，宗泽则派人到金朝占领的州郡张贴榜文，让他们伺机行动，迎接宋兵过河。在渡河作战的部署就绪后，宗泽于建炎二年五月上疏给宋高宗，提出了六月出师渡河的计划，要求宋高宗当机立断，回开封指挥这一北伐的壮举。

这时的宋高宗，却正在扬州同他那一帮宠臣一起，过着偷安岁月、醉生梦死的生活。对宗泽在开封的抗金部署，他们从一开始就设置障碍，百般阻挠。他们对宗泽在开封声威日著，也很不放心。他们不仅不理睬宗泽的出师计划，还准备派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仲

---

① “咨目”是用于同级机关的一种文书。

荀到开封任东京副留守，让他监视宗泽的行动。

宗泽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准备好的渡河收复失地的计划难以实现，不禁悲愤交加，终于积忧成疾，疽发于背，于建炎二年六月间病倒了。他在病榻上对前来探望的诸将沉痛地说："我因为'二圣'（指宋徽宗、宋钦宗）蒙尘难返，积愤成疾。诸公若能为我歼灭同仇，以成主上恢复之志，我虽死亦无恨"。这席话，使得病榻前的诸将都感动得流下眼泪，表示愿意尽力同金兵作战。

当前来探望的将官们退出以后，宗泽心涛汹涌，他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想起一片忠心描绘成的出师宏图已成泡影，不觉含着热泪，吟起了杜甫《蜀相》诗中的名句：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建炎二年（1128）七月十二日（或作初一日），这位不顾七十高龄，为抗金斗争顽强奋战的老将，用最后一口气连呼三声"过河"，就与世长辞了。

宗泽死后，宋高宗派投降派的杜充继任东京留守。杜充到开封后，把宗泽的抗金设施肆意破坏。宗泽召集起来的义兵，也因为不满杜充的倒行逆施而纷纷散去。金兵曾经一度不敢轻动冒犯的开封，又丧失了抵御金兵的能力，不久就自动放弃给金朝。两河的义兵，除了王彦的"八字军"转移到南宋境内外，五马山寨等义兵的斗争，因为得不到南宋的支援，在金兵的围攻下也先后失败。金兵大举入侵江淮，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三、兀术江南失利，张浚陕西败绩

——宋、金对峙局面的逐步出现

宋高宗及其宠臣在打击李纲、宗泽等抗战派人物的同时，还打

击各地人民的抗金武装。他们诬蔑义兵是“盗贼”，并发布诏令宣布：凡“以勤王为名，擅募民兵、溃卒者，并令遣散”，正式宣布取缔各地自行组织起来抗金的义兵。凡不愿自动解散的义兵，他们就派兵去镇压。一些与义兵有过联系的州县官，也被以“与贼通”的罪名横加诛杀。而对女真贵族，他们却卑躬屈膝，不断派使臣去乞和求降。有个使臣傅雱，甚至无耻地跪在云中金军的帅府中，听金朝元帅右监军完颜希尹的训责，并无耻地就两河军民抗金事向金朝道歉。

宋高宗等人的这些行径，既自毁抗金斗争的长城，也更助长了女真贵族的气焰。建炎二年（1128）年底，金朝见宗泽死后开封的防御设施已经瓦解，南侵再无后顾之患，大举向江淮进犯。金太宗吴乞买还下了一道讨伐赵构的诏令，命令金军擒拿赵构，要“穷其所往而追之”。宋高宗及汪伯彦、黄潜善等人却还在扬州做着太平梦，对金兵的入侵不闻不问。建炎三年（1129）二月初，金兵在一个夜间奔袭扬州，宋高宗在淫乐时听到金兵攻到扬州的急报，吓得魂不附体，急忙起床仓皇单骑逃出扬州，渡江逃到镇江。金兵因为尚无渡江南侵的准备，在扬州大肆抢掠烧杀后就后撤了。

宋高宗在镇江等待从扬州逃出的百官赶到，又仓皇逃到杭州。因为汪、黄二人在扬州遭金兵洗劫后更加声名狼藉，宋高宗不得不忍痛把这两个人罢免，任朱胜非为宰相，御营司都统制王渊同签书枢密院事兼都统制。将官苗傅、刘正彦同王渊有宿怨，对王渊的升任不服，又听说王渊同平日作威作福的宦官康履有联系，以为王渊的升迁是勾结宦官的结果，出于对王渊和宦官的怨愤，遂于三月间在杭州发动兵变，杀了王渊、康履及许多宦官，迫使宋高宗让位给三岁的皇太子，让隆祐太后孟氏（即哲宗废后）垂帘听政。这就是所谓“苗刘之变”。

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虽然是出于对王渊的私怨这一原因，但是，他们发布的榜文揭露“奸臣误国，内侍弄权，致数路生灵”，

在金兵入侵时“无罪而就死地”，指责“大臣内侍等，不务修省，尚循故态”，宋高宗“信任中官，赏罚不公”，却反映了当时军队中许多将士对宋高宗一伙腐朽奢靡的不满和反对逃跑投降的情绪。

由于兵变的组织者苗傅、刘正彦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也没有谋略，在南宋的大臣和将官中得不到广泛支持。当反对兵变的吕颐浩和张浚率兵压向杭州的时候，他们完全不知所措，又请宋高宗复位，兵变宣告流产。不久，苗、刘二人逃出杭州，在福建被韩世忠俘获，押回杭州处斩。

“苗刘之变”被扑灭后，宰相朱胜非引咎辞职，吕颐浩被任为宰相，张浚任知枢密院事。宋高宗鉴于在扬州差点被金兵俘获的教训，又从“苗刘兵变”中看到将士的不满情绪，不得不在表面上作了一些改弦更张的姿态，下令把江宁府（今南京市）改名建康府，于四、五月间离开杭州，把行都移到建康府，表示要在这里号令江淮一线的抗金斗争，并下令在江淮一带开沟引水，以阻挡金朝骑兵。他还委派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授予张浚全权到陕西组织抗金斗争。但是实际上，宋高宗却没有放弃向金人求降的主意。他一到建康，即派洪皓为“大金通问使”，让洪皓带信给粘罕，表示愿意去掉皇帝的尊号，用金朝年号，作金朝的藩臣。这一年八月，宋高宗听说金兵又将南侵，急忙派人送信给粘罕，说自己从北方逃到南方，“所行益穷，所投益狭”，“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哀求粘罕“见哀而赦己”，给自己一条生路。真是无耻至极。

女真贵族并没有为宋高宗的哀求所感动。建炎三年（1129）九月，金军在兀术的率领下，向江淮大举进攻，准备一举消灭南宋。宋高宗急忙把守卫长江的重任交给从开封逃回的杜充，让隆祐太后从建康向江西方向逃跑；自己则逃回杭州。金兵也分成两路。一路自黄州（今湖北黄冈）渡过长江，东向攻陷洪州（今江西南昌），准备俘虏隆祐太后。另一路由兀术亲自率领，自马家渡渡江攻占太平州（今安徽当涂），进逼建康府。杜充在金兵渡江前不认

真作御敌部署，在金兵进逼建康府时即急忙乘船逃到江北的真州（今江苏仪征县），随即向金兵投降。金兵遂占领建康府，并向杭州挺进，准备活捉宋高宗。

宋高宗见金兵向杭州追来，即接受宰相吕颐浩的建议，慌忙从杭州逃到越州（今浙江绍兴），又逃到明州（浙江宁波），从明州下海逃到定海，顺海路向南一直逃到温州。兀术追到杭州后，就在杭州驻扎，并派兵尾随宋高宗追到明州，乘舟入海追赶。

由于金兵不适应海上的战斗，入海追赶的金兵被宋兵打败。江南卑湿的气候和河湖纵横的水乡地理，金朝骑兵也不能适应。兀术见捉拿不到宋高宗，又恐孤军深入被切断退路，就在江南大肆搜掠一番后，宣称"搜山阅海已毕"，用舟船载着抢掠的财物，于建炎四年春离开杭州，沿运河北撤。入侵江西、湖南的金兵也跟着撤回北方。宋高宗见金兵撤退，才从温州返回越州，升越州为绍兴府，作为小朝廷的临时所在地。

当兀术的船队撤到镇江时，宋将韩世忠及其夫人梁氏早已率大批战舰在那里等候。兀术到金山龙王庙察看地形，差点被韩世忠的伏兵所俘。金兵的船小，又不习水战，无法同韩世忠相抗。韩世忠指挥宋军，梁氏亲自击鼓，使兀术遭到惨败。金兵被围困在黄天荡达 48 天之久，兀术全军陷入绝境，派人向韩世忠表示愿放弃所掠夺的财物，并赠送名马，换取一条撤退的道路，也遭韩世忠严厉拒绝。后来有个奸细告诉兀术，说只要挖开已堙塞的老鹳河故道，就可以通秦淮河。兀术发动全军连夜挖通 50 里老鹳河故道，才从秦淮河逃到建康。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黄天荡之役。

兀术在建康又大肆抢掠并纵火烧城。但在撤到静安时，早已在牛头山埋伏的宋将岳飞尾随其后追杀，金兵又遭到沉重打击。由于另一金将挞懒派兵前来接应，兀术又利用韩世忠轻敌大意，利用无风海舟不能行驶的时机，用小船以火箭烧毁了韩世忠从镇江赶来建康江面截击金兵的海舟，金兵才得以从江南撤回北方。

兀术自渡江南侵失利后，一直心有余悸，从此不敢再入侵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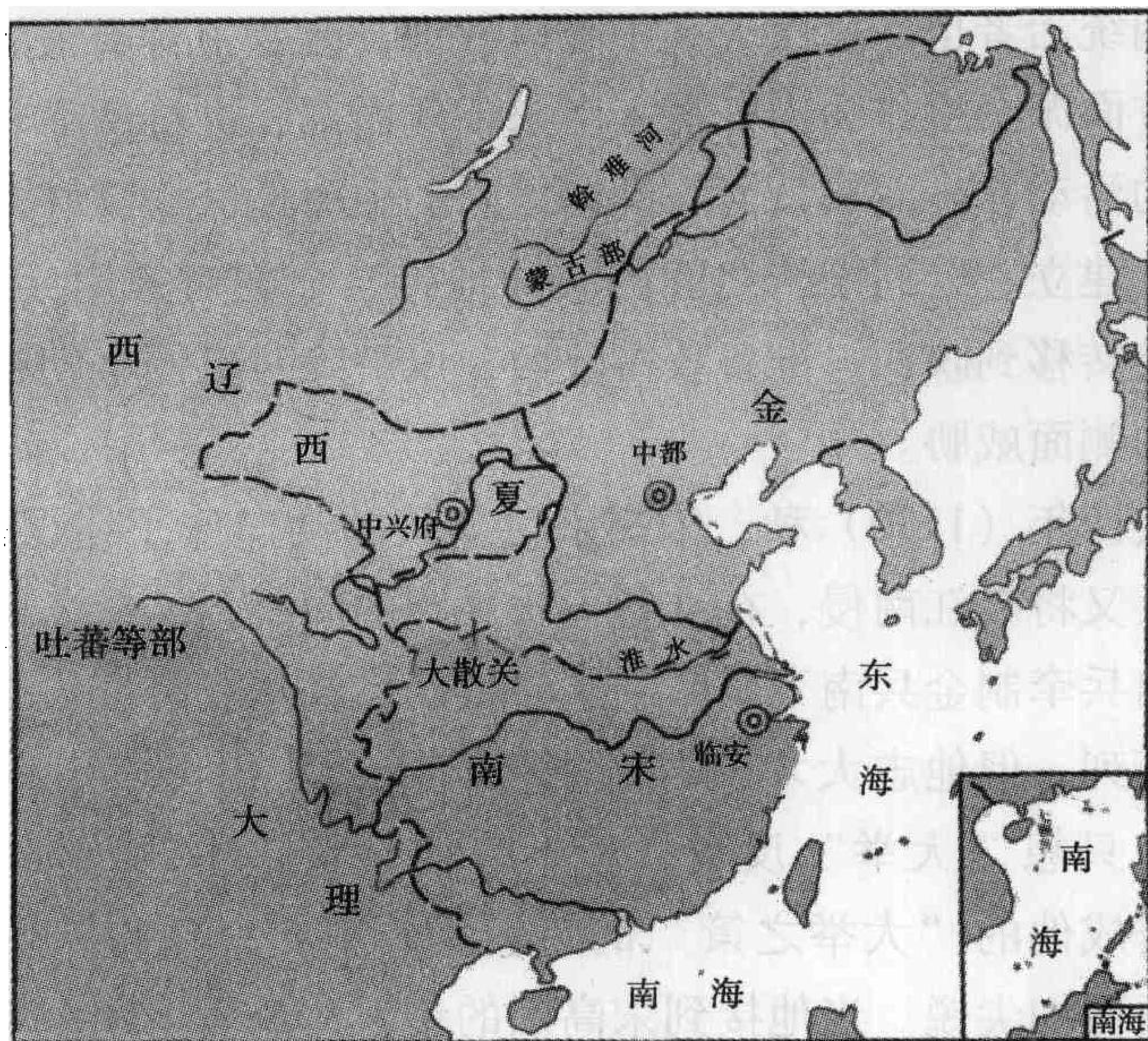
南。金朝统治者也从这次失利中吸取教训，改变了对南宋战争的策略，一方面派秦桧作为内奸潜入南宋朝廷内部，进行诱降和破坏抗金斗争的活动，一面在黄河与淮河之间的中原地区立汉奸刘豫为伪齐皇帝，建立一个同南宋之间的缓冲地带。金朝对宋用兵的重点，则由江淮转移到陕西，准备攻占陕西，以解除对巩固金朝在两河地区统治的侧面威胁。

建炎四年（1130）秋，宋高宗对金兵的动向作了错误的判断，以为金兵又将渡江南侵，在准备再次逃跑的同时，又命令川陕宣抚使张浚出兵牵制金兵南下。张浚这时虽然已经从投降派营垒转到抗战派的行列，但他志大才疏，又刚愎自用，从建炎三年秋到陕西后，一心只想“大举”反攻，却不曾认真整顿军政及训练军队，又对不赞成他的“大举之策”的将官进行打击，使得陕西宋将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当他接到宋高宗的错误命令后不顾一切，集中陕西五路宋兵数十万人，于九月十四日在陕西富平（今陕西富平县北），同金兵进行“会战”。

在会战以前，张浚和许多宋将都自恃有优势兵力，以为可以稳操胜券，地形没有认真选择，阵列没有好好布置，“人虽多，营垒不固，千疮万孔”。金兵看到了宋兵的弱点，利用宋兵的骄傲轻敌情绪，待到宋兵因骄傲轻敌而松懈斗志时，才发起攻击，很快就把宋军营垒冲乱，有的宋将临阵脱逃，数十万人马仅仅会战半天，就全线溃败而逃，大量军用物资丢弃给金兵。这就是所谓“富平之战”。

金兵在富平稍事休整后，向陕西内地发起全面进攻。因为宋军从富平溃败后，一直向后奔逃，张浚也只带亲兵一千多人，一口气退到蜀口的兴州（今陕西略阳），又从兴州逃入四川的阆州（今四川阆中），南宋军队在陕西全线瓦解，到绍兴元年（1131）三月，陕西五路基本上为金兵所占领。

接着，金兵向蜀口的前哨据点和尚原（在今陕西宝鸡西南）进攻，企图拔除这个据点，进而占领蜀口，打开入川的通道。



金、南宋形势简图

和尚原的守将吴玠，是个有勇有谋的将领。在宋军因富平之败而向川蜀溃逃的时候，他却认为，坚壁重兵扼守和尚原，金兵就不敢冒险轻进，是保蜀的良策，遂招集散亡之将士数千人，同将官们歃血为盟，誓死守卫和尚原。从绍兴元年（1131）三月起，金兵一再向和尚原进攻，都被吴玠率将士击退。这一年十月，兀术率军数万人（一说十几万人），连营三十里，再犯和尚原。吴玠率诸将利用险要地形，用劲弓强弩向来犯之敌“番休迭射”，经过三天连续激烈的战斗，金兵全线溃败，几乎全军覆没，兀术本人也身中两箭，带伤狼狈而逃。宋兵获得了金兵入侵以来最辉煌的一个胜利。

在这以后，金兵虽然曾在饶风关（在今陕西洋县东）打败过吴玠，占领了宋军自动放弃的和尚原，却在仙人关（在今陕西凤县、略阳交界处）遭到吴玠更加沉重的打击，始终不能越过蜀口一步。宋、金双方一直在蜀口进行拉锯战。

兀术入侵江南失利后金朝对宋战争策略的变化，张浚组织富平会战失败后陕西五路的丧失，金兵争夺蜀口的失败，这些事件使得

宋、金双方出现了一条沿秦岭至淮河的比较稳定的战线。以后宋金战争尽管继续进行多年，战线也有所变动，但始终没有改变沿秦岭、淮河一线相持的格局。因此，这三个重大事件，是宋金战争相持局面出现的标志。

四、“壮怀激烈”，英雄饮恨

——岳飞的抗金斗争和宋高宗、秦桧的叛卖行径

兀术自江山北撤后，宋高宗利用金兵暂时放松对江南军事压力的时机，同汉奸秦桧勾结起来，加紧进行对金投降的活动。

秦桧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在靖康之祸发生时，他正在朝中为官，曾经发表了激烈的抗战言论，反对金兵立张邦昌为皇帝，被金兵拘押北去。但是，他一到金朝就原形毕露，很快卖身投靠女真贵族，成了金太宗之弟挞懒的亲信。建炎四年（1130）十月，他带着其妻王氏，从涟水军（今江苏涟水）航海到越州（今浙江绍兴），来到南宋朝廷，声称自己是杀掉金朝的监视人员，夺舟而来的。当时南宋许多官员都认为秦桧的说法破绽百出，对他的来历感到可疑。但宋高宗在见到秦桧，听了他“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的鼓吹后，却喜出望外地说秦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得意地说自己“又得一佳士”，很快就于绍兴元年（1131）八月任命他为右相兼知枢密院事，让他负责对金“解仇议和”的活动。只是由于这时金朝尚无同南宋议和的诚意，秦桧在拜相前吹嘘只要他任宰相数月，必“耸动天下”，结果却无所作为，使宋高宗感到失望。秦桧按照金朝的授意，露骨地向宋高宗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二策，要南宋将河北人遣送给金朝，中原人遣送给刘豫的伪齐政权。因为当时不仅宋高宗本人是“北人”，许多文臣武将和士卒也都是北方人，按此二策办理，不仅南宋政权和军队都要解体，宋高宗本人也将无所归，所以宋高宗

尽管投降心切，但也不能接受此二策。左相吕颐浩及一些朝官也对秦桧进行弹劾。宋高宗仅任秦桧为相十个月，就把他罢免，并榜其罪于朝，示不复用。

在秦桧于绍兴二年（1132）首次罢相后的几年中，金朝虽然放出了“和议”的空气，但条件比通过秦桧提出的二策更加苛刻，除要南宋把“西北士民之在东南者”通通遣返外，还要南宋把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划给伪齐，使南宋失去淮南的屏障。这种“和议”实际上是金人消灭南宋的一种策略。南宋如果接受这些条件，连偏安江南一隅都不可得。所以宋高宗尽管对金统治者“卑辞厚礼”在所不惜，但却难以接受金人的条件，宋金的“和议”没有什么进展。

在军事战场上，从绍兴初年后，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金朝兀术继和尚原之败后，绍兴四年（1134）三月，又在仙人关遭到吴玠同样沉重的打击，不得不放弃入蜀的打算。在荆湖一线，宋将岳飞于绍兴四年五月至七月主动出击，收复了被伪齐占据的襄阳等六郡，使西北战场的防线同两淮战线的联系保持畅通，南宋的防御力量得到加强。兀术率军支援伪齐，于九月间伙同刘豫大举渡淮南侵，遭到岳飞、韩世忠所率宋军及两淮许多水寨义兵的英勇抗击，很快以失败告终。这一切说明，宋金战场的形势从绍兴四年起已发生了有利于南宋的变化。金兵在战争初期的军事优势消失了。南宋已在战争中锻炼出吴玠、韩世忠、岳飞等英勇善战的军事统帅，南宋军队的战斗力也已大大加强了。

绍兴初年金朝在诱降及军事方面的种种失败，使金朝内部在对宋战争的策略方面产生严重分歧。绍兴五年（1135）金太宗死后，女真贵族内部的矛盾更发展成激烈的内讧。扶植伪齐的粘罕失势，刘豫这个汉奸头目成了金朝对宋战争失利的替罪羊，伪齐于绍兴七年（1137）被金朝废掉，以挞懒为首的一派当权的女真贵族决定把原由伪齐管辖的河南、陕西交还宋朝，同宋朝议和。

金朝因内讧引起的对宋战争政策的剧变，在南宋小朝廷内部引

起巨大的反响。宋高宗认为多年盼望的“和议”又有了希望，重新起用秦桧为宰相兼枢密使，让他专决“和议”之事。南宋内部许多人都认为金人不可信，反对“屈己”与金朝讲和。这样，在南宋内部，抗战派与投降派之间又展开一场激烈的斗争。这时期抗战派的旗帜，就是抗金英雄岳飞。

岳飞，字鹏举（1103—1142），河南汤阴人。他出身农家，在北宋末年从军参加征辽战争。南宋初，他曾作为河北招抚司的下级将校，随王彦渡过黄河到河北抗金。离开王彦后，又投到东京留守宗泽的麾下参加开封保卫战，为宗泽所赏识。他在宗泽面前论阵法，提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见解，更为宗泽所赞赏。宗泽死后，岳飞又随杜充从开封撤到建康。当杜充在兀术渡江南侵时畏避逃跑乃至无耻投敌的时候，岳飞却率所部孤军奋战。兀术从江南撤退时，他又在建康附近奋勇追击，并收复建康城。这时的岳飞，已经经历了大小 200 余战，因英勇善战，声誉日高，很快升任独当一面的将领。当绍兴二年他刚 30 岁的时候，已经成了守卫长江中游的主帅。在绍兴四年（1134）他受命挥师北伐，夺回伪齐控制的襄阳六郡后，被封为节度使。这时他刚 32 岁，成了南宋大将中最年轻有为的一员。他所率的“岳家军”因纪律严明，战功显赫，深受人民爱戴，成为南宋抗金斗争的中流砥柱。



岳飞像（《中兴四将》局部）（右为岳飞）

岳飞素有恢复失地，出民水火，振兴宋室的志向，所以，他一面极力要求宋高宗出师“直捣中原，恢复故疆”，一面联络河朔抗

金的义兵，作收复失地的准备。

但是，岳飞的雄心壮志却不是遭到宋高宗的冷淡对待，就是遭到阻挠。宋高宗只想偏安江南，并不想取得抗金斗争的胜利，因为一旦打败金朝，迎回徽、钦二帝，自己就做不成皇帝了。所以宋高宗只允许岳飞守住已经相对稳定的防线，却不使他超出襄阳六郡的范围去收复更多的故土。在绍兴四年出师收复襄阳六郡时，宋高宗就给他明确的命令，让他严格限在被伪齐李成夺去的襄阳六郡范围，不得过分深入敌境，以免引惹金人，否则，“虽立奇功，必加尔罚”。绍兴六年（1136），岳飞再次受命北伐，虽然所向披靡，但因宋高宗下了不许直捣中原的命令，又不督促其他大将出兵应援，岳家军被迫撤回原地。绍兴七年（1137）二月，岳飞应召进见宋高宗，向高宗面陈规复之策。宋高宗不仅不置可否，连原先已作出的把淮西刘光世军并给岳飞、让岳飞尽力“中兴之事”的决定，也在一瞬间取消了。宋高宗不仅没有赏识岳飞的忠心，反而对他产生了疑忌。

这种种情况，使得坚决抗金的岳飞同以宋高宗为首的投降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岳飞不仅没有像宋高宗对他的要求那样，当一匹可供任意驾驭的温顺良马，反而因为感到恢复中原的宏愿难以实现，于绍兴七年夏愤然向宋高宗提出了辞去帅职的请求，并且不等宋高宗批复，就自己到庐山守其母之丧，以表示自己对恢复中原宏愿得不到支持的失望和愤懑。

当绍兴八年（1138）宋高宗起用秦桧为相，授予秦桧同金朝议和的专决大权时，岳飞表现出激烈反对的态度。当时宋高宗召他从鄂州（今湖北武昌）入朝，企图让他放弃举兵入中原的主张，附和投降活动。岳飞却尖锐地说：“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国（指秦桧）谋国不臧，恐贻后人讥”，要求宋高宗停止对金的“和议”。当宋高宗同秦桧沆瀣一气，于绍兴九年（1139）正月不顾一切，同金朝订立和议，向金朝称臣纳贡后，岳飞不仅没有按例向宋高宗敬献贺表，反而上表对宋高宗说，同金和好，“图暂安而

解倒垂，犹之可也；顾长虑而尊家国，岂其然乎?”表示自己口诵议和的诏书，“面有惭于军旅”，“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这实际上是一篇继续坚决抗金、反对投降的檄文。当宋高宗因庆贺“和议”成功而给诸大将加官晋爵时，岳飞却认为，“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只能训练将士，严加防备，“而不可行赏论功，取笑夷狄”，再三力辞不受。

岳飞这种坚决反对“和议”的态度，使宋高宗甚为恼怒，更为秦桧所切齿，从此被宋高宗和秦桧视为眼中钉。但是，事情却正如岳飞所预料的那样，在“和议”订立不久，金朝又一次发生内讧，兀术以挞懒把河南、陕西地归宋，告发挞懒同南宋有秘密勾结，挞懒被夺了军权，不久又被以谋反罪处死，对宋战争的急先锋兀术掌握了军权，立即撕毁绍兴九年正月同南宋订立的“和议”，并于绍兴十年（1140）五月，分兵两路，向陕西和河南大举进攻，很快又把河南、陕西夺了回去。

接着，兀术率大军向淮南大举进攻。宋高宗这时又慌了手脚，急忙下诏让岳飞从襄阳出击，牵制向淮南及陕西进攻的金兵，并“图复京师”（开封）。但是，进攻淮南的金兵却在顺昌（今安徽阜阳）遭到刘锜所率原“八字军”的沉重打击，兀术不得不撤回开封。金兵对淮南的威胁很快就解除了，宋高宗也马上改变主意，立即向岳飞下了“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的命令。岳飞却认为机不可失，坚决向中原进军，一路受到中原人民的热烈欢迎，岳家军所至克捷，收复了许多州郡。七月间，岳家军在郾城（今河南郾城）大败金兵，歼灭了兀术的精锐骑兵拐子马。接着，岳家军又在颍昌打得兀术狼狈而逃，并一直追击到距开封仅 45 里的朱仙镇。这时黄河南北许多坚持斗争的义兵都打着岳家军的旗号，响应岳飞的北伐，其他各路宋兵也转入局部反攻，抗金斗争呈现一派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金兵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兀术甚至一度准备撤离开封，到河北以避岳家军的兵锋。

但是，抗金斗争的大好形势，却吓坏了不愿抗金斗争胜利的宋高宗和秦桧一伙。他们急忙下令各路宋兵班师，使岳飞军处于孤军无援的状况，接着又连发金牌，强令岳飞退兵。岳飞接到宋高宗这种叛卖性的命令后，既十分愤慨，又不能违抗，不禁十分悲愤地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然后无可奈何地下令撤退。岳家军第二次北伐的巨大成果，又让宋高宗、秦桧拱手送给金朝了。

宋高宗、秦桧一伙在强令岳飞班师后，为了向金人表明投降的决心，撤销了岳飞、韩世忠等大将的兵权，加紧进行对金投降的活动。兀术因为绍兴十一年（1141）初再次向两淮进攻，在拓皋（今安徽巢县西北）又被宋军击败，终于认识到对宋战争已不可能用武力取胜，也表示愿意与南宋议和。宋、金之间为和议又开始了紧张的活动。



杭州岳王庙岳飞郾城大捷壁画

宋高宗见和议可成，像岳飞这样的良将已经不仅不再需要，还成了投降活动的障碍，长期的疑忌终于变成了杀掉岳飞的念头。兀术因为害怕岳飞反对和议，也派人授意秦桧害死岳飞。于是，宋高宗同秦桧策划，由附和秦桧的张俊出面，捏造罪名，诬告岳飞准备谋反，把岳飞及其儿子岳云、部将张宪逮捕入狱，交给秦桧的党羽万俟卨（mò qí xiè）用酷刑逼供，要岳飞承认有谋反之意。岳飞知道自己既落入国贼之手，"为国忠心，一旦都休"了，但始终拒绝承认秦桧一伙诬加的罪名。当时宋高宗、秦桧也找不出任何岳飞想谋反的证据。韩世忠替岳飞抱不平，去责问秦桧。秦桧竟说，岳飞父子谋反的事"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听了，不禁愤愤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从此，"莫须有"三字，成了

一切反动人物诬害正直人士所使用的卑鄙手段的代名词。

制造岳飞大冤狱，还是宋高宗、秦桧一伙压制其他反对投降的文武大臣、排除投降阻力的一种手段。在逮捕岳飞父子后，宋、金双方终于在绍兴十一年十一月订立和议：南宋正式向金朝称臣，每年纳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宋金东以淮河中流，西以大散关（在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中间的唐（今河南唐河县）、邓（今河南邓县）以北地区划归金朝。这个和议因为订在宋高宗绍兴年间，遂被称为“绍兴和议”。

就在“绍兴和议”订立不久，宋高宗、秦桧不顾一切地把岳飞父子及张宪订成死罪，并于绍兴十一年除夕（1142年1月28日），把岳飞、岳云及张宪杀害。当时岳飞年仅39岁，岳云年仅23岁。岳飞在临刑之前，在狱案上挥笔写下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表示了对投降派的最后抗议。


秦桧夫妇跪像

岳飞虽然被诬害，但他的事迹却几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颂。明代诗人文徵明曾赋《满江红》一首，直截了当地揭露了宋高宗出于卑鄙用心，勾结秦桧杀害岳飞的丑恶面目：

>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
>
> 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

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日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在杭州的岳王庙和汤阴的岳王祠，几百年来，一直有人在那里缅怀岳飞的功绩，痛斥宋高宗和秦桧一伙的罪行。

五、“便令江汉竭，未厌虎狼求”

——“绍兴和议”后的宋、金和战形势

“绍兴和议”的签订，是南宋以宋高宗为首的统治集团为维持自己的腐朽统治，对女真贵族的可耻投降。通过这个和议，南宋获得了金朝对其偏安一隅的承认。在这以后的20年时间内，金朝集中力量巩固其在北中国的统治，内部也不断发生互相残杀事件，无暇再发动对南宋的进攻。南宋统治者也安于称臣纳贡的地位，每年除把岁币如数送到泗州（今江苏盱眙）交纳给金朝外，还要搜刮大量的金银币绢，送给金朝贺正旦及生辰。宋高宗之母韦氏每年送给金朝皇后的礼物，也“以钜万计”。金朝随时索取各种玩好，宋高宗也下令“搜访与之”。

以宋高宗为首的南宋投降派以为，既然和议订立了，金朝统治者的贪欲又一一予以满足，从此可以安安稳稳地做起太平梦了，于是把战备抛到脑后，在杭州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但是，好梦不长。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就把宋高宗一伙的和议幻梦搅破了。

完颜亮是金朝第四个皇帝。他在发动宫廷政变弑金熙宗，登上皇帝宝座后，在金朝进行一系列政治改革，杀掉大批奴隶主旧贵族，在金朝确立了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后，又想使“天下一家”，成为“正统”，于是准备举兵灭宋。

为了消灭南宋，完颜亮一面下令大规模地调拨军队，建造战

船，一面不断指责南宋收纳叛亡，购买马匹，对和议及金朝“多有不诚”，制造举兵的舆论。

对于完颜亮南侵的意图，南宋一些有识之士早就有所觉察。绍兴二十六年（1153），有人上书要求宋高宗及早防备，宋高宗竟勃然大怒，把上书人流放到千里外，并下诏宣布此后有再“鼓倡浮言，以惑众听”者，都要“重置宪典”治罪。到绍兴二十九年（1159），因为完颜亮加紧了侵宋的准备，一些出使金朝回宋的使臣，又向宋高宗再次提出及早防备的建议。但这些有见识的建议也都被宋高宗及宰相汤思退、沈该视为“浮言”，不仅不予采纳，反而把提建议的人贬官赶出朝廷。绍兴三十年（1160），金朝使臣施宜生来南宋贺正旦。施宜生是福建人，虽然在金朝为官，却心向着南宋。他用“今日北风甚劲”及在几上连连扣笔说“笔来！笔来”，向南宋透露形势紧张，金朝必定南侵。南宋使金的官员贺允中也向宋高宗报告“金人必叛盟，宜为之备”。宋高宗君臣依然无动于衷，并罢了贺允中的官。

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夏，金兵南侵已在眉睫，宋高宗才开始考虑防务问题，但所采取的措施也只是从川陕防线抽调3 000人马戍守襄阳，命诸将划界各自为守而已。而这时幸存下来的刘锜、吴璘等战将，都已经年老多病，再没有一个像岳飞、韩世忠那样的大将可以独当一面克敌制胜了。这是宋高宗为了投降而自毁长城的恶果。

绍兴三十一年九月，金主完颜亮分兵四路，一路准备由海道直奔临安（杭州），一路由蔡州（今河南汝南）出发进攻襄阳及荆南，一路由凤翔（陕西凤翔）出发向蜀口进军。完颜亮亲率主力渡过淮河攻入淮南。宋高宗急忙任命已患病在身的老将刘锜及王权率军前去抵挡。王权根本没有斗志，在庐州（安徽合肥）不战而逃，全军溃败。宋高宗一听说王权兵败，吓得又想走建炎四年航海避敌的老路。只是由于这时新任宰相陈康伯坚决劝阻，宋高宗才下诏表示要率军亲征，并派知枢密院事叶义问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

人虞允文参赞军事，到江、淮督战。

当叶义问于十月下旬离开杭州的时候，金朝内部已经又发生政变，东京留守完颜雍在部分女真贵族拥戴下登上皇帝宝座，宣布废黜完颜亮。金朝统治区的汉族、契丹族人民也掀起一个起义高潮。率军南侵的完颜亮已面临困境。然而，因为南宋腐败，刘锜在扬州带病作战，兵败渡江南撤，整个两淮地区都被金兵占领了。

奉命到江淮督视军马的叶义问，是个毫无军事常识而又异常怯懦的人。他听说“金人又添生兵”时，竟问“生兵是何物”，被时人讥笑为“土园枢密”。当他来到镇江的时候，完颜亮已屯兵采石，准备渡江了。叶义问竟强迫民夫在长江南岸的沙滩上掘一尺多深的沙沟，沿沟栽上木枝作为障碍物，企图以此阻止金兵渡江。像这样的废物竟是南宋主兵的最高官员，而且让他到前线督师，南宋的腐败可见一斑了。

幸好参赞军事虞允文是个有胆略而又懂点军事的人。他受命到芜湖，宣布由李显忠取代王权领兵的命令，走到距采石十余里的地方，见到因王权逃跑而从淮西败退下来的宋军将士三三两两，无精打采地坐在路边。虞允文把这些将士组织起来，激发起爱国抗敌的精神，使这些宋军将士重新返回江边布防。正好完颜亮指挥金兵自采石渡江，虞允文亲自督宋军奋起抗击，又用海鳅船冲击敌舟，一举击败渡江的金兵。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采石之战”。

“采石之战”对已经处于困境的完颜亮是个致命的打击。这时准备从海道奔袭临安的金兵已在密州胶西县（今山东胶县）陈家岛被原岳飞的部将李宝击败，完颜雍在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自立为帝的消息也已传到完颜亮的军中。完颜亮在采石渡江失败后，移军向东，准备从瓜洲渡江。但是，虞允文已经又赶到瓜洲对岸的京口，作了严密的防御部署。金军将官看到南宋已有准备，知道渡江难以成功，要求完颜亮退回扬州再作打算，完颜亮却气急败坏，强迫金军将士冒死渡江，结果激起兵变。一些金军将领为求生存，杀死了完颜亮，率军撤回北方。南宋军队乘势收复两淮，取得

了抗金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

完颜亮南侵的惨败，使得南宋的抗战舆论又重新高涨起来。宋高宗鉴于金人败盟宣告自己投降政策的破产及朝野抗战声浪的高涨，感到难以再发号施令了，就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宣布退位，让他的养子赵昚（shèn）继承皇帝位，自己当起了太上皇帝。赵昚就是宋孝宗。


宋孝宗

宋孝宗是宋太祖的七世孙，宋高宗因在扬州受惊而患了不育症，仅有的一个儿子也在“苗刘之变”后不久夭逝了。在考虑收养个宗室为子时，因为当时有金朝灭北宋的主帅斡离不面型像宋太祖的传说，一些官员又提出了宋太祖没有失德，子孙却如同庶民，以致金兵入侵、北宋灭亡的事，就决定在太祖支派子孙中选择一个养子。宋孝宗因此被选入宫抚养。他继承皇位后，起用主张抗战遭到秦桧排斥的张浚为枢密使，为岳飞昭雪，把秦桧的党羽驱逐出朝廷，做出坚决抗战的姿态，并让张浚负责作出师北伐、收复失地的准备。

隆兴元年（1163）四月，张浚命李显忠、邵宏渊分别由濠州（安徽凤阳）、泗州（江苏盱眙）率军出击。宋军在出击初期取得一些胜利，收复了灵璧县（安徽灵璧）及宿州（安徽宿县）。后因邵宏渊妒忌李显忠之功，不肯同李显忠配合作战。当金兵向宿州反扑时，李显忠被迫后撤，金兵乘势尾追，在符离大败宋兵。张浚仓猝组织的这次北伐因符离之败而告终。

符离之役失败后，宋孝宗曾经燃烧一阵的抗金热情一下子就消失了，投降派的汤思退又被起用为宰相。张浚不久也重新被排斥出朝廷，并病死于出判福州的途中。南宋妥协投降派又一次得势，决计向金朝求和。汤思退甚至派人去金朝，请金朝派兵渡过淮河，对

南宋施加军事压力，以配合自己的投降活动。金世宗完颜雍因统治尚未稳固，无力对宋进攻，也愿意与宋朝议和。隆兴二年（1164）十二月，宋金重新订立和议：金宋由君臣之国变为叔侄之国；南宋每年向金朝交纳的“岁贡”改称“岁币”，并减十万之数；双方重新确认“绍兴和议”划定的疆界，南宋把完颜亮南侵失败后由宋军占领的州郡通通割还金朝。这就是所谓“隆兴和议”。

宋金之间的“隆兴和议”一直维持了40年之久，直到宋宁宗时韩侂胄北伐，形势才又发生变化。

韩侂胄是北宋名臣韩琦的五世孙，宋宁宗皇后韩氏的叔父。在宋宁宗时，他通过各种手段，排斥异己，把持了朝政。他听说金朝受北边鞑靼等部的侵扰，连年出兵，兵祸连结，内部又到处爆发反抗斗争，国势已经日益衰弱，以为这是收复失地的大好机会，就想在这方面立个盖世功名，以巩固自己的权势，遂决定出师北伐。开禧二年（1206）四月，宋兵开始出击，收复了泗州（江苏盱眙）、新息（河南息县）、褒信（河南息县包信集）、虹县（江苏泗县）。韩侂胄见宋军出击得手，就于五月间以宋宁宗的名义发布伐金的诏令，正式对金朝开战。

然而，由于这次北伐主要是韩侂胄为个人权势而搞的军事投机，在军事方面并没有认真进行准备。在西线川陕方面拥有重兵的吴曦又暗中与金朝勾结，先是按兵不动，接着公开叛变，自称蜀王，准备向金朝称臣。这一叛乱虽然不久就被平息，但南宋从西线出击的计划却告吹了。金朝因为西线无后顾之忧，得以集中兵力于东线，把出击的宋军击败，并转而向两淮大举进攻，占领了南宋许多州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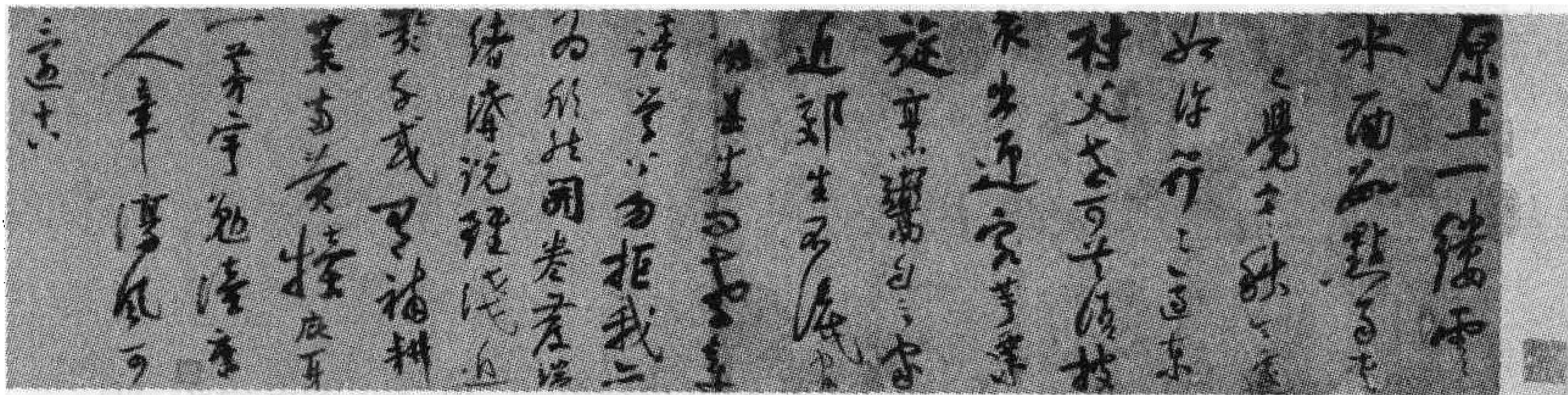
南宋因军事失利，又转而向金朝求和。金朝乘机要挟，要南宋向金朝称臣以换取淮南之地，否朝就要划长江为界。还要南宋斩北伐首谋的脑袋献给金朝，增加岁币5万，另纳犒师银1 000万两。这时韩侂胄因为兵败陷于孤立，宋宁宗同礼部侍郎史弥远、新立的皇后杨氏（韩侂胄之侄女已病死）密谋，于开禧三年（1207）十

一月，在韩侂胄入朝时，乘其不备，把韩侂胄杀死，以扫除向金朝求和的障碍。

嘉定元年（1208），宋、金又重新订立和议：金宋由叔侄之国改为伯侄之国；岁币由25万增加到30万；南宋交给金朝犒军银300万两；南宋把韩侂胄的首级献给金朝示众，金朝则从淮南及大散关等地撤军。

嘉定新和议对南宋来说，又是一个屈服于金朝苛刻条件而订立的和议，它进一步暴露了南宋小朝廷的腐败和无能。“绍兴和议”确立的南北分裂局面也因为这个屈辱的新和议而继续延续下去，使得那些昼思夜想盼望恢复中原的南宋爱国志士抱憤终生。就在“嘉定和议”订立第三年，爱国诗人陆游抱愤死去，临死时写了千古绝笔《示儿》诗云：

>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陆游《自书诗卷》

因南宋统治者的腐败无能而带着这种悲恨心情离开人世的人，又何止陆游一人呢！

第八章　偏安局面下的南宋社会经济

一、"苏常熟，天下足"

——南宋农业的迅速发展

南宋统治的中国南方，由于宋金战争的影响，许多北方的"士民"为了躲避金兵的掳掠，纷纷扶老携幼，逃到江南。使得一些战火未烧到的地区户口骤然增加。以福建的建州为例，北宋元丰年间有民户 87 000 多户，到南宋中期，已达到 142 100 多户，70 年间增加了 5 万多户，其中的许多人户就是从北方南迁的。

大量南迁的户口中，除了一部分不事生产的官僚地主外，多数是从事各种生产的劳动人民。使得南方的劳动力大大增加。南宋时，南方的农业生产虽然已经比较发达，但还有许多地方没有开发，劳动力的增加对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宋史·食货志》说："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南宋前期，劳动人民经过几十年辛勤劳动，不仅修复了在战争中遭到破坏的大量陂塘，还兴建许多新的水利设施。据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南宋政府的统计，江东共修陂塘沟堰 22 400 余所，淮东修治 1 700 余所，浙西修治 2 100 余所。兴元府（今陕西汉中）的山河堰，湖南的龟塘，镇江府的练湖 72 源，以及明州（浙江宁波）的东钱湖等大规模水利工程，都先后得到修治。一些阻塞的河道也得到疏浚。在沿海许多地方则筑堰置闸，阻挡海潮浸

淹民田。其中最著名的，有秀州华亭（今上海市松江）的捍海堰和淮东的绍熙堰。绍熙堰修成于宋光宗绍熙五年，全长数百里，使淮东数百万顷低湿土地变为良田。

水利设施的大量兴修，不仅增加了灌溉面积，减少了水旱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威胁，还使南方的耕地面积，尤其是水稻田的面积，大为扩大。

在兴修水利过程中，许多水草丛生的荒泽被垦辟成田。仅湖州一境，因修筑堤岸，十万亩草荡变为新的可耕之田。两浙农民还把许多旱地改造成水田。海堤的修筑，则使淮东、两浙、福建等路出现大量的海退泥田。福建沿海人民还自备钱本，围垦了许多海滩。浙江温州的广大海滨，更是无不耕之地。这些新垦辟的农田，有许多的水稻田。

水稻田面积扩大最为突出的，是圩田的耕垦比北宋时期更普遍、更大规模的出现。

在北宋末年江淮一带修建的许多圩田，南宋初年因金兵南侵，许多圩岸被掘破，还有许多圩田因佃农在兵荒马乱时逃散，圩岸长期失修，沟洫壅塞，重新抛荒。这使得南宋的军饷来源大受影响。因此，南宋政府对圩田的整修甚是重视，不仅下令凡有官圩田的州县，通判和县令都带兼管圩田的官衔，命令各州县把缺坏的圩岸疾速修复，还委派拥有大量私人圩田的大地主为圩长，让他们在每年秋后集本圩人夫增修圩岸。

南宋时期大规模修筑圩岸，围湖造田，虽然对生态平衡产生一定的影响，也使一些原来得湖水之利的农田失去灌溉之利。但是，权衡起来，当时圩田的大量出现所带来的水稻田面积的大大增加，却使南宋的农业生产带来了产量方面的激增。仅广德湖的圩田 700 多顷，每年收的稻谷就不下数十万斛。豪强地主滥围湖面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同大量圩田出现带来的巨大农业收益比较起来，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圩田的大规模兴修，是南宋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南宋时期，南方耕地面积的扩大，还表现在有更多的荒山被垦辟成梯田。据现存的南宋地方志《四明志》说，浙东奉化县的农民把山颠水湄的可耕之地，都累石堑土，建成梯田。江西袁州的山坡更是禾田层层而上，直至山顶。

南宋时，不仅耕地面积扩大，农业耕作技术也有提高。两浙地区的农民已经清楚知道河泥是水田的好肥料。

在耕作时，许多地方都深耕熟犁，使土壤松细如面。当时江南的水田地区，还出现一种名为“靠田”的田间管理方法。当秧苗长得壮茂时，把水放干，让阳光曝晒，促使稻根深扎，然后再放水入田。稻苗经过“靠田”后，能迅速生长，虽然遇到旱灾，也可以保证成熟。经过“靠田”的水稻，上田亩产谷可达五六石。这种科学的田间管理方法，直到近现代还为许多地区的稻农所采用。

农作物的品种在南宋时期也更多了。单水稻一项，品种就不下数十种。江南地区麦的播种也比北宋时期更加普遍，许多农民在春季竞种小麦，种植面积竟然可以同盛产小麦的淮北不相上下。绍兴府的农民还利用荞麦同小麦的不同生长期，实行荞麦与小麦套种，每年可多收一茬荞麦。

南方的劳动人民还积累了栽培各种果树的丰富经验。洞庭地区的农民栽桔树，不仅使树下的土壤又纯又细，还经常锄草，使果树周围不见杂草。广大果农还很注意使每棵树都能受阳光照射，在严寒时还在风头烧粪壤，以保护桔树不被冻坏。广南农民还知道用蚁可以治柑桔害虫的办法，在柑园里放蚁以治虫害。这种生物防治的办法在当时得到应用，说明南宋时期农民已掌握相当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棉花的种植，在南宋时更加普遍。除了早有棉花种植的岭南外，福建地区许多农户也种植木棉。南宋人彭乘《续墨客挥犀》记载说：“闽岭以南多木棉，土人竞植之，有至数千株者”。据王祯《农书·木棉图谱叙》说，南宋末年，棉花的诸种艺作之法，还进一步传到江淮和川蜀。

从上述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南宋半壁江山的农业生产，在许多

方面都在原来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发展最为突出的地区，是以太湖为中心的江浙地区。这地区原来的发展基础比较好，又因为是南宋的统治中心地区，从北方迁到这里的人口特别多，劳动力比其他地区充足，农田水利的兴修、土地的垦辟、圩田的修建都比其他地区多，精耕细作程度也比其他地区高。所以，江浙地区的农业生产，无论是单位面积产量，还是总产量，都超过其他地区。其中的浙西地区更是水稻的集中产地，《宋史·杜范传》称“浙西，稻米所聚”，《宋史·食货志》也说“苏、湖、常、秀所产”的稻米，“为两浙之最”。南宋时，太湖地区已经有“苏湖熟，天下足”及“苏常熟，天下足”的谚语流传。就连一向比较落后的台州地区，南宋时也一跃而“以胜壤名天下”，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在南宋统治地区，虽然两淮、荆湖和两广地区，有的因为宋金战争的影响，有的因为原来发展基础较差，农业生产发展水平同江浙地区有较大差距，但是，南宋时南方农业生产总的发展水平大大超过北宋时期，是没有疑义的。

二、巧夺天工，精益求精

——南宋手工业的发展

南宋手工业的发展，同农业的发展比较起来并不逊色。

制瓷业在原来基础上大幅度发展，使江南一举成为全国制瓷业的重心，这是南宋手工业发展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在北宋时期，江南已有江西景德镇制造的青白瓷器驰名全国。南宋时，北方原先著名的官窑、定窑、汝窑、耀州窑等名窑，都因为战争的破坏和工匠的逃亡而衰落下去。北方名窑的许多工匠迁移到南方，却给南方制瓷业的发展带来了雄厚的技术力量和优良的新工艺，使南方的青瓷白瓷工艺水平都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景德镇湖田、湘湖等窑的产品质地精良，几乎与玉器无别。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在南宋初所填写的《醉花荫》词中，有“玉枕纱

橱，半夜凉初透”之句。词中的“玉枕”可能就是景德镇色质如玉的青白瓷器。景德镇还继承了北方定窑的工艺，烧制的产品土脉细腻，质薄有光，被称为南定。

江西的吉州窑南宋时也达到鼎盛时期。解放后在吉安市郊永和墟发掘的吉州窑遗址，面积达20余亩，瓷层堆积有的地方达20公尺之厚，可见当时瓷窑规模之大。吉州窑制品的品种丰富，它既受北方磁州窑白地黑花釉下彩、绿釉及红绿彩等品种的较大影响，又采用定窑印花装饰工艺及覆烧工艺，是南宋诸窑中受北方制瓷技术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个瓷窑。

宋金战争对两浙路制瓷业的影响尤为巨大。

北宋末年在汴京有官窑，专门烧制供宫廷享用的精美瓷器。北宋亡后，宋高宗命令宦官邵成章，按汴京官窑的遗制，在杭州凤凰山下置修内司窑，制造青瓷，南宋叶寘《坦斋笔衡》说，修内司窑所产瓷器“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明初有人更概括地分析了修内司窑的制品胎细釉润，色青带粉红，釉有深浅之分，有蟹爪纹开片和紫口铁足等特征。可见，南宋官窑的制品是极其精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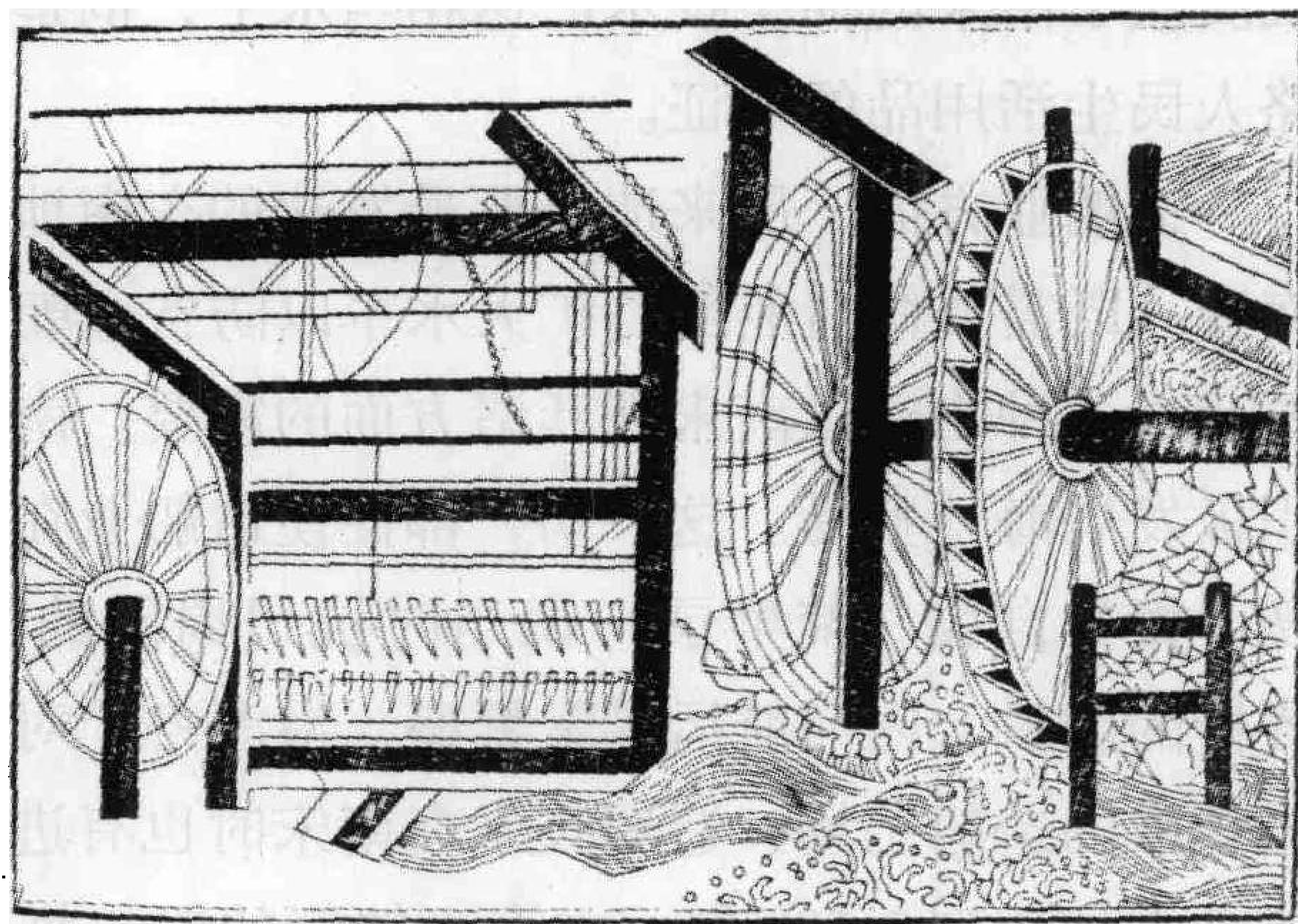
在北宋时继承越窑青瓷系统，以烧制所谓秘色瓷为特色的龙泉窑，南宋以后为应付宫廷、官府的需索，也受官窑的影响，生产一种以施粘稠的石灰碱釉为特征的似官或仿官瓷器，南宋中期以后更形成了有龙泉自身特点与风格的梅子青、粉青釉龙泉青瓷。南宋晚期，龙泉青瓷有很大发展，除龙泉县境内有众多窑场烧制外，邻境的庆元、遂昌、松阳、丽水等县，都有烧制龙泉青瓷的瓷窑。龙泉青瓷终于形成一个新的青瓷窑系，成了中国青瓷生产的主流，所产瓷器誉满海内外，其中的琉田窑所烧的瓷器“极青莹，纯粹无瑕，如美玉”，工艺水平达到了巧夺天工的境界。

福建地区的制瓷业在南宋时也大幅度发展，德化、泉州、永春、安溪、同安、南安等地，都有烧制青瓷或青白瓷的窑场，所产瓷器通过泉州港畅销海外。福建不仅青白瓷制品和窑场多，建瓯的

建窑烧制的黑釉也很著名，据说建瓯周围许多瓷窑都群起效之，使得建窑的黑釉瓷，同龙泉青瓷可以分庭抗礼。

纺织业是南宋另一重要手工业部门，其发展也有重要的特色。

南宋统治下的江浙和四川，在北宋时本来就是产丝织造帛绢的四大中心之二。南宋初，为同西南各少数民族交换马匹，南宋政府在成都的应天、北禅、鹿苑三寺设织造工场，专织锦绫被褥，以作为黎州（今四川汉源）等处和市马匹折支之用。乾道四年（1168），又因为三场散漫，不好管理，把三场机户都集中到原廉访司洁己堂，创立锦院，所织式样，有真红被褥等十余品，超过了北宋时期。江浙的丝织业发展更加普遍。南宋中期的谈钥说，吴兴山乡农户都以蚕桑为岁计，其中富户育蚕有数百箔，而且兼营机织。江浙的丝织技术也有新的提高。杭州杭坊所织的“唐绢”，幅狭而机密，是绘画的好材料，为画家所喜爱。原已著名的“越罗”，南宋时精益求精，创造出新的技术工艺。南宋的地方志《嘉泰会稽志》称这种“越罗”的新产品“纹皆隐起，而肤理尤莹洁精致”，远远超过了唐代闻名的宝街罗。浙东奉化所织的纱，丝密而轻如蝉翼，织造技术也很高超。



宋元时期的水转大纺车图

纺织业中的麻织业，在南宋时也继续发展。麻织素已闻名的广西，所织的柳布、象布，是商人贸易四方的畅销品。邕州（今广西南宁）的白毯以佳丽厚重著名。瑶族人民用蜡染法染制的斑花布，斑纹极细，尤为精致工巧。这种蜡染法，是当时我国境内染斑

技术的最高水平。除广西外，两浙路绍兴的强口布，也是一种当地著名的麻布。

棉纺织业在南宋时也进一步发展到两浙路及江西等地区，为元代江南地区棉织业的大发展准备了条件。闽、广的棉纺织物已经以"丽密"闻名。江南一些农户也已知道用铁铤碾去棉核，用竹制成小弓弹花，用纺车纺纱，然后织以为布的技术。近年来在浙江兰溪的南宋墓葬中，发掘出一条具有细密厚暖等优点的棉毯。这条棉毯既反映了南宋的棉织技术已达相当水平，也是棉纺织物已成为两浙路人民生活用品的见证。

造船业方面，历来造船业最发达的东南地区，在南宋时因宋廷南迁，既需要修造船舰、扩大水军以防备金朝渡江及渡海南侵，又要运送各种物资供南宋朝廷诸方面的需要。南宋为增加财政收入也积极发展海外贸易。这一切，都促使造船业在原来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据吴自牧《梦粱录》说当时杭州周围的河道里，行驶着各式各样的船只，内河航运异常繁盛。沿海各个对外贸易港口，都有相当规模的造船工场。造船技术在南宋时也有进步。当时内河航行的船，有的达到2 500斛。在海上航行的船，每艘可容数百人至数千人，还可以装载供船上人员一年食用的粮食，并且可以在船上养猪及酿酒。南宋人洪迈还说当时南方有载重2万石（合1 000吨）的大船。广南制造的藤舟，是一种可供远航的大海船，据说当时越海商贩都用这种大船出海远航。钟相、杨幺的起义军为抗击官军的镇压所创造的车船，有24车，分为3层，高达10丈以上，可载上千人，船上装有激水的轮子，开动起来疾速如飞。这种借助机械作动力的大船，反映了当时造船技术的进步。

南方的造纸业本来就比较发达，南宋时，由于北方士大夫大批涌入江南，对高级纸张的需求大大增加，这就促进了那些专供官僚地主用于书札、诗文、书画方面的高级纸张的制造工艺的发展。北宋末年已为书法家所珍爱的竹纸，南宋时质量又有提高。《嘉泰会稽志》说竹纸有五大特点：一是光滑；二是发墨色；三是宜笔锋；

四是卷舒虽久，墨终不变；五是不怕虫蛀。所以工书法的人都喜爱这种竹纸。苏州粉笺本来就有“美如花”之誉，南宋时又制出浅蜡色的笺，像软玉那样“莹腻无纤瑕”。建阳书坊还有一种用山椒果实煮汁染成的椒纸，纸性坚韧耐久，有浓烈的芳香气味，经久不消失。这种纸印的书可以防虫蠹。这种椒纸的制造工艺显然也很先进。

与造纸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印书业，南宋时的发展也相当可观。北宋四大印书中心，除开封沦陷于金朝外，其余三个印书中心都在南方，印的书籍不仅数量多，而且刻印技术精美。直到今天，宋刻本书籍仍为人们所称道。杭州、成都、建阳这三个北宋时期就已闻名于世的印书中心，南宋时仍然继续发展，刻书质量依然是杭州为上，成都次之。建州所刻印的书籍虽然质量较差，但以多、快取胜。建阳书肆刻印的书籍行销四方，无远不至。除这三个中心外，两浙的婺州（今浙江金华）、湖南的平江、江西的吉州（今吉安）、赣州、抚州、饶州（江西波阳）等地，也都有颇为发达的印书业。

从上述几个手工业部门的发展情况可见，南宋许多手工业在技术方面都不仅在北宋基础上精益求精，而且有所创新；在规模方面则比北宋时期更加扩大，分布地区也比北宋时广。

三、商业、都市和纸币

——杭州的空前繁华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南宋时南方的商业也进一步繁荣。这突出表现在海外贸易的空前繁荣、许多商业都市呈现繁华景象及国内商品流通的加强等几个方面。

据南宋人的记载，当时同南宋有海上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五六十个。东至日本，南至印度尼西亚诸岛，西至非洲东海岸的坦

桑尼亚，都有中国海商同外国贸易往来的足迹。当时从海外运人南宋的货物计400种左右。由南宋运往海外的商品，以丝绸及陶瓷器为大宗，还有各种金属及金属制品、农副产品、各种日用手工艺品等等。泉州、广州和明州，是当时海外贸易的主要口岸。南宋的海外贸易，是我国海外贸易史上空前繁荣的一个时期。

南宋境内许多商业都市的繁华景象，是当时商业繁荣的集中表现。

南宋的都城杭州，取代了北宋汴京开封的位置，成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商业中心。当时四方士民、商贾都集中到杭州，使南宋时的杭州及其属县户口整整增加了一倍，达到100多万人。这就使得杭州的消费量激增。杭州所需的柴炭、干鲜果子等物要从严州（浙江建德县东）、婺州（浙江金华）、衢州（浙江衢县）、徽州（安徽歙县）等地运来；所需的海鲜来自明州（后改名庆元府，今浙江宁波）、温州、台州（今浙江临海）；每日所需的数千石粮食则要从苏（江苏苏州）、湖（浙江吴兴）、常（江苏常州）、秀（浙江嘉兴）等州及淮南、广南等处运来。每天通过钱塘江、长江、运河及海上航路载运各种货物来到杭州的船只不计其数，杭州成了钱塘江、长江、运河及海上交通的集汇枢纽，成了当时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

在杭州城内，自大街到各个坊巷，大小店铺连门皆是。大街上的买卖昼夜不绝，夜市一直到午夜三四点钟方散，而到五更，早市又已开始。杭州不仅店铺甚多，货物充盈，交易量也很大。珠子市的买卖“动以万数”，尤其兴隆。在城里设有许多专供店铺及商旅存放货物的“塌房”。杭州的外城，东西南北各数十里，也都人烟聚集，百物繁盛，市井坊陌铺席很多，走了数日都难走遍。外城的每个集市，都可以同外路一个州郡比肩。南宋中期，杭州及其属县每年收商税120万缗，相当于北宋景祐年间全境岁收商税总数的四分之一，可见当时杭州的商业之盛。

除杭州外，长江中下游的鄂州（今武昌）和建康府（今江苏

南京市），也是重要的商业都会。

鄂州是联系湖广陆上商路及长江、汉水、湘江水路的都会，商业非常繁荣。南宋诗人范成大到过鄂州，见到这里“列肆如栉”，店铺比比皆是，川、广、荆、襄、淮、浙各路的商人都到这里贸易，所有货物都有出售，而且不问多少，一日之内就可以售完。另一个大诗人陆游入蜀时路过鄂州，也看到每天停泊在这里的“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船只首尾相侯，有数里之长。比陆游稍后的王炎也说，鄂州位于水陆要冲，南面的潭（湖南长沙）、衡（湖南衡阳）、邵（湖南邵阳）等州，西面的鼎（湖南常德）、澧（湖南澧县）、江陵（湖北江陵）、安（湖北安陆）、复（湖北天门）、襄阳等州府，“数路客旅兴贩，无不辐凑鄂渚”。可见，鄂州在南宋时商业的繁荣是众口皆碑的。

建康府的商业贸易在南宋中期也相当繁荣。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为适应商业活动的需要，建康府重修秦淮河上的镇淮、饮虹二桥，时人所作修桥记说：“二桥横跨秦淮，据府要冲，自江淮、吴蜀，游民行商，分屯之旅，假道之宾客，杂沓旁午，肩摩毂击，穷日夜不止”。其中的镇淮桥更是桥上“车马如云”，桥下“千艘鳞鳞”。秦淮河上两座桥梁商旅往来繁忙的景象，是建康府商业活动繁荣的写照。

从湖南到广南的驿路，在南宋时也进一步加宽，沿途一些城镇的商业活动也很繁荣。南岳的岳市，市区遍及南岳的四周，江浙川广的各种货物都集中到这里，凡人们日常所需无所不有，商业更是繁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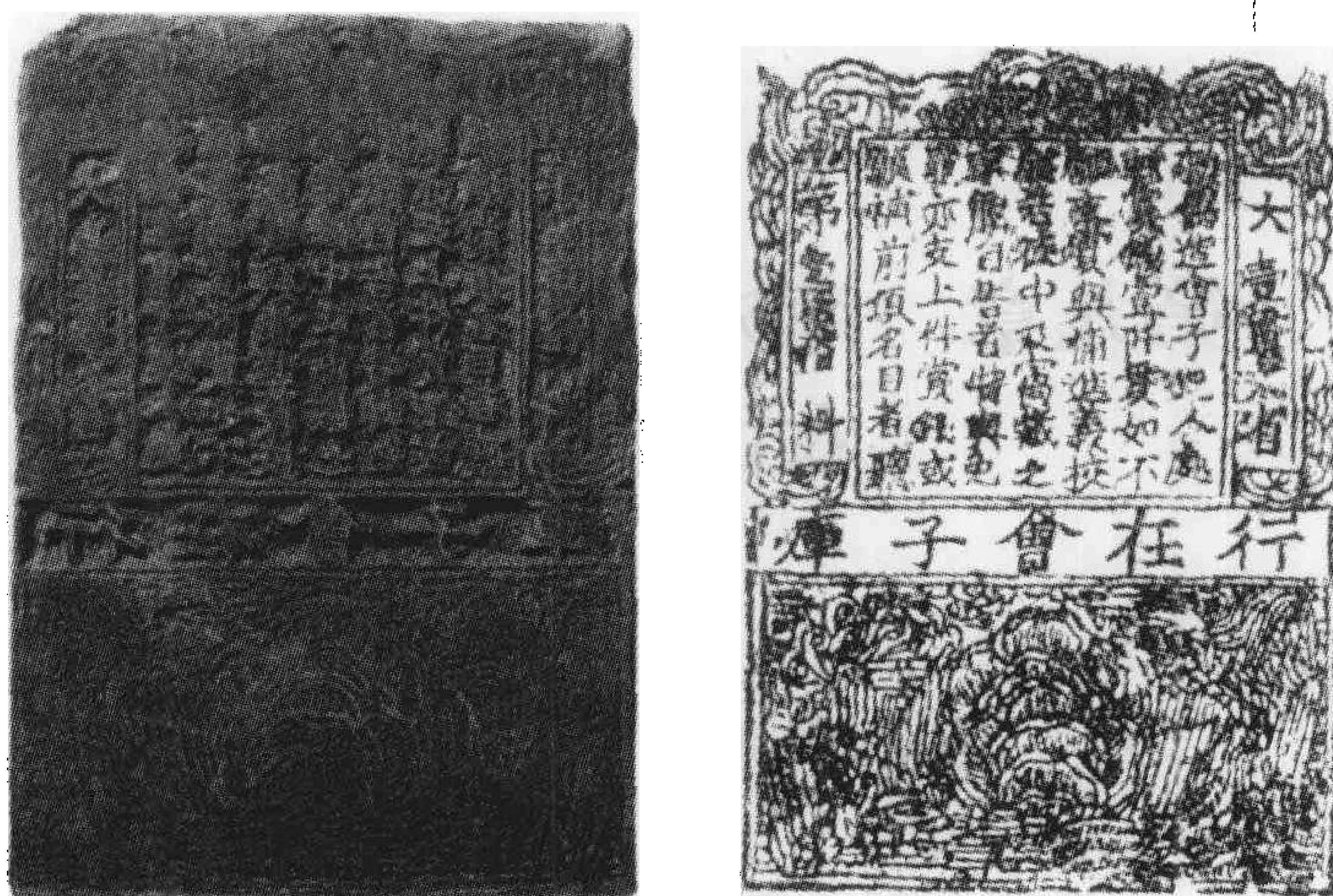
除了大小中城镇以外，乡村草市之类的集市在南宋时也有进一步发展。南宋人的记载说：“今夫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乡民在这些米盐之市互通有无，交易的虽然仅仅是“圭黍勺合之利”，但这种交易在当时已被视为“世道之常”，已经是乡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了。

南宋境内各民族的商业联系也很密切。海南岛的黎族人民经常

到汉族人民聚居的墟市，用他们的名香、槟榔、椰子、棉布等土特产，换回耕牛、生产工具及日用品。黎族制造的一种青红间道的棉布“黎单”，深受两广人民的欢迎，桂林人都买这种“黎单”作为卧具。广州税场所征收的海商贩运黎人槟榔的税额，每年达数万缗，可见贸易额之大。西南各少数民族也经常以马匹、名贵木材、珠、犀、水银、麝香、披毯、云南刀及各种药材，与内地汉族人民交易，换回锦缯之类的丝绸及文书、茶、盐、粮米等日常生活用品。南宋政府在雅州（四川雅安）、宜州（广西宜山）、邕州（广西南宁）等地设置“博易场”，同西南各族人民互市。雅州的碉门寨（四川天全），成了四川的富商大贾尽皆向往的市场，商业交易相当活跃。

对北方金朝统治区的商业交往，即使在宋金战争最激烈的南宋初期也没有中断。尽管宋、金双方都严加禁止，但民间走私交易始终在进行着。南方许多商人运载江浙的米和帛，从海上航行到山东贩卖。宋、金订立“绍兴和议”后，南宋政府先后在盱眙军（今江苏盱眙）、襄阳邓城镇、寿春花靥镇（今安徽寿县西北）、光州光山县（河南光山县）中渡市等地，设置官府管理的对金贸易的“榷场”。由南宋输入金朝统治区的货物，有耕牛、药材、丝织品、漆器、竹木器、金银器以及茶叶、粮米等等。由金朝输入南宋的货物，有北珠、生金、丝绢、马匹、人参等等。这些商品有的通过“榷场”交易，有的则通过走私的渠道交易。对金的贸易，是南宋商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

随着商业的发展，商品流通对作为流通手段的铜钱的需求量也大大增加。但在南宋时，铜钱却大量减少，远远不能满足社会流通需求量激增的需要。这是因为，当时有大量铜钱被销毁制作铜器，许多富家又竞相蓄藏铜钱，使许多铜钱发挥不了流通手段的作用，偷运铜钱出口到金统治区及海外的问题，也十分严重。当时官府铸钱的数额又因许多坑冶废弃而大大减少。因此，南宋时的“钱荒”一直十分严重。商品流通扩大同钱荒的尖锐矛盾，就使得北宋时仅在局部地区使用的纸币，逐渐成了广泛流通的货币。



南宋会子版

宋室南渡之初，只有北宋时期流通纸币的四川继续通行纸币，称为“钱引”。南宋官府虽然发行过“见钱关子”、“交子”、“公据关子”，但这些都只是为临时应付军事开支而发行的代用券，只具有票据的性质，还不是流通的货币。到宋高宗统治后期，杭州的富商鉴于当时商业流通同铜钱短缺的矛盾，联合发行一种“便钱会子”，代替铜钱在市场上流通。南宋政府见发行纸币有利可图，遂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在杭州设立“行在会子务”，把发行会子的权利收归官府，正式在东南各路发行会子，分一贯、二贯、三贯三等，与铜钱同时流通。后来为流通的方便，又增印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三种票面。规定以三年为一界（期），每界以一千万贯为额，每界都以旧兑新，称为“东南会子”。此外，在湖北为“湖会”，两淮有“淮会”，这两种会子都同四川的“川钱引”一样，只在特定地区与铜钱并行流通。

南宋纸币的流通，开辟了中国货币史的一个新纪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第九章　南宋的腐朽统治和农民起义

一、秦桧擅权，三朝“内禅”

——南宋政治的黑暗腐败之一

南宋的统治，在朝政方面的突出特点就是一再出现权臣专政擅权，一再出现皇帝的“内禅”，以及道学猖獗，泛滥成灾。

第一个专政的人物，就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秦桧。

秦桧从金朝把他纵回南宋后，很快得到宋高宗的信任，被宋高宗授予同金朝议和的全权。他凭借这种大权，破坏抗金斗争，陷害民族英雄岳飞，压制朝野舆论，强行同金朝订立屈辱投降的“绍兴和议”，使南北分裂局面铸成定局。

宋高宗把秦桧视为难得的“贤相”，认为“一相既贤，则所荐皆贤”，只要是秦桧推荐的官员，都加以重用。秦桧也利用宋高宗对自己的宠信，竭力培植党羽，不管什么无能之辈或龌龊之徒，只要依附秦桧，都被授予高官。秦桧也同这些趋炎附势之辈，结成狐群狗党，把持朝政大权，为所欲为地打击和迫害不同他臭味相投或曾经反对过他的官员。

秦桧为打击异己，使用了各种卑劣的手段。

一是安插党羽，控制台谏部门，把从宋仁宗时起成为皇帝耳目的台谏，变成自己肆意横行的工具。只要秦桧流露出对某一官员的不满，台谏就赶快去罗织罪名弹劾某一官员。台谏的官员也常常派

人到秦桧那里探听秦桧的意图，随时按秦桧的指挥，充当秦桧的打手。

二是鼓励告密，搞特务统治。有人偷开亲戚的箱箧，偷看书信，向朝廷告密，秦桧立即兴大狱治被告发者之罪，而告密者则得美官。从此以后，告密成风，一帮想投靠秦桧的贪渎无耻之徒，连旧朋骨肉，都从往来书信、酒醉后的戏言中，搜集材料告发，而凡被告发，都不免灾难临头。这种告密之风和特务统治，使得许多官员因担心招来横祸，连通书信互相问候、甚至连拜访秦桧以外的执政大臣，都有所顾忌。整个朝野笼罩着恐怖的政治气氛。

三是大兴文字狱。在绍兴八年（1138）上疏反对和议，要求宋高宗斩秦桧以谢天下的胡铨，被流放到新州（广东新兴县）后，在一首《好事近》词中，写了“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等句，把秦桧比作豺狼，用以抒发自己被压制打击的愤恨情绪，结果被扣上“毁谤当途（执政者）”的罪名，进一步流放到海南岛。凡在这前后赋诗赞扬胡铨，或曾经同胡铨相唱和过的人，都一一被治罪。有个太学生把春秋时吴王夫差为报越王勾践杀父之仇，嘱咐卫士每天见面时说的“夫差！尔忘越王杀而父乎”这句话写在墙壁上，也被杖脊刺配。像这类文字狱，在当时还有多起。

由于秦桧利用权势肆无忌惮地打击和排斥异己，南宋从中央到地方的官职，都为秦桧的党羽及附和秦桧的人所占据。但秦桧对自己的党羽也不尽放心。在陷害岳飞过程中是秦桧同谋者的张俊和万俟卨，都因为秦桧对他们不放心而被排斥。只要哪个官员有点声望，立即就被排斥出朝廷，调往偏远之处，谁要是有调回朝廷的念头，谁就要招来祸端。秦桧所信用的，都是一些既贪渎而又柔佞易制的人。秦桧让他们当自己的副职，不过是充当备员而已，并不让他们干预朝政，而且就连这类贪庸之才，官当不了多久，也要被借故排斥掉。整个南宋的内外军政大权，实际上操纵在秦桧一人手中。宋高宗不能容忍像岳飞这样的忠勇之将，却因为秦桧是他同金

朝和议的象征，一直纵容秦桧擅权。秦桧的横行，同宋高宗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秦桧及其党羽不仅倚靠权势残酷打击不同他们同流合污的官员，还肆意营私舞弊、贪赃受贿。绍兴十二年（1142），秦桧的养子秦熺参加科举考试，秦桧指令主考官从中作弊，录取秦熺为状元。绍兴二十四年（1154），秦桧的孙子秦埙参加科举考试，秦桧任命自己的亲信汤思退等人为主考官。这些主考官知道这是讨好秦桧、谋取富贵的机会，就通同作弊，把秦埙定作第一名。直到廷试时，宋高宗看了秦埙的对策，认为没有什么自己的见解，才被拉了下来，降为第三名。秦桧还公开卖官鬻爵，官员的补阙及升迁改秩，各有定价，交相贸易，如商业市场一般，谁要想谋取"监司帅守"一类有方面大权的职事，必须用珍宝或数万贯钱向他行贿。许多官员为了谋取权势，也想方设法贿赂秦桧。每年秦桧生日，各地官员都要进献贵重礼品为他祝寿。在平时，各路大帅、监司、郡守行贿馈送礼物来到秦桧门口，也无虚日。从各地运送黄金、白璧、明珠、犀角象牙等海内外珍异之物进献给秦桧的车船，首尾相衔，相属于水陆之道，昼夜不绝。

在秦桧专擅朝政大权的十几年中，南宋的朝政就是这样血腥、黑暗、恐怖、龌龊与丑恶。这十几年，不仅是南宋历史上政治空前黑暗的时期，也是朝政空前腐败的时期。

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病死。宋高宗虽然没有接受秦桧临死时的要求，让秦熺继任宰相，但继秦桧任宰相的汤思退等人，依然是秦桧培植的党羽，南宋的朝政依然是一派乌烟瘴气。

宋孝宗（1162—1189年在位）继位后，宋高宗以太上皇退居德寿宫，一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死去，共当了25年太上皇，差不多同宋孝宗在位的时间相始终。宋孝宗所任用的大臣，许多也是宋高宗的旧臣。他虽然曾想对宋高宗朝的腐败朝政作些更改，但既受到宋高宗的掣肘，也遭到高宗朝旧臣的反对，不能有所作为。宋孝宗在位期间，朝政方面比较突出的变化，是吸收宋高宗让秦桧

独相18年，使秦桧擅权的教训，反其道而行，像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宰相，28年中共任命15人为宰相。其中好几人任期不足一年，有的仅仅任用三个月就被撤换。参知政事共换了34人，有18人任期不到一年，有的仅仅两个月就被撤换。宰相也没有宋高宗时那么大的权力，皇权又重新抬头，既没有宰相专权的现象，担任宰相的人也不能有所建树。

淳熙十六年（1189），金朝皇帝世宗完颜雍病死，21岁的金章宗继位。因“隆兴和议”规定金宋为叔侄之国，南宋皇帝对金朝皇帝要自称“侄皇帝”，自隆兴和议后一直对金、宋往来礼节不能平等而耿耿于怀的宋孝宗这时已是63岁的老翁，他不愿意以老翁之身向比自己小42岁的金章宗称侄，就传位给太子赵惇，自己退居重华宫当太上皇。赵惇就是宋光宗。

宋光宗（1189—1194年在位）即位不久，就患了“心疾”，政事都由皇后李氏所掌握。李氏骄恣专横，受宋孝宗训责，对宋孝宗产生很深的怨恨，就挑拨宋光宗同宋孝宗的关系，使宋光宗视其父宋孝宗如仇敌。在宋光宗统治的短短五年中，虽然没有宰相擅权，但宫廷矛盾却闹得不可开交，宦官趁宋光宗长期不能临朝听政之机，窃弄权柄，交通贿赂。绍熙二年（1191），太学生余古上书揭露说，当时“上而三省，下而百司”，都在宦官的号令之下，“自副将而至殿步帅，各为高价。不问劳绩过犯，骁勇怯弱，但如价纳贿，则特旨专除”。从秦桧专权以来十分严重的贿赂之风，在这时又有所发展。

绍熙五年（1194），宋孝宗病死。宋光宗既不去探视，也不出来主持丧礼，引起朝野舆论哗然。宋光宗的病也重新发作，一时政局动荡，宰相留正吓得弃官出走。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在外戚韩侂胄支持下，征得高宗皇后的许可，由她以太皇太后身份发布诏令，立光宗之子赵扩为皇帝，尊宋光宗为太上皇。这次“内禅”同前两次的不同之点，在于它实际上是一出逼宫戏，宋光宗实际上是被废黜，过了六年就死了。赵扩就是宋宁宗。

二、韩、史用事，道学猖獗

——南宋政治的黑暗腐败之二

宋宁宗（1194—1224）即位后，原任知枢密院事的赵汝愚因拥戴定策起了决定的作用，先兼参知政事，旋升任枢密使、宰相，执掌了朝政大权。

赵汝愚一掌朝政，就把四方知名之士召到朝中任职，作出要对朝政积弊略加改变的姿态。所谓知名之士，就是集宋代理学之大成的著名道学家朱熹及跟随朱熹鼓倡道学的人。因为道学鼓吹“克己复礼”及“正心、诚意”治国平天下，政治色彩很浓，因此，它一出现就卷入了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从宋孝宗时起，道学的影响逐渐扩大，许多大官僚也崇尚道学，赵汝愚就是道学的热烈支持者之一。所以，他一主持朝政，就把一批道学家和崇尚道学的人引荐入朝任职。

而在这个时候，在宋宁宗上台时出过力的韩侂胄势力也在迅速发展。他利用皇后叔父的特殊身份及担任知阁门事兼枢密都承旨这个职务上的方便，在接近宋宁宗及为宋宁宗传宣诏旨时施展手段，很快受到宋宁宗的特别亲信。他因为在论定策功时受到赵汝愚的压抑，没能如愿获节度使头衔，对赵汝愚产生怨恨，就施展阴谋，通过宋宁宗的“内批”，引荐自己的党羽担任谏官，控制了言路，并且罢免了支持赵汝愚的朱熹、彭龟年等人的官职。由于韩侂胄拥有宋宁宗“御笔”“内批”这一武器，虽然官职不太高，权力却很快超过宰相。他的党羽很快就控制了朝廷的各个要害部门。

庆元元年（1195），韩侂胄与其党羽京镗谋划，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为口实，让宋宁宗罢免了赵汝愚的宰相职务。凡上疏要求留用赵汝愚的人，都被斥为同赵汝愚结党，被赶出朝廷。从此，韩侂胄操纵朝政一切内外大权。

韩侂胄专权前后达13年之久。他的官衔由节度使一直升到太师，并被封为平原郡王。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他对政治上的反对派极力加以打击和迫害。由于当时道学家是一股影响不断增大的政治势力，而朱熹及其他崇尚道学的人在韩侂胄同赵汝愚的斗争中又都站在赵汝愚一边，韩侂胄就通过禁道学来打击自己的政敌。他宣布朱熹的道学是“伪学”，把朱熹、赵汝愚等曾经直接或间接触犯韩侂胄的人列为“伪学逆党”，设置党籍。当时列入党籍的，共59人，有的是道学家或崇尚道学的人，有的根本同道学无关，因为反对过韩侂胄，也被列入“伪学逆党”之中。这59人中，凡未被罢黜的都予以罢黜。与这些人有牵连的人也不许再任官职。在科学考试中，要写明本人“委不是伪学”，凡引用道学义理者，一概黜落。荐举官员时，也必须在奏牍前面申说“非伪学之人”。因为这一事件发生在宋宁宗庆元年间，历史上被称为“庆元党禁”。这个党禁一直延续到嘉泰二年（1202），因为韩侂胄担心自己失势时遭报复，才弛道学之禁。

在打击政治反对派的同时，韩侂胄把自己亲朋故旧和狐群狗党都一个个安插到朝廷的重要部门担任要职。京镗因为同他勾结，出谋划策把赵汝愚罢官，升任为宰相。陈自强因为是他的启蒙教师，尽管昏老庸缪，也很快当了宰相。苏师旦本是韩侂胄在地方当官时的刀笔吏，因为狡黠善辩，成了韩侂胄的亲信，没有几年就升任知阁门事兼枢密都承旨这一韩侂胄曾经赖以窃弄权柄的要职。

在韩侂胄专权期间，政府、枢密、台谏、侍从等重要官员，皆出自韩侂胄之门。而他的那帮亲故得势后，也利用权势贪赃受贿。陈自强公开纳赂卖官，各地官员寄给他的书信，信缄上都必须注明某物若干并献，凡无“并”字的书信都不拆开看。他还纵容子弟接受贿赂。想要升官，必须先讲定价钱。苏师旦因掌握任命武将的大权，更是招权纳贿，其门如市，自三衙以至沿江诸帅，皆立定价，多者至数十万缗，少者亦不下十万。其他担任宰执、台谏的官员，也都龌龊不堪。南宋史学家李心传说：“自侂胄用事，贿赂盛

行，四方馈遗，公至宰执、台谏之门，人亦不以为讶”，“一为台谏者皆致富”。这是当时满朝官员贪赃成风情况的概述。

开禧元年（1205），韩侂胄就任平章军国事兼国用使，集军、政、财大权于一身，立班宰相之上，三省的印章都交到他的府中，甚至假作宋宁宗的御笔升黜将帅也没有人敢过问。韩侂胄的权势至此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宋史·韩侂胄传》说当时韩侂胄“威行宫省，权震宇内”，确实并不夸张。

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韩侂胄因北伐失败，被史弥远、杨皇后秘密策划谋杀，韩侂胄的专权才告结束。但是，南宋却又开始了史弥远更加长时期的专权。

史弥远是宋孝宗时的宰相史浩之子。他在策划诛杀韩侂胄后，地位迅速上升，嘉定元年（1208）就升任宰相兼枢密使。在宋宁宗统治后期的17年中，除因料理其母丧事短期离职外，一直位兼宰相、枢密使双重要职。他同杨皇后相表里，终宁宗之世一直操纵着朝政大权。韩侂胄专政时期朝政方面的种种腐败现象，在这时期都继续发展。有个叫陈宓的官员在嘉定七年（1214）上书，说当时“宫中宴饮或至无节，非时赐予，为数浩穰”，“所用大臣非亲即故，执政择易制之人，台谏用慎默之士，都司枢掾，无非亲暱，贪吏靡不得志，廉士动招怨尤”。官员为得美差，都竭力钻营史弥远的门路。

当时宋宁宗无子，便从绍兴府民间找来宋太祖的后裔赵竑养在宫中，立赵竑为皇子。史弥远为了监视赵竑，利用赵竑喜好鼓琴，买了个善鼓琴的美女安插到赵竑的身边。赵竑对杨皇后、史弥远专权的情况不满，曾说一旦得志，就要把史弥远流放到海南岛治罪。这个密探把这种情况向史弥远报告。史弥远遂决定废掉赵竑。

嘉定十七年（1224），宋宁宗病死，史弥远与杨皇后策划废掉赵竑，另立一个宗室赵昀为皇帝。不久又借故逼赵竑自缢。赵昀就是宋理宗。

宋理宗因为是史弥远所立，对他既感激又畏惧，又让史弥远独

相9年，一切听任史弥远摆布，对一切揭露史弥远奸恶的奏疏都不予理睬，所有反对史弥远的人也都遭到史弥远排斥打击。史弥远在这9年中也更加专横跋扈。宋理宗不过是他手中的一个傀儡。

绍定六年（1233），史弥远病死，宋理宗才亲自执掌朝政，并改元端平。这时的南宋，经过韩侂胄、史弥远连续长达40年的专政，已经腐败不堪。当时吴潜曾把这时的政局，比做一件用稀浆烂纸粘缀的破坏之器放在桌子上，只要用手一碰，就会落地破碎。宋理宗亲政后，把推崇朱熹的道学，起用名儒，视为扭转乾坤的根本，于是南宋出现了一个道学猖獗的时期。

朱熹的道学自“庆元党禁”解除后，影响更加广大。经过宋理宗亲自提倡，声势更加煊赫。许多道学先生借道学之名欺名盗世。他们沆瀣一气，相互标榜，攻击不同他们一类的人。凡治财赋则被目为聚敛；凡有守卫边疆的武功，则被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被攻击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的官员被视为俗吏。他们所读的书，只是朱熹编注的《四书》及语录之类。他们标榜自己的学问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为生民立极，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为前圣继绝学”。凡当监司的人，必须建立书院、立儒家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语录，才被称为“贤者”。这样的人可以沽名钓誉，飞黄腾达。在科举考试中，凡引用道学义理作文的，都可以擢巍科，成为“名士”。只要有人对某个道学先生有所非议，他们就群起而攻之，指斥为“小人”。道学家的气焰，到了令人可畏的程度。这帮道学先生被引荐入朝，占据一切清班要路，甚至担任执政大臣，对改善南宋的腐朽局面不仅没有起任何好的作用，反而把南宋政局搅得更加乌烟瘴气。

到宋理宗统治后期，南宋又出现外戚贾似道独揽大权的局面。贾似道担心有真才实学的人影响他的权势，就专用那帮只会语录，无任何真才实学的道学先生，并把道学尊崇到新的高度。南宋出现了专政的权臣同腐朽的道学相结合的形势，弄得万事不理，于是也就接近灭亡了。

三、“弱者肉，强者食”

——南宋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

在南宋的腐朽统治下，北宋时已相当严重的土地兼并之祸，也愈演愈烈。

南宋初年，因为连年战乱，许多农民或死于兵火，或弃家逃亡，在两淮及江南许多地区，出现了许多无主土地。这些无主土地都被作为“逃绝户”田没收为“官田”。许多参加农民起义的农民，在起义被镇压下去后，他们的土地也被作为“贼徒田舍”没收充当“官田”。当时由官府组织围垦的圩田也划入“官田”的范围。仅江南西路的吉州（今江西吉安），这样的官田就达3 650余顷。在两淮地区，“官田”的数量就更多了。

南宋朝廷把这些“官田”的一部分作为“赐田”，赏给那些官僚权贵，每次赏赐的田地都在数十顷以上。建康的永丰圩，四至相距皆五六十里，有田950余顷。这个有名的大圩田，最初赐给大将韩世忠，后来又转赐给专权擅国的汉奸秦桧。南宋政府为了填补财政亏空，多次下令把“官田”投标出卖。当时的投标，名义上说是让人户把“投状”封严，到期限日拆封，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实际上这些出卖的官田都被豪强依倚势力用贱价买去，一般农户是无法问津的。

南宋王朝对数额巨大的“官田”的种种处置，无一不是对当时已经十分激烈的土地兼并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随宋室南渡而迁移到南方的大批文官武将，为了重建他们在北方丧失的家园，对土地的兼并特别疯狂。

许多兵权在握的武将，都竭力利用权势掠夺土地。被称为“四大将”之一的刘光世，驻守淮东时总是一闻金兵打到就仓皇逃跑，平时却派遣许多“干当使臣”，到处相视肥沃的土地，替他霸

占土地。绍兴五年（1135），当他调驻淮西时，竟然公开要求朝廷允许他用所兼并的淮东田土在淮西对换。另一个大将张俊，更是以“喜殖产”而著名。他在南宋初的十几年间，所掠夺的田产，每年所收的租米多达60万斛，占据土地当达数十万亩。韩世忠所占田产，每年也可以收租数万石。岳飞在南宋初的大将中，算是个最不以殖私产为意的人，可是他在江州（江西九江）仅仅驻扎了不长的时间，在那里就有水田7顷多，陆地12顷，可见占地也不很少。

那些权臣贵戚掠夺土地的狂热，也不比握兵的武将逊色。秦桧不仅在建康府（今南京）霸占许多田业，在平江府（今苏州）、秀州（今浙江嘉兴）等地也都有他的庄产。秦桧的亲党王历，在江西当官时凭借秦桧的权势，“凌夺百姓田宅，甚于寇盗”。作为宋高宗的御医而得到特别宠信的王继先，田庄“别业”遍布杭州周围各县。韩侂胄专权时，他的一个田庄称为“万亩庄”。宋宁宗密令诛杀韩侂胄后，为管理没收来的韩侂胄及其党羽苏师旦的田产，南宋专门设置一个“安边所”，用这些田产的田租来弥补因开禧北伐失败而亏空的国库。据刘克庄说，“安边所”的官田每年可收30万斛，韩侂胄及苏师旦的田产之多可以想见。其他地方官员也在各地大肆兼并土地。南宋初年，通州（今江苏南通）通判方云翼强市民田30余顷，又强迫曾因战火逃亡、后来归业的农民为他耕种，因被弹劾，所得民户田产被没收。像方云冀这样强夺民田的事例，在南宋见诸记载的还有多起。没有败露，不见文献记载的当然就更多了。

在文官武将大肆兼并土地的同时，各地的土豪地主，也继续贪婪地兼并贫民的土地。淮东有个土豪张拐腿，每年租谷收入达70万斛，占地之广可以想见。在南宋的文献中，势家豪强强夺贫民土地的记载俯拾皆是。许多土豪地主都同贪官污吏勾结侵占民田。1980年，在四川广元发现南宋中期一个豪强地主的墓葬，出土文物中有用黄沙石制作的买地券两方，反映了豪强地主不仅生前兼并土地，还想在死后继续在阴间兼并土地的贪婪欲望。

南宋商业活动的发展所造成的大批富商大贾，也以巨额商业利润参加土地兼并活动。新安吴十郎在舒州（安徽安庆）卖油致富，就用巨万资财广置田土。有个叫张䌹的商人，数次航海到交阯（今越南北方）、渤泥（今文莱）诸国，获得大量资产，就不再经商，而在婺州（今浙江金华）城外购置田产，从富商变成了大地主。

寺院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兼并势力。南宋时，为弥补财政亏空，政府一再出卖剃度僧道的“度牒”。这就使得南宋寺院的势力大增，许多寺院都占有数十顷的土地。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台州（今浙江临安）的寺观共占水田135 000余亩，占全境水田总面积的5%。寺观所占山林达131 000多亩，更占全境山林的10%。从台州寺观占有水田、山林的比例，可以看出当时寺观兼并土地也是很猖狂的。

皇室、贵族、官僚、地主、富商、寺观这六种兼并势力，像虎狼一样鲸吞掉许多农民的土地。在南宋初的绍兴二十六年（1156），有个叫汤鹏举的官员就说：“富贵之家，连阡跨陌，兼并贫民之产”。在南宋中后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南宋中期的陆九渊说，他家乡（江西抚州）的农民，“非佃客庄，则佃官庄。其为下户自有田者亦无几”。多数农民的土地都已为兼并势力所鲸吞。

官僚、势家地主兼并土地，把大多数土地集中到他们手中，却凭借权势隐漏土地应交的二税，这使得南宋王朝的税源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以平江府（苏州）为例，原来的两税每年达70万斛以上，因为豪强隐漏赋税，绍兴十二年（1142），二税的实际收入仅仅20万斛。福建路的漳（今漳州）、泉（今泉州）、汀（今长汀）三州，也因为豪民漏税，使政府的常赋十分失去五六分。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南宋政府同地方兼并势力发生尖锐的矛盾。因此，从绍兴十二年起，就不断有人建议实行所谓“经界法”，即对土地进行重新丈量，确认土地的所有者及其应负担的田赋，使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以保证政府的二税收入。这种“经界法”虽

然曾在一些地方推行过，但是，由于豪强势力的极力抵制，各级官吏也从中舞弊，“经界法”一直没能认真推行。

四、“剥肤摧体”，“膏血无余”
——南宋繁苛的赋敛榨取

在土地兼并恶性发展的同时，南宋王朝繁苛的赋敛榨取，也像虎狼一样吞噬着农民的膏血。

南宋王朝是北宋王朝的延续，北宋各种赋税制度，南宋基本上都继承了下来。南宋初年，有的地方因为经过兵火洗劫，原来作为征收赋税依据的“版籍”残缺，宋高宗还特地要求凡经兵火的州县，所有“丁产钱谷簿书”都要按北宋已行办法重行置造。北宋的各种变相榨取手段，南宋也都继承下来。

同北宋的赋敛比较起来，南宋的榨取更加残酷，名目也更加繁多。

以每年夏秋两税而言，农民秋季交纳苗米时，每交一石，各种名目的加耗竟达七八斗乃至一石以上。官吏还要私设大斗，数外另取。此外还有代替“支移”的所谓水脚线、脚剩线、租船运输等负担。每到交纳的时候，官府还往往不收本色，要反复“折变”，普遍的情况是以粳米折变糯米，又以糯米折成现钱，连加耗之数也跟着折变。在折变时，明明是丰年米贱，却把米定了高价，要农民贱价卖掉所生产之米，按高价向官府折纳现钱。如福建路每斛米价是钱 3 000，农民纳苗米时，却要按每斛钱 8 000 交纳。经此折变，农民负担一下子就增加三倍。湖南岳州（今湖南岳阳）的税米经过反复纽折，有的竟增加到数十倍。

两税中的夏税，按规定要纳绢帛，称为税绢。在宋金战争期间，官府以军需为由提前催逼，迫使民户不得不去买绢输纳，绢价因此暴涨至每匹八千至十千。后来，南宋政府以照顾贫民下户为

名，规定每匹税绢按六贯或七贯折钱输纳。但在绍兴和议以后，随着军需的减少和社会生产的发展，绢价下跌，官府所规定的夏税折帛钱却不相应下降。有时官府让民户交纳绢帛，官吏却又百般挑剔，常常以不合规格盖章印退为名，故意用油墨把干净的绢帛染污，或借故把民户交来的绢帛没收入官，甚至吞为己有。这样，无论是折钱输纳还是交缴实物，民户的负担都要大大增加。

南宋初年，有个叫林勋的官员上书说："宋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这仅仅是官府的税入而言。农民的实际负担，比唐代显然远远超过七倍。

两税之外，对北宋时期在各种名目下征收的苛捐杂税，南宋都继续征收。例如，潭州（湖南长沙）在北宋时要征收"黄河筑埽铁揽钱"，南宋时黄河早已丢给金朝，潭州却还要继续征收这项苛税。宋神宗熙宁变法时让民户纳钱代替差役的役钱以及让城郭行户交纳的免行钱，南宋时不仅作为一种赋敛名目继续征收，而且变本加厉。免役钱在原额之外重增三分。免行钱不仅兼收于城郭的贫民下户，连乡村下店都要征收。北宋时一再宣布废除的身丁钱米，南宋时大部分地区不仅照旧征收，而且更加苛重。荆湖北路一丁要输税米七斗。广西一带把十二三岁未成丁的男孩也列入丁籍，超过60岁或已死亡的男子却不除丁籍，都要输所谓"挂丁钱"，甚至连幼儿也要纳丁钱。所以当时的民谣讽刺说："三岁孩儿便识丁，更从阴府役幽魂。"

除了利用北宋原有的名目变本加厉榨取外，南宋王朝还以对金朝战争的需要为名，创立许多新的榨取名目。其中最主要的，有"月桩钱"、"板帐钱"、"经总制钱"三项。

"月桩钱"又称"每月桩发大军钱"、"应付桩办大军月桩钱"、"认发大军月桩钱"，地方政府必须按月按定额解送中央政府，以应付军队支用。最初只是一种战时的临时税收名目，但绍兴和议后一直继续征收。

"板帐钱"也是一种说不清具体名目的苛税的总称。凡罚酒、

科醋、卖纸、税酱、下拳等钱，都属“板帐钱”征收的范围，查到盗贼的赃物不还失主之类，也都作为“板帐钱”。究竟包括哪些项目，宋宁宗时已经有人认为“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

“经总制钱”是“经制钱”和“总制钱”的合称。“经制钱”为北宋宣和年间东南发运使陈遘所创，北宋灭亡前夕宣布废止，南宋初又重新征收。“总制线”创于绍兴五年（1135）。这两个名目就统称为“经总制钱”。在南宋新创的三大赋敛名目中，“经总制钱”虽然“敛之于细，而积之甚众”，敛取的数额最为庞大。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经总制钱岁入达 1 725 万贯，占当时中央政府税入的四分之一以上。南宋中期的思想家叶适说：“若经总制不住，州县破坏，生民之困未有已也”。“经总制钱”是人民不堪忍受的负担。

南宋时的无名科敛，除“月桩钱”、“板帐钱”及“经总制钱”外，还有各种临时摊派。南宋军队制作兵器所需的牛皮、牛筋、箭杆、翎毛，以及修城用的木头、麻皮等物资，官府都直接向民间强行科派。这种科派既无定时，也无定额，官吏又从中上下其手，肆行搜刮以饱私囊。

在整个南宋时期，社会经济虽然有较大发展，但政府的赋敛也大幅度增加。繁苛的赋敛既加剧了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也影响到当时的阶级斗争。南宋初年的洪挺就说，官府的各种苛税和“不时之需，无名之敛，殆无虚日”，老百姓“所以去而为盗”。繁苛的赋敛榨取，是南宋许多农民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

五、钟相、杨么起义

——南宋初年的农民反抗斗争

在南宋的腐朽统治下，广大农民始终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因此，阶级斗争从一开始就十分剧烈。在南宋初年，湖南、江西、福

建等南方广大地区，就燃烧起熊熊的农民起义烈火。

南宋初年江南广大地区的农民起义，是南宋统治者推行对金投降的政策及对广大人民残酷压榨激发起来的，是民族矛盾同阶级矛盾交织的情况下爆发的。

南宋小朝廷一建立，就借口抗金的需要，巧立各种名目搜刮民脂民膏，却不肯认真组织抗金，致使金兵得以在建炎三年（1129）秋渡江长驱侵入江南，蹂践了两浙及江西、湖南大片地区。南宋官军一闻金兵来到就望风而逃，对老百姓的劫掠却如狼似虎。那些大小官吏也趁火打劫，大发横财。在湖南、江西，更有孔彦舟、马友等大股土匪武装到处流窜劫掠，南宋的地方官则与这些土匪互相勾结，残害人民，兼并土地。有个叫韩璜的官员描绘当时湖南、江西的情景说，那里"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询其所以，皆缘金人未到，而溃败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袭逐之师继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遍。盗贼既去，疮痍未苏，官吏……更加刻剥。兵将所过纵暴，而唯事诛求"。金兵洗劫之后，南宋官兵、官吏、土匪又轮番搜劫，使得江南广大地区内人民呻吟的"嗷嗷之声，比比皆是，民心散畔，不绝如丝"。

广大人民为了生存下去，不能不奋起斗争。建炎四年（1130），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就在江南大部分地区爆发。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篇章的钟相、杨么起义，也在这时爆发于遭受压迫最甚的湖南洞庭湖地区。

钟相起义经过长期的酝酿准备。还在北宋末年，钟相就在其家乡湖南鼎州（今常德）武陵县利用宗教活动组织群众。他针对当时土地兼并激烈，贫富悬殊，阶级对立严重的情况，继承并发展了王小波、李顺起义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口号，深受周围劳苦大众的拥护，周围数百里间的贫苦农民都自己带上干粮，络绎不绝地去拜见钟相，称为"拜爷"。经过20多年的宣传鼓动，钟相积累了发动起义所必须的资金，聚集在他周围的贫苦农民也越来越多。

靖康二年（1127），钟相的长子钟昂趁北宋王朝在灭亡前夕号召组织“勤王民兵”之机，着手组织了一支300人的武装，北上抗金。这支武装在邓州（今河南邓县）被宋高宗发遣回乡后，钟相父子看到南宋政权的腐败，就把它保存起来，并多置旗帜器甲，积极准备发动起义。

建炎四年（1130）春，金兵攻入潭州（今湖南长沙），宋兵弃城逃走，使潭州城人民遭到金兵残酷的屠戮。腐朽的南宋政府对人民的赋役盘剥这时也空前繁重。这时孔彦舟的土匪武装更趁机洗劫澧州（湖南澧县），并向鼎州方面一路杀掠过来，鼎州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威胁，而那些平时压迫人民的官吏却带着家眷及掠夺来的财物先期逃走。钟相遂于这时打出保卫乡土、抗拒匪兵劫掠的旗帜，发动武装起义。

钟相的义旗一揭，立即得到鼎、澧等数州农民的热烈响应。起义军一开始就把斗争矛头指向那些平时欺压人民的官僚豪绅，截获了先期逃走的鼎州单姓提点刑狱官的“辎重”及其白马，到处焚烧官府、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专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等五种人，公开宣布宋朝的“国典”是“邪法”，把杀死上述五种人称为“行法”，把矛头直指南宋王朝的腐朽统治。而对那些“执耒之夫”（即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则加以保护。

钟相在发动起义后，宣布建立政权，以“楚”为国号，“天载”为年号，并宣布凡是参加起义及拥护起义的人，都不负担赋税和科派，不再受官府法令的统治，彻底解除南宋王朝加在农民头上的沉重枷锁，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许多贫苦农民都把参加起义视为“天理当然”。起义军的声势也迅速扩大，鼎州的武陵、桃源、龙阳、沅江，澧州的澧阳、安乡、石门、慈利，江陵府（今湖北江陵）的枝江、松滋、公安、石首，潭州的益阳、宁乡、湘阴、安化，峡州的宜都（今湖北宜都），岳州（湖南岳阳）的华阳，辰州的沅陵等19县，很快都为起义军所控制。

为了扑灭农民起义军，鼎州城里的官绅豪富竟请求孔彦舟的匪

兵开进鼎州，在鼎州大肆烧杀。孔彦舟匪军多次向起义军进攻，都遭失败。后来，孔彦舟使用狡诈的手段，一面向起义军散布说什么“爷若休时我也休，依旧乘舟向东流”，装出要向东撤退的样子，一面派爪牙假装成拥护起义的农民，混进起义军。然后趁钟相一时因胜利而产生的麻痹，里应外合，偷袭钟相的大寨。钟相父子被这帮匪徒俘获杀害，孔彦舟因此受到南宋政府的嘉奖。

钟相牺牲后，起义军在杨么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他们在洞庭湖周围建立了许多坚固的水寨，制造了许多战船，实行“陆耕水战”，一面坚持生产自给，一面同南宋的官兵、匪兵作战。洞庭湖周围地区的大批农民，因不堪忍受南宋政府的诛剥豪夺及残酷杀掠，更加踊跃地加入起义军行列。更有许多村落的穷苦百姓，暗中准备起义军穿用的“绯衣巾”，准备响应起义军。起义军的势力也在斗争中进一步壮大，仅一年多时间，就控制了东抵岳阳、西达枝江、南至长沙、北达公安的大片地区。

起义军还多次粉碎南宋政府的军事围剿和诱降“招安”阴谋，成了南宋统治者的心腹大患。

为了扑灭湖湘地区农民起义的烈火，绍兴五年（1135）夏，南宋又把当时宋军中最有战斗力的岳家军调到湖南，全力镇压杨么起义。岳飞到洞庭地区后，一面加紧对起义军的封锁包围，施加军事压力，毁坏起义军播种的庄稼，使起义军“陆耕水战”的办法无法继续实行，粮食发生恐慌，从而使起义军中一部分不坚定分子对继续坚持斗争产生动摇；一面派人到起义军中进行个别的诱降活动，收买叛徒。由于起义军中握有实力的杨钦等人在岳飞的诱降下叛变，并反过来帮助岳飞进攻其他坚持斗争的营寨，起义军的许多营寨被攻破。杨么的大寨也于绍兴五年六月被岳飞攻破。杨么被俘后英勇牺牲。坚持了7年之久的钟相、杨么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

在镇压了钟相、杨么起义以后，南宋政府又对江西、福建等地区尚在坚持斗争的各小股农民起义武装进行反复清剿。曾经如波涛汹涌的南宋初年江南各地的农民起义，暂时转入低潮。

第十章　蒙古南侵及南宋灭亡

一、联蒙灭金，“端平入洛”

——宋、蒙战争的序幕

在宋、金南北对峙，南宋的统治日益腐朽，南宋政局江河日下的时候，我国北方蒙古高原上的蒙古族，却迅速强大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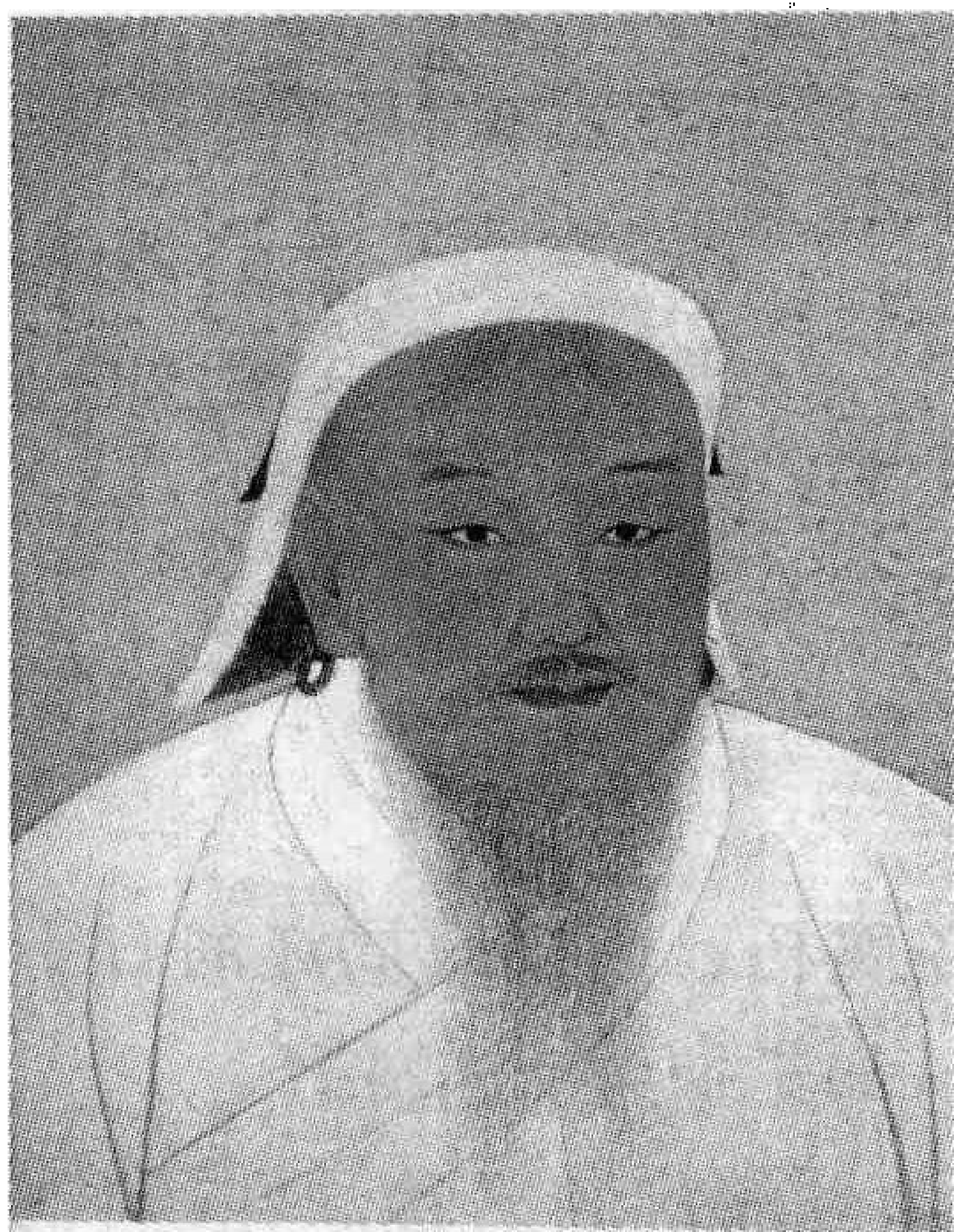
蒙古本是大漠南北许多游牧部落中一个部落的名称。在唐代，它称为蒙兀室韦，是室韦部落联盟的组成部分，居住在望建河（今额尔古涅河）流域。后来逐渐向西迁移，游牧于斡难（鄂嫩）、客鲁涟（克鲁伦）、土兀剌（土拉）这三条河流的源头。在它的周围，还有许多其他的部落。其中比较大的，有位于蒙古部以西的克烈部，位于克烈部之北的篾儿乞部，位于克烈部和篾儿乞部之西的乃蛮部，位于蒙古部之东的塔塔儿部，以及在大漠以南的汪古部，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部落互不相统属。因为塔塔儿部是其中最强大的部落，塔塔儿的谐音“鞑靼”，就长期成了蒙古高原各部落的共同称呼。

到12世纪末，蒙古部涌现了一个杰出的领袖铁木真。他利用各部落之间的矛盾和纷争，采用联合一些部落打击另一部落的策略，逐步消灭同自己抗衡的部落，发展自己的势力，把其他部落的百姓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草原各部落都统一在蒙古部之中，从此，“蒙古”取代“鞑靼”，成了大漠南北各草原部落的共同称呼。

公元1206年（宋宁宗开禧二年，金章宗泰和六年），铁木真

被他手下的军事贵族拥戴为蒙古的大汗，称“成吉思汗”[①]，正式建立了蒙古奴隶制政权。

在铁木真登上政治舞台以前，大漠南北的各部落大都受金朝管辖。金朝为了防止这些部落的反抗，一面用官爵赏赐拉拢一些部落的首领为金朝效劳，一面在各部落间挑拨离间，挑动各部落互相残杀。金朝还对这些部落实行残酷的“减丁”政策，经常派大军去残杀那些敢于反抗的部落的男子。这种反动政策使得蒙古高原地区在12世纪下半期陷入极度混乱，人民不得安生。铁木真统一各个部落，建立蒙古统一的政权，使蒙古族摆脱金朝的统治和压迫，走上民族发展的新阶段，是有积极意义的。



成吉思汗

但是，由于新兴的蒙古政权是个奴隶制政权，铁木真在统一蒙古各部的过程中，就大肆掠夺财富和奴隶。随着蒙古政权的建立和蒙古军事贵族势力的发展，同蒙古毗邻的金朝、西夏、西辽等地区，也很快成了蒙古奴隶主贵族侵扰和掠夺的对象。

从公元1211年（宋宁宗嘉定四年，金完颜永济大安三年）起，成吉思汗就借口其伯父俺巴孩罕曾被塔塔儿部缚送给金朝杀掉，打出为俺巴孩罕复仇的旗号，大举进攻金朝。这时金朝也已腐败不堪，经野狐岭（今河北张家口之北）一战，金朝40万大军一败涂地，从此，金朝不敢再与蒙古兵争锋。到公元1213年（宋宁宗嘉定六年，金崇庆二年），整个黄河以北地区除都城燕京等几个大城市外，都被蒙古军所占领。金朝只好用大量金帛、马匹和童男女献给蒙古求和，换取蒙古军队撤退。在蒙兵撤退后，金朝统治者

① “成吉思”的意思，有的说是“海洋”，有的说是“天赐”。

感到中都燕京已处在蒙古军队随时南侵的威胁之下，就于公元1214年（金宣宗贞祐二年，宋宁宗嘉定七年）把都城从中都迁到汴京（今河南开封）。第二年，金朝的辽东、河东、河北及山东的大片地区都丧失了。金朝的辖境只剩下陕西、河南及山东部分地区，只能凭黄河之险苟延残喘了。

当金朝迁都汴京的消息传到南宋后，南宋于同一年停止向金朝交纳岁币。这使得疆土大大缩小、财政困窘不堪的金朝更加陷入困境。而金朝统治又历来视南宋如草芥，认为丧失给蒙古兵的疆土可以通过对南宋进攻、夺取南宋的疆域来补偿，就于嘉定十年（1217）分路大举南侵。东路渡过淮河，进攻南宋的光州（河南潢川）中渡镇，中路进攻樊城（今湖北襄樊）、枣阳（湖北枣阳）、光化军（湖北光化）等州郡。西路进攻大散关，企图夺取南宋的西和（今甘肃西和）、成（甘肃成县）、阶（甘肃武都）等州。六月，宋宁宗也发布讨伐金朝的诏令。嘉定和议至此完全破裂，宋、金又处于交战状态。

宋、金这次战争延续了六年之久。金朝利用蒙古军队主力在成吉思汗率领下西征，暂时放松对金朝进攻的时机，连年对南宋发动进攻。在淮河一线，金兵多次渡淮入侵襄阳、枣阳、光山、随州（湖北随县）及淮东的安丰军（安徽寿县）、滁（安徽滁县）、濠（安徽凤阳东北）、光（河南潢川）、黄（湖北黄岗）、盱眙（江苏盱眙）及淮东许多州县，但先后遭到宋将赵方、孟宗政等人率军迎头痛击，每次进攻都以惨败撤回淮北告终。在川陕一线，因为一些南宋守将望风而逃，金军曾占领天水军（今甘肃天水）、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大安军（陕西略阳南）、洋州（陕西洋县）及大散关等地，但最后也都被宋军击退。金朝统治者本想通过对宋战争夺回在蒙古军入侵战争中的损失，结果却损兵折将，财政更加匮乏。在金、宋战争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蒙古军队又加紧向陕西地区进攻，这就使得金朝处于两面受敌的困境。这时金朝统治集团内部又自相残杀，力量更加削弱。金宣宗就在这种困境下于公元

1223年（金元光二年，宋宁宗嘉定十六年）底病死。新即位的金哀宗为了集中兵力抗蒙图存，遂于公元1224年（宋宁宗嘉定十七年，金哀宗正大元年）派人同南宋“通好”，并下令金兵不再进犯南宋。南宋这时正是史弥远专权，统治也极腐败，几次出击皆无功而返。宋、金双方从嘉定十七年起又暂时处于休战状态。宋宁宗也在这一年死了。

在这以后，蒙古成吉思汗西征结束，回师南向准备灭掉夏、金。成吉思汗虽然在公元1227年灭西夏后就死了，没有实现灭金的计划，但蒙古军队对金朝的进攻却更加紧了。窝阔台于公元1229年被推选为大汗后，蒙古又重新确定了由窝阔台亲自率大军灭金的方针，并陆续出兵攻占了金朝控制的关中及山西部分地区。

公元1231年（宋理宗绍定四年，金哀宗正大八年）蒙古军在窝阔台亲自指挥下，分三路攻入河南，在钧州（河南禹县）三峰山围歼金兵主力，于公元1232年（宋理宗绍定五年，金哀宗天兴元年）包围金朝的都城汴京。金哀宗先逃到归德（河南商丘），后又逃到蔡州（河南汝南）。金朝守卫汴京的西面元帅崔立杀掉其他许多大臣，于公元1233年四月献汴京向蒙古军队投降。

蒙军在包围汴京后，即派使臣来同南宋商议夹攻金朝的事宜。这时南宋以宋理宗为首的腐朽统治集团中，大多数大臣都认为这是复仇的大好时机，只有赵方之子赵范提出应吸取北宋联金灭辽、自取其祸的教训，但这种意见没有被采纳。南宋答应出兵配合蒙古军作战，共同灭金，并出师攻占金朝边境的唐（河南唐河）、邓（河南邓县）、寿（安徽凤台）等州郡。

金哀宗逃到蔡州后，蒙军统帅又派人到南宋，约宋兵合攻蔡州。南宋遂在息州（今河南息县）以南集结军队，准备出兵。金哀宗派人到南宋求粮，同时向南宋叙说“唇亡齿寒”、蒙古灭金后必祸及南宋的道理，要求同南宋连和。南宋也不予理睬。

公元1133年九月，蒙军进攻蔡州，被金兵击退，就在蔡州周围建筑长垒，围困蔡州。南宋即于十月派大将孟珙、江海率师2

万，运米30万石，前去支援蒙古军。蔡州被蒙、宋联军围困数月，城中粮草断绝，于1234年（宋端平元年）正月被孟珙所率宋兵攻破，蒙、宋联军随后拥入蔡州，金哀宗上吊自杀，金朝灭亡。

南宋联蒙攻取蔡州、消灭金朝后，原金朝统治的河南分成两个部分。陈（河南淮阳）、蔡（河南汝南）西北州郡归蒙古占领，以南地区归南宋占领。蒙军主力撤回北方，南宋军队也撤回襄阳、信阳等地驻扎。

这时南宋内部原先反对联蒙灭金的赵范及其弟赵葵，大概是因为在灭金过程中无功而感到悔恨，忽然提出了乘蒙古兵主力撤退之机出兵收复三京（指北宋的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应天府），据守黄河及潼关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宰相郑清之的大力支持。宋理宗这时刚亲政不久（因史弥远已死去），正想有一番作为，立即采纳这个建议。当时尽管许多大臣都认为这是个冒险举动，必然引起蒙军南下，南宋即使一时侥幸得手，也难以守住，反对这一举动。但宋理宗却一意孤行，于端平元年（1234）六月下令全子才自庐州（安徽合肥）率军万人直取汴京，赵葵自滁州（安徽滁县）率兵五万取泗州，由泗州赴汴同全子才会师。这时汴京的金降将李伯渊等人，因对献城降金的崔立不满，先同全子才联络，杀死崔立，接应宋兵，全子才得以顺利占领汴京。赵葵随后到达汴京时，不顾粮草未集，极力催促全子才进兵洛阳，占据潼关。全子才只好下令分兵向洛阳进发。因为蒙古在洛阳全无守备，南宋先头部队200人在七月间就占领洛阳。这就是宋代历史上的所谓“端平入洛”。

蒙古得悉南宋军队占领汴京及洛阳，立即出兵南下。由于南宋所谓“端平入洛”完全是一种军事投机，事先并无认真准备，军队出发后粮饷不继，当宋兵进入洛阳时，粮草已经空竭，只好采摘野菜和面做饼充饥。后续部队在赴洛阳途中，遇到南下的蒙古军，只得仓猝应战，结果惨败，许多宋兵被驱入洛水淹死。溃卒逃到洛阳，报告蒙军已占据洛水北岸。仓忙入洛的南宋军队一听这消息，都垂头丧气。八月间，蒙古兵逼近洛阳，宋军因无粮可食，杀战马

充饥，同蒙古军稍微接战，知道难以支持，就仓惶撤出洛阳向南奔逃。全子才与赵葵在汴京，也因为所夺取的州县早已被蒙古兵洗劫一空，无粮可吃；蒙古兵又决黄河堤，放水淹灌宋军，许多宋兵被水淹死，也赶快向南撤退。“端平入洛”遂以全军迅速溃败后撤告终。

“端平入洛”给蒙古贵族提供了一个向南宋开战的口实。这一年十二月，蒙古派人到南宋，指责南宋破坏双方的盟约，实际上是对南宋宣战。端平二年（1235）六月，蒙古大汗窝阔台发布分道进兵、大举入侵南宋的命令。延续40年之久的蒙古侵宋的战争，就这样揭开了序幕。

二、襄、淮、蜀残破，钓鱼山献捷

——蒙古对南宋的两次大规模攻势

端平二年（1235）五月，南宋在唐州（今河南唐河）的守将发生矛盾，守臣杨侁向驻守襄阳的荆湖制置大使赵范告发本州统制军马郭胜想叛变。六月，赵范檄召郭胜，准备置狱处置。事情为郭胜所知，郭胜就在唐州杀掉杨侁，发动叛乱，并秘密派人去向蒙古军求援。蒙古贵族见有机可乘，遂于七月初进兵唐州，开始了对襄汉地区的大规模入侵。十月，另一路蒙古兵在窝阔台次子阔端率领下大举进攻四川。端平三年（1236），蒙古军队又在两淮开辟新的战场。宋、蒙战争就在南宋北面边境的各个战线上全面展开了。

在襄汉一线，蒙古军以窝阔台三子曲出为统帅，先攻陷枣阳，继又在襄阳、邓州（河南邓县）、郢州（湖北钟祥）大肆掳掠，随后撤了回去。然而，在曲出撤退后，南宋襄阳主帅赵范却整天同一些将领饮宴取乐，不修军政，宋将之间互相争斗，在南宋“端平入洛”时降宋的原金朝将官李伯渊等人率部分军队放火焚烧襄阳的城郭和仓库，劫夺大批官、民、物资及军械，叛降蒙古。另一部

分宋军也乘机大肆抢掠。襄阳这个南宋经营了130年的军事重镇，至此变成一片灰烬，并沦于蒙古军之手。蒙军接着又先后攻陷了随州（湖北随县）、郢州（湖北钟祥）、荆门（湖北荆门）、枣阳军（湖北枣阳）、德安府（湖北安陆）等州郡，并向江陵府进攻。南宋名将孟珙奉令救援江陵，击败了来犯之敌，襄汉一线的战局才开始出现转机。嘉熙二年（1238）十月，南宋委任孟珙为京湖制置使，让他收复京西及襄汉失地。孟珙调兵遣将，先收复郢州及荆门，又于嘉熙三年（1239）三月遣兵出击。三战三捷，收复了信阳、光化军（湖北光化）、樊城、襄阳等州郡。宋、蒙在襄汉一线出现相持的局面。

在川蜀地区，阔端所率蒙军自凤州（陕西凤县东北）越过白水关，攻占沔州（陕西略阳）。又进攻大安军（陕西宁强大安镇），在这里被宋将曹友闻率兵击败。蒙军暂时退却。曹友闻进据仙人关（在甘肃徽县境）。端平三年（1236）九月，蒙古调集蒙古兵及金朝降蒙的汉军50余万，再次大举向四川进攻。蒙古军队一举突破武休关（在陕西留坝南武关河附近），进占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并由兴元府向大安军进攻。南宋的四川制置使赵彦呐强令曹友闻从仙人关撤回大安，以保蜀口，结果曹友闻在大安军阳平关全军覆没，蒙古军乘胜长驱入蜀，在一个月内迅速攻陷成都、利州、潼川三路的绝大部分州郡。阔端在这三路州郡大肆掳掠后撤回陕西。南宋于嘉熙二年（1238）收复成都。然而，第二年（嘉熙三年，1239）八月，蒙军将领塔海又率大军入蜀，接连攻占成都及汉州（四川广汉）、邛州（四川邛崃）、简州（四川简阳）、眉州（四川眉山）、蓬州（四川仪陇东南）、遂宁府（四川遂宁）及重庆府（今四川重庆）等许多州郡。同年十二月，塔海再次率兵攻入川东，占领了夔州路的一些州郡。南宋京湖制置使孟珙派兵截击，收复夔州（四川奉节）。四川成了蒙古军队随意出入掳掠的地区。

在两淮一线，蒙军将领口温不花接连攻陷淮西的光州（河南潢川）、蕲州（湖北蕲春南）、舒州（安徽安庆），并进兵合肥及黄

州（湖北黄冈），在黄州为孟珙率师击退。口温不花转而进攻安丰军（安徽寿春），守将杜杲率将士奋勇抵抗。口温不花引兵退去。另一支蒙古军在察罕率领下进攻淮东的真州（江苏仪征），南宋知真州丘岳部署将兵，在十倍于己的强敌面前既奋力抵抗，又设伏于西城，用火炮轰击蒙古军，并派勇士袭击敌营，终于迫使察罕撤走。嘉熙二年（1238）九月，察罕再次率兵入侵淮东，围攻庐州（安徽合肥）。蒙军号称80万，准备攻破庐州后，在巢湖造舟，入侵江南。南宋守将杜杲率军奋勇抗击，蒙古兵败走，杜杲又乘胜追击数十里，并在淮河练水军，守卫淮河。察罕见难以取胜，便挥师进攻滁州（今安徽滁县）及招信军天长县（今安徽天长），又遭到知招信军余玠率军迎头痛击，只好撤回北方。两淮战线因口温不花和察罕所率蒙古军队被迫撤退，暂时转危为安。

蒙古窝阔台从端平二年起对南宋发动的大规模攻势，因为在襄、淮的许多地方都遭到南宋军队的顽强抗击，蒙军的主要兵力又放在第二次西征方面，还没有消灭南宋的计划。在掳掠财富的目的已经部分得到满足，南宋又派人求和的情况下，到嘉熙四年（1240），蒙古军队的攻势相对减弱。淳祐元年（1241）春，窝阔台患病，同年年底病死。蒙古同南宋的和议虽然没有谈成，但对南宋的这次大规模进攻却因此而停止。

从嘉熙四年（1240）起的十多年间，蒙古军队虽然继续不断南侵，但都只进攻局部地区，规模也比较小。蒙、宋双方互有胜负，战争处于相持状态。

淳祐三年（1243），南宋另派余玠为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

余玠是南宋末年一位有远见卓识而又有爱国激情的军事家。在端平初年蒙古军队即将大规模南侵时，他毅然从军，投到淮东制置使赵葵的麾下，决心报国自效。在蒙古兵进攻两淮时，他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接连立下战功，被提升为淮东制置副使。他调任四

川制置使时，宋理宗曾让他“为四蜀经久之谋，勿为一时支吾之计”，要求他在四川建立经久的防御设施。余玠也决心在四川的抗元战争中做出一番事业。他一到四川，就在重庆府治所的左侧筑招贤馆，提出“集众思，广众益”的口号，宣布士人有什么谋略进献，近者可直接到公府面谈，远者由所在州郡以礼护送到重庆。凡有献策的人，他都不厌其烦地以礼接待，只要所献之策有可用之处，就量才录用。即使所献之策不可用，也厚礼答谢。许多四川士人纷纷向他献策。

当时有冉琎、冉璞兄弟二人，都是文武双全的人才，听说余玠礼贤下士，特地前来拜谒。余玠用厚礼接待。冉氏兄弟数月没有献策，只是用白土在地上画山川、城池形势图，有时又突然外出不回。余玠并不干涉他们的行动，而是耐心等待。冉氏兄弟在经过周密考虑，并往实地进行认真考察后，向余玠提出了移合州城于钓鱼山，积粟以守的建议。余玠大为高兴，立即向朝廷报告，要求破格任命冉氏兄弟为合州守臣，委任冉氏兄弟全权负责徙城的事宜。这时南宋朝廷内部，刚好是余玠在淮东的知己上司赵葵执掌军政大权，对余玠的报告立即给予支持。冉氏兄弟遂在余玠的全力支持下，利用钓鱼山的险要地形，建筑了坚固的城垒。在屡经蒙古军铁骑践踏的潼川路及利州路，余玠也按冉氏兄弟的建议，下令凭借山区的险要地形，修筑城堡，把军、政机构移到新建的城垒之中，在这些城垒屯兵积粮，作长久守备的打算。这些新建的城垒都既有险可守，又有水源可用，彼此间棋布星分，连成一体，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淳祐十一年（1251），蒙古贵族内部结束了因窝阔台之死而发生的长期的汗位争夺，拥立蒙哥为大汗。这时蒙古贵族已经有了消灭南宋的打算，一面在襄、邓一带及蜀口的沔州（陕西略阳）、利州（四川广元）一带分兵屯田，列戍守卫，且耕且战，改变了以往以掳掠为主要目标，掠完即撤的战略，准备利用已攻占的州郡作

进一步入侵南宋的据点。另一方面，从宝祐元年（1253）起，蒙哥又命令其弟忽必烈率军远征云南的大理国，用不到二年的时间就控制了云南地区，完成了对南宋的侧翼包围。南宋面临着蒙古发动更大规模入侵的严峻形势。

南宋以宋理宗为首的统治集团这时却更加腐朽。宋理宗沉溺于声色之中，不顾山河残破，只顾大兴土木，耗费大量财赋建造寺观和园林。为了替他的宠妃阎氏建功德院，宋理宗竟派吏卒到各州县搜括木料，砍伐木材。财赋亏空，就滥发纸币，使得纸币不断贬值。在宝祐年间（1253—1258），他先后信任谢方叔、丁大全、马天骥及宦官董宋臣等人。这些人都竭力投宋理宗之所好。如谢方叔当权时，高斯得上疏要求停建新的寺庙，谢方叔竟把高斯得的职事罢免。宦官董宋臣因为善于逢迎，替宋理宗督建佑圣观，建了梅堂、芙蓉阁、香兰亭，又引倡优入宫，供宋理宗享乐，深得宋理宗宠信，霸占民田、招权纳贿，无所不至，被时人称为“董阎罗”。丁大全因为对阎妃及董宋臣阿谀奉承，迅速得到重用。在谢方叔同董宋臣发生矛盾，于宝祐三年（1255）被罢官后，丁大全又于宝祐四年（1256）用暴力手段把不同自己勾结的右丞相董槐强行驱逐出朝。宋理宗任命丁大全为佥书枢密院事，丁大全的党羽马天骥被任命为同佥书院事。当时因阎妃怙宠，丁大全、马天骥得到宋理宗特别信用，有人在朝门写了“阎、马、丁当，国势将亡”八个字，对宋理宗敲了南宋将亡的警钟，但宋理宗却不醒悟，于宝祐六年（1258），又升任丁大全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让他总揽军政大权。

就在丁大全、董宋臣互相勾结、独擅朝柄的时候，蒙古对南宋发起的第二次大规模攻势开始了。

宝祐五年（1257），蒙古开始从云南向南宋的广西进攻，南宋西南边境首次出现危急局势。

宝祐六年（1258）初，蒙古军队分三路向南宋大举进攻。蒙

哥亲率蒙军主力进攻四川，忽必烈率军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兀良合台由云南经广西攻湖南，再北上与忽必烈会师。蒙古的这次大规模攻势，显然是想先占据长江上流和中流，再顺江而下，消灭南宋。

进攻广西的蒙古军，因南宋分散设防，难以抵挡蒙古军集中兵力于一点的进攻，很快突破宋朝李曾伯布下的防线，经广西进入湖南，但在潭州（今湖南长沙）遭到宋将向士璧率军顽强抵抗，被牵制在潭州城下。

蒙哥率军入蜀后，南宋军队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经过一年时间，蒙古军队才占领了川西、川北地区及川东部分州郡。开庆元年（1259）二月，蒙古兵抵达合州。这时合州的守将名叫王坚。蒙哥派汉奸向王坚招降，王坚杀掉这个汉奸，坚决拒绝投降。于是，蒙哥亲率大军包围合州城所在的钓鱼山。自二月至七月，蒙哥一再督蒙古军队进攻，都被王坚率将士击退。最后，蒙军前锋将汪德臣被宋军发射的飞石击毙，蒙哥也中了飞矢，死于钓鱼山下。进攻四川的蒙古兵因大汗蒙哥战死，被迫撤退。钓鱼山历时半年的保卫战，获得大捷。

进攻鄂州的忽必烈军，本来负有直趋杭州的使命。当蒙哥的死讯传来时，忽必烈正在进军鄂州途中。他感到自己不能无功而返，就继续进军，于开庆元年（1259）九月渡过长江围攻鄂州。南宋急令负责长江一线防务的贾似道屯兵汉阳，以援鄂州。贾似道虽然握有重兵，但早被蒙古兵的气焰吓坏了，竟私自派人向忽必烈求和，表示愿向蒙古称臣纳币。忽必烈起初不予理会，后来听说蒙古诸宗王正在漠北准备拥立阿里不哥为大汗，想赶快回去争夺汗位，就同意贾似道的请求，同贾似道约定：宋、蒙划长江为界，南宋每年向蒙古奉献银 20 万两、绢 20 万匹。接着，忽必烈就派兵南下，接应兀良合台自潭州北上，会师北撤了。

蒙古对南宋发动的第二次大规模攻势，因在合州钓鱼山遭到严

重挫折，不得不全线撤退。腐朽的南宋王朝又度过了一次濒临亡国的危机，获得一次苟延残喘的机会。

三、“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

——贾似道专权及其倒行逆施

在蒙哥分兵三路大举入侵南宋时，权奸丁大全因隐匿军情不报，先被罢相，继又在流放途中死去。权阉董宋臣也被赶出宫廷。支持丁大全、董宋臣的阎妃也于景定元年（1260）病死。几个丑类擅权的时代结束了，南宋却又出现一个贾似道专权的更加腐朽黑暗的时期。

贾似道，字师宪，台州（今浙江临海人)。其父贾涉当过淮东制置使。他自小不务正业，浪荡不羁。因其姊被宋理宗选为贵妃，他才攀龙附凤，以“国舅”的身份跻身于政治舞台，并且很快就爬到两淮宣抚使的职位，成了南宋举足轻重的一个军事主帅。在蒙哥对南宋发动大规模入侵时，贾似道被任命为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使，兼督江西、两广军马，身当全面负责抵抗蒙古三路入侵的重任，并且在军中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但他却怯懦畏战。当时在朝的左丞相吴潜让他把帅府从汉阳移到黄州（湖北黄冈），以防止蒙古军从潭州攻入江西，在往黄州途中碰到一支押送掳掠金帛子女北去的蒙古兵老弱，他竟吓得不知所措，以为自己死期将临。后来，他又背着宋理宗及宰相吴潜等其他大臣，私自同忽必烈订立向蒙古称臣、割地、纳币的屈辱和议。

忽必烈撤兵后，贾似道向朝廷隐瞒了私自同蒙古达成和议的真相，谎报宋军大捷、鄂州围解，江、汉肃清。宋理宗大为高兴，以为贾似道真的立下了使“宗社危而复安”的奇功，特下诏褒美，称赞贾似道是“股肱之臣”使“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



忽必烈

造”。宋理宗还下诏召贾似道入朝，下令百官在杭州郊外迎接，不久又封他为少师、卫国公。一个名副其实的“市井无赖”，无耻诈骗的社会渣滓，竟被南宋视为国家的栋梁和救星。贾似道也一下子成为南宋最有权势的人物。

贾似道一掌握朝政大权，就不遗余力地清除异己。他认为自己在从汉阳移驻黄州途中受惊，是左丞相吴潜想陷害自己，一直怀恨在心，所以，他一入朝，就借故把吴潜贬官赶出朝廷，同时还以“党人”的罪名，把支持吴潜的官员都驱逐出朝。对那些曾经对贾似道有过不尊敬表现的将官，贾似道也一一加以打击和迫害。他实行所谓“打算法”，以核实军费支出为借口，把那些对他不敬的将官在抗击蒙古兵时所支取的官物，都说成是“赃私”，给诬加上“侵盗官钱”的罪名，罢官流放，有的甚至下狱迫害致死。

在清除异己及打击、迫害抗蒙有功将官的同时，贾似道受纳贿赂，把那些对他奉迎巴结、热衷于营钻谋私的人都引荐入朝，占据要津，又引荐一批外戚子弟为各地的监司和郡守。

景定五年（1264），宋理宗病死，宋度宗赵禥继位。因宋度宗为贾似道所拥立，对贾似道特别尊敬，称他为“师臣”，朝官都称他为“周公”，贾似道也更加专横，一再用辞职要挟宋度宗。宋度宗因为把他视为自己立国的靠山，一再挽留他，甚至一天派大臣传四五次圣旨挽留，并派宦官在夜间睡在贾似道的府第之外守住他，不让他辞职而去。后来又封贾似道为平章军国重事，一月三赴经

筵，三日一朝。贾似道虽然接受平章军国重事的官职，却根本不到朝中办公，让小吏抱文书到他家中呈署。一切内外大小朝政都须得到他的点头才能颁行。台谏弹劾，各个官府的荐举及京城、畿县、漕运等一切事务，没有先向贾似道报告就不敢付诸实行。凡不同他同流合污的官员，都被斥罢。官吏争着向他贿赂以求美职。想要得到主帅、监司、郡守等职务的人，都必须有大量贿赂。南宋的朝政，到这时真可以说是暗无天日了。

从宋理宗统治末年到宋度宗统治时期的15年中，贾似道虽然位极人臣，权倾中外，但他自小养成的浪荡本性，不仅没有收敛，反而随权势的膨胀而更加发展。当时尽管元兵（忽必烈在夺取蒙古汗位后，建立元朝）的进攻日益加紧，贾似道却置若罔闻，闭口不谈兵事，整天同一群无聊文人诗来歌往，粉饰太平。他在西湖及风景秀丽的葛岭，建筑了许多楼台亭榭。他把在葛岭建造的台亭称为“半闲堂”，把花园称为“养乐圃”，表示自己的悠闲自得和尽情享乐。他又像市井恶少那样，见到民间美女就想方设法弄到府中糟蹋。

贾似道不仅自己放肆地过着浪荡的生活，还引倡优傀儡入宫，使本已荒淫不堪的宋理宗更加热衷于游玩饮宴。贾似道所拥立的宋度宗，就更加荒淫昏庸。

南宋因蒙古军队长年连续入侵，版图日益缩小，财政早已日益空竭。在贾似道专权时期，统治集团的纵情声色和侈靡挥霍，更使得南宋的财政面临崩溃的局面。当时刘克庄曾说，“财用不足”，是“今日不可药之病”。人民已经被繁苛的赋敛搜括得山穷水尽。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贾似道就采用“买公田”和无限制地印发楮币两种办法，肆无忌惮地榨取民脂民膏。

买公田是从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开始实行的。最初规定两浙路乡村中凡占田200亩以上者，政府各派买1/3，以后连百亩之家都不能免。政府对所征购的土地，用纸币及“官诰”、“度牒”

等折价支付，以作报酬，因当时纸币严重贬值，贱如粪土，“官诰”在南宋灭亡前夕也已不值一文，这种派买实际上是无偿强行征收。官府在这些派买来的土地上建置官庄，每乡一所，委派富饶的地主担任“庄官”，每年直接向佃客征收官租，输纳官仓，以充军饷。这就是所谓“景定行公田”之法。“公田”法实行的实质，是政府在财政崩溃、军饷无所从出的情况下，不满足于收取田赋，而直接把佃农交纳地主的地租夺到官府手中，扩大官府的田赋收入。所以，“公田”法的推行遭到江浙豪强地主的强烈抵制和反对，江浙大小地主无不对此怨入骨髓。

滥发纸币的问题，从南宋中期就开始出现了。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只发行2 400万缗。宋宁宗开禧年间（1205—1207）增加到1.4亿缗。到宋理宗绍定年间（1228—1233），纸币发行额已激增至3亿缗左右。宋蒙战争爆发后，因南宋用滥发纸币的办法应付日益庞大的军事开支，在淳祐六年（1246），已把绍定年间的发行额翻了一番，激增至6.5亿缗。贾似道专权后，南宋更是依靠滥发纸币度日。最初是每天增印15万缗发行，后来又继续扩大发行量，纸币大量发行而又没有现钱作储备，使得纸币迅速贬值。

除了买公田和滥发纸币外，贾似道还在景定年间（1260—1264）批行所谓“景定推排之法”，下令各路重新清丈田亩，办法是以县统都，以都统保，选任“才富公平者”，重新确定田亩的赋税，载入图册，名义上是要“使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实际上是为了增加田赋的收入，结果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税，对人民的田赋榨取更加苛刻，无论地主还是农民都受到极大的骚扰。

贾似道在专权期间的种种倒行逆施，使得南宋王朝的朝政“万事不理”，政权机构近于瘫痪，社会经济崩溃，政府财政空竭，人民怨声载道，地主阶级对南宋王朝也离心离德，抗击元兵的军事力量也更加削弱，边情更加危急。南宋王朝虽然因四川钓鱼山之捷

获得一次苟延残喘的机会，却不仅未能利用这个机会稍微改善一下危亡的形势，反而陷入了面临灭亡的绝境。

四、襄鄂尽陷，元兵入杭

——南宋的灭亡

当贾似道隐瞒私自同忽必烈议和的真相，谎报鄂州战功，并施展狡诈手段独擅朝纲的时候，忽必烈于景定元年（1260）春，在开平（后称上都，在今内蒙正兰旗东）被部分蒙古贵族拥立为大汗。

景定元年四月，忽必烈派郝经为国信使到南宋，准备把自己即位之事通告南宋，同时敦促南宋履行鄂州城下和议的条款。贾似道为了不使私订屈辱和议的事败露，把郝经秘密拘留在真州（今江苏仪征）的军营之中。蒙古一再派人来询问郝经的下落，贾似道也不予理睬。这就给了蒙古再次大规模南侵的口实。正好这时贾似道在各路实行“打算法”以迫害不依附自己的将官，上行下效，蜀帅俞兴因与潼川安抚使刘整有矛盾，也乘机以“打算法”整治刘整，刘整向朝廷申诉无门，就以泸州（今四川泸州）15 郡降附蒙古。刘整是南宋一员骁将，他的叛降，使得蒙古对南宋国情虚实完全了解，忽必烈也因此下定了消灭南宋的决心。只是由于当时一部分在漠北的贵族同忽必烈对抗，蒙古陷入长达数年的内讧，在山东的军阀李璮又在这时起兵反蒙，忽必烈忙于处理内讧和变乱，一时无暇南顾，只好按刘整的建议，用玉带贿赂依附贾似道的鄂州帅吕文德，以在襄阳置榷场互市为名，秘密在樊城外的鹿门山修筑堡壁，建立了进攻襄汉的前哨据点，不时出兵抄掠，威胁襄阳。

景定五年（1264，元至元元年），忽必烈在平定漠北蒙古贵族和山东李璮的叛乱后，把都城迁到燕京，重新把注意力放在消灭南宋这一方面，并听从刘整的建议，决定先取襄阳，由汉水入长江，

再沿江而下直取南宋都城临安。刘整还针对蒙古水战不如南宋的问题，建议蒙古兵大造战舰，练习水军，以夺南宋之所长。这个建议也被负责进攻襄阳的蒙军主帅阿术所采纳。南宋面临蒙古发动大规模水陆攻势的危亡局面，而贾似道却还是无动于衷，根本不作任何加强防御的准备。

从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起，蒙古一面筑城于汉水东面的白河口，切断襄阳的粮饷通道，一面练习水军，逐步向襄阳进逼。咸淳五年（1269）二月，蒙古军终于包围樊城。南宋将领张世杰、夏贵、范文虎率兵救援，皆为阿术所率蒙古军击败。吕文德因悔恨自己贪财受贿允许蒙古建榷场，疽发于背而死。贾似道另任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让他督师援救襄阳、樊城，但又命令范文虎从中牵制。李庭芝屡次要进兵，都受到范文虎阻挠。范文虎有贾似道的支持，终日与妓妾玩乐宴饮，拒绝出兵，致使李庭芝无法行动，襄阳也于咸淳七年（1271）被蒙古兵包围。

就在蒙古兵包围襄阳的这一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建立了元朝，并下令各路元兵大举向南宋进攻，牵制各路宋兵，以配合元兵对襄阳及樊城的进攻。进入四川的元兵分路出击，很快就占领许多州郡。南宋两淮的舟师十万，在范文虎率领下开赴襄、樊，也遭大败，损失战船及甲仗不可胜计。南宋各个战场又告危急，而贾似道却还不许任何人在朝中对宋度宗说起边境危急的事，更不采取任何应急的措施。

襄阳被元兵包围，前后达五年之久。樊城守将范天顺（范文虎之子）、牛富及襄阳守将吕文焕（吕文德之弟）都利用城中的积粟，率军民竭力固守。襄阳和樊城之间的江面上，还有铁索连成的浮桥，可以使两城的南宋军民互相支援。但是，因元军在襄、樊周围的要害处都设置城寨、汉水又布满元兵的战船和铁索，襄阳、樊城同南宋其他地方联系的通道皆被切断。南宋的贾似道仍旧在杭州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根本不以襄阳告急为意，使襄、樊二城的军民一直在看不到南宋援兵的艰苦情况下奋战。

咸淳九年（1273）正月，元兵切断联系襄、樊二城的浮桥，使二城宋军不能互相支援，接着加紧进攻樊城。樊城终于被攻破。范天顺表示要“生为宋臣，死为宋鬼”，在所守之地自缢而死。牛富率死士同元兵展开巷战，使元兵遭受重大损失，最后自己身负重伤，以头触柱，投入火中自焚而死。牛富的裨将王福喊着“将军死国事，吾岂宜独生！”也赴火而死。樊城失守后，襄阳守将吕文焕因得不到援兵，又慑于元兵从西域运来的新炮的威力，变节献襄阳降元。

襄阳失陷前夕，贾似道一再假惺惺地上书给宋度宗，表示要带兵赴边抗元，却在暗中指使他控制下的台谏，上表要求把他留下“居中以运天下”，实际上是惧怕带兵去同元兵打仗，只想在杭州淫乐。襄阳失守后，贾似道又装模作样地表示要“上下驰驱，联络气势”，以挽回危局，于是建机速房于中书，自己掌握军情急报，名义上是说要革除枢密院漏泄兵事、稽迟边报之弊，实际上是更加严密地封锁元兵南侵的消息。对于敢言战事的人一律予以迫害。由于贾似道的倒行逆施，处于危亡关头的南宋王朝的防御力量更加削弱。咸淳十年（1274）七月，宋度宗病死，其子赵㬎继位时年仅四岁，宋度宗之母谢氏以太皇太后身份临朝听政。南宋这时已经危在旦夕了。

咸淳十年（1274）上半年，元朝调兵遣将，决定不失时机地给南宋以最后一击，任命伯颜为统帅，水陆并进消灭南宋。九月间，伯颜分大军为两道：一路由博罗欢、刘整率领，进攻淮南，直取扬州。伯颜亲自与阿术一起，率元军主力，以吕文焕率舟师为前锋，准备自襄阳出发，顺汉水沿长江东下，攻占杭州。

进攻淮南的元兵被宋兵牵制在无为军（安徽无为）。刘整因受伯颜的压抑，不能抢到首先渡江的功劳，发愤死于无为城下。

伯颜和阿术所率元兵主力先分三道，水陆并进，企图攻占郢州（湖北钟祥），遭到宋将张世杰的顽强抗击，未能得逞。伯颜就越过郢州，攻占郢州南面的黄家湾堡，沿汉水南下，进攻沙洋（今

湖北沙洋），南宋守将王虎臣、王大用拒绝吕文焕的招降，奋勇抵抗，最后城破被俘。沙洋新城的守将居谊壮烈牺牲。

接着，伯颜率兵向鄂州（今湖北武昌）进逼，在鄂州以东的青山矶击败宋将夏贵率领的鄂、汉水军。汉阳及鄂州的南宋守将相继献城投降。伯颜留阿里海牙率部分蒙古兵守卫鄂州，并继续进攻荆湖未陷州郡，自己率军沿长江东下。因为沿江许多州郡的守将都是吕文德、吕文焕的部属，元兵所至、这些吕氏旧属望风归降，伯颜所率元兵于恭帝㬎德祐元年（1275）正月到达江州（今江西九江）。范文虎在安庆府（今安徽安庆市）献城投降，伯颜又进抵安庆府。

在元兵占领鄂州后，贾似道开都督府于临安（杭州），但还不准备出兵迎击元兵。直到德祐元年（1275）正月，他听说投降元朝的刘整死了，才壮着胆，抽各路精兵 13 万，用船载着无数金帛辎重，甚至带着妓妾，开抵芜湖。鄂州兵败后逃到庐州（今安徽合肥）的夏贵引兵至芜湖同贾似道会合。这时，贾似道还幻想走开庆元年（1259）同忽必烈议和的老路，派人向伯颜求和，表示愿向元朝称臣纳岁币，只求元兵撤退。伯颜不予理睬，挥兵进攻池州（安徽贵池）。南宋池州知州事王起宗望风潜逃。

池州失陷后，贾似道以精锐七万人交总统诸军孙虎臣，屯于池州下流的丁家洲。让夏贵以战舰 2 500 艘布列江中。贾似道自己屯兵鲁港（安徽芜湖南）准备同元兵决战。伯颜令军士砍柴放在数十个大木筏上，扬言要用火烧掉南宋战船，使南宋军日夜防备，丧失出战的意志，然后水陆并进，攻击孙虎臣军。孙虎臣在两军接战时，跑到其妾的船上。宋兵以为他逃跑了，一时大乱。夏贵自鄂州兵败后，已被元兵吓破了胆，这时也不战而逃。贾似道在鲁港，见夏贵逃回，也惊慌失措地鸣钲收兵，使本已惊乱的宋兵争先恐后逃走。伯颜乘势追杀，许多宋兵落水溺死，江水为之变赤。贾似道所带的军资器械，全部成了元兵的战利品。他慌忙与孙虎臣乘快船逃到扬州。

鲁港之役的溃败，使南宋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伯颜继续沿江东下，许多南宋守将望风而逃，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和州（安徽和县）、无为军的宋将则献城投降。伯颜于德祐元年（1275）三月进驻建康（今南京市），在建康分兵四出，进攻两浙的无锡、常州、广德（安徽广德）等州县。进攻淮南的博罗懽军及进攻荆湖的阿里海牙军，也相继攻陷南宋的一些州郡。

南宋见元兵逐步向都城临安进逼，满朝乱成一团，要求各路将官率兵勤王，多数将官都不响应，许多朝官弃官逃出临安。贾似道祸国殃民，到这时已经无法再专权下去。台谏和许多太学生都上书要求杀贾似道，谢太后却只把他发配到循州（广东龙川）。押解贾似道的会稽县尉郑虎臣激于义愤，于德祐元年九月间，在押解途中把贾似道杀死于福建漳州木棉庵，结束了贾似道罪恶的一生。宰相陈宜中竟把郑虎臣问罪处死。这说明，直到灭亡前夕，虽然贾似道专权结束了，南宋统治者还是没有改弦更张之意。

德祐元年（1275）七月，元世祖忽必烈下令伯颜直取临安。十月，元兵自建康分三路向临安挺进。伯颜亲率中军进攻常州。南宋知州姚訔、通判陈炤、将官王安节等奋勇守城，姚訔在城破时战死，陈炤、王安节率军展开巷战，皆壮烈牺牲。伯颜下令在常州进行血洗，杀尽常州之民。另一路元兵攻破安吉（今浙江安吉）东南的独松关，其他附近州县宋兵皆望风而逃。谢太后派使臣到无锡请求伯颜退兵讲和。伯颜说："汝国得天下于小儿，亦失于小儿。其道如此，尚何多言"，拒绝南宋的请求。当时文天祥、张世杰要求太皇太后谢氏、太后全氏及帝㬎逃入海中避难，自己率军同元兵背城一战，宰相陈宜中又不允许。最后，南宋终于在德祐二年（1276）正月，向伯颜献传国玺，宣布向元朝投降，要求成为元朝的藩属。

南宋的这种投降要求还是不为元朝所接受。二月间，元兵逼近杭州。三月，伯颜率军进入临安。帝㬎、全太后以及许多官僚和太学生被俘，押送到大都（今北京）。帝㬎被元世祖废为瀛国公，后

来人寺为僧。太皇太后谢氏因病暂留临安，不久也被押解到大都。

偏安江南150年的南宋王朝至此宣告灭亡。从公元960年开始的宋朝统治，至此实际上也结束了。

五、正气凛烈，可歌可泣

——文天祥、张世杰等南宋军民的抗元斗争

元兵占领杭州后，两淮、四川、江南、荆湖还有许多州郡的宋兵仍在坚守，闽、广则基本上还在南宋控制之下。伯颜命令南宋太皇太后谢氏出手诏，又让南宋三省枢密院发布檄文，号召所有未陷州郡停止抵抗，向元朝投降。南宋有的将官，如那个在鄂州及鲁港一再临阵逃脱的夏贵，就趁机以淮西州郡向元朝投降了。

但是，南宋军民的抗元斗争并没有因为太皇太后下令投降而告结束。



广东揭阳文天祥塑像

在元兵入杭前夕，一部分南宋官员护送宋度宗之子益王赵昰、广王赵昺逃到婺州（今浙江金华），又逃到温州。陆秀夫、张世杰及元兵入杭前逃出杭州的宰相陈宜中等人在温州拥戴赵昰、赵昺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及副元帅，准备组织诸路义兵拯救宋室于危亡之中。元兵入杭后，他们又退到福州。帝㬎被掳北上后，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人于五月初一在福州拥立益王赵昰为帝，改元景炎，用这个新建立的小朝廷继续号令抗元，兴复宋朝。

是时，在两淮、湖南、四川等地的一些南宋将领，也在坚持抗元斗争。

对于元军起到了一定的阻滞作用。在湖南潭州（今长沙），李芾率军民坚守三个多月，城破之日，召部下沈忠，以金赠送，对他说："吾力竭，决心一死，吾家人亦不可当俘虏受辱。你先尽杀我家属，再杀我。"沈忠再三不愿意这样做，李芾坚决命他照办，沈忠只好哭着答应。于是李芾取酒让全家人都喝醉，让沈忠一一杀死，再放火烧李芾住宅。沈忠按李芾的命令办理后，回家杀了妻子，又回到李芾住所自杀身亡。许多幕僚也皆自杀。潭州许多百姓听说李芾壮烈而死，也都举家自尽。据说潭州城无虚井，缢死林木者相望。潭州军民在抗元斗争中也演出了极其悲壮的一幕。

在四川，王坚的部将张钰继王坚之任镇守合州。在周围州郡相继向元朝投降的情况下，张钰两次拒绝元朝的招降。当伯颜入杭州后，张钰还在积极准备收复失地，并出师收复泸州，解重庆之围，被重庆守臣迎入重庆，就任四川制置使。赵㬎投降后发布的投降命令，张钰也拒不执行，继续在重庆和钓鱼山坚持斗争。

景炎元年（1276）九月，元朝以舟师和骑兵，分别由明州（今浙江宁波）和江西出发，大举向闽、广地区进军，力图最后消灭南宋的抵抗力量。闽、广地区的抗元斗争，也悲壮激烈地展开了。

在元朝舟师自海上向福州进逼的时候，陈宜中和张世杰等人用海船载着大批宋兵，护送赵昰及赵昺撤退到泉州港口。因泉州守臣蒲寿庚叛变，陈宜中等人又护送赵昰向潮州（今广东潮州）方向撤退。在这期间，张世杰曾出兵收复潮州，还曾亲自率兵讨伐献泉州降元的蒲寿庚，因元兵来援，张世杰被迫撤回海上。接着，因元兵乘舟入海追赶，张世杰又继续护送赵昰，于景炎二年（1277）十二月撤到珠江口的井澳。这时，陈宜中逃到占城，当了可耻的逃

兵。年仅10岁的赵昰因在井澳遇上飓风，惊悸成疾，于景炎三年（1278）四月病死，张世杰与陆秀夫又拥立8岁的赵昺为皇帝，改元祥兴，以新会的厓山（在今广东新会厓门附近）为据点，在那里建造行宫及军屋，储备资粮，制造舟楫器械，准备长期坚持斗争。

正是在这时，历史上出现了一位抗元斗争的英雄文天祥。

在伯颜率元兵向临安进逼时，文天祥任江西安抚副使，知赣州。当他接到南宋太皇太后谢氏的勤王诏时，立即招募民兵万余人，开赴临安。本来他生活豪奢，这时他见南宋已在危亡关头，便把家资都捐献出来充当军费，自己过着俭朴的生活。因遭宰相陈宜中的阻挠，他组织起来的民兵未能开赴临安。德祐元年（1275）八月，他才被允许带兵到临安入卫。在临安陷落前夕，他被谢太后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负责到伯颜军中议和，因同伯颜争辩，被伯颜扣留在元军营中。临安陷落后，他又不顾自身安危，当伯颜的面痛责吕文焕等人不能以死报国，反而合族为逆的罪行，被伯颜拘押北去。在被押解到镇江时，他乘元兵不备脱逃，跑到真州（江苏仪征），又从高邮、通州（今江苏南通）逃到温州。赵昰在福州即位后，他应召来到福州，但很快就被陈宜中排斥出朝，到南剑州（今福建南平）、汀州（福建长汀）一带组织抗金斗争。

张世杰等人护送赵昰从海上撤入广南后，文天祥率兵由福建的龙岩转战到广东的梅州（今梅县），后又转入江西南部，一举收复会昌，并于景炎二年（1277）六月在雩都（今江西于都）大败元兵，收复兴国，在兴国建立大本营，又分兵收复吉州（江西安吉）、赣州的属县，包围赣州。江西许多地方都有人起兵响应文天祥。

元朝统治者看到文天祥在江西的抗元斗争声势越来越大，急忙于八月间派兵增援赣州，同时出兵袭击文天祥在兴国的大营。文天祥没有料到元兵会如此迅速反攻，一时仓猝应战失利，所率宋兵在

撤退途中溃散。文天祥的妻子及幕僚都被元兵俘虏，文天祥亏得部属赵时赏乔装顶替，才幸免于难。但他没有气馁，撤到循州（今广东龙川）后，召集散亡，继续在广东的海丰一带坚持斗争，最后于祥兴元年（1278）十二月，在广东海丰北面的五坡岭被元兵俘获。他被俘后想自杀未果，被押在元兵水军的船上。当船经过珠江口的零丁洋时，他回想起在赣水惶恐滩起兵勤王四年以来抗元斗争的艰辛历程，写了一首《过零丁洋》诗说：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首诗不仅表述了他自己被俘后至死不屈的决心，还表述了他对待死的态度，即死要死得其所，要能光照史册。元军统帅张弘范要他写信向张世杰劝降，他就用这首诗作为回答。

文天祥被俘，元朝因担心张世杰拥立赵昺后得到闽广的响应，任命张弘范为蒙古、汉军都元帅，授予宝剑，让他专决军事，统率水陆之师二万，扑向广南。


南宋恭帝

祥兴二年（1279）正月，张弘范率师由潮阳港（今广东潮阳）乘舟下海，沿海岸搜索到甲子门（在陆丰境），获知张世杰屯兵厓山，即扑向厓山。张世杰率师迎战。元兵想用火攻，张世杰早有防备，战舰都涂泥结长木以拒火。张弘范没有办法，让张世杰的外甥三次去招降。张世杰都断然拒绝。到二月间，张世杰的防线终于被元兵突破。陆秀夫看到难以再

逃脱了，就背起九岁的赵昺，一起投海身亡。许多宫人和官员也跟着投海。张世杰撤退到南恩州（今广东阳江）的海陵山（今海陵岛），准备入广南继续坚持斗争，不幸遇到飓风，船毁坠水，牺牲在海中。南宋灭亡后，不愿降元的南宋军民企图保存宋室，恢复宋朝的努力，至此彻底失败。

张世杰的抗元斗争失败后，张弘范还想劝文天祥投降。文天祥依然拒绝。张弘范只好派人把他押解到大都（北京）。他在大都依然表现出一派宁死不屈的凛然正义，拒绝向元朝丞相下跪。元世祖为了使他投降，把他囚禁在大都三年多，但他一直要求一死，不愿变节降元。他在狱中还写了一首流传千古的《正气歌》，用“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是随所旁薄，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等诗句，继续表示自己视死如归的决心。元世祖当面劝他投降，表示要拜他为丞相。文天祥表示自己既为宋宰相，不能事二姓，只求一死。元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文天祥在大都柴市从容就义。死年47岁。

第十一章　宋代的科技、思想和文化

一、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他

——科技的辉煌成就

宋代的科学技术，在我国科技发展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中，活字印刷术和指南针出现于这个时期，火药的配方也在这时期臻于完善，获得广泛应用，并对历史产生巨大的影响。

活字印刷术是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布衣毕昇发明的。宋代的印刷术主要是雕版印刷，刻工技术精良。但是，雕版费工费时，存放雕版又要占很多地方，这对印刷事业的发展有很大局限性。毕昇可能是当时刻书中心杭州的一名刻工。他用胶泥制成一个个单字，经火烧使之变硬，按字的韵目排列在一格一格的木架上，印刷之前，先在一块铁板上放上铁框，其中放置松香、蜡和纸灰，再按需要拣字排列在铁框内。排好字后，即把铁板置于火上加热，使松香和蜡熔化，再用平板把活字压平，冷却后活字牢固地粘成一片，就可以印刷了。如果原版不用，可以重新把蜡和松香烧化，拣出活字，以便重新排版时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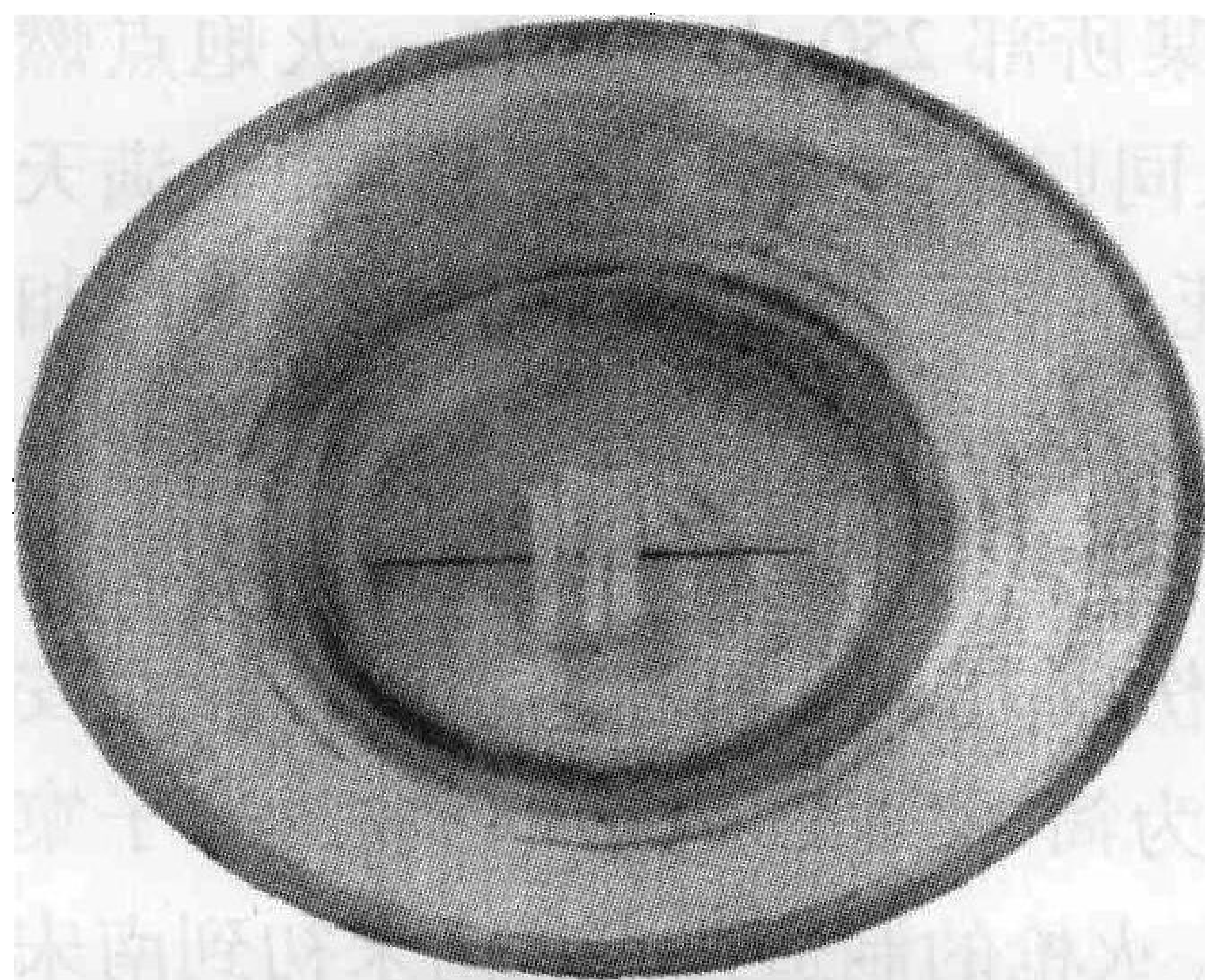
毕昇发明的胶泥活字印刷术在北宋中期没有得到推广。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毕昇死后，他的活字为沈括的随从所得，并加以珍藏。沈括还把这一伟大发明记载了下来。到南宋末年，才有人用这种活字印刷术印成了朱熹的《小学》、《近思录》等书。但是，


毕昇像

毕昇的发明开创了近现代铅字排印技术的先河，比欧洲谷腾堡的活字印刷要早四百年，被世界公认为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指南针的发明和应用于航海，也出现在北宋时期。

在宋代以前，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已经知道磁石具有指极性，并且制造了一种称为“司南”的指向仪器。战国时期的韩非子说“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的指针像一把勺，用天然磁石磨制而成，置于平滑的刻有方位的“地盘”上，“共祇指南”。因为天然磁石在磨成指针时，容易因打击、受热而失去磁性，“司南”的磁性较弱，而它与“地盘”的摩擦力又比较大，因此，“司南”的指南效果比较差，长期未能广泛应用。到了宋代，人们创造了人工磁化的方法，用天然磁石磨针锋，利用天然磁石的磁场作用，使钢针具有磁性。磁针的装置，在宋代也创造了“水浮”、“缕悬”等办法，以减少指针转动时的摩擦力。其中有一种指南龟，把天然磁石安装在一个木刻的龟腹内，在木龟腹下挖一个光滑的小穴，对准了放在顶端尖滑的竹钉子上。这种竹钉支点处的摩擦阻力很小，木龟可以自由转动以指南。这种指南龟，是后来出现的旱罗盘的先声。一种可以准


水浮法指南针复原模型

确指示方向的仪器，终于在北宋时期出现了。

指南针的发明，立即被应用于航海。北宋末年朱彧写的《萍洲可谈》及徐竞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两书，都有航海碰到阴晦天则用指南针以确定方向的记载。从此，人们在茫茫大海上航行才能有更加准确的方向。指南针的发明和应用，也是宋代劳动人民对于人类的重大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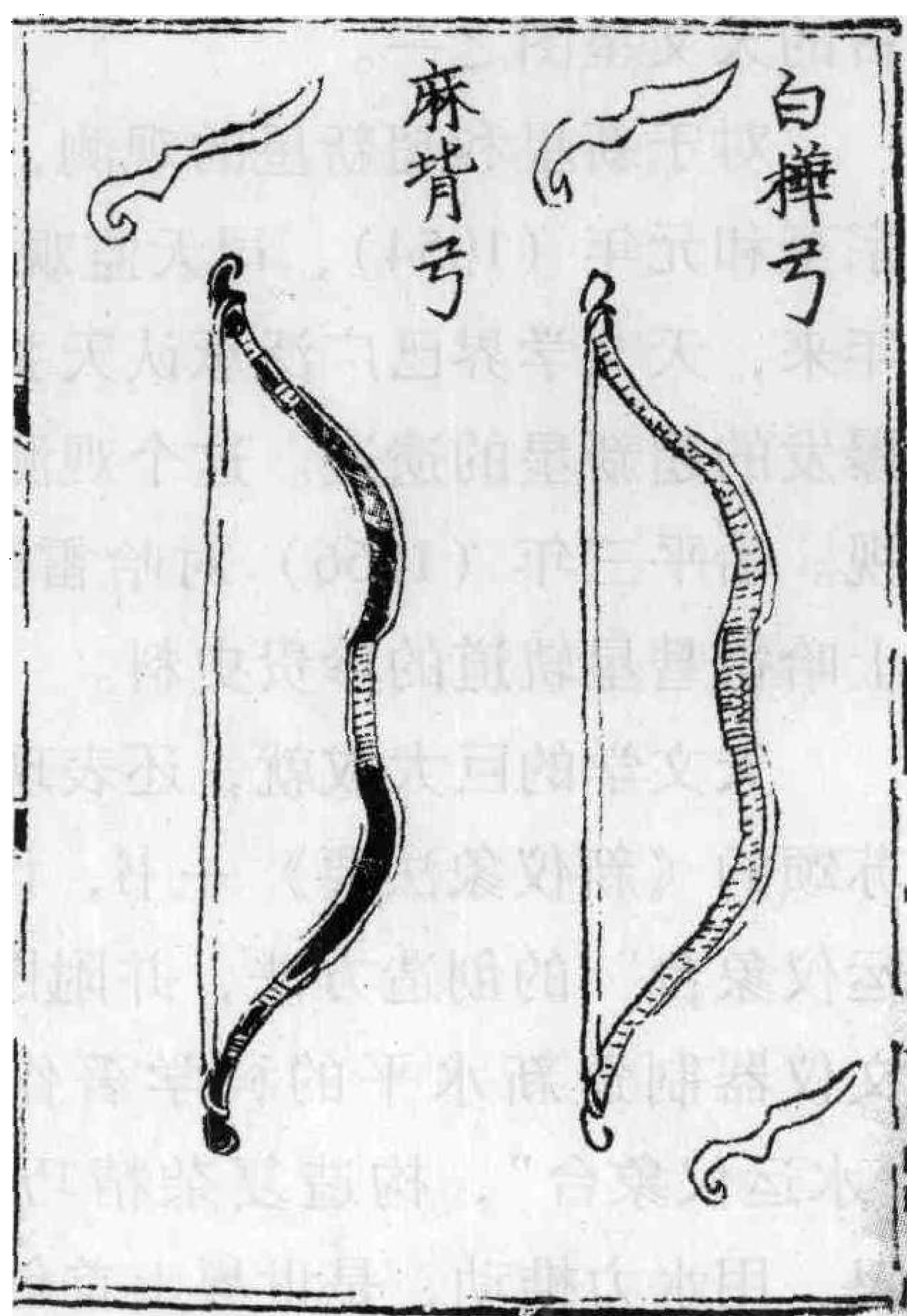
火药虽然出现于宋代以前，但因为配方尚不完善，没有获得广泛应用。在宋代，火药配方有重大改进，其中硝的含量大大增加。唐代火药中硫和硝的含量是1:1，宋代增加到1:2，甚至1:3，与后代黑火药中硝占四分之三的配方相近。在火药中还加入其他易燃、易爆及有毒原料，使火药的威力大大增加。火药在宋代也进入实用阶段，被广泛应用在军事火器方面。北宋政府在开封设置“广备攻城作”，制造各种战争物资，其中就有专门制造火药的工场。

宋代用火药制造的兵器，有火箭、火炮、火枪等等。在北宋初年，就有冯继升向宋太祖进献火箭法。这种火箭，是在箭头附近装上用火药制成的燃烧物，点燃后用弓射向敌营。火炮是用抛石机把火药制成的爆炸物抛向远方，当时还没有管状大炮。北宋末年的抗金斗争中所出现的“霹雳炮”、“震天雷”等的火炮，大约也是用抛石机抛出的。宋代制造的火炮，已成了军队的一项重要装备。南宋末年的李曾伯说，荆淮一带的宋军有铁火炮十多万只。在广西静江（今桂林）的抗元斗争中，娄某所部250人最后拥一火炮点燃爆炸，一声如雷霆的巨响，250人同归于尽，月城为之崩塌，满天烟气，围城的元兵也有许多被惊死。可见，当时火炮的威力已经相当大。火枪是一种竹制管状火器。南宋初年，德安（湖北安陆）守将陈规在抗击金兵时，创造了一种“长竹竿火枪”，把火药装在长竹竿里，临阵时点燃发射以烧伤敌人。南宋末年，寿春府（安徽寿县）制造的突火枪，以巨竹为筒，内安子窠，燃放后，子窠从竹筒中射出，声闻百五十余步。火枪的制造技术从南宋初到南宋末显然有很大改进。这种安有子窠的突火枪，已经是近现代枪炮等

管状武器的先河。它的出现，是兵器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突破。

除了三大发明外，宋代科技的许多领域，都出现蔚然可观的新成果。

在数学方面，我国古代解方程式的“开方法”迈进了一大步。北宋中期的数学家贾宪，制成一个二项定理系数表，称“开方作法本源图”，详细列出各高次方展开式各项系数，并指出求这些系数的方法。17 世纪欧洲出现的“巴斯加三角”，才得出同贾宪系数表相同的系数。南宋末年，数学家秦九韶创造的“大衍求一术”，在世界数学史上也占有光辉的地位。在他所著《数书九章》中，系统地指出了用“大衍求一术”求解一次同余组的一般计算步骤，其方法正确而又严密。欧洲人直到 500 年后，对同一问题才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可见，宋代的数学，在许多领域都在世界上居遥遥领先的地位。



宋代白桦弓和麻背弓

同数学关系密切的天文学，宋代也获得重大的成就。

在北宋时期，朝廷设立的司天监，集中了一批天文、历法专门家，专门从事天文研究和历法的推算。司天监曾先后五次对恒星位置进行大规模的观测工作。其中元丰年间（1078—1085）所进行的第四次观测的结果，南宋初曾由黄裳绘成天文星图，后来又由王致远刻石立于苏州。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苏州石刻天文星图。这个星图高达八尺，宽三尺半，刻星一千四百三十颗，以北极为中心，绘有三个同心圆，分别代表北极常显圈、南极恒隐圈和赤道。有二十八条辐射线表示二十八宿距度。这个天文星图，被公认为世界上最

古的天文星图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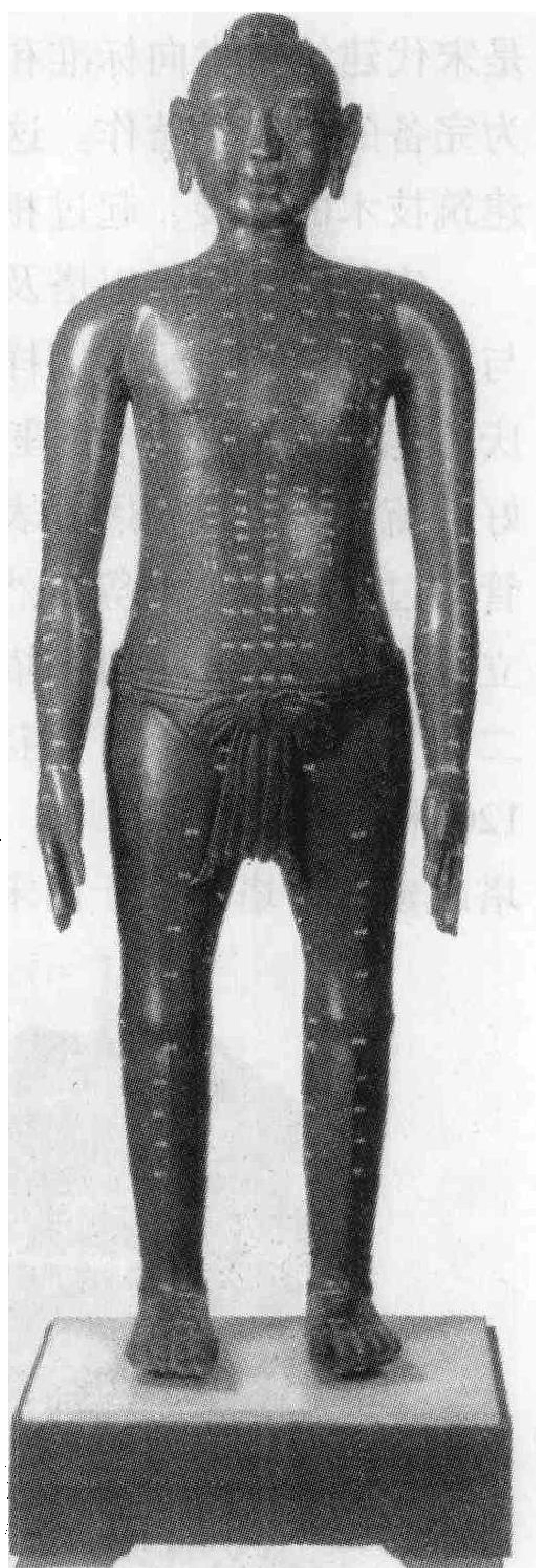
对于新星和超新星的观测，宋代获得的成就也举世瞩目。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司天监观测到天关客星爆发的情况。近几十年来，天文学界已广泛承认天关星附近的蟹状星云，就是至和元年爆发的超新星的遗迹。这个观测记录的科学价值，也得到广泛的重视。治平三年（1066）对哈雷彗星的观测记录，也成了研究历史上哈雷彗星轨道的珍贵史料。

天文学的巨大成就，还表现在天文仪器的制造方面。北宋中期苏颂的《新仪象法要》一书，详细介绍了“浑仪”、“浑象”、“水运仪象台”的创造方法，并附图63种，是一部反映这时期我国天文仪器制造新水平的科学著作。苏颂和韩公廉等人合作制成的“水运仪象台”，构造复杂精巧，规模宏大，高达36尺多，宽21尺，用水力推动，是世界上首创的水动天文钟。

在医药学方面，宋代很重视各种医药书籍的修订。北宋时先后修订了《开宝本草》、《嘉祐本草》、《图经本草》、《证类本草》、《本草衍义》等等。其中的《图经本草》系苏颂整理而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配有图样的本草书。《证类本草》为北宋末年唐慎微私人修纂而成，收录药物1 700多种，对各种药物的配伍禁忌也作了介绍，还收录了许多单方。因为此书不仅总结了前人的成果，还进一步发展了前人的成果，曾一再为宋朝政府修订出版。在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出现以前，它一直是本草书的范本。《本草衍义》为北宋末寇宗奭所撰，收载药物虽不多，但颇多有见地的科学见解。《证类本草》和《本草衍义》这两部医药书，对医药学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对于医方书籍的整理，在宋代也受到重视。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王怀隐主编的《太平圣惠方》一百卷，收集了前代流传下来的16 000多个处方。后来贾黄中等人又集医方之大成，编成《神圣普救方》1 000卷。宋神宗元丰年间太医局编纂的《和剂局方》，是我国第一部由政府刊订的配方手册，曾广泛流行。

宋代医学的进步，还突出表现在分科更加细致及诊治技术之提高方面。唐代中医只分四科，宋代分为九科。其中以小儿科、产科、针灸科最为有名。当时的儿科医生已能区别天花、麻疹、水痘等传染病，并各有专门处方。产科方面，已有专门介绍顺产、难产各种情况的著作出现。北宋钱乙《小儿药证直诀》、杨子健《十产论》，分别是小儿科和产科的代表作。针灸科的发展，最重要的成就是北宋前期王唯一所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及其所制作的两具针灸铜人。这本书在后代一直是针灸科教学的重要参考书。针灸铜人的构造精巧，造型逼真，使针灸图像具有立体感和真实感，长期受到国内外医学界的重视。



针灸铜人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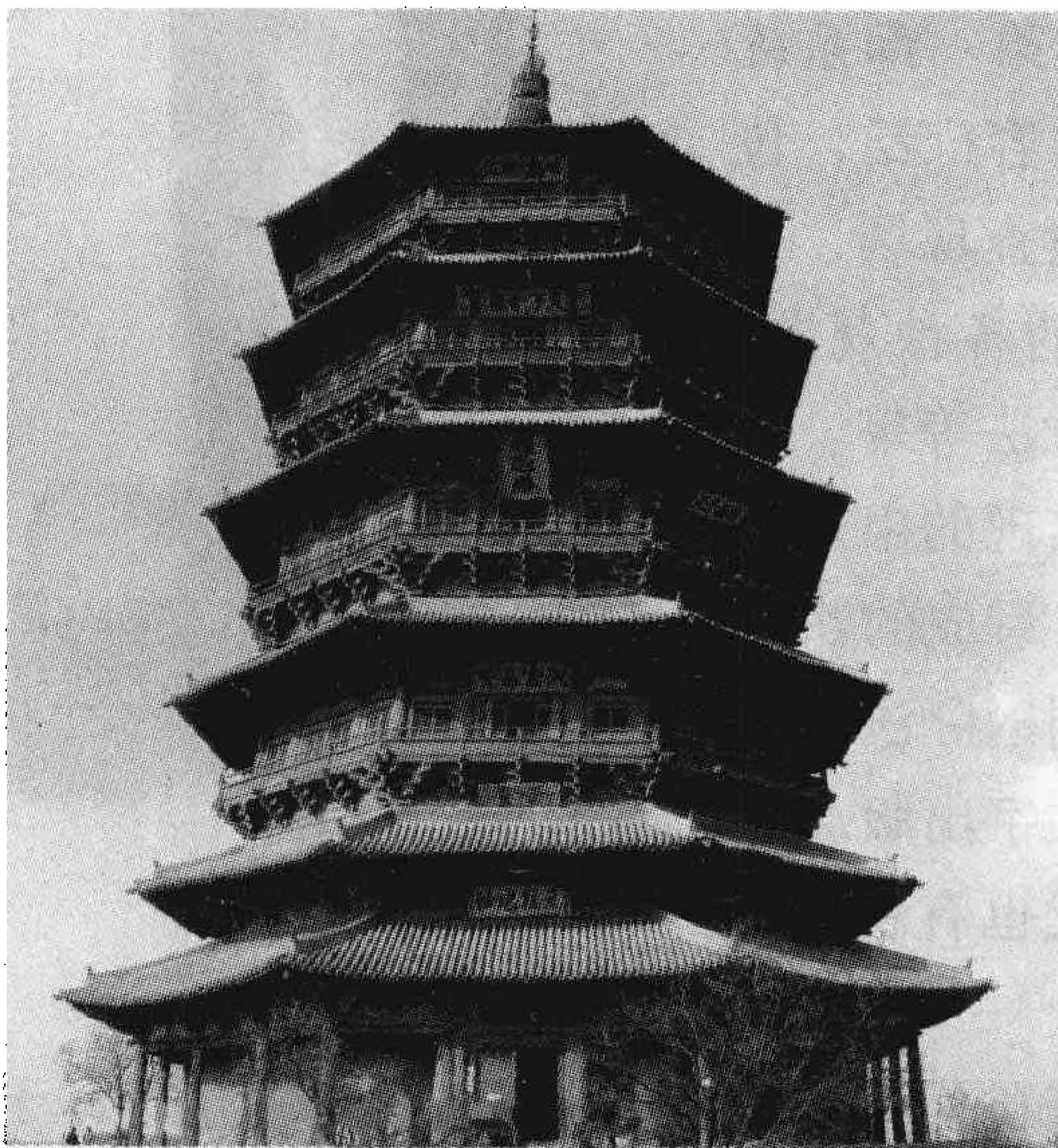
宋慈于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写成的《洗冤录》，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它记述的内容广泛，包括人体解剖、检验尸体、检查现场、鉴定死伤原因、自杀或谋杀的各种现象、各种毒物和急救、解毒的方法等等。这部法医著作，比西方最早出现的由意大利人菲德里于公元1602年写成的法医著作，早了300多年，受到国际法医界的广泛重视，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在建筑技术方面，宋代也有相当可观的成就。

北宋时期，政府的主管机构将作监很重视建筑技术的规范，于元祐六年（1091）编成《元祐法式》。接着又由李诫重新编修。李

诚用了6年时间，于元符三年（1100）编成《营造法式》一书。该书对历代建筑经验及宋代建筑技术成就作了系统的总结，对各种官府建筑的用材选择、各种结构的坡度标准、各种技术操作，都作了严格的规定，而且图文并茂，有许多极珍贵的建筑图案，它不仅是宋代建筑技术向标准和定型方向发展的标志，也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完备的建筑学著作。这部书所规定的各项建筑技术制度，对后代建筑技术的发展，起过相当大的作用。

宋代的建筑，以塔及桥梁最为著名。塔以砖塔为主，也有木塔与石塔，外观多呈楼阁样式。开封祐国寺的“铁塔”，建成于北宋庆历元年（1041），底座呈八角莲花状，共13层，全用预先烧制好的琉璃砖砌成，因外表颜色如铁，被称为铁塔。九百多年来，尽管有过洪水及地震等自然灾害，塔基有所下沉，但整个塔身迄今屹立在开封市内，可见该塔建筑之坚固。著名木工喻浩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在开封开宝寺所建的福胜塔，也是8角13层，高达120米，是一座木构塔。著名的泉州开元寺东西塔，都在宋代由木塔改建成砖塔，又于南宋时先后改建成石塔，并一直保存至今，反映了宋代石结构建筑的高超技术。桥的建筑，以北宋都城开封的虹桥，泉州的洛阳桥、安平桥最为著名。虹桥是这时期木拱桥的代表作，全用木梁连接成拱，跨径近25米，净跨约20米，拱矢约5米，桥宽8米，不用支柱，桥下可以任船随意航行。这种木拱结构犹如长虹飞越河上，是桥梁建筑中的一件杰



宋军用于监视辽方动静的山西应县木塔

作。泉州洛阳桥和安平桥都是石桥。洛阳桥建成于北宋嘉祐四年（1057），桥长1 200米，宽5米，有47个桥孔，建于洛阳江入海处，水急浪高，工程非常艰巨，为了解决桥梁基础稳固问题，建筑者们首创了“筏形基础”，沿桥位向江底抛掷数万立方巨石，筑成一条长一里，宽20多米的石堤，然后在石堤上筑桥墩，桥墩的迎海面砌成尖劈状，可减少海潮冲击力，又在桥基和桥墩上种蛎固基，利用牡蛎的石灰质贝壳附在岩石间繁殖的特性，使桥墩和桥基的石块通过牡蛎贝壳的繁殖自己连成一体。桥面的石梁，每块都有20至30吨之重。这个巨大规模的石桥的建成，是桥梁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至今在泉州一带，还流传着关于洛阳桥建筑的一些美妙的神话，说这座桥的建筑有神力的帮助。其实，这是建桥工匠聪明才智的结晶，它揭开了中国桥梁史上新的一页。安平桥建于南宋初年，全长270米以上，横跨安海海湾，是我国古代遗留下来的最长桥梁。塔和桥梁的建筑，充分反映了宋代建筑技术的高超。

在宋代科技发展史上，值得一提的还有沈括和他的名著《梦溪笔谈》。

沈括（1031—1095），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曾积极参加熙宁变法，但在许多问题上又不完全附和王安石，因而被王安石骂成“怆人”、“小人”，遭到王安石的排斥。他在政治上并不得志，但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却蔚然壮观。《宋史·沈括传》说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宋史·艺文志》所录的沈括著作有22种、155卷之多。可惜他的著述多数没有保存下来，但从现存的《梦溪笔谈》，也可以反映沈括涉及的科技领域之广泛。《梦溪笔谈》有26卷，连同《补笔谈》、《续笔谈》共30卷，其中科技方面的条目占1/3以上，内容涉及数学、天文、历法、物理、化学、地理、冶金，建筑、动植物等十多个科技领域，而且在许多领域都有精辟的见解。例如，他通过长期观测和研究，提出了月本无光，“日耀之乃光”的科学结论，并解释了月亮盈亏的自然现象。他发现磁针

"常微偏东"，不全指南的现象，是物理学方面发现磁偏角的最早记载，比西欧的记载要早四百多年。他用小纸人所做的共振现象的实验，证明了弦线的基音与泛音的共振关系，比欧洲人所做的类似实验要早好几世纪。他用流水侵蚀作用，解释浙东雁荡山及我国西北地区黄土高原的地貌，由太行山的山崖中含有贝壳及鸟卵石的现象，推测出太行山"乃昔之海滨"。他还用泥沙淤积解释华北平原的成因。这些解释都是地质地理学方面的科学见解。他在任西北地区军事长官时用熔蜡制作的立体地图，比欧洲最早出现的立体地图也要早700多年。《苏沈良方》中沈括所整理的医方，反映了他在医学方面的精湛造诣。其中的"秋石方"，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荷尔蒙制剂的配制方法。沈括在科技方面的杰出成就受到后人的敬仰，被中外学者公认为历史上卓越的科学家。

二、从崇尚黄老到尊崇理学

——政治思想的演变及新儒学的发展

在两宋统治的300多年中，因为历朝统治者基本上都执行宋太祖关于"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遗训，政治思想比较活跃，不同学派之间展开热烈的争辩，儒学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统治思想也发生了由崇尚黄老到尊崇理学的演变。

北宋初年，特别是太宗、真宗两朝，因为统治政策从锐意进取向因循守旧转化，宣扬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为最高统治者所推崇。淳化四年（993），宋太宗对新任参加政事吕端说："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吕端立即附和说："国家若行黄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至道元年（995），吕端拜相，制词还明确要求他"体黄老而行化，用致乎无为"。吕端在宋太宗及宋真宗初年都当过宰相，他执政也贯彻了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鼓吹和

奉行，黄老思想就成了这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并且成了这时期因循守旧政治的理论支柱。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对历代政治一直有重大影响的儒学，北宋初年也被统治者加以利用。宋太宗下令孔子的后嗣袭封文宣公，特免其家赋税。宋真宗东封泰山，特地到曲阜拜谒孔庙，表示尊崇，后来又表示要使“礼乐交举，儒术化成”。孔子后代世袭的衍圣公名号，则是宋仁宗时开始的。然而，在北宋初年，儒学仅仅被统治者视为同佛、道二教地位相同的一种宗教。宋真宗曾说，佛、道、儒“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大抵皆劝人为善，惟达识者能总贯之”。儒学同佛教、道教一样被视为一种统治工具，并没有得到特别尊崇。当时尽管有个别学者努力要使儒学对政治起更大作用，鼓吹“通经致用”，但是，多数儒生都埋头于“章句注疏之学”，而注释经籍又都墨守旧章。所以，在北宋初年，儒学思想比较沉闷，在当时的政治思想中没有占支配的地位。

到北宋中期，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因循守旧政治受到日益激烈的批评，士大夫中要求改革政治的变法思潮日益高涨，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受到变法思想的猛烈冲击和批判。

在北宋初年比较沉闷的儒学，这时期却吸收了佛教、道教的一些思想，向着“通经致用”的方向发展，适应新的政治形势需要而日益活跃。当时士大夫中不少人出于对内忧外患交炽局面的忧虑，想通过对经籍作出符合现实需要的新解释，为解决现实的社会矛盾寻找答案，为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寻求药方。因为各个思想家的政治立场不同，在解释经籍时就有不同的观点，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儒学也在各个学派争鸣中得到发展，形成带有新的时代特点的新儒学。

北宋中期的儒学学派，比较重要的有王安石的新学，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等。

王安石的新学，是适应富国强兵的变法需要而出现的。其主要著作是《三经义》（包括诗义、书义、周礼义）、《字说》、《老子注》及《洪范传》。这些著作大部分已经散佚，现存的只有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周礼义》（即《周官新义》）16卷及《老子注》的佚文。王安石的文集《临川先生文集》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也保存了许多反映王安石政治思想的资料。

王安石的新学，是北宋中期以后有重大影响的学派。《三经义》一修成，宋朝立即发给宗室、太学及诸州府学，作为必读的教材，同时下令杭州、成都府路转运司镂版印卖。科举取士也以三经新义为标准。王安石晚年修成的《字说》，“出入百家，语简而意深”，也有很大影响。

王氏新学在政治思想方面，是以儒为主，兼采法家。他称赞儒家主张的“王道”，反对法家主张的“霸道”，认为“王道”都是出于本心，“霸道”的做法则全是虚伪造作，所收功效不如“王者之道”。他批评韩非“治民无常，唯法为治”的法治思想，认为“刑名法制，非治之本”，单靠多立严密法制，根本达不到“教化”的目的。他还一再引述孟子关于“徒法不能以自行”的说教，说明人治的重要性。但是，他又并不否定法制的重要性，而是把法家的“法治”同儒家主张的“人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他就提出了“天下至大之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的儒法兼采的思想。在“义”与“利”，尚德还是尚刑等问题上，王安石也兼收并蓄。他认为，“义”和“利”，对统治者来说，都是必要的统治手段，是相辅相成的。他嘲笑那种把“任德”、“任察”、“任刑”相割裂开来的人都是各执一端的偏见，认为“圣人为政之道”不过是对这三者“兼用之而已”。他强调“圣人”进行统治离不开“礼、乐、刑、政”四种手段，但他又认为“礼、乐”是“基太平而泽万世”的根本，而“政”和“刑”只是“礼、乐”的辅助手段。对于先秦法家的耕战思想，王安石为了推行“富国强兵”政策也加以吸取。

而对孟子不言财利的陈腐思想，则予以摒弃。可见，王氏新学在政治思想方面对儒法两种思想都有所去取，而以儒为主，以法为辅。这种思想所遵循的，还是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儒法合流这一统治思想发展的轨道。

在哲学方面，王安石是个唯物主义者。他认为万物都是由“道”产生的，而“道”的本体是元气，“道”分化而为阴、阳，具体化为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元素，这五种元素的变化就形成万事万物。他反对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自然观，认为各种自然灾害都有自身的原因，与人事虽然有时会产生偶合，但并无必然联系，“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即使上下附会，也不可信。他在变法时表现出来的那种“天变不足畏”的战斗精神，就是以这种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无神论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的。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通过感觉和思维，一切事物都“可视而知，可听而思”，都可以认识。同时，他认为一切事物内部都有矛盾的对立面“耦”，“耦之中又有耦焉，而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任何事物都是变化运动的。而变化又是“新故相除”的。他在《字说》中对“除”字解释道：“除，有阴有阳，新故相除者，天也；有处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所谓“新故相除”，就是用新生事物代替陈旧的东西。这种进步的辩证法，也是他进行变法的一种思想武器。

周敦颐，字茂叔（1017—1073），因晚年卜居于江西庐山濂溪之麓，筑室名濂溪书堂，被学者称为濂溪先生，他的学派就被称为濂学。他的主要著作，有《太极图·易说》（又称《太极图说》）、《易通》（又称《通书》）。《太极图·易说》是道教《太极先天之图》与儒家易说的结合。这种用儒家易说对道教图像进行新的解释的学说，就是道学。

周敦颐在哲学思想方面，主要是提出了一套“自无极而为太极”，即从无而为有，有生于无的宇宙生成说，认为天地万物的性命都是由“道”决定的。“道”又称“太极”，而“太极”又是精神性的理。所以，他的哲学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他还把先秦儒家思

孟学派提出的“诚”的概念加以发挥，说“诚”源之于天，是宇宙“无极”本体的体现，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是仁、义、礼、智，信等伦理纲常的最高境界。而要达到这个境界，就要“中正”、“主静”、“无欲”。这套唯心主义的宇宙生成说及“诚”的说教，既是道教思想和儒家思想的混合物，也吸收了佛教思想。所以，周敦颐实际上是宋代道教思想向道学思想演变的过渡人。

程颢（1032—1085），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他们兄弟的哲学思想相近，他们的著作被合编为《二程全书》。因为他们长期居住在河南洛阳，他们的学派就被称为洛学。

二程都曾师事周敦颐，又受过相当时间的佛教思想影响。他们都强调“道”和“气”的关系，认为精神性的“道”，是产生物质性的“气”的根源。他们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理”。这个“理”同周敦颐所说的“理”有所区别。例如，周敦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他所说的“理”是条理、序列的意思。二程的“理”又称“天理”。这个“理”是天下万物的最高原则，是先于事物存在的，每一物都由“理”产生，也都体现了一个完全的“理”，“天下只有一个理”，“物我一理”。它既生万物，又统辖万物。这种哲学体系，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他们还把这个“理”应用到伦理方面，提出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说教，把三纲五常说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程颐还进而提出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谬论，反对寡妇改嫁。从此，这种反动说教成了封建礼教的重要内容，成了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屠刀。在认识论方面，二程发挥了《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说教，宣扬“知”不是外面得来的，而是内心固有的，只是因为“人欲”妨碍了对“天理”的认识，只要“求于内”，进行内心的封建伦理修养，“灭私欲，则天理明矣”。这种认识论，既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又是一种禁欲主义的说教。这

种哲学体系是要求人们都绝对服从至高无上的“天理”，服从封建统治，不得有任何“私欲”。

张载（1020—1077），字子厚，住陕西横渠镇。因陕西又称“关中”，他的学派就被称为关学，他被称为横渠先生。他的著作有《正蒙》、《易说》等。他认为，宇宙是一个无始无终的过程，一个不息不休的流行。这个过程有一种客观存在，就是“气”，而“气”存在的基本形式就是“太虚”（有时他又称之为“虚空”）。这就是他提出的“太虚即气”的宇宙观。张载也讲“道”和“理”，认为“事无大小，皆有道在其间”，“万物皆有理”，但他又认为：“由气化，有道之名”，“理不在人，皆在物”，“道”离不开气，理寓于物。所以，张载的宇宙观有别于周敦颐和二程，有唯物主义倾向。张载还提出了“一物两体”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认为“气”有阴阳两体的对立，天地间万物的一切变化都是对立“二端”的作用。同时，他还提出了阴阳两气在运动变化中由“渐化”到“著变”的很有价值的辩证法观点。但在认识论方面，张载把认识分别“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认为只有“德性之知”高于“闻见之知”，而“德性之知”又称“天德良知”，是一种先天的知识。人们要获得这种“天德良知”，就必须“穷理”，按孟子所说的“尽心”去进行内省修身，以达到“一天人，合内外”的精神境界。这样，他在认识论方面就滑进了唯心主义的泥潭。

从周敦颐到二程、张载，尽管他们之间宇宙观有唯心与唯物之别，但他们都讲大道、讲“理”，都讲修身养性，这就逐渐形成一个以讲“心性义理”之学为中心的理学（道学）体系。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鼻祖，二程和张载则是理学的奠基人。

理学在北宋中期形成后，因为当时王安石的新学占据统治地位，没有立即对政治思想产生大的影响。南宋初年，因为士大夫中许多人把北宋的灭亡归咎于熙宁变法，王安石的新学也受到非议，但权奸秦桧却支持新学。支持程颐理学的赵鼎很快失势，所

以，王氏新学继续发挥影响，理学虽然进一步传播，但仍然受到压抑。到南宋中期，王安石的新学大概是因为秦桧曾予支持而声誉受到损坏，很快衰落下去，理学却适应统治者的需要而迅速兴盛起来。

在南宋理学兴盛过程中起重大作用的人物是朱熹（1130—1200）。朱熹是宋代理学集大成者，著作很多，有《周易本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诗集传》、《楚辞集注》等等。他的文集《朱子遗书》及语录汇编《朱子语类》，也都记录了他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他虽然祖籍江西人，但长期在福建讲学，所以他的学派称为闽学。



朱熹讲学之白鹿书院

朱熹是程颐的四传弟子，他继承和发展了二程关于“理”的唯心主义思想，又吸收张载关于“性”和“气”的学说及周敦颐关于“太极”的思想，形成自己庞大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的基本范畴是“理”。他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是万物的本源，气是构成万物的材料，“有理而后有气”，气是从理生出来的，“理”的最高境界则是“太极”，“理”和“太极”都先于万物而存在。他还把“理”运用到社会方面，鼓吹“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所有封建纲常都是“天理”的体现。在认识论方面，朱熹和二程一样，竭力宣扬“格物致知”，但又比二程走得更远。他宣扬“心包万理”，只要“涵养”、“静坐”、“内省”，就可以在顿悟之下“一旦豁然贯通”，全部掌握绝对真理。在人性论方面，朱熹也贯穿“理”的说教，宣传天理在人身上体现的性有两种，一是“天命之性”，一是“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是“理

与气杂”而产生的，有善与不善。人所以有不善，是因为受物欲所累，由此，他又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说教，宣称“天理”同“人欲”势不两立。同时，他还用人性论来解释人的贫富现象，说什么人的贫富贵贱都是因为各人禀受的“气质之性”不同所致，“都是天所命”。

朱熹继承和发展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的理学思想所形成的这套理学体系一出现，就受到许多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和士大夫的重视，影响迅速扩大。到宋理宗时，程朱理学终于确立了在政治思想方面的统治地位。

南宋时期比较著名的思想家和学派，还有陆九渊的“心学”及陈亮、叶适的事功学派。

陆九渊（1139—1192），字子静，著作有《象山先生全集》。他继承和发挥了程颐天即理即心的观点，认为“心”是世界的本体，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观点，所以，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被称为“心学”。他曾同朱熹展开争论，但这种争论只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之争，他们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方面是一致的。“心学”属于理学的一个派别。

陈亮（1143—1194）和叶适（1150—1223）两人都认为世界是物质性的，道在物中，有物才有道，都是朱、陆唯心主义理学的反对者。他们都反对理学的空谈“义理”和心性，主张讲求功利。陈亮曾同朱熹就“王霸义利”问题进行多次激烈的争辩，提出了“功到成时，便是有德；事到济时，便是有理”的功利主义观点：讥笑那些空谈“义理”的书生“不知事功为何物”。叶适也认为，如果没有“功利”，“道义”不过是“无用之虚语”，并且提出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的主张。所以，他们都被称为事功学派。这个学派反映了东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在世界观方面是唯物主义的，在历史观方面都反对历史退化论，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因此，事功学派是个有进步倾向的学派，属于儒家中的异端派别。

三、文坛辉煌灿烂，艺术花开烂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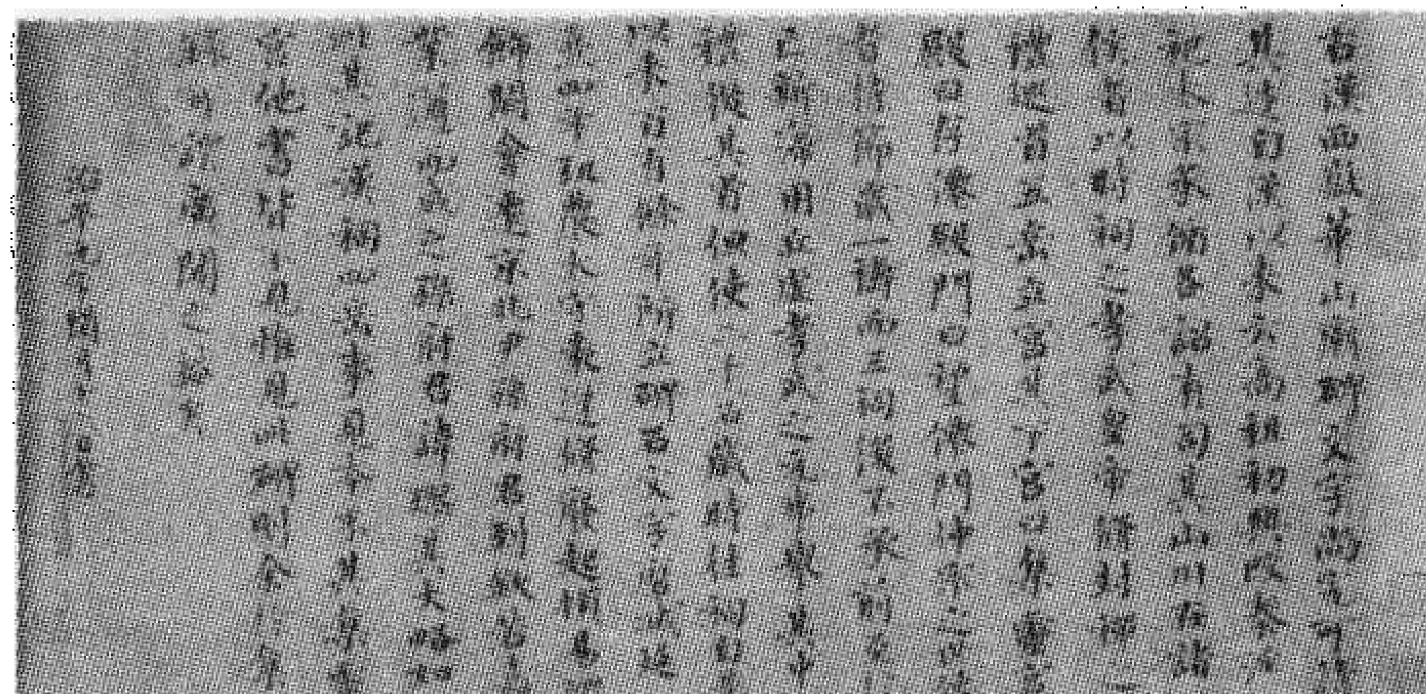
——文学艺术的繁荣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文学艺术成就辉煌灿烂的时期。这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既有社会经济的繁荣作为物质基础，也同政局的发展变化有一定联系。

在北宋前期，先是统治者出于加强皇权的需要，鼓励大官僚放纵于声色宴乐之间，后来又因循气氛充斥朝廷，黄老“无为”的思想居统治地位。同这种政治和思想气氛相适应的浮靡文风，占据文坛的统治地位。这种文风开始于唐末五代，以词藻典丽而内容空虚为其特点。北宋初年的代表作就是《西昆酬唱集》。这部诗集的作者杨亿、钱惟演、刘筠等人，都是宫廷侍臣和翰林学士，他们在起草制诰和修书之余，拾取前人作品中的“芳润”，重新编组成诗，互相唱和。他们致力于“雕章丽句”，玩弄词章典故，讴歌内廷侍臣的优游生活，以华灯、绮宴、兰风、慧帐等为主要题材，内容空虚无物。《西昆酬唱集》的这种文风，就被称为西昆体。因为这种文风适应了当时士大夫无所事事、热衷于宴游的生活情趣，它一出现，在文坛上就产生很大影响。据欧阳修说：“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西昆体影响所及，不仅使得盛唐时期曾经光灿夺目的诗歌在宋初变得僵化和毫无生气，而且因为当时擅长这种绮丽文风是中科第、得名声的敲门砖，曾经受到唐代韩愈、柳宗元批判的骈体文，这时也成了“时文”，有生气的散文反而处于窒息状态。

唐代由民间曲子词发展起来的词，北宋前期也继续发展。以晏殊为代表的宋初词作，善于描写即景抒情的短调小令，用清丽的词语，描绘出情景相融的画面，表现手法含蓄而有韵致。但是，这种词作同唐末五代时期一样，依然是官僚士大夫酒后茶余消遣的工

具，内容主要反映士大夫悠闲自得的生活及伤情惜景的无聊情绪，词风也几乎完全承袭晚唐、五代那种柔靡的风格。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局部）

到北宋中期，随着封建经济的繁荣，在文坛上培养出大批人才。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人物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先后在不同程度上要求政治革新，在文学方面则反对浮靡的西昆派文风，掀起诗文革新运动。欧阳修是这个运动的旗手，他把宋初已被人遗忘的韩愈文集加以补缀刊印，使之流传，号召学习韩文风格，继承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并且提出了文道并重、道先于文的观点，主张文章应思想性和艺术性并重，思想性先于艺术性，文章应作为“明道”的工具为社会服务。同时，他还指出那些只注重“文章丽”、“言语工”，醉心于“文字间”游戏的西昆派作家迟早会“与众人同归于泯灭”，对西昆派那种只重艺术形式、轻视思想内容的文艺思想进行尖锐的批判。在诗歌方面，欧阳修反对西昆派的无病呻吟，推崇韩愈用诗来“叙人情，状物态”而“曲尽其妙”的风格。王安石则认为文章应当努力做到“有补于世”。苏轼也提出文章要能“救时行道”的口号。

这个反对西昆派文风的诗文革新运动，在散文、诗歌等文学领域都获得重大成果，使宋代文学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在散文方面，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有六家出现于北宋中期，他们的成就也超过了唐代的韩、柳。欧阳修所写的《醉翁亭记》、《秋声赋》等散文，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灵活生动，音调和谐优美，富于诗情画意，而且情景交融。他的《朋党论》等政、史论文，说理透彻雄辩，引人入胜。这些散文使人耳目一新，而使那些浮靡乏味的西昆体文章相形见绌，黯然失色，天下学者争着传诵欧阳修的散文，学习他的风格，使西昆体文风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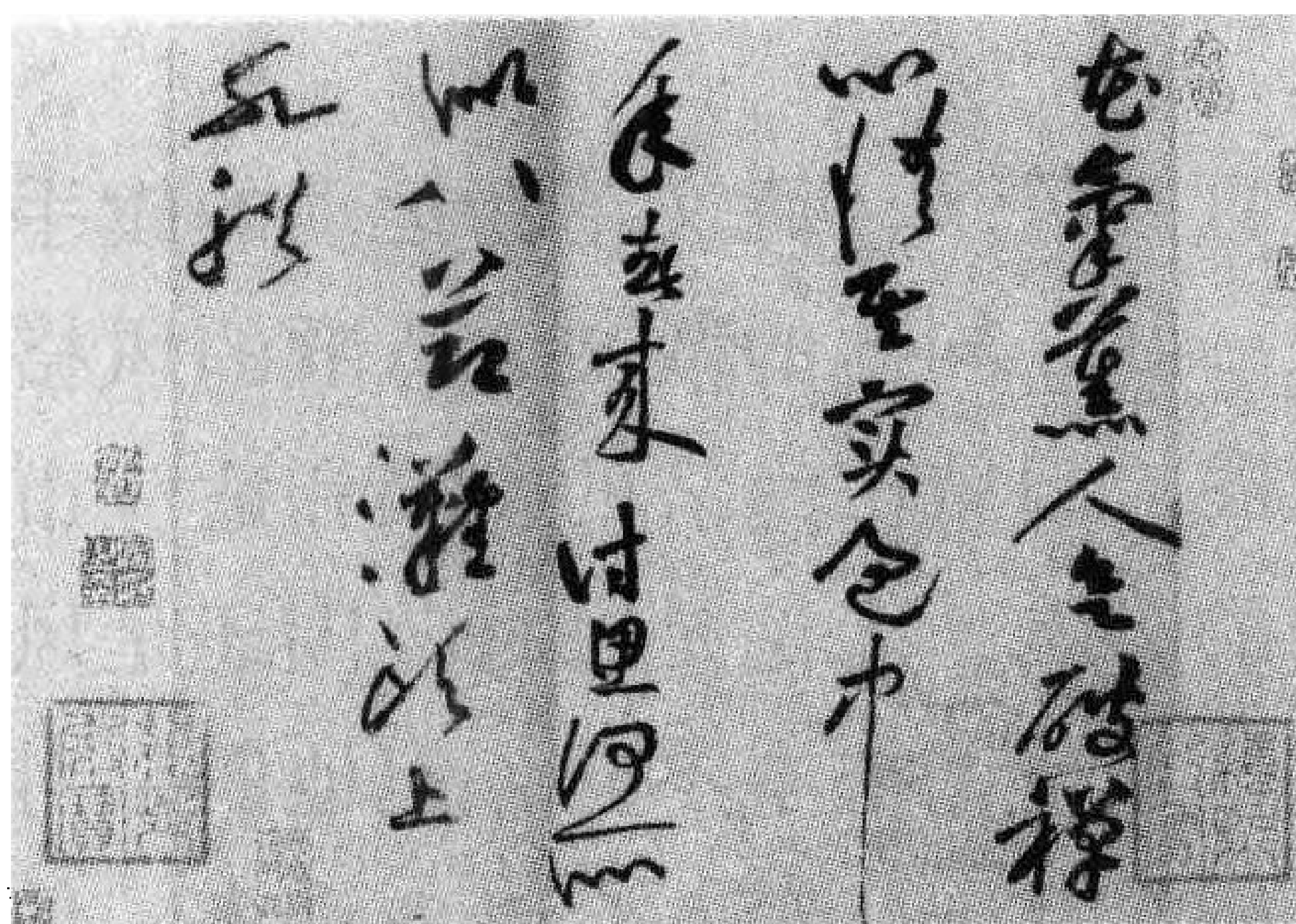
沉重打击。曾巩的散文具有法度严谨、层次井然的风格，使人回味无穷而又深然其理。王安石则以政论见长。他的文章精辟、深刻，具有锋利劲峭而又凝练矫健的艺术风格。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被称为“三苏”，在散文方面都有自己的艺术风格。苏洵风格雄健，善于反复辨析。苏辙的文章寓意深刻，气派很大，色彩优美。“三苏”中以苏轼的成就最大，他的散文不论什么题材，都像行云流水那样自然，又像波澜叠出，变化无穷，能把读者引入美丽如画的意境，使人心旷神怡。欧阳修等六大散文家的光辉艺术成就，不仅像劲风扫落叶那样把西昆派文风涤荡殆尽，使北宋文风发生根本转变，而且使得散文体制趋于完善，为后代散文的发展规定了方向，提供了典范。

在诗歌方面，通过诗文革新运动，西昆派那种形式主义颓风也遭到扫荡。叶梦得《石林诗话》说：“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言多平易疏畅”。欧阳修诗歌的风格平淡秀丽，表现手法主要是以文为诗，冲破诗歌格律的束缚，使诗歌能较自由地表达思想感情。他和梅尧臣等诗友，都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创作了一些揭露当时社会矛盾的诗歌。在《食糟民》一诗中，欧阳修揭露了官府强征农民的粮食酿酒，使农民无以为食，不得不反向官府买糟而食的黑暗社会现实。梅尧臣的《陶者》诗，仅用了“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20个字，就把当时劳动人民劳动果实全被剥夺，剥削者却不劳而获的阶级对立深刻揭露了出来。他所写的《田家语》、《汝坟贫女》等诗，在揭露黑暗社会现实方面也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王安石、苏轼等人也都在诗歌中触及到当时社会生活方面的许多问题。王安石的诗内容充实，艺术上俊逸而又平易近人。苏轼的诗歌则以开阔的境界和奔放的风格为时人所推重。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名家的诗作，使西昆体诗风受到沉重打击，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指导下所出的工练、雄放而又艺术造诣精深的诗歌，成了北宋中期诗歌的主流。宋诗的“尚理”，“以议论为诗”的独特风格也在北宋中期

基本上形成了。

词的发展同诗文革新运动没有直接关系。诗文革新运动的旗手欧阳修所创作的词，风格属于晏殊一脉，同他的散文、诗歌的风格迥然而异。然而，北宋中期词的发展，因城市经济的发展和适应市民增多的需要，又受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无论是题材范围还是风格，都有重大的突破。柳永和苏轼虽然格调根本不同，但他们都对这时期宋词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柳永是宋代第一个专业词人。他的词虽然还局限于叙写男女离别情思，充满靡靡之音。然而，他突破了以往词只是描写士大夫悠游生活的狭隘题材，成功地用词这种艺术形式来反映中下层市民的生活面貌，深受广大市民的欢迎，据说当时“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词从官僚士大夫的庭院中向社会扩展，影响扩大了，这对词的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柳永还发展了词的长调体制，使词能够组织较为复杂的内容，词的体式也因此而更加完备。长调词在北宋中期以后蔚然成风，这应当归功于柳永的倡导。后人认为宋词至柳永而一变，这种估计是合乎事实的。苏轼的贡献是把词的题材进一步扩大，为词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开创了豪放派词风。南宋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中说，苏轼的词“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他“以诗为词”，用诗的某些表现手法作词，使词也像诗那样具有咏怀言志的功能。他的名作《水调歌头》唱出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之句，至今仍为人们所喜爱。他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所唱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词句，豪迈情怀溢于言表，成了千古绝唱。南宋初年胡寅评论道：“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这种评论是很精辟的。

北宋中期伴随着政治上革新思潮汹涌而出现的文坛上的生气勃勃景象，在北宋后期并没有继续发扬。随着熙宁变法的失败和北宋统治的日益腐败黑暗，士大夫普遍滋长了闭门读书、空谈儒学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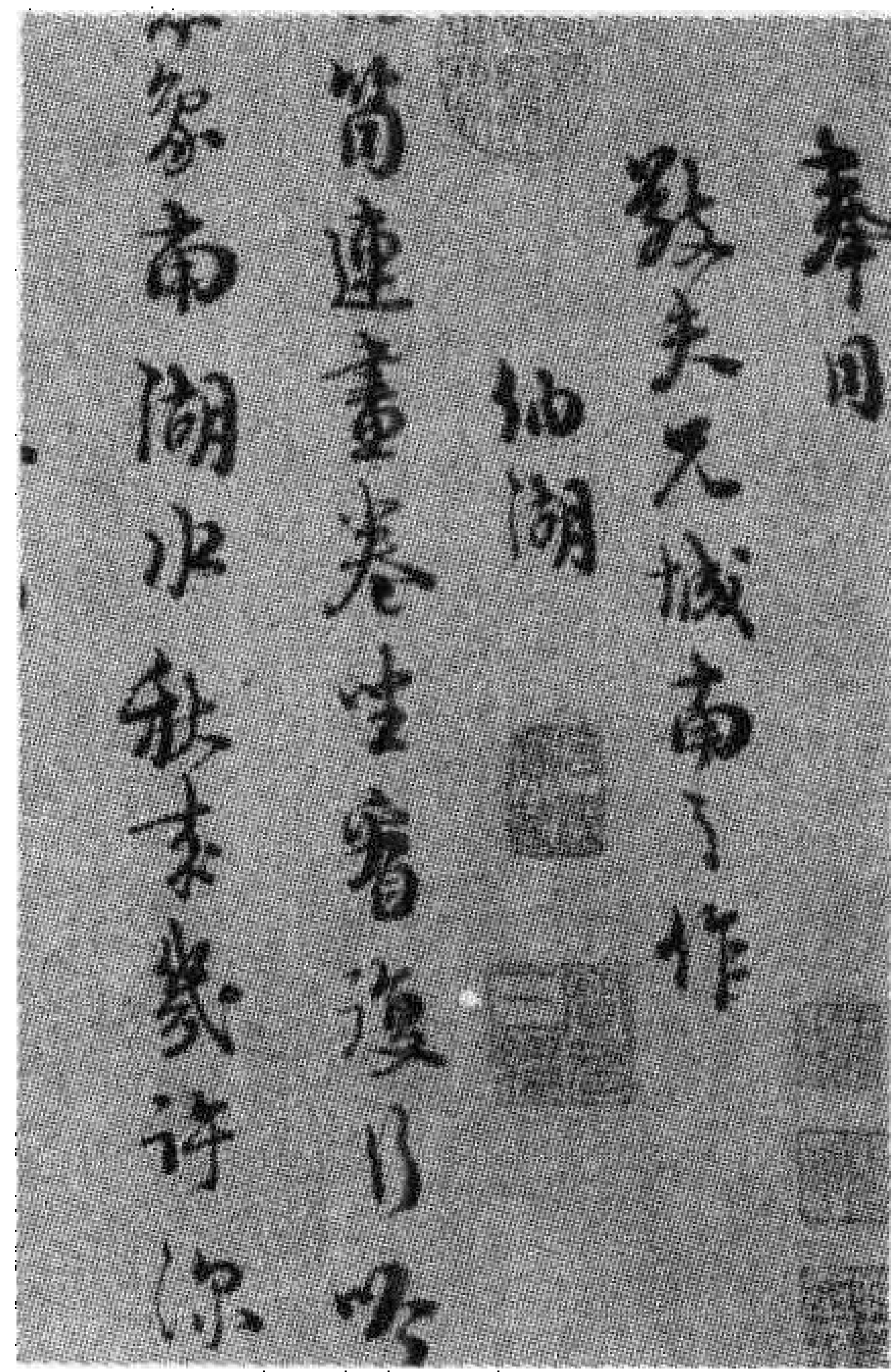


黄庭坚《花气薰人诗帖》

理、脱离社会现实的思想倾向。与此相应，在文坛上，形式主义的创作倾向又重新抬头。苏轼弟子之一的黄庭坚提倡写诗要做到“无一字无来处”，要“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他在诗作中“搜猎奇书，穿穴异闻”，竭力显示自己的渊博，在技巧上又竭力锻炼。这种诗风因适应当时士大夫脱离现实的思想倾向而风靡一时，并且形成一个影响很大的文学流派——江西诗派，统治着北宋末年的诗坛。词的创作在北宋末年也走上追求格律化的道路。号称苏门著名词人的秦观，艺术上虽然有相当成就，但风格却类同柳永，并没有继承苏轼的豪放词风。被称为当时词坛泰斗的周邦彦，虽然在艺术技巧方面有很大成就，他的词作讲求曲折、回环，变化多端，语言典雅、含蓄，开创了用长调咏物的风气，在格律方面尤其讲究，但内容却主要是描写儿女闲情，显得空虚、贫乏。著名女词人李清照虽然才华焕发，善于用优美、生动的语言创造出鲜明、完美的艺术形象，但她反对苏轼的豪放词风，抨击苏词是“皆句读不葺之诗”，“又往往不协音律”。她自己十分讲究格律，在词作方面也成了同豪放派对立的“婉约派”正宗词人。这种对豪放词风的否定和追求格律、忽视作品思想内容的形式主义倾向，是对北宋中期诗文革新运动的倒退。

到南宋初年，由于金兵南侵，许多士大夫激于北宋灭亡、故土沦陷之痛，用诗、词等文艺形式表达了要求抗金、反对投降的心声，北宋中期诗文革新运动所开拓的现实主义道路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爱国主义激情成了这时期诗、词的主要旋律。连在北宋末年以“婉约派”正宗词人著称的李清照，这时也写出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愿将血泪寄河山，去洒青州一抔土”等悲壮激烈的诗句，抒发自己的爱

国激情和对投降派的愤慨。陆游是这时期爱国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他的诗歌热情奔放，大都以收复失地为主题。他所写的“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等等许多表述自己心迹的诗句，唱出了这一时代民族和人民的最高亢的歌声，几百年来一直激荡着历代爱国志士的心灵。陆游的诗不仅充满爱国主义激情，艺术上也有很高的造诣，许多诗都别具风采，成了为人传诵的名作。辛弃疾的词，则是这时期爱国主义词作的优秀代表。他继承了苏轼所开创的豪放派词风，以强烈的爱国热情、横溢的才华和多样的艺术风格，把词的境界扩展到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他那里，无不可运用的题材，无不可描绘的事物，无不可表达的意境。他的词唱出了当时广大人民要求抗金的时代最强音。他用“要挽银河天浪，西北洗胡沙”，“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等词句，表达了自己要挽狂澜于既倒，恢复故国河山的豪情壮志。同时，他也用诸如“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其血三年化为碧”，“万事重教，浮云来去，托了冲冠发”这样的词句，抒发自己在南宋腐朽统治者的排斥下，壮志难酬的悲愤。辛弃疾的词不仅意境比苏轼广大得多，思想性比苏词更加强烈，而且表现手法丰富多彩。他词中应用词汇之丰富是其他词人所不能比拟的。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辛词都是当时词坛的权威和典范。以陆游、辛弃疾为代表的爱国主义诗、词作品，使南宋前期成了宋代文学的一个辉煌灿烂的时期。



朱熹《城南唱和诗卷》

在南宋时期，由于统治者偷安岁月，许多大官僚都沉浸在歌池酒海之中，南宋末年词人文及翁曾赋词感慨地说：“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适应上层官僚这种糜烂生活的需

要，在文坛上就出现一批依附于统治阶级的文人清客，其代表人物，在词坛方面有姜夔、史祖达、吴文英等人。他们自己不曾做官，经常往来于仕宦之家，充当大官僚的门客。他们的词作，也大都是为了同他们所依附的达官贵人应酬。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作品只讲格律和雕琢词藻，在字句间精心刻意，或陶醉于自然景物，或着眼于自己的离愁别恨，发泄无可奈何的伤感情绪。姜夔等人的词因为适应那些偷安避世的士大夫的需要，受到他们的欢迎，在当时很有影响，形成一种以讲究格律为主的姜派词风。

在诗歌方面，有所谓“永嘉四灵”及其影响下形成的江湖派。“永嘉四灵”因徐照（灵辉）、徐玑（灵渊）、翁卷（灵舒）、赵师秀（灵秀）四个诗人都是永嘉人，名字又都有个灵字而得名。他们同姜派词人一样，也都喜欢攀附达官贵人。他们的诗歌主要也是些应酬之作，诗只是他们猎取名家桂冠的手段，所以他们也注重在炼句炼字上下功夫，思想境界很窄。在他们影响下形成的江湖派，除少数作家外，大都是些所谓“山人”和“食客”，他们写诗主要是以文字做游食，所以意境浅薄。南宋后期的词坛主要由姜派词人统治着，诗坛则笼罩着“永嘉四灵”及江湖派的影响，形式主义文风又占据统治地位。直到南宋末年，因元兵入侵及南宋军民掀起悲壮激烈的抗元斗争，爱国主义才又成了一些关心南宋灭亡命运的诗、词作品的旋律，出现了文天祥、刘辰翁、汪元量等爱国主义作家。但这时南宋已面临灭亡，这种爱国主义文学作品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南宋后期文坛的萎靡习尚和风气。无论是诗还是词，在南宋后期都走向衰败。

在散文、诗、词等文学形式发展的同时，包括“话本”和戏曲两大种类的民间说唱文学也蓬勃发展。

“话本”就是白话小说，是“说话人”表演时的底本。“说话人”是随城市市民需要而出现的说书艺人。他们说书的内容，包括短篇的白话小说、长篇的讲史和讲佛经故事三种。其中以“小说”的内容最为丰富，有灵怪、胭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

神仙、妖术等八类。讲史以历史故事为题材。“说话人”说书的内容，开始是民间口头文学，经过一些文化人的记录和整理，就成了“话本”。因为这种民间文学使用的语言接近口语和白话，通俗易懂，内容又主要是市民所熟悉的社会生活中发生过的事和精彩的历史故事，艺术上鲜明生动，为广大市民所喜闻乐见。甚至连皇帝也把小说当作消遣的工具，南宋高宗就很喜欢听“善小说”的“内侍纲”编讲的小说。据罗烨《醉翁谈录》统计，宋代话本达一百多种。可见这种民间文学的繁荣。今天保存下来的宋代话本还有二三十篇，散见于《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等书之中。这些话本虽然有宣传佛教因果报应、宣扬封建伦理等糟粕，但也有许多揭露当时封建统治的黑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话本这种文艺形式的出现，开拓了后代白话小说发展的道路，是明清时期各种优秀长篇小说出现的先河，使中国古典文学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戏曲在唐代以前还只是萌芽，到宋代才适应市民生活的需要而空前发展起来。两宋的戏曲主要是杂剧和南戏。杂剧又叫滑稽戏，以演出带讽刺性的故事为主，演员一般有四五人，登台时用白粉和黑墨化装。南戏又叫“温州杂剧”，首先出现在温州，南宋时流行于南方，有演有唱，能够表演比较复杂情节的杂剧和南戏的发展，为元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唐代出现的傀儡（木偶）戏，到宋代发展成悬线傀儡、杖头傀儡、药发傀儡、肉傀儡、水傀儡等多种。宋代的歌舞，有歌有舞，还有念白表演、叙述故事的大曲和曲破，比起唐代的歌舞，在艺术上也有显著发展和创新。

宋代的美术，在雕塑、绘画等方面都有出色的成就，呈现花开烂漫的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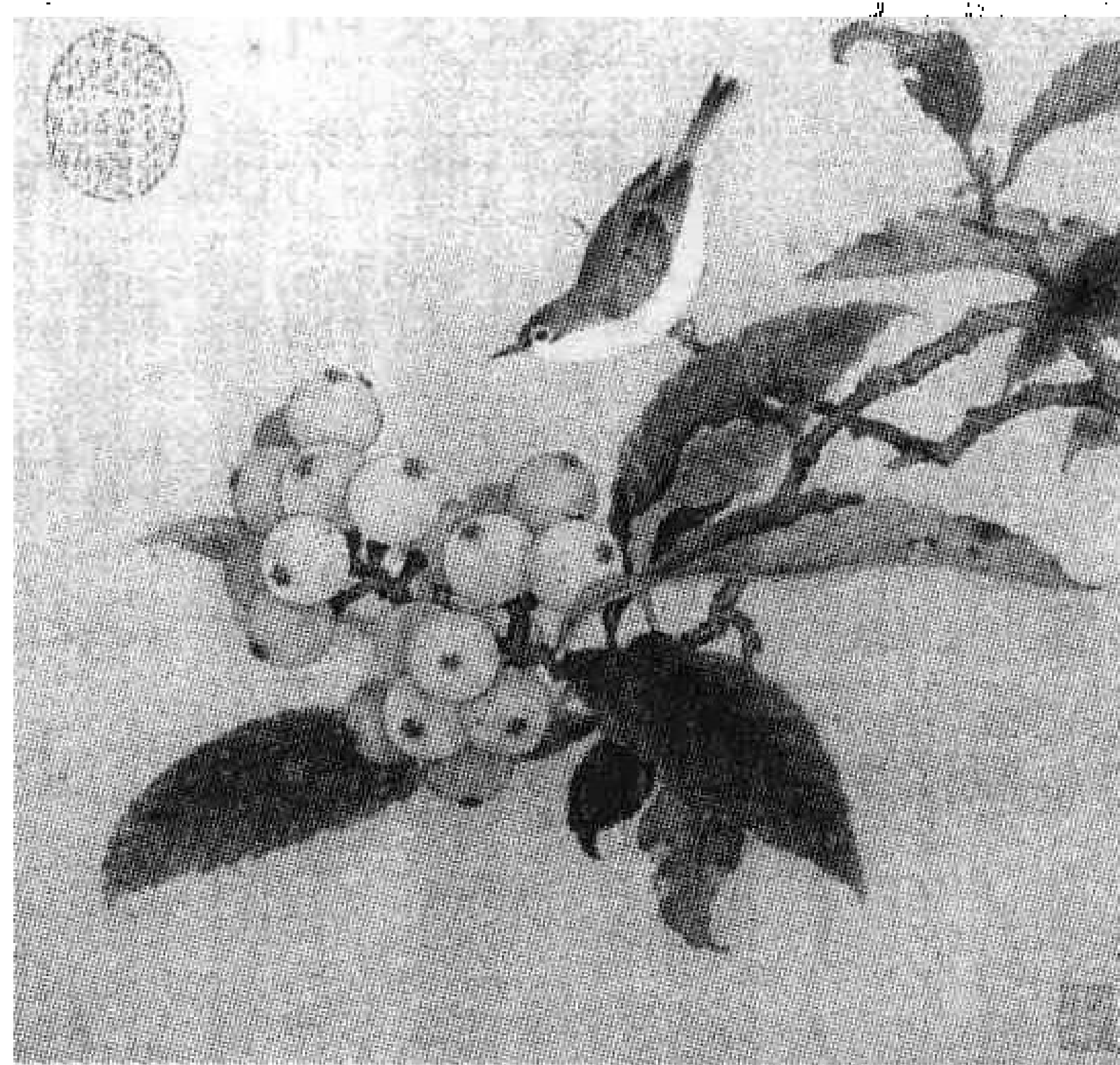
山西晋祠的四十四尊宋代彩塑，通过眉宇、口角的不同表情和腰身、手式的动势，把那些宫女的不同年龄、性格、神情、状态，都一一表现出来。这些彩塑互相左顾右盼，静中寓动，默然传神；其衣着松动自然，彩绘富丽鲜明，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是宋塑中



晋祠圣母殿侍女彩塑图

有代表性的一个组群。四川大足县北山的宋代摩崖石窟，雕刻技术精炼，衣纹平面褶叠，理路清晰，华冠佩饰精雕细镂，刀法锋利，棱角清楚。这些宋代石刻同当地唐代石刻比较，技艺显得更加精湛，反映出来代石刻的水平在唐代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在绘画方面，宋代按五代“画院”的遗制，设“翰林书画院”，网罗一批士大夫画家到其中从事绘画创作。宋代许多著名的画家，都曾在画院中任职。那些“画院”中的画家主要是陪着皇帝在宫廷中画些工整艳丽的花鸟供统治者玩赏，形成了以画花鸟为主的“院体画”，一些画院外的文人画家相从效尤，使宋代花鸟画出现繁荣景象。山水画在宋代也有很大发展。北宋的著名画家有李成、范宽、郭忠恕、燕文贵、郭熙、王诜等人。他们所画山水的共同特点着重表现大山大水的全景，给人以“远观其势”的雄厚感觉，但又各有所长，从各个方面探索了自然美景，使山水画的思想内容和自然形象更加丰富。李成的《读碑窠石图》，范宽的《谿山行旅图》，都是传世佳作。北宋末年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再现了北宋都城开封的繁荣景象，更是一幅不朽的画卷。南宋的山水画家，有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四大家，他们的画主要是用以小见大的艺术手法，对山腰水脚的一木一石着意刻画，表现方法更加多样，构思和技法都更加



宋代花鸟画

成熟。宋代山水画的成就，为后代山水画的发展取得了许多经验，对后代有很大影响。

版画艺术在宋代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唐、五代佛教画像及经卷插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雕版佛画，刻制相当精致，有的还施以淡彩，使画面更加灿烂绚丽。1955 年在日本发现的北宋《弥勒菩萨像》，就是一幅雕版佛画，从这幅版画的细腻作风和柔和线条，可以看到当时版画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随着当时雕版印书业的发展，原来仅用于佛经插图的木刻画，也广泛应用在各类书籍中作为插图和绣像。北宋末年李诫的《营造法式》，以及宋朝政府修订的《经史证类大观本草》等科技书籍，就有大量木刻版画插图。版画突破宗教题材的束缚，这对我国版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新的史书体裁，新的研究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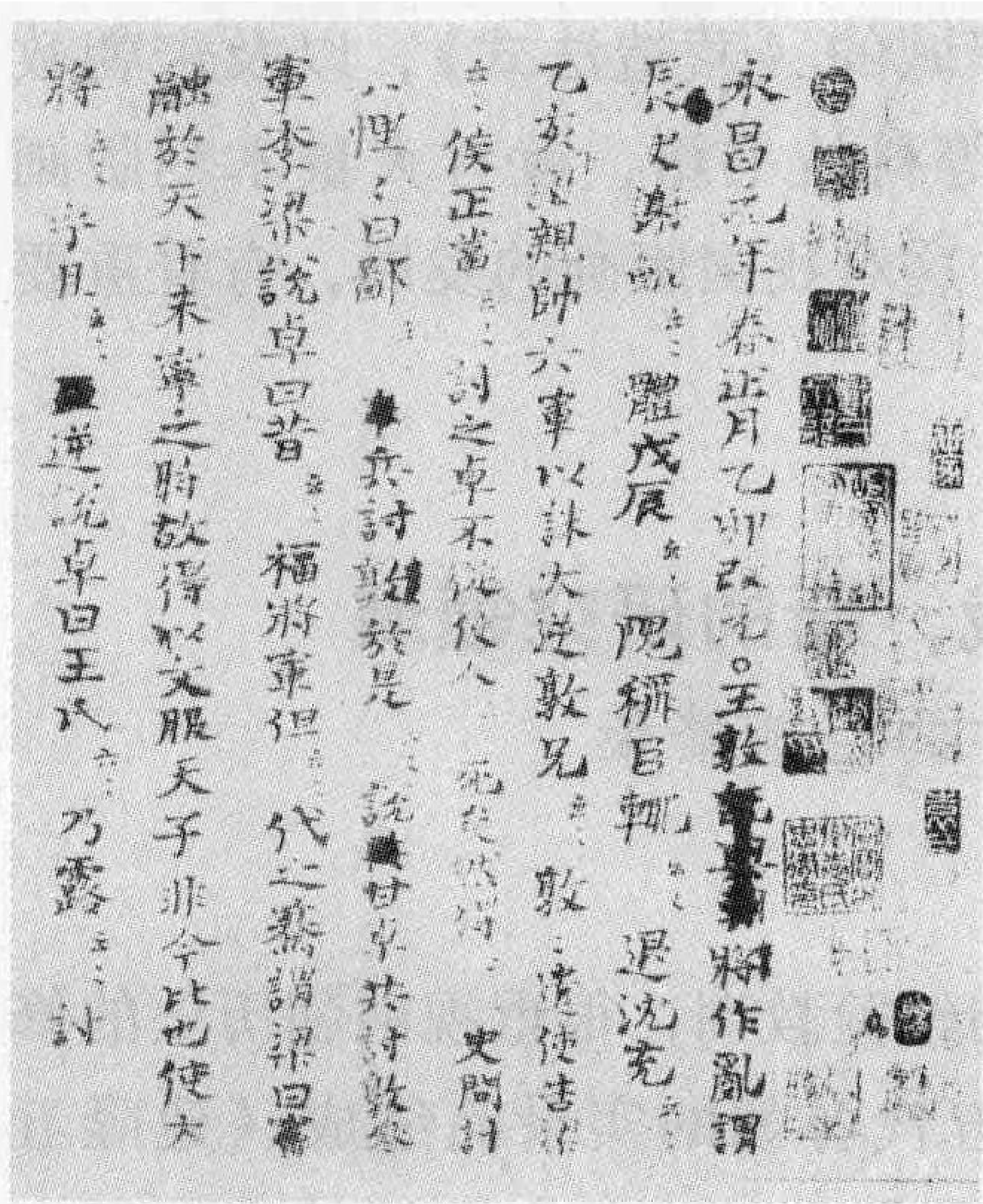
——宋代史学的空前繁荣

宋朝统治者为吸取前代兴亡的经验教训，很重视前朝历史的修纂。北宋刚建立，宰相范质就把五代各朝的实录简编成《建隆五代通录》65 卷。开宝六年（973），宋太祖又下令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史。经过一年多，修成《五代史》150 卷。唐朝的历史，五代后晋时已编成《唐书》（后世称《旧唐书》）。宋仁宗对《唐书》的文笔不满意，又下令重修，由宋祁和欧阳修负责，修成《新唐书》225 卷。《新唐书》不仅删了《旧唐书》的许多繁文，还增补了许多新的资料。该书志的部分所新创的《兵志》、《选举志》、《仪卫志》等条目，为宋以后的历代正史所沿袭。除了朝廷组织编修外，私人编纂前朝史书的也不少。宋真宗时，路振采集五代时吴、南唐等九个割据政权的君臣事迹，撰成《九国志》12 卷。宋仁宗时，欧阳修利用奉命修《新唐

书》之便，重新修订五代史，撰成《新五代史》74卷，这是我国唐代以后唯一由私人编纂的正史。北宋末年的马令和南宋时的陆游，则分别编纂了《南唐书》30卷、《南唐书》15卷。这些官修、私撰的唐、五代断代史的出现，说明当时统治阶级从上到下都很重视对前朝历史经验的总结。这是宋代史学繁荣的一个重要方面。

各种不同体裁的通史的编纂，在宋代更是获得辉煌的成果。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宋代通史中的不朽之作。这部书从宋英宗时就开始编写了。宋英宗专门在秘阁中设书局，让司马光主持编写从战国到五代的历代君臣事迹。宋神宗熙宁变法期间，司马光因反对变法，辞官居于洛阳继续编书，书局也随他迁到洛阳。他在精通史学的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的协助下，搜集了历朝正史、实录，以及大量杂史、传记、小说、地志、文集的材料，由刘恕等三人分段编写出“丛目”和“长编”，然后由司马光执笔删削定稿，并一一考核史实，前后用了19年时间，把战国至五代1360余年的史事，按《左传》的体例，编成一部294卷的编年体历史巨著。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他“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目的在于为宋朝统治提供借鉴。宋神宗甚为欣赏，赐名《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的文字虽长，但优美通畅，全书像一气呵成，其中的唐、五代部分，记载了许多正史中见不到的史实，史料价值极为珍贵，确实是一部不朽的史学名著，在宋元以后一直受到历代史学家的推崇，成了后代编年体史书的典范。



《资治通鉴》书影

《资治通鉴》刊行后，南宋初的袁枢把《通鉴》中分散在各卷的同一历史事件的资料辑录在一起，编成《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以记事为中心的史书新体裁。这种史书虽然没有多大史料价值，但它为人们了解一个历史事件提供了方便，为明清许多史家所仿效。

南宋初郑樵编撰的《通志》及宋元之际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是另一类型的通史巨著。《通志》的精华，是记述从上古至唐代典章制度沿革的二十略。《文献通考》分田赋、国用、户口、职官等二十四考，记述了从远古到南宋后期各种制度的沿革，对宋朝制度的渊源和变化，记载尤其详细，是研究宋朝历史不可缺少的史料。《通志》、《文献通考》同唐代杜佑编撰的《通典》，被后人并称为“三通”，都被视为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史籍。

重视当代史的记述，出现不少当代史名著，也是宋代史学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

宋朝政府对修撰当代史也很重视，有一套完整的修史机构和制度。由朝廷编修的本朝史，有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会要等六种。起居注记录了皇帝每日处理的大小政事及各种活动。时政记记录的是皇帝和宰相、枢密使所商议的军国大事，有中书时政记和枢密院时政记两种。日历是编年体的原始史实汇编，材料来源除起居注和时政记外，还有内外官司收到的圣旨指挥。日历经过加工整理，就编成比较简练的实录。国史是在实录的基础上修成的，它同实录的区别主要是：实录为编年体，每个皇帝死后都编成一朝实录；国史为纪传体，是几个皇帝统治时期的历史。宋朝修成的国史，有仁宗时编修的《三朝国史》（包括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神宗时编修的《两朝国史》（包括仁宗、英宗两朝），孝宗时编修的《四朝国史》（包括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理宗时编修的《中兴四朝国史》（包括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等四部。会要是另一种体裁的当代史。它把一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分门别类编在一起，当时是为

了处理政事的方便而编的政书，在后代就成了珍贵的史籍。现存《宋会要辑稿》，就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当时官修各种会要的残本，内容极其丰富。宋朝政府编修的当代史虽然大部分已经散佚，但它为元朝修撰《宋史》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料，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起了有益作用的。

官修的实录、国史，为私人修史提供了资料的方便。宋代除短时期外，对私人修撰当代史都采取容许乃至鼓励的态度。所以，在有宋一代，私人修撰本朝某一时期历史的风气甚盛，并获得可观的成果。仅流传至今的宋人私撰的当代编年史就有十多部，其中最重要的是南宋李焘用了将近 40 年时间编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980 卷，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 卷、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250 卷。属于纪传体的私史，最为著名的是王禹偁《东都事略》130 卷。这些私人修撰的当代史，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种私人修撰大部头当代史的风气之盛及成果之富，是唐代以后任何朝代都不能比拟的。

地方志的编撰，在宋代也蔚然成风。宋太宗时，乐史撰成《太平寰宇记》200 卷。该书引用的历代史书、地志、文集、碑刻、诗赋等资料约 200 种，不仅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经济史的资料，而且比唐代的《元和郡县志》等地理书增加了人物、艺文等条目，使历史地理志书的体例发生重大变化，内容也更加丰富。《太平寰宇记》所开创的新体例，为以后的地方志所仿效。从此，地方志成了包括州县沿革、地理、风俗、物产、人物、艺文等多方面内容的重要史籍。不过，宋代地方志的编纂方向，北宋和南宋时期还有重要的变化。北宋时期继《太平寰宇记》之后，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及欧阳忞的《舆地广记》等书，都是记载整个封建王朝统治区各郡县的地理和历史。南宋时期出现的《三山志》、《吴郡志》、《四明志》等许多地方志，则都着重记述一郡一县的地理历史及风物人情。这种专门记述一州一县情况的地方志的编纂，是明清时期地方志普遍出现的先河。

除了各种体裁、各种类型史书的卓有成果的编纂外，宋代史学还在几个方面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首先是金石学成了史学研究的一个领域。在宋代以前，古代的金石文物只是士大夫手中玩赏的古董。宋代的学者开始把金石学的研究和古代文献的考订结合起来。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是这时期金石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集古录》收集了历代古器物和石刻的铭文拓本400多种，先著目录，再把内容研究的成果写成跋尾，是我国现存最早金石学研究的专著。《金石录》是赵明诚在其妻子李清照的帮助下编成的，全书收集历代碑刻铭文拓本共2 000种，也同《集古录》一样，先著目录，再写跋尾。北宋后期吕大临编的《考古图》及宋朝政府编著的《宣和博古图》，是著录和考释商周铜器铭文的专著。这两部书都有器物的分类、名称、形制、铭文，并附有铭文考释和考证说明，还注明收录文物的出土地点和收藏处所。南宋洪适的《隶释》和《隶续》，是专门考释与历史有关的汉魏篆隶碑文的著作。这些金石学方面的著作，使古代文物从古玩变成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从而使历史学扩大到金石学领域。

第二个方面是史学批评的开展。吴缜先后撰《新唐书纠谬》20卷、《五代史纂误》5卷，是这时期史学批评的代表作。《新唐书纠谬》列举了《新唐书》的错误400多处，大都言之有据，批评中肯。《五代史纂误》指出了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的失误200多处。欧阳修是当时的文豪，他编撰的史籍有人敢于提出批评，并用了“纠谬”这样尖锐的题目。而这样尖锐的批评在当时还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也是史学繁荣的一个景象。

其三是对历史问题研究和评论风气比较活跃。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许多“臣光曰”，就是他结合历史事件发表的评论。欧阳修的《正统论》、《本论》、《朋党论》等一系列史论，都从自己的政治立场出发，从历史事实中引出一定的结论，实际上是一些史与论结合的历史学论文。吕祖谦的《历代制度详说》，是研究历

代各种制度的专著，在许多问题上都有作者自己的见解。朱熹的门人所编的《朱子语类》，也记录了朱熹对许多历史问题的评论。上述所列举的史学评论和论文，虽然许多观点都反映了作者的唯心史观和政治立场，有的还是作者在政治斗争中的武器。但这种结合政治斗争的需要而研究历史和评论历史事件的风气，却使宋代的历史学显示出一定的战斗性和生气。

五、佛、道俱兴，“事魔”盛行
——宋代的宗教

宋代公开流行的宗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宋朝统治者很重视利用这两种宗教对人民的麻醉作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宋真宗所说的佛、道、儒“三教之设”，宗旨“皆劝人为善”，“道、释二门，有助世教”，就反映了最高统治者对这两种宗教的重视。

宋朝的大多数皇帝都对佛教的发展持赞助的态度。宋太祖不仅下令在成都雕刻印刷《大藏经》，还下令西川转运使沈义伦从成都抄写金银字金刚经，送到都城开封供奉。乾德四年（966），有僧150人要求去印度求法，宋太祖特地赐钱三万以供这些僧人费用。宋太宗更是一个佛教的鼓吹者。他下令在开封设“译经院”，后又改名“传法院”，并赐额“传法”，让印度僧人天息灾、法天等人主持翻译佛经，又选派50个童子在院中学习梵学梵字。佛经译出后，宋太宗亲自写序附在每部佛经的前面，由印经院刊印，使佛经广为流传。

宋真宗对佛教更加热衷，他不仅经常对佛教寺院进行赏赐，一再特许寺院增加度僧人数，广设度僧的戒坛，为僧人吸收新的成员提供方便，还亲作《崇释论》，把佛教提到与孔孟之道同等的地位。宋真宗还亲自在便殿阅试各个寺院“主首”的“行业”，从中择优选派僧官。宋仁宗则于至和元年（1054）下令增加每年的度

僧人数，废弃宋太宗以来300僧人岁度一人的规定，恢复宋太祖时100个僧人度一人的旧制。宋神宗不仅批准在广西、荆湖少数民族聚居地增建僧寺，还下诏为他的妃子邢氏修佛寺，赐名“多庆禅院”。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儿子赵煦（宋哲宗）也崇信佛教。元丰七年（1084），宋神宗患病，赵煦特地手抄佛经二卷，要为其父祈福。

由于皇帝扶植佛教，皇室贵族和文武大臣中有许多人也信奉佛教。

在北宋统治集团的热心扶植下，佛教在宋朝统治区迅速发展。到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僧人达到39.7万余人，尼姑达6.1万余人。北宋中期，虽然一再有人呼吁裁减僧尼，以减冗费，但实际上僧尼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僧尼不仅人数迅速增加，政治和经济势力也很大，有的僧人被授予官职，有的交通皇亲国戚和权贵，恃势强占农民土地。寺院成了当时一股重要的兼并势力。到北宋末年，因为宋徽宗听从道士林灵素的建议，曾下令将佛教寺院一律改成道教宫观的名称，改佛号为大觉金仙、仙人、大士，把佛号和僧尼称号也改成道教称号，企图把佛教强行改造成道教。佛教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但这种改变只是名称的改变，僧尼和寺院的势力并没有真正受到打击。不久，林灵素失宠，北宋也很快灭亡，宋徽宗对佛教的压抑也解除了。

南宋时期，因为政府一直把出卖度僧牒作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来源，大量出卖度牒，僧尼的人数也继续增加，在宋高宗绍兴年间，曾流传着“无路不逢僧”的说法。宋高宗虽然标榜不使佛教太盛，其实佛教从南宋初年起就继续兴盛。据绍兴二十七年（1157）南宋官员的估计，认为当时南宋有僧20万。这时南宋仅剩下半壁江山，而这个僧人数目却相当于北宋天禧五年统计数字的一半，同熙宁年间北宋全境的统计数字几乎相等，可见，南宋的佛教之盛不减于北宋的最盛时期。

宋代流行的佛教宗派，主要是宣传个人只要修身养性，极乐世

界就在眼前的禅宗。宣传只要“修善”、“积德”，诚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能消罪治病得福，死后就能进入西方“净土”解除人生苦难的净土宗，在宋代也迅速传播。南宋初年，从净土宗中还衍生出一个新的佛教宗派——白莲宗。白莲宗的创始人茅子元被宋高宗赐号“白莲导师”。白莲宗后来发展成很有影响的白莲教。

道教在宋代也得到统治者的扶植。

北宋初年，统治者在优遇佛教僧尼的同时，也给予许多道士优厚的宠遇。宋太祖在征北汉途中，曾特地召见真定府龙兴观道士苏澄隐，希望他到开封新建的建隆观居留，同时赐予茶 100 斤，绢 200 匹。宋太祖还亲到龙兴观，向苏澄隐问养生之术。宋太宗同一些道士也有很深的关系，京城建隆观道士王怀隐善医，宋太宗未登皇帝宝座时，就让王怀隐侍候自己。为了促进道教的发展，宋太宗还下令校正道教经典《道藏》3 737 卷。

到宋真宗时，因为道教所设的神仙符箓骗局对他制造天书符瑞骗局大有作用，宋真宗对道教大为尊崇。他宣称“天书”是赵氏的始祖轩辕皇帝奉玉皇大帝之命授予他的，特地在京城修建了规模十分宏丽的玉清昭应宫，供奉天书，在各地方州郡，也都相应建造了许多道教宫观。除了经常在京城举行各种大规模的道教“法醮”仪式外，他还不惜耗用国库大批钱财，率领文武大臣亲到亳州（安徽亳县）进谒道教尊奉老子的“太清宫”，把被道教尊为始祖的老子尊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宋真宗还把秘阁中所藏道教典籍全部发至杭州，由张君房主其事，集中一批道士，把秘阁的道书同苏州、越州（今绍兴）、台州的旧有《道藏》，加以校定，编成《大宗天宫宝藏》4 565 卷。因为宋真宗大力扶植，道教的发展出现一个高潮。

宋真宗以后的几个皇帝对道教的尊崇虽然没有像宋真宗那样狂热，道教的政治势力有所下降，影响不如佛教，但是，道教的发展却继续受到统治者的扶植。在北宋中期，在籍的道教的道士和女冠，一直在二万人左右，保持着真宗崇尚道教时期的数额。道教对

宋代社会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道藏》中的《太极先天之图》，就在这个时期被周敦颐和邵雍演化为《太极图》和《先天图》，成为宋代理学的一个渊源。

北宋末年，宋徽宗崇尚道教的狂热大大超过了宋真宗。道士刘混康、王老志、王仔昔、林灵素等人相继得到宋徽宗的宠信，宋徽宗不仅先后在京城兴建玉清和阳宫、迎真宫、上清宝箓宫等道教宫观，还下令各州县都兴建道教宫观。他经常让道士帮他编造神仙降临的鬼话，举行祀天仪式，还专以道士百人执仪仗前导。因为林灵素编出了宋徽宗为天上神霄玉清王降世的鬼话，宋徽宗即把玉清和阳宫改名玉清神霄宫，并让道士们册立他为教主道君皇帝，胡诌自己是奉上帝之命下凡当“人主”，“令天下归于正道”。因为宋徽宗通过道教给自己的腐朽统治披上了神圣的外衣，道士也得到了空前绝后的宠遇。宋徽宗特设道阶26级，道官26等，授予道士，道士都有俸禄，每个道教宫观都给田上百上千顷。每设大斋，都要赏给道士缗钱数万。林灵素等道士气焰显赫，出入朝廷敢与诸王争道，甚至见了皇太子也不回避。在地方州郡，宋徽宗规定知宫观道士与各级地方官以客礼相见。道教宫观俨然是地方上另一官府机构。宋徽宗还规定道士序位在僧之上，给予道士高于僧人的政治地位。后来又听从林灵素的建议，下令把佛教寺院都改成道教宫观，佛号改成道号，僧尼称呼也改为道教的称呼。道教的政治势力在这时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林灵素和另一道士张虚白，被开封人称为“道家两府”。仅这两个道士的门徒就差不多有二万人，整个北宋统治区道士的人数就更多了。

北宋的灭亡和迷信道教的宋徽宗被金兵俘虏北去，这对盛极一时的道教无疑是个严重的打击。南宋建立后，改为宫观的寺院全部改了回去，佛教僧人的地位又居于道士之上。在整个南宋时期，道教再没有出现宋真宗或宋徽宗时期那样的兴盛局面。但是，南宋政府对道教仍然是保护的。据绍兴二十七年（1157）统计，当时僧人20万，道士1万，这个比例同北宋中期的僧、道人数比例基本

一样。南宋政府在出卖僧人度牒时，也出卖道士度牒，使道教继续存在和发展。

在佛、道两种宗教因得到统治者的扶植而发展的同时，被统治诬称为“事魔”，并严加禁止的各种异端宗教，也在民间秘密流行着。

宋代所谓“事魔”，又称“吃菜事魔”，包括摩尼教和金刚禅、二会子等等佛教异端派别。南宋时浙右的“道民”，也属于“吃菜事魔”的“魔教”。这些宗教的活动方式都是夜间聚众诵佛焚香，天晓即散，有严密的组织，参加者不茹荤饮酒，有互相帮助的义务。这种异端宗教的教义，主要是使人避害而趋利，背祸而向福。在宋代阶级矛盾尖锐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秘密宗教使那些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得到精神上的寄托，在农村地区得到广泛流行。从北宋末年方腊利用这种秘密宗教组织起义后，统治者对“吃菜事魔”严厉取缔，但这种秘密宗教活动在南宋江淮及闽、浙地区却继续盛行不衰。

第十二章　中外友好关系的发展

一、“招接通好”，睦邻互利

——中外政府间的友好关系

在宋代，历朝统治者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在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的同时，又派政府使臣及委托海商向海外国家的政府转致“招接通好”的意向。外国使臣来宋朝，都受到盛情款待。北宋末年，宋朝政府还特地在泉州设置“来远驿”，负责接待各国来华的友好使者，并且规定外国使者从泉州到都城开封途中，所经州军的官员要用伎乐隆重接待和迎送。对外国政府以“朝贡”方式来华进行政府间的贸易，宋朝不仅予以减免征税的优待，还以“回赐”的方式给予优厚的报偿。宋朝奉行的这种对外开放的政策，对中外友好关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亚洲许多国家都同宋朝建立了以“朝贡”为方式的官方贸易往来。宋朝同许多国家的政府之间，都建立了睦邻友好的关系，一些海外国家的统治者，都曾接受过宋朝的封号。

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王氏王朝，在北宋初年就同宋朝建立密切联系。有宋一代，见于记载的宋、高丽的使节交聘，高丽遣宋使臣达57起，宋朝使臣赴高丽达30次。宋朝和高丽政府，都给予从对方来的贸易商人种种优惠的待遇，所以，宋朝和高丽之间海商的贸易往来也特别密切。在两宋时期，到高丽的宋朝海商和水手，见于记载的就约5 000人，许多宋朝商人都受到高丽政府的设宴招待，甚

至被邀请参加节日盛会的观礼活动。通过政府间及私商的贸易往来，高丽从宋朝输入大批的丝织品、瓷器以及茶叶、书籍、手工艺品等物资，宋朝也从高丽输入大量野生药物及果品、布匹、铜器等器物。这时期宋朝同高丽王氏王朝的友好关系，是中朝两国友好关系史上的重要篇章。

与中国仅一衣带水相隔的日本，同宋朝也建立友好的关系。日本国人滕木吉于咸平五年（1002）随中国海商来宋朝，宋真宗特地予以接见，表示了对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意向。此后，日本政府通过海商多次向宋朝政府递送文牒。南宋时，宋孝宗曾派水军使臣施闰、李忠随海商出使日本，日本政府也于乾道九年（1173），委托明州的海商携带方物向南宋“入贡”。宋朝政府对发展同日本的贸易往来始终持积极态度。日本政府对开展同宋朝的贸易也很重视，特别是在南宋时期，日本政府采取对外开放政策，不仅鼓励本国商人到中国贸易，还在对华贸易的主要口岸博多港内开凿了一个长袖形的人工港，称为“袖凑”，作为同宋朝贸易往来的船舶的停泊处。中、日两国间的贸易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有宋一代，从中国输往日本的货物，有四五十种之多，主要是纺织品、香药、陶瓷器、竹木、书籍、茶叶，还有各种珍禽异兽，这些商品都为日本人所珍爱。由日本输入宋朝的货物，主要是木材和硫磺，还有金子、珠子及各种工艺品。宋朝政府很重视购买日本出产的硫磺以用于配制火药，日本的其他货物也受到中国人的喜爱。近年来在日本“袖凑”遗址附近所发现的中国商人、船员的居住遗址及宋代的铜钱和瓷器，就是这时期中、日两国海上贸易频繁往来的历史见证。

在中国南面的中南半岛上，两宋时期的主要国家有交阯（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真腊（今柬埔寨及越南南部一部分）、真里富（今马来西亚境内）等。这些国家都同宋朝建立政治或经济的联系。

交阯在唐代是唐王朝的辖境，五代后晋时建立独立政权，但很快又四分五裂。北宋初，丁部领统一交阯，建立大瞿越国，自称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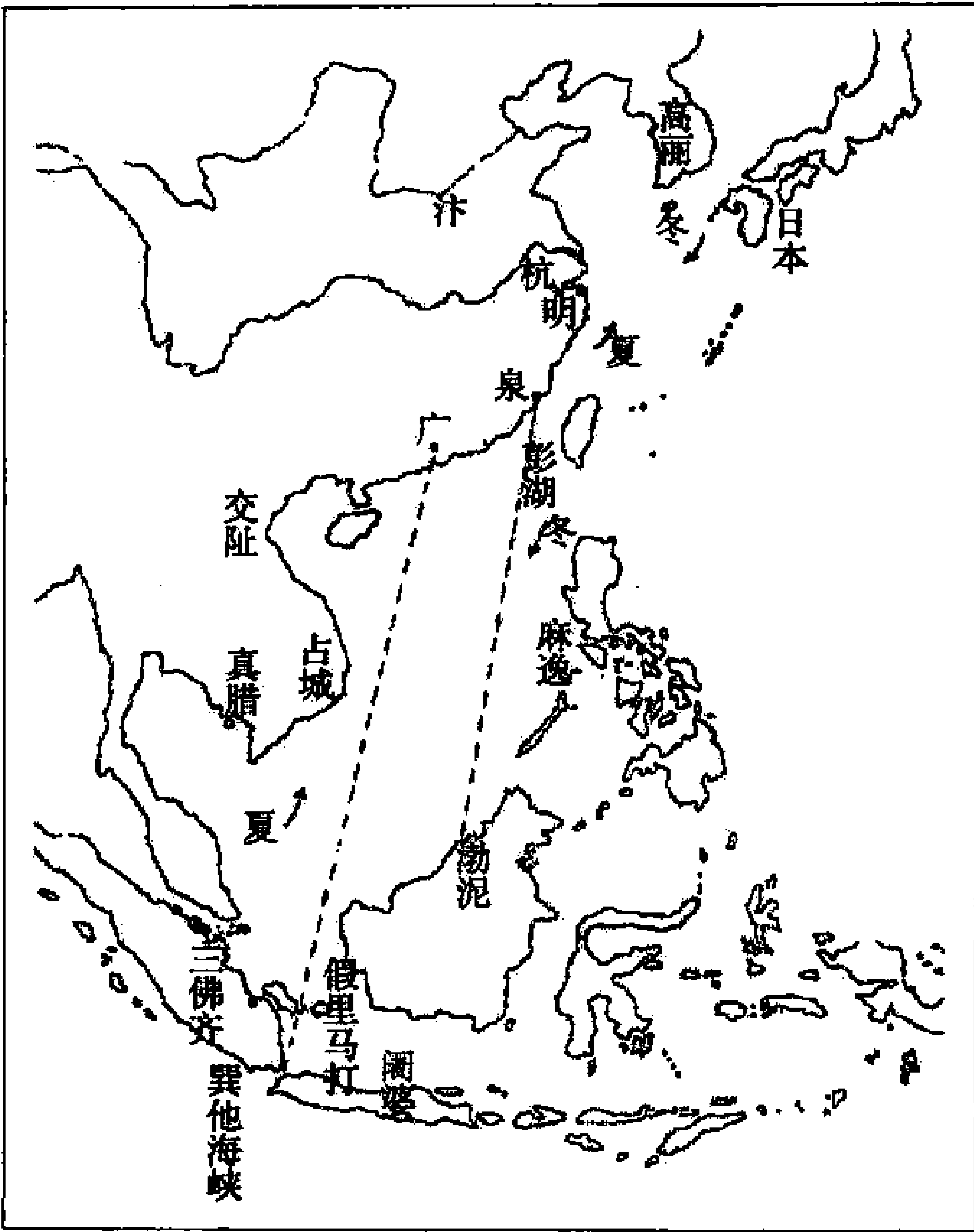
帝。宋太宗时，丁部领及其长子被臣下杀死，幼子丁璿继位，权力被大将黎桓篡夺。宋太宗曾为此派兵讨伐，结果失败。黎桓为了取得宋朝对自己篡权的承认，遣使向宋朝进贡谢罪。不久，黎氏王朝正式取代丁氏王朝，宋朝按黎桓的请求，册封他为交阯郡王。公元1009年，大将李公蕴篡夺黎氏王朝的政权，建立李朝，宋真宗也册封他为交阯郡王。宋朝还在邕州（今广西南宁）、钦州（今广西钦州）等处设置博易场，开放对交阯的贸易。无论是丁氏王朝还是黎、李两个王朝，都同宋朝通过“入贡”等各种方式进行贸易往来。但是，黎朝和李朝在发展对宋朝的贸易的同时，都不断出兵侵扰宋朝的边境。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冬，李朝还对北宋发动大规模入侵，攻陷北宋广西的钦（今广西钦州）、廉（今广西合浦）、邕（今广西南宁）等州，屠杀宋朝居民十余万。宋朝被迫调兵反击。李朝兵败，不得不遣使到宋军求和。宋军因不习水土，攻入交阯境后又粮食不继，便允和撤兵。从此，李朝承认宋朝为宗主国，同宋朝使节往来不断。到南宋末年，继李朝而起的交阯陈氏王朝，还曾同南宋订立过共同抗击元兵入侵的协议，南宋也曾调拨一批弓箭，支援陈氏王朝的抗元斗争。

占城同宋朝的关系比较密切，在北宋建国第二年（建隆二年，公元961），就派使节到宋朝。有宋一代，占城来宋的使节，见于记载的就有40多起。宋仁宗时，占城因为经常受到交阯李氏王朝的侵扰，曾于皇祐二年（1050）遣使到宋朝“入贡”，向宋朝申诉该国受交阯欺压的情况，要求宋朝政府出面调停，使交阯不要再侵夺占城州府。占城国王也接受宋朝的册封。

真腊在两宋时期曾是中南半岛上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其疆域包括今柬埔寨及越南南方大片地区。宋朝政府也很重视发展同真腊的友好关系。为对付交阯的入侵，宋神宗曾派刘富由广州出发，带着宋神宗的诏书，航海出使真腊国。真腊国王曾让刘富带回本国贡物。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真腊国派出使臣14人到宋朝，受到宋徽宗的接见，这批使臣在宋朝停留了一年多才辞行回国。南宋

时，宋高宗又于建炎三年（1129）对真腊国王加以册封。真腊同宋朝的贸易往来也有发展。南宋时，真腊大商有一次就同时发四艘大船到泉州港贸易黄蜡，可见贸易的规模是相当大的。

真里富同宋朝的友好关系是在南宋初建立的。当时有个真里富大商人到明州（今浙江宁波）经商，不幸病死于明州。宋朝明州地方官不仅没有没收他的巨万资产，还为这个商人治办棺材，让这个商人的随行人员护送归国。这事使真里富国王大为感动，第二年特地派使臣来华，向南宋政府致谢。从此，真里富国人也向宋朝入贡，发展同宋朝的贸易往来。



宋代泉州与东、西洋交通示意图

两宋时期，位于中国南海以南的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的主要国家，有三佛齐（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岛）、阇婆（在今爪哇岛）、渤泥（今文莱）等国家。三佛齐位于由中国诸港到印度洋北岸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要冲，航海顺风时只要 20 天就可以到达广州，到泉州港也只要一个多月的航程。三佛齐与泉、广二港之间已有固定的航线，不仅双方的商人往来不绝于道，三佛齐政府同宋朝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三佛齐国王派使臣来宋朝对宋真宗说，本国建佛寺，为宋真宗祝寿，要求为该寺赐名及赠送铜钟。宋真宗十分高兴，特赐名为“承天万寿”，并下令铸钟赠予。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三佛齐詹毕国主及主管国事国主之女”还专门寄信及礼物给广州主管市舶的官员。有宋一代，三佛齐向宋朝派遣的使者，也有数十起之多。除了三佛齐以外，阇婆和渤泥从北宋初年起，也都通过派遣使臣随海商

到宋朝“朝贡”，同宋朝建立密切的贸易联系。

在菲律宾群岛上麻逸（今民都洛岛）、文古老（今摩鹿加群岛）及其他岛屿，同宋朝也有密切的贸易联系。其中麻逸在北宋时还曾派遣使者到过中国。

在印度尼西亚群岛以西的印度洋北岸，有“西天诸国”和大食诸国。“西天诸国”泛指印度次大陆各国。“大食”是当时阿拉伯地区各国的总称。在两宋时期，“西天诸国”和“大食诸国”同宋朝的海上贸易往来非常密切，大食商人到宋朝的尤其多。许多大食商人还以本国政府的名义向宋朝“入贡”，以获得贸易方面的优惠。宋朝政府对发展同大食诸国的贸易也特别重视，一些为促进宋朝同大食诸国的贸易作出重大贡献的大食商人，还被宋朝政府授予官职。

中南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菲律宾群岛，以及印度洋沿岸这些同宋朝有政治、贸易关系的国家，因为都在中国南海周围及以南地区，在宋代被统称为“南海诸国”。由宋朝输往“南海诸国”的货物，以丝绸和陶瓷为大宗，还有各种金属和金属制品、各种日常生活用品及农副产品。由“南海诸国”输入宋朝的货物，品种繁多，主要是香料、药材及各种奇珍异宝。这种贸易往来都是通过海上航路进行的，它使得联结中国和南海诸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在这时期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

二、“住蕃”与“住唐”

——中外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

随着中外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国人民同亚洲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也进一步发展。

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东海岸，到处都有宋朝商人和水手的足迹。中国商人同海外国家的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

谊，受到所到国家人民信赖和欢迎。在菲律宾群岛的麻逸，中国商船一到，只要把货物交给当地的商贩，让他们帮助“博易土货”，当地商贩销售完毕，就把原议定价偿还中国商人，从来没有发生丧失信用的事。在麻逸附近的其他岛屿，中国商船一到，只要敲起鼓，当地商贩就争着驾驶小舟，用吉贝、黄蜡、番布、椰心簟等土特产与中国商人交易。因为中国商人为这些岛屿的居民带去了他们所需要的用品，所以，有的岛屿的居民每年都盼望“唐舶”（中国商船）的到来。在印度尼西亚群岛，中国商人更是受到热烈欢迎。阇婆国人只要见到中国商人，就像贵宾那样招待住宿，提供丰洁的饮食。渤泥国人更对“唐人”（中国商人）特别敬重，总是以丰盛的酒宴招待，如果中国商人喝醉了，渤泥国人就会扶他们回到住处安歇。在友好邻邦高丽，中国商人更是被作为上宾款待。

从事海上贸易活动的中国海商，因航程遥远，有许多人当年无法返回，居留海外，称为“住蕃”。有的商人和水手在海外长期定居，同当地人民通婚，就成为早期的华侨。在宋代，日本、高丽及交阯等国家，都有中国的侨民。北宋时，日本僧人成寻来华，所乘海船上的梢工林皋吉，就是一个旅居日本的华侨的儿子。许多华侨因为有某种才能，受到侨居国政府的重视。例如，北宋末年，高丽国王城有华人数百，都是福建人经商到那里居留的。高丽王在这些华人中暗中测验其才能，对有才能的华人用高官厚禄挽留，有的人就因此终生留在高丽。1972 年，在文莱发现一块汉字石刻墓碑，上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10 个大字，旁刻“景定甲子男应□甲立”几个小字。景定是南宋理宗最后一个年号，景定甲子年是公元 1264 年。这个在南宋末年埋葬在渤泥（文莱）土地上的“蒲公”，显然是一个曾为南宋官员，后从事海外贸易并侨居渤泥的南宋侨民。

海外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因来华贸易而居留在中国，在宋代称为“住唐”。宋代的广州、泉州、杭州等对外贸易港口，都有从海外各国来的“蕃客”在那里居留。还有许多“蕃客”数代在中国居

住，他们在中国生育的后代，被称为“土生蕃客”。宋朝政府曾根据“蕃客”数代居留中国的情况，就到中国居住已经五世的“蕃客”的财产继承权问题，作了专门的规定。

“蕃客”在中国沿海港口城市居住，都相对集中在一个区域。广州的“蕃客”主要居住在城南滨海地区，也有些大蕃客居住在城中。泉州的“蕃客”虽然与当地居民杂处，但也相对集中在城南一带。

这些长期居住在中国的“蕃客”，虽然有的在侨居地也参与兼并土地的活动，但他们活动的主要方面是从事沟通中外贸易联系，为发展中外海上贸易作出了贡献。有时他们也为侨居地做些好事。例如，南宋初年，福建泉州府属下的晋江县官员受命建造一批战船，在泉州的“蕃客”就慷慨解囊，承担了建造这批战船的全部费用，使晋江的百姓免除一次繁重的科敛负担。各国来华居留的“蕃客”同当地中国居民混杂而居，虽然有时也有摩擦，甚至发生“争斗”，但是，友好相处是“蕃客”和当地居民关系的主流。有的“蕃客”还同当地的居民通婚，在中国成家立业。宋代文献记载说，广州蕃坊中有个姓刘的“夷部”人，娶了赵氏宗室的女子，官至左班殿直。这个“夷部”刘氏，显然是个长期侨居广州，取了汉姓的外国蕃客。蕃客连宗室女都可以娶，同民间女子结合就更为平常的事了。在广州、泉州和杭州，都有专门安葬卒于中国的蕃客的公共基地。据南宋人方信孺记载，广州城西十里的地方，“蕃人塚”“累累数千”。赵汝适《诸蕃志》则记载泉州有大食商人作“丛塚”于城东南，以掩埋蕃客的遗骸。在今天泉州市的东郊灵山上，还保存许多完整的蕃客墓。这些死于异乡的蕃客，所以几百年来能在异乡土地上安息，他们的墓地一直被保存下来，同当地人民的保护是分不开的，它充分反映了当地中国居民对这些长眠异乡的蕃客的敬重和情谊。如果当时的蕃客同当地居民不是友好相处的话，这些蕃客墓要完好保存下来，是难以想象的。

在中外人民的友好交往中，除了商人和水手外，还有僧人的互

访。北宋初年，既有许多中国僧人到印度求法，也有不少印度僧人来华。在宋太宗所设置的译经院中主持翻译佛经的天息灾等人，就是从印度来的僧人。高丽、日本的僧人，则纷纷渡海到中国求法。见诸中日两国文献记载的日本来华僧人，仅南宋中期至后期就达120多人。当时中、日两国的僧人经常委托海商替他们传递相互赠送的礼品及彼此往来的信件，这充分反映了两国僧人通过互访所建立的深厚友谊。

中外人民在进行贸易往来和各种形式的交往过程中，也进行着广泛的科技和文化交流。

宋代的中国，有高度发展和繁荣的封建文化，各种书籍大量雕版刊印和出售，有的书籍就通过政府间的赠送及商人、僧人的贩书和市书，流传到海外地区。以高丽为例，北宋初年，高丽就派"朝贡"使臣及僧人到宋朝，要求宋朝赠予佛经、阴阳地理书及医书。宋哲宗时，高丽又一再派遣使臣到宋朝，要求购买刑法文书、《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各类书籍。对于高丽的购书要求，宋朝总是尽可能予以满足。高丽还通过中国海商，在杭州雕刻佛教《华严经》的印版，运到高丽去刊印。通过海商和僧人之手传到日本的中国书籍也很多。宋朝海商刘文仲一次就把宋朝刊印的《东坡指掌图》二帖，《五代记》十帖，《唐书》十帖，作为礼物献给日本一个大臣。当时从中国输往日本的书籍，除《大藏经》等佛教经典外，还有大批的儒学、道学著作及各种杂书。宋朝刊印的书籍大量外销，是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式。后来日本翻刻宋版《论语集注》，兴起了对宋学的研究，就是宋朝书籍大量输入日本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影响。高丽国有个国王特别喜爱宋朝书籍，每有海商为他购到宋朝印行的书，就换上洁服，焚香接待。像这样酷爱和向往中国的文化，也是书籍传播产生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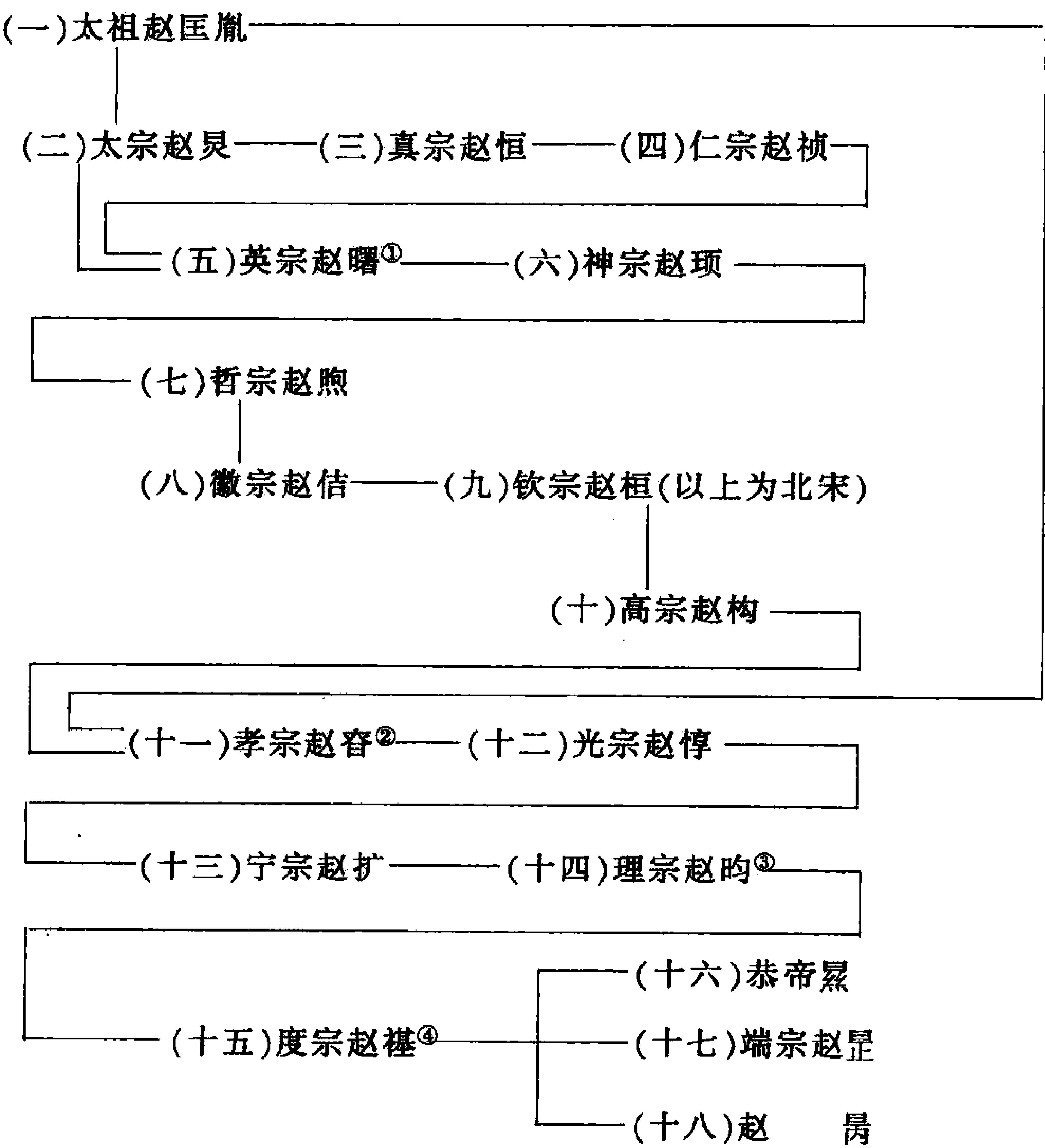
中国的医学和医术，在宋代也向高丽和日本传播。马端临《文献通考·高句丽》记载说，自北宋末年高丽王俣向宋廷请医以后，高丽才掌握中医诊治的技术。可见，宋廷派到高丽的医生，不

仅为高丽王治病，还传播了中国的医术。这时期的日本僧人荣西，在其所著《喫茶养生记》中说："今得唐医口传，治诸病无不效验矣"。"唐医"就是中国医生。荣西的记载，反映了中国医术这时期不仅传入日本，而且获得了很高的信誉。中国制造解毒丸的技术，也是通过一个随日僧入宋的人，从中国传入日本的。

举世无双的中国丝织和制瓷技术，在宋代也随着丝绸和陶瓷器的大量外销而向海外传播。日本著名的"博多织"，就是日本人弥三跟随日僧辨圆到宋朝，学习了广东织和缎子织，回到日本对华贸易的门户博多港（今福冈）兴办起来的。制瓷技术的外传就更广泛了。跟北宋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埃及特米王朝（969—1171），曾仿制过中国的青瓷和青花瓷器。高丽在北宋时也仿制中国越窑及汝窑的青瓷。交阯（越南北方）、罗斛（今泰国）烧制的青釉瓷器，也有中国浙江越窑的影响。日本著名的"濑户烧"，更是学习中国制瓷技术的产物。"濑户烧"的创始人藤原景正曾于公元1223年随日僧道元入宋，学习了六年的制瓷技术。因他回国后所烧制的"濑户烧"对日本制瓷业产生重大影响，身后被追称为日本的"陶祖"。

海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在宋代也向中国传播。宋真宗时，日本人滕木吉随宋朝海商来华，向宋真宗进献日本的"唱和诗"，使中国人对日本的这种文学有所了解。到泉州港贸易的埃及人，教给了泉州府所属永春县居民用树灰净糖的方法，该地区的制糖技术因此有了重大改进。一些阿拉伯地区的建筑艺术，这时期也随着"住唐"的蕃客，被带到中国的广州、泉州等海港城市。今天仍屹立在泉州涂门街的清净寺，就是北宋时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礼拜寺的形状建筑的。该寺现存的圆形穹顶，尖拱形大门，以及"奉天坛"的墙壁门窗和壁龛，都具有浓厚的阿拉伯宗教建筑的风格。这座清净寺，就是宋代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建筑艺术互相交流，阿拉伯建筑艺术传入中国的一个历史见证。

附录一　两宋世系表



①英宗为宋太宗第四子赵元份之孙，因仁宗无子，被收为养子而继皇位。

②孝宗为宋太祖子赵德芳的后裔，因宋高宗无子，被收为养子而继皇位，从此宋朝帝系转为宋太祖支派。

③理宗为宋太祖子赵德昭后裔，因宁宗无子，被收为养子而继皇位。

④度宗为理宗之侄，因理宗无子，被立为皇太子而继皇位。

附录二　宋代大事年表

中国纪年	公元纪年	大　事
太祖建隆元年	960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
建隆二年	961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乾德元年	963	慕容延钊、李处耘率宋兵一举消灭荆南、湖南两个割据政权，北宋开始进行统一战争。初以文臣知州事，着手削弱地方节度使权力。
乾德二年	964	王全斌、曹彬率师分道伐后蜀。翌年，后蜀被消灭，因宋兵滥肆杀掠，蜀降兵拥全师雄为帅起义。北宋始置诸路转运使。
开宝元年	968	李继勋率宋兵伐北汉，遇契丹兵援汉而返。
开宝二年	969	宋太祖亲率大军伐北汉，因久攻太原不下而撤军。
开宝三年	970	潘美、尹崇珂率师伐南汉。翌年，南汉亡，宋在广州首置市舶司。
开宝七年	974	曹彬率宋兵伐南唐。翌年，南唐亡。
开宝九年	976	宋五路兵攻北汉未果。宋太祖在斧光烛影下死去。宋太宗即位，改元太平兴国。
太宗太平兴国三年	978	陈洪进纳土，漳、泉平。吴越国王钱俶纳土，南方的割据政权至此全部削平。
太平兴国四年	979	宋太宗亲率大军伐北汉，北汉亡，北宋实现局部统一。宋太宗乘胜出师幽燕，在幽州城下高粱河为辽兵击败。辽开始连年南侵。

太平兴国八年	983	辽恢复契丹国号。西夏李继迁发动反宋斗争，宋西夏战争启端。
雍熙三年	986	宋朝曹彬、田重进、潘美分三路率兵攻契丹，因指挥失误全线溃败，抗辽名将杨业被俘绝食而死。西夏李继迁同契丹联婚，后被契丹册为夏国王。
淳化四年	993	四川爆发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口号。翌年，起义军建立大蜀政权，旋失败。
至道三年	997	宋太宗死，宋真宗即位。宋封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承认其割据地位。
真宗咸平六年	1003	西夏李继迁在扩张势力的战争中中流矢死，子德明继立。
景德元年	1004	契丹大举南侵，宋与契丹订立澶渊之盟。
景德三年	1006	宋、西夏订立和议，宋封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
大中祥符元年	1008	宋真宗为掩饰澶州城下定盟之耻，开始搞天书骗局，并东封泰山。后又祀汾阴、亲谒亳州太清宫。
乾兴元年	1022	宋真宗死，宋仁宗即位，刘太后垂帘听政。
明道二年	1033	刘太后死，宋仁宗亲政。
宝元元年	1038	西夏赵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
宝元二年	1039	宋下令削元昊官爵及赐姓，绝与西夏的和市，宋西夏战争旋即爆发。
康定元年	1040	西夏大败宋兵于延州三川口。宋朝派韩琦、范仲淹赴陕组织对西夏的防御战争。
庆历二年	1042	辽趁宋受西夏困扰，陈兵幽州，迫使宋增加向辽输纳岁币。
庆历三年	1043	王伦、张海、郭邈山等农民起义相继爆发。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开始推行“庆历新政”。

庆历四年	1044	“庆历新政”夭折。宋再次与西夏订立和议，册元昊为夏国主。契丹攻西夏遭惨败，宋、辽、西夏对峙局面确立。
庆历七年	1047	贝州王则起义。
皇祐元年	1049	广源州蛮侬智高侵扰广南。翌年，宋遣狄青率师讨伐，侬智高败走大理被杀。
嘉祐四年	1059	王安石上万言书，向宋仁宗陈述变法主张。
嘉祐八年	1063	宋仁宗死，宋英宗即位。
英宗治平四年	1067	宋英宗死。宋神宗即位，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
神宗熙宁二年	1069	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着手推行熙宁变法。翌年，王安石被任为宰相。
熙宁八年	1075	宋逼于辽的压力，与辽重划河东地界，失地七百里。
熙宁九年	1076	交阯入侵广西，屠邕州。宋出兵还击。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宋神宗亲自主持推行新法。
元丰三年	1080	宋神宗改定官制。
元丰四年	1081	宋神宗下令兴五路师进攻西夏，翌年，以败绩告终。
元丰八年	1085	宋神宗死。宋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同听政，起用司马光，开始废罢熙宁新法。
哲宗元祐八年	1093	太皇太后高氏死，宋哲宗亲政，重行新法。
元符三年	1100	宋哲宗死，其弟宋徽宗继位。
徽宗政和七年	1117	道箓院册宋徽宗为教主道君皇帝。
宣和二年	1120	宋、金订立海上之盟，约定共同出兵灭辽。睦州方腊起义。宋江横行河朔。翌年，宋江、方腊起义相继失败。
宣和四年	1122	宋两次出兵攻辽皆告惨败，童贯密邀金兵攻辽燕京，辽亡。

宣和七年	1125	金兵大举南侵，宋徽宗禅位与宋钦宗。李纲守卫开封。
钦宗靖康元年	1126	金兵再次围攻开封。
靖康二年 高宗建炎元年	1127	徽、钦二帝被金兵俘掳，北宋亡。宋高宗于南京重建南宋政权，是年又逃至扬州。
建炎三年	1129	宋高宗由扬州逃到杭州。南宋发生苗刘之变。金兀术渡江南侵。
建炎四年	1130	湖南钟相起义。兀术自江南北撤，韩世忠组织黄天荡之役。福建范汝为起义。金朝立刘豫为伪齐皇帝，并派秦桧潜回南宋。张浚在陕西组织富平会战。
绍兴元年	1131	吴玠和尚原大捷，挫败兀术入蜀计划。秦桧拜相，翌年被罢。
绍兴四年	1134	吴玠仙人关大捷。岳飞收复襄阳六郡。兀术会同刘豫渡淮南侵遭惨败。
绍兴七年	1137	金朝废刘豫，拟同南宋议和。宋高宗起用秦桧为枢密使。
绍兴八年	1138	秦桧任宰相兼枢密使。金归宋河南、陕西地，宋对金称臣。
绍兴九年	1139	金朝内讧，主持对宋和议的挞懒被杀。
绍兴十年	1140	兀术分道南侵，夺回河南、陕西地。刘錡率“八字军”在顺昌获捷。岳飞进兵中原。宋高宗、秦桧十二道金牌强令岳飞撤兵。
绍兴十一年	1141	宋高宗罢岳飞等大将兵权。兀术南侵，大败于柘皋。高宗及秦桧以“莫须有”罪名陷害岳飞。宋、金订立“绍兴和议”。
绍兴三十一年	1161	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虞允文采石大捷。
绍兴三十二年	1162	宋高宗禅位与养子宋孝宗。宋廷为岳飞的冤案昭雪。
孝宗隆兴元年	1163	张浚北伐，在符离败绩。
隆兴二年	1164	南宋与金订立“隆兴和议”。

乾道元年	1165	郴州李金起义。
淳熙二年	1175	湖北茶贩赖文政起义。
淳熙六年	1179	郴州陈峒起义。广西李接起义。
淳熙十六年	1189	宋孝宗禅位与宋光宗。
光宗绍熙五年	1194	宋孝宗死，宋光宗退位。宋宁宗即位，开始韩侂胄专权时期。
宁宗开禧二年	1206	韩侂胄北伐失败，翌年被杀，开始史弥远专权时期。
嘉定元年	1208	宋、金订立“嘉定和议”。
嘉定七年	1214	金朝在蒙古侵扰下迁都汴京，南宋停止向金输纳岁币。
嘉定十年	1217	金兵分路南侵，宋金战争再起。
嘉定十七年	1224	宋宁宗死，史弥远废掉皇太子赵竑，另立宋理宗为傀儡皇帝。
理宗绍定二年	1229	晏梦彪在漳州潭飞磜起义。
绍定六年	1233	史弥远病死，宋理宗亲政。蒙古兵攻陷金朝都城汴京，金哀宗逃到蔡州。南宋与蒙古联兵围攻蔡州。
端平元年	1234	蒙宋联军灭金。南宋乘机进军收复三京，在洛阳溃败，宋蒙战争启端。
端平二年	1235	蒙古兵开始发动对南宋大规模攻势，宋蒙战争全面爆发。
淳祐三年	1243	南宋派余玠为四川制置使，经营钓鱼山防御体系。
宝祐六年	1258	蒙古大汗蒙哥分兵三路再次大举进攻南宋。
开庆元年	1259	南宋王坚在钓鱼山获捷，蒙哥死于钓鱼山战场。忽必烈围攻鄂州。贾似道同忽必烈私订和约。
景定元年	1260	贾似道秘密拘押忽必烈的使臣郝经。南宋将领刘整献泸州降蒙。
景定二年	1261	贾似道实行“买公田”。

景定五年	1264	蒙古大汗忽必烈迁都燕京，准备消灭南宋。宋理宗死，贾似道拥立宋度宗继位。
度宗咸淳五年	1269	蒙古军包围樊城。
咸淳七年	1271	蒙古军包围襄阳。忽必烈改国号为元。
咸淳九年	1273	樊城、襄阳相继失守。
咸淳十年	1274	宋度宗死，幼子帝㬎继位，太皇太后谢氏临朝听政。元兵水陆并进，大举进攻南宋。
帝㬎德祐元年	1275	宋蒙进行鲁港之役。贾似道被击死于漳州木棉庵。
德祐二年	1276	伯颜率元兵入临安，南宋灭亡。
帝昺祥兴二年	1279	张世杰、陆秀夫的抗元斗争失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宋朝史话
作者=吴泰著
页数=256
SS号=12447750
出版日期=2009.10